



ISSN 3080-3039

eISSN 3080-3047

維普數據庫全文收錄

Modern Education



WISVORA



Gotu Track
国图出版

ISSN 3080-3039



9 773080 303002



2026

第2卷第3期

3

中國現代教育學報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中國現代教育學報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主辦 香港社會科學學術智庫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編輯出版 廣東國圖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現代教育學報》編輯部

編輯部郵箱 jyxb@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HONG KO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THINK TANK LIMITED
香港社會科學學術智庫有限公司

總編輯 梅見華

編輯委員會

陳科存	孫文傑	蘇天	穆艾偉	熊森浩
劉偉偉	呂憬巖	黃少安	劉宇	葉明裕
陳曦	景瑞賓	崔健	王正威	李澤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吳鈺雙	穆尚海	曹一君
陳立立	舒波	袁臣輝	郝澳茹	

版權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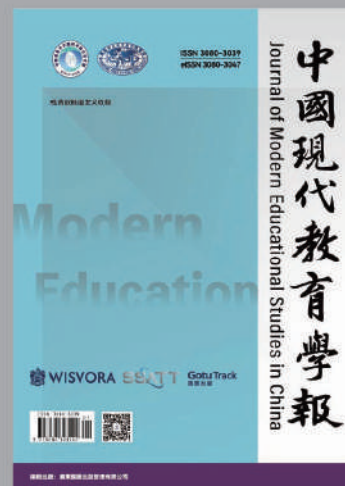
文章版權由文章作者所有，單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所刊載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進行許可。根據該許可協議，任何第三方在明確署名原作者與出處的前提下，均可對本刊內容進行複製、傳播、演繹使用，無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個別授權。



Gotu Track
國圖出版

廣東國圖專注於數位學術出版基礎建設與學術服務創新，致力為全球科研工作提供專業、規範、高效的出版支援。公司透過建置數字期刊平台、孵化高水準學術期刊、提供國際出版服務，通過出版學術期刊、舉辦學術會議，推動學術界與社會各界的對話與合作。

www.wisvora.com gotu-track@wisvora.com



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

印刷出版 ISSN 3080-3039

網上出版 ISSN 3080-3047

維普數據庫全文收錄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維思沃爾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界將軍澳景嶺街 99 號啟德
工業大廈 8 樓 D07
publisher@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國大陸編輯出版
廣東國圖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本刊依投稿原稿字體發行
不作繁簡互轉調整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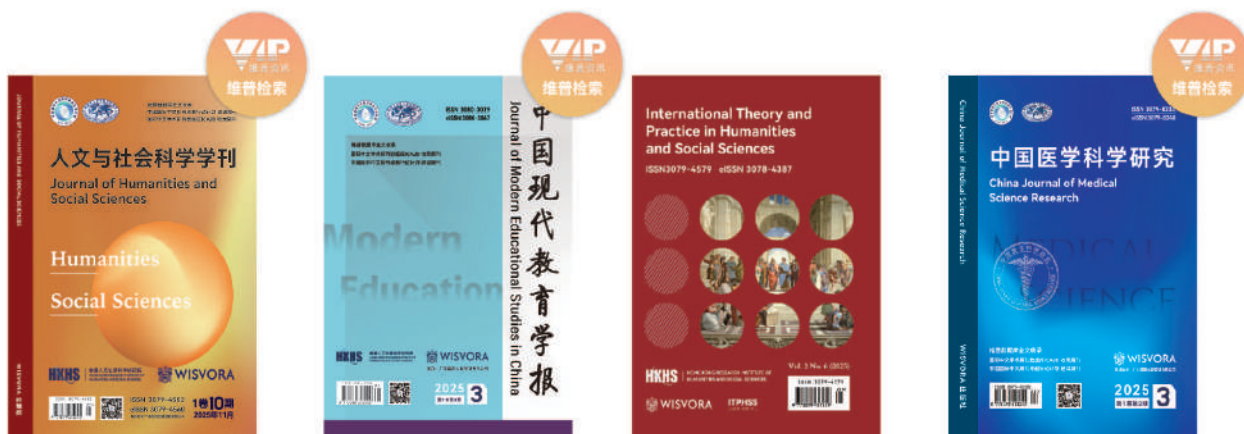
維思沃爾出版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WISVORA

Gotu Track
国图出版



WISVORA是一家致力于促进创新和社会进步的国际学术出版商。我们相信，跨学科前沿研究对于理解世界和解决现实挑战至关重要。WISVORA出版社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致力于打破学科界限，将研究见解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深入的分析和有效的策略。

WISVORA 还致力于推动中文学术成果的全球传播，设立多个覆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管理、艺术等领域的中文学术期刊，为中文作者提供便利、更高效、更专业的发表选择。我们重视学术原创性与表达自由，采用快速审稿、开放获取、普惠版面费机制，努力构建一个包容、多元、国际视野下的中文学术传播平台，助力更多优质中文研究走向世界、服务社会。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10+

我们目前已成功运营10余本学术期刊，涵盖人文社科、管理、艺术、教育等多个领域

我们运营的期刊数量

400+

已有来自全球的300多位学者参与我们期刊的编辑、审稿与学术合作

我们的合作学者数量

10000+

我们的作者社群已超过3000人，汇聚青年学者、博士生与研究机构专家

我们的作者社群规模

www.wisvora.com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慢就业”家庭困难学生就业软实力提升路径探究——以吉林省民办高校为例-陈韬宇，辛琦媛，孟令军.....1-5

精准教学模式下“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教学的数字化实践——以作业设计为例 - 辛琦媛、毕英博、陈韬宇.....6-9

中西面点融合发展回顾与教学启示 - 祁恩红..... 10-14

小学汉语拼音教学中介音归属划分机制与教学策略研究 - 张健、王海红、田纯、袁田雨、辛静怡15-20

从“描写”到“规范”——《汉语大字典》修订中的义项增删与当代汉语词汇知识库的建构 - 沈士博、熊灿、张程.....21-30

MATLAB 软件在医学高等数学数字化改革的实践探索 - 王静、顾锦裕、陈唯贤、丁有得..... 31-36

课内到课外：教师支持与校园体育氛围对大学生课外锻炼意向的影响——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 - 胡海红、丰华..... 37-42

UbD 理论在初中历史单元教学设计中的应用与优化路径 - 骆建豪、马子含.....43-47

数字化赋能：应急管理课程思政的融合模式与教学实践 - 张瑞、程兵芬、高蕾..... 48-51

广东省民办高校英语教师数字素养调查报告——基于扎根理论与 NVivo12 的质性研究 - 丛蕊.....52-57

劳动精神融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索 - 尹雪雪.....58-62

艺术类大学生消极完美主义与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 - 王莹莹、杨绿.....63-67

学习场景驱动下大学生 AI 学习工具使用意愿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实证分析 - 汪琪、章瑶魏晨、陈宇..... 68-73

面向实战的大学生应急救援技能赋能路径研究与实践 - 王剑、司俊鸿、孙孟晨.....74-78

大概念统领下初中历史单元教学的设计逻辑与实施路径 - 骆建豪.....79-83

数智赋能·大创筑基·价值引领：大学数学类课程教学改革新实践 - 田怀谷、梅鹏、章培军、施旸婉婷、曹云波、李小敏	84-90
广西壮汉双语师范生定向培养政策的演进逻辑与优化路径 - 高超、林明	91-97
AI 赋能幼儿教师融合教育实践的个案研究 - 田俞茜、何书瑶、张家瑶、郑萱琪	98-104
虚拟仿真赋能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理论逻辑与实现机制 - 李霞, 丁惠炯	105-112
数字营销视域下品牌管理课程教学优化研究 - 张琬玥	113-116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 詹榕榕	117-123
儿童钢琴学习中民族音乐启蒙的路径与方法研究 - 袁小龙, 周莲怡	124-127
大思政一体化视阈下中学少先队红色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研究 - 曾丽玲	128-132
具身认知视域下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设计初探 - 乐冰洁	133-141
智能算法驱动下青年价值引领的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 - 蔡蕊	142-147
数字文化赋能：国际理解教育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张力与突破 - 王凡	148-155
青少年创伤心理影视表征的情绪传播机制与行为模仿风险研究 - 孟杨、陈矿	156-162
高校辅导员“精准思政—心理护航—生涯赋能”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 刘杰	163-168
质量保障视域下西部高校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研究 - 聂浩虹、吴钰双	169-173
人工智能背景下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 谭盼、陈鸣	174-178
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 农文君	179-182
地方高校教育硕士学科教学（数学）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的思考 - 程从华、李燕章、曾欣怡	183-187
西部高校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的实践路径与育人机制研究 - 聂浩虹、吴钰双	188-195
无障碍理念下的老年住宅室内空间优化设计策略研究 - 农蒋怡、莫雯雯	196-201
壮族文化在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中的研究 - 袁泽佑、陈小霞、郑婷	202-206
基于仿生理念的儿童趣味性家具设计研究 - 麦堡勇、韦远通、覃华盛	207-212
"新文科"背景下《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 汪洋	213-217

“慢就业”家庭困难学生就业软实力提升路径探究 ——以吉林省民办高校为例

陈韬宇¹ 辛琦媛¹ 孟令军^{1*}

(1.长春光华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33)

摘要: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日益突出,家庭困难学生因资源匮乏、职业规划模糊等问题,在就业市场中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本研究聚焦民办高校“慢就业”家庭困难学生群体,在界定就业软实力内涵的基础上,从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协作经验、职业规划意识、心理韧性四个维度,系统分析该群体就业软实力的现实困境与深层成因,并从精准化信息识别、双轨师资建设、核心能力课程开发、全流程跟踪反馈四个层面,探索系统化的就业软实力提升路径,从而为民办高校完善精准化就业帮扶体系、促进困难学生高质量就业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思路。

基金项目:2025年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吉林省民办高校“慢就业”家庭困难学生就业软实力提升路径探究”(课题编号 202513600005)

关键词:民办高校;“慢就业”;家庭困难学生;就业软实力;提升路径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548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for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Soft Skills of Students from Families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Who Choose“Slow Employment”——Taking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Jili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Chen Taoyu¹, Xin Qiyuan¹, Meng Lingjun^{1*}

¹ Affiliation, Changchun Guanghua College, Jilin(Province), Changchun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slow employment" among college graduat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tudents from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face even more severe challenges in the job market due to issues such as scarce resources and vague career planning.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group of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students with "slow employment"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employment soft power,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and deep-seated causes of the employment soft power of this group from four dimensions: communication and expression ability, teamwork experience, career planning awareness,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t also explores systematic paths to enhance employment soft

作者简介:陈韬宇(2006—),男,本科,研究方向为“慢就业”、学前教育;

辛琦媛(1990—),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

孟令军(1989—),男,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高等教育。

通讯作者:孟令军

power from four aspects: precise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dual-track faculty construction, core ability course development, and full-process tracking feedback. This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deas for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ir precise employment assistance system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mployment for disadvantaged students.

Keywords: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low employment"; student from families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employment soft power; improving path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持续加快,高校毕业生规模逐年攀升。2025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 1222 万人,同比增加 43 万人;2026 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升至 1270 万人,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在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的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其中“慢就业”现象尤为值得关注^[1]。调查数据显示,2022 年至 2024 年高校毕业生中“慢就业”的占比分别为 15.9%、18.9%、19.1%,呈逐年上升趋势。另有报告显示,2026 届毕业生中约有 10.3%选择暂不就业或等待更优机会,这一比例较上一届提升了 0.9 个百分点。

对于家庭困难学生而言,“慢就业”往往并非主动规划与从容等待,而是因就业竞争力不足、职业规划模糊而被迫延缓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不仅使学生在经济与心理上承受双重压力,更可能进一步加剧家庭负担,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帮扶,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吉林省民办高校作为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生数量逐年增加,生源结构中家庭困难学生占比较高。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高校在办学资源、社会声誉、校企合作平台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其家庭困难学生在沟通表达、团队协作、职场适应等就业软实力方面的短板尤为突出。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和产业持续升级,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要求不断提高,仅凭专业知识和技能已难以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取得优势。因此,聚焦民办高校“慢就业”家庭困难学生群体,探究就业软实力的系统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就业软实力的概念内涵与研究现状

就业软实力是指求职者在求职过程和职业发展中所需要的、超越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的非认知能力集合,主要包括沟通表达能力、人际交

往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心理调适能力及职业规划意识等核心要素。当前,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学历文凭与专业技能,更加关注毕业生在实际工作场景中是否善于沟通协调、是否具备团队意识。把握企业真实需求,从内涵层面厘清就业软实力的构成维度,是精准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的逻辑起点。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当前学界对大学生就业软实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培养理念与模式探讨。游静在企业需求背景下对就业软实力的内涵进行解析,从职业素养、通用能力、心理资本等维度进行了系统划分^[2]。在人力资本与就业的关系方面,已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质量呈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是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质量的重要变量,积累的人力资本越多,其就业质量可能越高。

在“慢就业”现象的专门研究中,已有文献多从社会、高校、家庭、个人四个层面探寻原因与对策,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探索路径以提升就业指导服务质量。也有研究者从精准就业质量提升的视角,探讨了加强职业规划教育、深化高校与用人单位联系等策略。然而,将研究视域聚焦于民办高校领域、专门针对家庭困难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就业软实力研究,目前仍较为薄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获取社会资源和参与实践的平台相对有限,其自身的资本积累不足,这恰恰是导致其就业竞争力弱于同龄人的深层原因。已有研究基于实证数据发现,以家庭经济地位等为表征的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这为本研究聚焦民办高校“慢就业”家庭困难学生的软实力提升提供了理论出发点与问题切入点。

三、“慢就业”家庭困难学生就业软实力的现实困境

家庭困难学生就业软实力的不足体现在多个层面,且各问题之间相互交织、互为因果,构成了制约其顺利就业与职业发展的复合性困境。

（一）沟通表达能力欠缺，自我呈现效果不佳

沟通表达能力是求职过程中最基础、最直接的核心软实力，直接影响面试官的第一印象和录用决策。部分家庭困难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因家庭文化资本相对薄弱，日常生活中缺少充分表达自我、参与讨论的家庭氛围与社交场景，在正式场合往往表现为语言组织逻辑性不强、表达自信心不足、难以精准呈现自身优势。在求职面试这一高压情境中，紧张忘词、回答空泛、互动被动等情况时有发生，使得一些专业基础尚可的学生因临场表现不佳而在首轮筛选中失去竞争优势，出现了“具备能力却无法有效展示”的困境。

（二）团队协作经验匮乏，合作意识有待培养

用人单位普遍将团队协作能力作为遴选人才的重要标准，而这一能力的形成依赖于丰富的团队实践经历。家庭困难学生课余时间多用于勤工俭学以减轻经济负担，参与学生社团、学科竞赛、志愿服务等集体性活动的机会和时间较为有限。缺少在团队情境中锻炼协作与协调能力的平台，使得部分学生在小组讨论、无领导小组面试等环节中缺乏角色定位意识，不善于倾听与回应他人观点，难以有效展现合作精神。这一短板在职场初期便会显露，影响融入团队的速度和职业发展节奏。

（三）职业规划意识模糊，求职行为缺乏方向

清晰的职业规划能够引导学生有针对性地积累能力与经验，然而部分家庭困难学生对自身兴趣、性格、能力缺乏系统认知，对外部职业世界的信息了解也较为有限。由于社会关系网络相对狭窄，其信息来源主要依靠同学交流与网络碎片化信息，缺少系统性职业探索的机会。这使得学生临近毕业时仍缺乏清晰的职业目标，就业方向感不强，求职行为带有较大盲目性，容易陷入“随大流报考”或“先等等看”的被动状态。职业规划的缺位使本已有限的求职准备期被进一步压缩，增加了陷入被动“慢就业”的风险。

（四）心理韧性有待加强，应对挫折能力不足

家庭困难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承受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来自经济拮据带来的现实紧迫感，另一方面来自就业竞争引发的持续焦虑。由于缺乏有效的压力调节策略和充足的心理支持资源，部分学生在遭遇简历石沉大海、面试接连失利等挫折后，容易产生自我否定与习得性无助，求职主动性随之降低。心理韧性是个体面对逆境、挫折和压力时能够有效应对并迅速恢复的心理品质，其强弱

不仅影响当下的求职行为持续性，也可能对长远的职业发展信心产生深远影响^[4]。这一问题若得不到及时干预，极易陷入“越挫败越退缩、越退缩越难就业”的恶性循环。

上述四个问题并非各自孤立，而是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沟通能力不足加剧面试失利，反复失败侵蚀心理韧性，信心下降使职业规划趋于保守，而缺乏规划又导致软实力提升失去方向。因此，就业软实力的提升不能局限于单一能力的修补，而需要构建系统化的综合帮扶路径。

四、就业软实力提升路径构建

针对上述问题及其内在关联，本研究提出涵盖识别、支持、培养、巩固四个环节的系统化提升路径。

（一）构建精准化信息收集与识别体系

精准帮扶的前提是对学生情况进行精准掌握。建议依托学校学生工作系统，联合辅导员、班主任等一线学生工作人员，通过专项摸排与日常观察相结合的方式，从多维度收集信息：一是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困难等级、主要经济来源、受资助情况等；二是就业心理状态，包括就业意愿强度、焦虑水平等；三是软实力基本情况，通过自评量表或结构化访谈，了解学生在沟通、协作、规划等方面的自我认知与主要困难。在充分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的前提下建立帮扶档案库，将学生初步分为“能力提升型”“心理支持型”“规划引导型”等不同类别。

在国家政策层面，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已明确要求离校前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并提供至少1次政策宣介、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1次培训或见习机会的“1311”实名服务。吉林省也实施了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建立实名制台账，全面提供“1311×N”服务，聚焦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等困难高校毕业生，组织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民办高校应充分对接上述政策资源，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际帮扶成效，同时在校内层面进一步完善信息识别与分类机制，为后续施策提供有力依据^[5]。

（二）建设“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双轨师资队伍

师资力量是软实力提升的关键保障，单一的校内师资难以满足学生的多元化需求。建议从两个方向进行师资整合与优化。

校内方面，遴选就业指导课教师、心理咨询

教师及具有企业实践或社会服务经验的专业课教师, 组建核心指导团队, 侧重课程研发、日常辅导与心理支持。通过系统培训统一教学理念与方法, 确保指导服务的专业性与连贯性。

校外方面, 充分挖掘校友资源。邀请在不同行业稳定发展、职业成长路径清晰的往届毕业生, 特别是同样来自家庭困难背景、经过自身努力实现良好职业发展的优秀校友, 担任校外朋辈导师。校外导师以讲座、工作坊、线上交流等灵活多样的形式, 分享亲身求职经历、职场成长心得和实用技巧。校内导师侧重于提供理论框架与系统性指导, 校外导师贡献实践经验与榜样力量, 二者协同配合, 可有效增强帮扶的说服力、亲和力与实效性。

(三) 开发“求职技能+职场能力+心理调适”模块化课程

课程内容应突出问题导向与实操性, 采用模块化设计, 各模块相对独立又彼此衔接, 便于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灵活组合实施。

第一模块为求职技能训练。聚焦求职前期准备与面试表现, 内容包括: 简历制作工作坊, 讲解简历结构、亮点提炼与针对性修改技巧; 职业形象与面试礼仪, 涵盖着装规范、仪态管理、入场离场礼节等基本要素; 模拟面试实训, 设置一对一面试与无领导小组讨论两种情境, 由指导教师担任面试官, 现场进行表现点评与改进指导。通过反复演练与即时反馈, 降低学生对面试情境的陌生感与焦虑感, 提升临场发挥的稳定性。

第二模块为职场能力培养。聚焦进入职场后的核心工作软实力, 重点训练三项能力: 沟通表达能力, 通过即兴演讲、观点阐述、工作汇报模拟等练习, 提升语言组织与信息传递的清晰度; 团队协作能力, 设置小组项目任务, 让学生在分工、协商、整合成果的过程中体验团队运作机制, 学会倾听、妥协与建设性表达; 执行力与时间管理, 通过案例讨论与工具实操, 帮助学生掌握任务拆解、优先级排序和高效完成工作的基本方法。

第三模块为心理调适辅导。聚焦求职期间的心理支持与韧性培养, 由心理健康教师或专业咨询师组织开展团体辅导活动。内容可涵盖: 情绪觉察与表达训练, 帮助学生识别焦虑、挫败等情绪信号并学会合理宣泄; 认知重构练习, 引导学生审视求职中的非理性信念, 建立更加灵活、积极的归因方式; 正念减压与放松训练, 传授简单易行的身心调节方法。团体辅导中形成的同伴支

持效应, 也有助于学生感受到“并非独自面对困难”, 从而增强坚持求职的内在动力。

(四) 建立全流程跟踪反馈与持续优化机制

有效的帮扶不是一次性活动, 而应贯穿学生求职全过程。建议建立涵盖“培训记录—实践追踪—收集反馈—动态调整”四个环节的闭环机制。

培训期间, 由指导教师团队记录学生的出勤情况、课堂参与度、任务完成质量等过程性表现, 为后续个性化指导积累基础数据。培训结束后, 通过定期线上回访、求职进展月报等方式, 持续跟踪学生的求职动态、面试经历、录用结果等关键节点信息。同步收集学生对课程内容、师资水平、组织形式的满意度评价与改进建议。定期汇总分析追踪数据与反馈意见, 识别效果显著的做法与需要调整的环节, 对课程设置、师资配置、支持策略进行动态优化, 使帮扶工作保持持续适应性和改进能力, 逐步形成符合本校实际、可复制推广的有效经验^[6]。

五、结语

“慢就业”家庭困难学生的就业问题, 不仅是高等教育领域的育人课题, 更是关乎社会公平与代际流动的重要民生议题。在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用人单位对综合素质要求不断提高的当下, 就业软实力的提升已非锦上添花, 而是补齐短板、实现公平竞争的关键之举。对于民办高校的家庭困难学生而言, 软实力的不足往往是其从“校门”到“职场”这段路程中最隐蔽却最顽固的障碍。打破这一障碍, 需要的是系统化的制度设计而非零散的帮扶举措, 需要的是持续性的能力培养而非一次性的就业指导。

本研究从精准化信息识别、双轨师资建设、模块化课程开发以及全流程跟踪反馈四个维度, 探索了适合民办高校实际条件的就业软实力系统提升路径。这四环路径层层递进、互为支撑: 精准识别为分类措施提供基础, 双轨师资为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模块化课程为能力塑造提供抓手, 跟踪反馈为持续改进提供动力。唯有打通这四环, 才能将帮扶从碎片化的活动整合为可复制的系统工程, 真正助力家庭困难学生凭借自身能力的提升在就业市场中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随着高校就业工作精细化的不断推进, 对家庭困难学生就业软实力的培养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期待更多民办高校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和学生的实际需求, 积极探索本土化的软实力提升方案, 让每一个家庭困难学生都能在走出校门之际,

不仅拥有一纸文凭，更拥有立足于社会的综合能力，以高质量就业带动家庭走出困境，融入更为广阔的人生发展舞台。

参考文献：

[1] 刘宇文.当前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20):69-75.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0.009.

[2] 游静.企业需求背景下职业学校学生就业软实力内涵解析及多维提升[J].继续教育研究,2023,(7):66-69.

[3] 刘新华,杨艳.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差序就业——关于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影响的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3,(5):66-68.

[4] 李晓,余娟,汪海红,等.家庭经济困难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影响的——以孤独感为中介[J].现代预防医学,2019,46(11):1990-1994.

[5] 李逸.高校大学生“慢就业”精准帮扶策略探讨——评《“慢就业”形势下大学生就业精准服务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24,(8):I0022-I0022.

[6] 王以梁.大学生“慢就业”的现状、成因与应对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2023,(11):106-111.

精准教学模式下“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教学的数字化实践 ——以作业设计为例

辛琦媛¹ 毕英博¹ 陈韬宇¹

(1. 长春光华学院, 吉林长春 130033)

摘要: 为顺应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落实职业教育改革政策, 破解高职“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作业存在的内容维度单一、能力阶层模糊、评价方式固化等痛点, 本研究依托混合式精准教学模式, 以学习通智慧平台、AI 助教等数字技术为支撑, 构建了“三阶递进, 多维融合”的作业设计体系。通过确立“基础认知—综合应用—创新实践”的三阶作业目标, 搭建知识建构、文化认同、思维迁移、价值塑造、实践转化的五维作业内容,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实施方法与“维度+阶层+多主体”多元评价模式, 实现作业体系的数字化革新。该实践有效衔接幼儿园保教岗位需求, 解决了课程“学用脱节”问题, 助力学生历史素养、实践能力与创新素质的协同提升, 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作业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精准教学; 中外学前教育史; 数字化

基金项目: 2025 年度吉林省职业教育科研课题: 高职“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三阶递进, 多维融合”式作业设计的实践研究(课题编号: 2025XHY244)。2025 年长春光华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数字化赋能“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混合式精准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课题编号: 2025GHJY02002)。2025 年吉林省高教科研课题: 数字化赋能高职院校“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研究(课题编号: JGJX25D1100)。2025 年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吉林省民办高校“慢就业”家庭困难学生就业软实力提升路径探究”(项目编号: 202513600005)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550

Digital Practice of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Preschool Education" Course Teaching under Blended Precision Teaching Mode: Taking Homework Design as an Example

Xin Qiyuan¹ Bi Yingbo¹ Chen Taoyu¹

1. Changchun Guanghua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 130033, China

Abstrac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implement the polici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to address the pain points existing in the "Histor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course assignm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uch as single content dimensions, ambiguous ability levels, and rigid evaluation methods, this study, relying on a blended precise teaching model and supported by digital

作者简介: 辛琦媛(1990-), 女, 吉林省长春市, 硕士, 长春光华学院现代教育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学前教育。

毕英博(2005-), 男, 吉林省四平市, 长春光华学院学前教育系学生, 研究方向: 学前教育。

6 陈韬宇(2006-), 男, 浙江省金华市, 长春光华学院学前教育系学生, 研究方向: 学前教育。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Learning Pass smart platform and AI teaching assistants, has constructed a "three-stage progressive" system. The "Fiv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assignment design system. By establishing a three-stage operation goal of "basic cognition -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 innovative practice", building a five-dimensional operation content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cultural identity, thinking transfer, value shaping and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adopting a "online + offline" hybrid implementation method and a "dimension + level + multi-subject" multi-evaluation model, the digital innovation of the operation system is achieved. This practice effectively connects the demand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care positions, resolves the issue of "disconnection between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in courses, and promotes the coordinated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historical literacy,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ve quality. It provides a replicable practical path for the reform of course assignments in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 Precision teaching. The histor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Digitalization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精准思维，做到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当，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高校应着力锤炼精准思维，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深化精准教学改革，通过技术赋能与教学创新双向发力，推动数字时代课程教学提质增效。

一、“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作业设计数字化实践的价值意蕴

（一）时代要求：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呼唤作业体系革新

我国学前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明确要求强化师范生综合素质，但该课程现有作业多停留在史料背诵、知识点默写层面，缺乏综合应用与实践转化设计，导致学生“学用脱节”，作业体系革新势在必行。

（二）政策推动：职业教育政策为作业设计提供明确指引

国家近年职业教育政策，为“三阶递进，五维融合”式作业设计提供坚实支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知行合一、工学结合”，确立实践教学核心地位，为作业设计对接幼儿园保教实际奠基。《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与作业设计的全面性、能力进阶逻辑高度契合。《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2025版）》明确“典型工作任务导向”，强调知识综合运用，提供最新政策依据。

（三）教学急需：课程作业设计存在突出痛点

“中外学前教育史”作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核心课程，当前作业设计存在显著短板：一是内

容维度单一，聚焦知识记忆，缺文化对比、价值塑造与实践转化内容；二是能力阶层模糊，未形成“基础认知—综合应用—创新实践”进阶逻辑；三是评价方式固化，以“答案正确性”为核心，忽视思维过程与创新意识。这严重制约教学质量与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亟需“三阶递进，五维融合”式作业设计系统性破解。

本研究立足学前教育发展需求与教学实际，探索“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作业设计的有效路径，优化内容体系与评价标准，为培养高素质幼儿教师提供实践支撑，契合国家职业教育与学前教育改革方向。

二、“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混合式精准教学模式的运行逻辑

“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是我校课程质量评价优秀示范课程，也是我校第一批立项建设的智慧课程。“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混合式精准教学模式的运行逻辑，将围绕精准学情诊断、精准目标设定、精准资源推送、精准过程调控、精准质量评价、精准教学实施这几个方面进行。

（一）精准学情诊断：线上数据+线下观察

线上依托多模态数智技术，结合学习通图谱工具、数据分析及AI助教，梳理“中外学前教育史”知识点关联网络。通过知识图谱定位后进生基础知识盲区，借助能力图谱识别中等生知识迁移短板，结合拓展任务数据发现优良生高阶探究目标差距，AI助教汇总生成学情报告，直观呈现认知短板。

线下以“分层观察+个性访谈”补充数据。记录后进生课堂概念卡顿、笔记中教育家思想混淆及制度理解误区，关注中等生小组讨论逻辑衔接问题并梳理知识运用障碍，跟踪优良生实践探究思维局限及高阶能力需求，最终形成立体分层

学情画像。

（二）精准目标设定：线上追踪+线下落地

线上依托学习通目标图谱分层设定目标。为后进生聚焦“中外学前教育史”核心知识点达标，平台实时更新基础目标进度；为中等生侧重中外教育思想关联对比、制度演变影响分析，支持个性化学习路径；为优良生强调深度探究与创新思考，教师动态监测各层次目标达成情况。

线下细化落地方案。后进生通过平台章节微课开展基础知识点强化训练，夯实根基；中等生依托平台课程案例资源，开展知识应用专题研讨，梳理教育思想与制度的逻辑关联；优良生参与创新实践工作坊，围绕主题探究，线下表现同步至平台，实现分层目标双向衔接。

（三）精准资源推送：线上匹配+线下转化

线上依托学习通智能资源库与知识图谱，按层次精准匹配资源。为后进生推送微课、基础练习题等基础资源包，AI助教按薄弱项定向推送；为中等生提供教育思想与制度整合资料、典型案例及应用训练题，支持通过图谱自主拓展关联内容；为优良生推送深度研究文献、创新探究任务书，资源随学习表现动态更新。

线下转化学生领取资源形式。后进生领取纸质基础知识点清单（附微课二维码），中等生领取知识关联练习册及实体素材，优良生领取探究任务卡；线下实践成果上传平台，实现资源分层共享。

（四）精准过程调控：线上预警+线下干预

线上依托学习通实时监测与知识图谱建立预警机制。对后进生设基础内容掌握率预警，未达标自动推送补救资源、开启一对一答疑；对中等生监测知识应用达标度，关联案例推送解析并组织小组互助；对优良生跟踪拓展任务进度，对接深度探究资料、发起跨主题交流，教师后台查看干预效果。

线下实施分层干预。针对后进生薄弱点开展小班化基础辅导，以具象化方式强化理解；结合中等生应用短板组织专题训练，通过互动巩固知识关联；围绕优良生探究瓶颈举办思维拓展沙龙，提升高阶能力，线下生成资源反哺线上，持续优化干预方案。

（五）精准质量评价：线上量化+线下质性

线上依托智慧平台评价功能与多图谱工具开展综合评价。知识图谱统计核心知识点掌握度，生成后进生进步曲线；能力图谱量化分析维度表

现，呈现中等生知识应用与分析能力得分；结合拓展任务成果及图谱关联评估，生成优良生素养发展雷达图，AI助教输出评价报告。

线下开展立体评价补充。记录后进生课堂参与度与基础任务完成质量，结合基础测试反馈优化；关注中等生协作表现与应用效果，通过专题汇报评估提升空间；跟踪优良生探究深度与创新成果，以实践展示评价高阶素养，线下质性评价与线上数据融合，形成完整成长画像。

三、精准教学模式下“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作业设计数字化实践进路

本研究以“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精准教学模式为总体框架，致力于构建出“三阶递进，五维融合”式高职“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作业设计的实践路径。强调知识掌握与能力提升并重，内容设计与学生需求相辅相成，力求通过系统性、针对性的作业改革，全面提升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历史素养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出能够适应幼儿园保教工作与行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学前教育人才。

（一）确立“三阶递进”的作业目标

“中外学前教育史”原作业侧重知识目标，忽视高阶思维培养，导致学生难以运用所学开展实践。为了改变传统的作业目标，课程组重新确立了确立“三阶递进”的作业目标，即“基础认知-综合应用-创新实践”作业目标。

“基础认知-综合应用-创新实践”三阶作业目标含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维度。基础认知（初阶）聚焦教育思想史、制度史等理论知识的记忆理解；综合应用（中阶）侧重综合应用能力；创新实践（高阶）旨在培养分析、评价、创造能力和批判思维。

（二）构建“五维融合”的作业内容

“中外学前教育史”原作业仅从学科角度组织，难以匹配学生发展需求。结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目标，兼顾学科体系（中国与外国古近现代学前教育史六大核心板块）与现实应用需求（幼儿园岗位历史知识胜任、毕业创作写作、“挑战杯”等竞赛能力提升），以“基础认知→综合应用→创新实践”三阶递进为核心目标，将作业内容模块化、阶层化、体系化重构。

重构后形成“五维融合”阶层化作业体系，涵盖知识建构、文化认同、思维迁移、价值塑造、实践转化五大维度，各维度均设基础认知、综合应用、创新实践三阶层。同时明确基础认知作业、

综合应用作业、创新实践作业、结课作业四类形式,既保障学科知识落实,又针对性解决毕业、就业、竞赛等现实需求。

(三) 使用“线上+线下”混合式的作业实施方法

“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以三阶递进目标为指引,为有效实现“基础认知→综合应用→创新实践”三阶递进,结合实际情况和人才培养需求,采用了数字化赋能的差异化作业实施方法。

五个维度的作业内容中基础认知阶层作业大多数在 SPOC 中体现,在学习通中完成。综合应用阶层作业大多数在“SPOC+线下”教学中体现,采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的作业实施形式,创新实践阶层作业大多数在学习通中体现,多采用课创成果设计、学科竞赛、分享汇报、成果答辩等作业实施形式。创新实践阶层作业鼓励学生规范运用课程所学理论与数字化工具进行创新设计,基础认知阶层作业批阅在学习通进行智能批阅,对于不同学生的需求进行智慧资源推送,夯实学生基础。

(四) 采用“维度+阶层+多主体”的作业评价

“中外学前教育史”原作业评价指标划分模糊,难以适配多样化作业内容与评价需求。课程组以三阶递进作业目标为指引,为有效实现“基础认知→综合应用→创新实践”三阶递进,实施“维度+阶层+多主体”的作业评价。

基础认知作业采用线上评价(学习通),聚焦“知识点准确率(70%)”与“完成时效性(30%)”;综合应用作业以“线上+线下”评价,师生共评“历史理论与案例关联度(45%)”“分析逻辑完整性(35%)”“小组讨论贡献度(20%)”。创新实践作业线上评价,学生随机分组,课创立项(第2周)、实施(第3-14周)、结项汇报(第15周),经组内、组间及教师共评,考查“保教

方案创新性(40%)”“岗位适配性(35%)”“答辩表现力(25%)”。结课作业以线下评价为主,选题围绕“幼儿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家精神”等,采用“清单式+评语式”评价,评阅教师初评等级、课程组复评,优秀论文学生参加线下答辩(第16周)由答辩组定分。此外,教师综合评定学生科研兴趣、思维品质等,选拔学生加入教师课题项目组与学科竞赛组,通过师生、生生合作搭建发展平台,促进师生共同成长。

参考文献:

- [1]李茂森.我国大学作业研究的梳理与思考[J].当代教育科学,2017,(06):51-54.
- [2]付达杰,唐琳.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教学模式探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7,27(07):12-18.
- [3]黄冠,李媛媛.“情感教育”导向下《中外学前教育史》课程建设研究——以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为例[J].社会福利(理论版),2018,(10):39-42.
- [4]王鹰汉,胡华海.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高职院校教学中有效性探究[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19,32(23):134-135+152.
- [5]邢丽丽.基于精准教学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证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20,(09):135-141.
- [6]谭小熙.美国高校课程作业设计的框架与主要特征——以 Assignment Library 为例[J].外国教育研究,2021,48(05):70-83.
- [7]颜荆京,李钦芳,梁林梅.基于案例的教师教育类 MOOC 课程大作业设计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21,42(06):53-59.
- [8]孟令军,辛琦媛.数字化赋能高职“教育科研方法”课程教学的价值意蕴与实施路径[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38(15):150-152.

中西面点融合发展回顾与教学启示

祁恩红¹

(1.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云南 昆明 650111)

摘要: 中式面点与西式面点的融合, 是饮食文化交流、食品工业技术进步、消费场景变化和烹饪教育内容更新共同推动的结果。中式面点以米麦粉、杂粮、豆类等为基础, 形成了蒸、煮、烙、煎、炸、烤等多元熟制体系, 并与节令礼俗、地域风味和主食结构紧密相连; 西式面点则以烘焙体系、乳蛋糖脂配方、精确计量、装饰造型和标准化生产见长。二者的融合并非简单地把中式馅料放入西式外壳, 或把西式奶油装饰移植到中式点心中, 而是涉及原料、工艺、风味、形态、消费场景、生产管理、文化叙事与教学转化的系统重组。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梳理中西面点融合的历史脉络、现实形态、主要问题与未来方向, 并进一步讨论其对烹饪类专业课程建设、实践教学、创新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的启示。研究认为, 中西面点融合已经从早期的产品模仿和风味叠加, 进入以文化识别、健康化、标准化和场景创新为核心的复合发展阶段。面向教育教学, 其价值不仅在于拓展面点课程内容, 更在于为学生理解传统技艺现代转化、跨文化食品创新和职业岗位能力重构提供具体载体。

关键词: 中式面点; 西式面点; 融合创新; 烹饪教育; 面点教学; 课程改革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551

Chinese–Western Past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Enhong Qi¹

¹ College of Applied Technology, Yun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Kunming,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astries results from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dietary cultural exchang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food industry, changes in consumption scenarios, and the renewal of culinary education. Chinese pastries, based on rice flour, wheat flour, coarse grains, and beans, develop diverse cooking methods such as steaming, boiling, griddling, pan-frying, deep-frying, and baking, and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seasonal customs, regional flavors, and staple food structures. Western pastr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baking systems, formulas based on dairy, eggs, sugar, and fat, precise measurement, decorative modeling, and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Their integration is not a simpl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fillings with Western shells or the transfer of Western cream decoration to Chinese pastries, but a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ingredients, techniques, flavors, forms, consumption contexts, production management, cultural narratives, and pedagogic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existing stud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urrent forms, major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Chinese–Western pastry integration, and further discusses its implications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actical teaching, innovation training,

作者简介: 祁恩红(1969—), 女,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烹饪与食品科学。

and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culinary programs. The study argues that Chinese-Western pastry integration has moved from early product imitation and flavor layering to a compound development stage centered on cultural identity, health orient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scenario innovation. In terms of education, its value lies not only in expanding pastry course content, but also in providing a concrete medium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techniques, cross-cultural food innovation,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Keywords: Chinese pastry; Western pastry;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culinary education; pastry teaching; curriculum reform

一、概念界定：从“品类相加”到“体系融合”

中式面点通常指以面粉、米粉、杂粮粉及相关淀粉性原料为基础，配合馅心、调味、发酵和多种熟制工艺制作的食品，其功能既包括日常主食，也包括节令点心、宴席点心和地方小吃。相关教材与面点工艺资料显示，中式面点的特点在于地域类型丰富、熟制方法多样、成形技艺复杂，并与节庆、礼俗和地方饮食结构关系密切[1][2]。西式面点则主要依托面包、蛋糕、饼干、派、塔、酥皮点心等烘焙品类，强调面筋、油脂、糖、乳制品、蛋品、膨松剂、发酵控制、烘焙温度和装饰体系之间的配方平衡[6]。

因此，中西面点融合至少包含四个层面。第一是原料融合，例如将红豆、莲蓉、黑芝麻、枣泥、桂花、茶、米粉、杂粮等中式元素与黄油、奶油、奶酪、巧克力、酥皮、蛋糕胚等西式体系结合。第二是工艺融合，例如把中式蒸制、包馅、层酥、发酵经验与西式烘焙、冷冻面团、模具成形、装饰裱花和配方标准化结合。第三是风味与文化融合，即让消费者既能识别中国地域、节令或礼俗符号，又能接受西式烘焙的口感与消费场景。第四是产业融合，包括研发、教育、门店运营、中央厨房、冷链物流和质量控制体系的协同。已有中文研究多从差异比较与创新策略角度讨论中西面点的融合问题，指出二者在原料、风味、造型、工艺和消费习惯上的差异，是创新的基础而不是障碍[3][4][5]。

从教育教学角度看，中西面点融合具有天然的课程整合价值。它既能连接中式面点、西式面点、食品营养、餐饮文化、产品研发和门店运营等课程内容，也能把“会做某一类点心”的技能训练提升为“理解差异、设计产品、解释文化、验证工艺”的综合能力训练。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不仅面向产业实践，也面向烹饪专业教学内容更新与人才培养模式优化。

二、历史脉络：从本土面食传统到现代烘焙交汇

中式面点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农耕与地域基础。小麦、稻米、杂粮和豆类等原料经过长期地方化实践，形成了北方面食、江南糕团、广式点心、川渝小吃、清真面点等多种谱系。传统中式面点的历史不仅体现为食品形态的演进，也体现为节令制度、礼仪消费和家庭手工技艺的积累[1][2]。这一传统为后来的融合提供了稳定的文化资源：包馅、层酥、发酵、蒸制、节令造型和吉祥寓意，都是能够与西式烘焙发生连接的核心要素。

西式面点进入中国后，最初更多表现为外来食品、饭店点心、城市消费品和专业教育内容。随着近现代城市商业、餐饮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面包、蛋糕、饼干、酥皮点心等逐渐从外来食品转化为城市日常消费品。改革开放以后，烘焙门店、酒店餐饮、职业教育、连锁品牌和食品机械进一步推动西式面点技术普及。此时的融合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式口味的西点”，如红豆面包、肉松面包、抹茶或乌龙茶蛋糕、月饼风味酥点；另一类是“西式表达的中点”，如以蛋糕、慕斯、巧克力、奶油装饰重塑传统节令点心的外观与礼品属性。

进入新消费阶段后，融合从单点产品扩展为品牌策略和产业议题。中文研究对中西面点差异与融合策略的讨论，集中在技艺互补、口味调适、营养改良、造型创新和文化表达等方面[3][4][5]。这说明中西面点关系已经从“谁影响谁”的线性问题，转变为如何在本土文化识别与全球化食品技术之间建立平衡的问题。

对面点教学而言，这一历史脉络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技艺并非静止的传统，而是在原料流通、城市消费、职业教育、食品机械和品牌经营共同作用下不断重组的知识体系。教学中若只分别讲授中式面点和西式面点，容易造成品类割裂；若以融合发展为线索组织案例，则更有利于学生形成跨品类比较和创新设计意识。

三、现状：产品创新活跃，但系统能力仍不均衡

当前市场中的中西面点融合，首先表现为产品形态和风味表达的快速更新。较常见的做法，是以西式烘焙载体承载中式风味，例如在面包、可颂、蛋糕卷、泡芙、曲奇、塔类和酥皮点心中加入红豆、芋泥、黑芝麻、莲蓉、枣泥、桂花、茶粉、米酒、咸蛋黄、肉松等元素；也有一些产品以中式节令点心吸收西式工艺，如冰皮月饼、流心月饼、巧克力月饼、奶黄酥和慕斯化节庆糕点等。除此之外，传统早茶、茶点、伴手礼和下午茶场景也在相互靠近，使面点不再只是日常主食或节令食品，而逐渐进入社交消费、礼品消费和休闲消费之中。

这种活跃的产品创新降低了传统面点进入年轻消费场景的门槛，也使西式烘焙获得更强的本土化表达。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不少产品仍停留在“中式元素标签化”的阶段，只是把茶、芝麻、红豆、咸蛋黄或国潮包装作为卖点，尚未真正处理好口感结构、营养结构、文化叙事和稳定量产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市场上的融合产品数量已经不少，但能够长期沉淀为稳定品类的案例并不多。这也说明，中西面点融合的难点并不在于发现一个新奇组合，而在于让组合经得起技术、消费和文化三方面的检验。

从技术角度看，中西面点融合正在形成相互补充的趋势。西式面点体系的优势在于配方精确、工艺参数清晰、设备适配度高和质量控制链条完整。面包及烘焙技术研究强调面粉品质、发酵条件、油脂糖蛋比例、搅拌与烘烤控制等因素对成品结构的影响[6]，这对中式面点产业化具有启发意义。传统经验可以通过称量、温湿度控制、醒发曲线、质构测试和感官评价转化为更可复制的流程。与此同时，中式面点自身也为融合提供了独特资源。以馒头等中式发酵面制品为例，原料组成、化学成分和加工条件会显著影响体积、色泽、质构和感官品质[7]；杂粮和豆类加入中式发酵面制品，可以改善营养结构，却也可能带来面筋稀释、组织粗糙、体积下降和口感变硬等问题[8]。这些研究提示我们，融合创新不能只追求概念新颖，还必须解决原料相容性、面团流变、保水性、老化速度和货架期等基础技术问题。

消费者对融合面点的接受，也并不只是由“新奇感”决定。融合食品能否成功，取决于消费者是否能够理解其“新”和“旧”的关系。相关研究指出，成功融合通常不是任意混搭，而是要在熟悉性和惊喜感之间建立可接受的平衡[9]。对应到中西面

点，消费者愿意尝试“茉莉茶可颂”“黑芝麻巴斯克”“莲蓉拿破仑”等产品，往往是因为这些产品既保留了可识别的西式形态，又提供了熟悉的中式风味。如果产品只有概念组合，缺少口感逻辑和文化解释，就容易停留在短周期营销，难以形成稳定复购。

从产业和教学两方面看，目前中西面点融合虽然具有明显活力，但系统性沉淀仍显不足。品牌端新品迭代较快，季节限定、节日礼盒、国潮包装和社交媒体传播推动了产品扩散；但许多融合产品缺少长期验证，配方稳定性、冷链适应性、营养评价、消费者复购和区域接受度的数据积累不足。职业教育和企业研发也共同面临“会做单品”与“能建立体系”之间的差距。对院校教学来说，这一差距提示面点课程不能只停留在配方复现和成品展示，还应引入产品分析、工艺记录、成本核算、感官评价、文化表达和市场定位等训练环节。中文研究提出的融合创新策略，大多强调提升技术、吸收差异、重视文化与营养，但这些建议仍需要更多可量化的研发工具和案例验证[3][4][5]。

四、主要问题：符号化、健康化和标准化的三重挑战

从现有实践看，中西面点融合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把“融合”理解为视觉符号或风味标签的叠加。国潮包装、中式命名和地域风味确实能够提高产品识别度，但如果这些元素没有与原料结构、制作工艺和食用场景形成内在联系，文化表达就会停留在表层。真正有价值的融合，应当能够解释某种中式风味为什么适合某种西式结构，或某种传统点心为什么需要借助现代烘焙工艺重新表达。换言之，融合产品不仅要“看起来有中国元素”，更要在口感、工艺和消费语境上成立。

健康化也是中西面点融合必须面对的现实矛盾。西式面点常依赖糖、油脂、乳制品和精制面粉形成风味与质构，而中式饮食观念中又包含杂粮、低糖、低脂、高纤维等健康期待。当二者结合时，产品往往会在营养目标和感官品质之间出现拉扯。杂粮与豆类可以提升营养价值，但也可能带来面筋稀释、组织粗糙、体积下降和口感变硬等问题[8]。因此，健康化不能简单等同于减少糖油或加入粗粮，而应建立在配方平衡、质构控制和消费者接受度验证的基础上。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传统经验与现代标准之间的衔接。许多中式面点依赖师傅经验、手感判断

和地方口味,具有鲜明的手工性和地域性;西式烘焙则强调计量、设备、温湿度和流程控制。两套体系各有优势,也各有局限。本文认为,中西面点融合不宜走向单一标准化,而应形成“基础指标可复制、风味表达有弹性”的分层标准。安全、成熟度、稳定性、成本和货架期需要标准化;地域风味、造型寓意和手工审美则应保留一定开放性。这一点对产业研发和院校教学都具有启示意义,因为学生未来面对的并不是单一配方,而是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和生产条件。

在教学层面,传统面点课程常以教师示范、学生模仿和成品评分为主,评价重点集中在外观、成熟度和口味。面向融合创新的教学若仍沿用这种评价方式,容易把复杂的产品开发过程压缩为一次作品展示。更合理的做法,是把方案设计、原料选择理由、工艺参数记录、失败原因分析、消费者定位和文化说明纳入评价,使学生从“完成作品”进一步走向“解释作品”和“优化作品”。这种变化并不是增加教学环节,而是把产业真实研发过程转化为课堂学习过程。

五、未来发展:从混搭创新走向可持续融合体系

未来的中西面点融合,应当从“做出新奇产品”转向“形成稳定体系”。目前市场中不缺红豆面包、茶味蛋糕、咸蛋黄酥点、国潮礼盒等融合案例,真正缺少的是能够持续迭代的研发逻辑。本文认为,较成熟的融合路径应至少同时回答三个问题:文化上能否被理解,技术上能否稳定复现,消费上能否形成持续需求。只有这三个问题同时成立,融合才不会停留在短周期营销。

文化识别仍是未来发展的基础。月饼、糕团、花馍、酥点、茶点等传统品类都具有丰富的节令意义、地域记忆和礼俗功能,它们与现代烘焙体系结合时,不应只被处理为馅料或装饰,而应被转化为可以讲述、可以体验、可以消费的文化场景。例如节令礼品强调仪式感,茶点强调搭配关系,旅游伴手礼强调地域识别,社区烘焙则更强调日常性和亲近感。由此看,中西面点融合的关键不是把传统符号放进现代外壳,而是重新组织传统符号与当代生活之间的关系。

技术互嵌将决定融合能否走向专业化。中式面点可以吸收西式烘焙在配方计量、设备控制、冷冻面团、货架期管理和感官评价方面的经验;西式面点也可以借鉴中式包馅、蒸制、发酵、层酥、节令造型和低油熟制方式。未来研发需要更多关注面团流变、淀粉老化、发酵风味、复合馅料稳定性和冷链复热品质,而不是只在外观或命

名上创新。健康化趋势同样要求研发更精细:杂粮化、减糖化、低油化、高蛋白和清洁标签都需要与质构、风味和货架期一起验证,不能以牺牲基本食用品质为代价。

从市场场景看,中西面点融合不应只依赖节日礼盒和网红单品。早餐、下午茶、茶饮配套、旅游伴手礼、校园餐饮、社区烘焙和预制烘焙,都可能成为融合产品的稳定入口。未来餐饮研究关注技术、可持续、健康、体验和跨文化创新等趋势[10],这与中西面点融合的发展方向具有较高一致性。对企业而言,更重要的不是不断推出一批新品,而是建立从文化主题、技术验证、营养评价、场景测试到规模化生产的闭环。对学校而言,这一闭环也可以转化为课程项目,使学生在真实问题中理解产品研发的复杂性。

六、教学启示:面向课程改革与人才培养

把中西面点融合引入烹饪教育,并不是简单增加几个创新点心案例,而是为面点课程提供一种重新组织知识的方式。传统教学往往按照中式面点、西式面点、烘焙工艺、食品营养等课程边界展开,学生容易形成“分门别类学技术”的认知。融合主题能够把这些知识重新连接起来:学生既要理解中式面点的历史、原料和成形技法,也要掌握西式烘焙的配方逻辑、设备控制和标准化方法,还要进一步考虑产品定位、文化表达和消费场景。这种教学组织方式更接近真实岗位中的综合任务。

从人才培养角度看,中西面点融合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能够把技能训练转化为创新能力训练。教师可以围绕传统节令点心现代化、地方风味西点化表达、健康杂粮面点开发、茶饮配套点心设计等主题设置项目,但项目的重点不应只是做出成品,而应要求学生完成资料检索、配方设计、工艺试制、感官评价、成本测算和展示说明。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会发现,融合不是随意组合,而是不断取舍、验证和修正的过程。这样的训练比单纯复现配方更能培养职业判断力。

产教融合也可以在这一主题中获得更具体的落点。企业新品研发、门店运营、节令产品开发和地方文旅食品,都可以成为课程案例或实践任务。学校可以引入企业真实命题,也可以把地方特色食材、非遗面点、社区消费和伴手礼开发纳入课程项目。通过校企共同命题、共同评价和成果展示,学生能够更早理解行业对稳定品质、成本控制、食品安全、审美表达和消费者沟通的综合要求。本文认为,这类教学设计比单纯参观企

业或短期实习更能体现产教融合的实质,因为它把企业问题转化为了课堂中的学习任务。

此外,中西面点融合还具有文化育人的意义。面点融合教学不应简单追逐“网红化”和“西式化”,而应引导学生理解中国面点传统的文化价值和现代转化路径。通过比较月饼、糕团、花馍、茶点、酥点等传统品类与现代烘焙产品的关系,学生可以认识到传统文化并非只能被保存,也可以通过科学工艺、现代审美和消费场景获得新的表达。对于烹饪类专业而言,这种认识有助于把技能教育、文化理解和职业精神结合起来,使学生在掌握手工艺的同时形成更清晰的专业认同。

七、结论

总体来看,中式面点与西式面点的融合经历了从外来食品接受、城市烘焙普及、本土口味改造,到当代国潮化、健康化和场景化创新的发展过程。当前融合已经表现出较强的市场活力,但也暴露出文化表达表层化、健康化与口感稳定难以兼顾、传统经验与现代标准衔接不足等问题。未来的融合不应停留在“中式风味加西式外形”或“西式技术包装中式符号”的层面,而应在文化解释、技术验证、营养评价和场景适配之间建立更稳定的关系。

本文进一步认为,中西面点融合的专业价值,正在从产品层面的创新转向教育层面的知识重组。它既能为食品企业提供产品研发方向,也能为烹饪教育提供课程改革抓手。对于院校而言,融合主题能够把传统技艺传承、现代工艺训练、产品研发实践、文化表达和职业素养培养放在同一教学框架中,使面点教学从单一技能传授走向综合能力培养。这种转向符合餐饮行业对复合型、创新型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有助于增强学生对中国面点传统的现代认同。

因此,中西面点融合不只是一个食品创新话题,也可以成为烹饪教育观察产业变化、更新教

学内容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切入点。后续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具体课程案例、学生作品评价、企业项目反馈和消费者感官数据,验证融合主题在教学实施中的实际效果。只有把文化、技术、市场和教学真正联系起来,中西面点融合才能从概念性创新走向具有持续价值的教育与产业实践。

参考文献:

- [1] 方志荣,徐惠荣,刘顺保,龙业林.中式面点工坊[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 [2] 臧雪妍.中式面点的传承与创新[J].食品安全导刊,2023(8).
- [3] 高嘉诚.中西面点的差异和融合创新发展策略研究[J].食品安全导刊,2022(15):155-157.
- [4] 黄骏.中西面点的异同及融汇创新策略分析[J].现代食品,2021(24):36-38.
- [5] 刘永智,黄树文.浅谈中西式面点的差异及融合创新[J].轻工科技,2019,0(8):10-13.
- [6] Cauvain S P. Technology of Breadmaking[M]. 3rd ed. Cham: Springer, 2015.
- [7] Zhu F. Influence of ingredients and chemical components on the quality of Chinese steamed bread[J]. Food Chemistry, 2014, 163:154-162.
- [8] Yang Y, Wang X. Effects of coarse cereals on dough and Chinese steamed bread: a review[J]. Frontiers in Nutrition, 2023, 10:1186860.
- [9] Spence C. Contemporary fusion foods: How are they to be defined, and when do they succeed/fai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stronomy and Food Science, 2018, 13:101-107.
- [10] Yıkmış S, T ü rköl M, Abdi G, İmre M, Alkan G, T ü rk Aslan S, Rabail R, Aadil R M. Culinary trends in future gastronomy: A review[J].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Research, 2024, 18:101363.

小学汉语拼音教学中介音归属划分机制与教学策略研究

张健¹ 王海红¹ 田纯¹ 袁田雨¹ 辛静怡¹

(1.唐山师范学院, 河北 唐山市 063000)

摘要: 汉语拼音作为汉字识读与正音的重要工具, 其教学核心目标在于通过系统化训练, 使学生掌握音节的拼读与拼写规律。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教学目标则要求教师既要理解汉语拼音音节的结构特性, 又要了解在拼读过程中音素间协同发音的规律, 从而依据结构类型选择适配的拼读策略, 使学生实现从符号认知到发音输出的有效转化。本文通过回溯汉语拼音拼读法的发展脉络, 厘清了介音(介母)在音节拼读过程中的归属划分演变, 并结合实际语音生成中介音的协同发音特征, 揭示了当前小学语文拼音教学中介音处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同时借鉴西方音系学的理论视角, 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改进策略。

关键词: 汉语拼音教学; 介音归属; 汉语拼音方案; 语文课程标准

基金项目: 2025年度唐山师范学院校级科研(学科建设)项目“新课标视域下义务教育语文教材教学适切性研究”(20251143003)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554

Research on the Classification Mechanism of Medial Sounds in Primary School

Hanyu Pinyin Teaching and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Zhang Jian¹ Wang Haihong¹ Tian Chun¹ Yuan Tianyu¹ Xin Jingyi¹

^{1,2}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Hebei 063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pronunciation correction, Hanyu Pinyin aims primarily to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rules of syllable spelling and pronunciation through systematic training. Teaching objectives oriented toward competency development require teacher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anyu Pinyin syllables, but also to recognize the patterns of coordinated articulation among phonemes during the spelling process, so as to select appropriate spelling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ructural types and help students effectively transform symbolic recognition into accurate pronunciation output. By tracing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Hanyu Pinyin spelling method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attribution of medial sounds (glides) in the process of syllable spelling. Combined with the coarticulatory features of medial sounds in actual speech production, it reveal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treatment of medial sounds in current primary school Chinese Pinyin teaching. Drawing on perspectives from Western phonological theory, the paper further proposes targeted

作者简介: 张 健(1985—),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
王海红(2003—), 女, 本科, 学生, 研究方向为小学教育;
田 纯(2005—), 女, 本科, 学生, 研究方向为小学教育;
袁田雨(2005—), 女, 本科, 学生, 研究方向为小学教育;
辛静怡(2005—), 女, 本科, 学生, 研究方向为小学教育。

通讯作者: 张 健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instruction.

Keywords: Hanyu Pinyin teaching; medial sound attribution; Scheme for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Standards

一、引言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2025)以“办强办优基础教育”为核心任务,强调“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汉语拼音作为小学语文学习的基础性内容,是低年级学生学习和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起点。其教学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系统化训练,使学生能够“准确拼读”“正确书写”音节,逐步形成对规范语言文字的意识与运用能力,在实践中积累个体的语言经验,并感受语言文字的丰富内涵^[1]。

基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提出的课程理念,对统编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及教师教学用书的梳理发现,当前汉语拼音拼读教学系统整合了拼音教学发展历程中的多种拼读方式,构建起以“两拼法”、“三拼法”及“整体认读”为核心的多维拼读体系。其中,三拼音节基于介音的语言学特性及其在音节结构中的功能定位,通过对介音在音节中的不同划分,形成了“声-介-韵”“声介合母”以及“介韵合母”三种结构的拼读方法。例如,音节“guā”在语文教材(32 页)中按照“声-介-韵”的方式拼读为 g-u-ā→guā;同时在教师教学用书中(74 页)又提供了“声介合母”(gu-ā→guā)和“介韵合母”(g-uā→guā)拼读方法。

音节拼读方法的多样性对教师专业素养提出双重诉求:一方面,教师需要系统掌握汉语音节的结构知识,理解介音在音节拼读过程中的语音功能与作用机制;另一方面,还应根据不同音节类型的特征,灵活选择适配策略以实施分层化教学。现有研究虽然在《汉语拼音方案》的框架下揭示了教学实践中的若干典型难点,但对偏误产生的音系学根源尚缺乏系统性阐释。因此,本文从历时视角梳理汉语拼音拼读法的演变脉络,结合介音在音节协同发音中的动态作用机制,依托新课标及修订后的语文教材,解析小学拼音教学中介音归属划分的关键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解的教学策略。

二、汉语拼音拼读法的历史演变与体系

统编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以及配套教师教学用书中,拼音音节的拼读方法呈现出显著的复合

型特征,既延续了传统的声韵二分拼读法的基础框架,又整合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教学实践中的多项改良成果,形成了“声介合母”“介韵合母”与“声-介-韵”并存的拼读方式体系。

1. 声韵二元拼读法:传统拼读体系的历史基础声韵两拼法作为汉语拼音教学体系的核心方法,其历史渊源可

溯至东汉末年的反切注音法。东汉末年,先人们受梵文拼音字理的启示,对汉语音节结构有了精准分析,总结出了反切法的注音原理^[2],从而奠定了韵书产生的基础。反切法作为一种独特的注音方式,其基本原理是借助两个汉字,通过“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及声调的模式注音。如“同”(徒红切),将切上“徒”的声母与切下“红”的韵母和声调相结合,即可拼读出被切字“同”(tóng)的完整读音。然而,受制于字库依赖性、声调标注不稳定等局限(古代音系演变导致切下字声调信息失效),反切法逐渐难以适应现代注音需求^[3]。为了摆脱传统反切法的局限,汉字注音体系历经三次关键转型:1913 年引入注音字母减少字库依赖,后推行罗马字母方案提升系统化程度,最终于 1958 年颁布《汉语拼音方案》(后文简称《方案》)。该方案从西 s 方音素制的拼音文字出发,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采用国际通行的拉丁字母系统,科学划分声母、韵母二元结构,确立“前声后韵、声韵相拼、调附其后”^[4]的现代拼音规则。

2. 声介韵三元拼读法:介音结构独立与教学体系重构

《汉语拼音方案》自 1958 年颁布以来,始终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拼音教学的核心纲领性文件。《方案》以汉语音节结构为基准,详细地呈现了汉语声韵体系,其中按照韵母第一个拼音符号发音时的开口度以及唇形特征,将整个韵母体系划分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和撮口呼(即四呼)四大类属。在长达十余年的教学实践中,教师以《方案》为教材,通过讲解声母与四呼的拼读规则,构建起以声韵直接拼读为核心的教学范式。但这种传统拼读法将介音(i、u、ü)简单归入韵母范畴,

未能充分考量介音在语音学上的特性差异,从而增加了学生对后响韵母 ia、ua、uo; 中响韵母 iao、uai; 鼻韵母 ian、iang、iong、uan、uang、ueng、üan 的学习负担^[5]。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 语言学界针对传统声韵二元拼读的教学局限性展开深入探讨。拓牧、黎锦熙等学者从音系学角度提出介音在发音机制上具有过渡性特征, 其音值既不同于声母的辅音属性, 也有别于韵腹(主要元音)的稳定发音状态, 应在音节结构中确立独立地位^[6]。在此基础上, 1960 年拓牧提出了“声介合母”拼读法^[7], 主张将声母与介音预先组合成声介合母, 再与基础韵母进行二次拼合, 形成“(声母+介音)+韵母”的三元拼读结构。例如, 音节 guāi 由声介合母 gu 与韵母 āi 相拼形成。“声介合母”三元拼读法通过分解复杂韵母的构成要素, 将 13 个带介音的长韵母简化为基本韵母的拼合形式, 显著降低了记忆负担。同年, 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注音拼音教学大纲(初稿)》中正式推荐此教学法^[8]。然而实践检验表明, 采用“声介合母”拼读法进行拼音拼读教学, 学生不仅需要记住 28 个声介合母^[9], 还需要学习韵母 ie、üe 中 ê 的发音, 以及理解字母 e 在单独成韵与构成复韵母时存在的发音差异。复杂的语音规则辨析要求, 超出了低龄学童的认知水平, 反而增加了学生与教师的负担。

3. 多元拼读策略: 从“声介合母”到“声-介-韵”的教学变革

作为与“声介合母”拼读法的逆向探索, “介韵合母”拼读策略通过重构音节组合逻辑, 将介音与韵腹、韵尾预先结合形成复合韵母单元, 继而与声母进行二次拼合, 形成“声母+[介音+(韵腹、韵尾)]”的层级结构。例如读 guā(瓜)时, 先将介音 u 与韵腹 ā 组合为 uā 单元, 再与声母 g 相拼完成整体拼读。然而从传统音韵学视角分析, 无论是将介音前置于声母构成“声介合母”, 或者将其后置于韵母构成“介韵合母”, 两种方式均与汉语音节“声-韵”二分法的传统认知产生结构性冲突。即前者将介音归入声母系统模糊了辅音与半元音的界限, 后者则使介音在韵母系统中的过渡性定位产生认知偏差, 这种双重属性困境导致教学实践中频繁出现介音归属的体系性混乱。为解决这一理论实践矛盾, 1972 年秋季教育部统筹组建专项工作组,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京津辽冀晋五省市教研团队, 系统开展教材体系重构。该教材在沿袭 1963 年人教社汉语拼音教材改进成果的基础上, 将含介音音节的拼读从声介合母拼读进一步改良为“声-介-韵”横向拼读模式^[10]。将传统声韵两拼结构解构为声母、介音、韵腹的三元线性排列, 如将 guā 分解为 g-u-ā 三个独立音素进行序列化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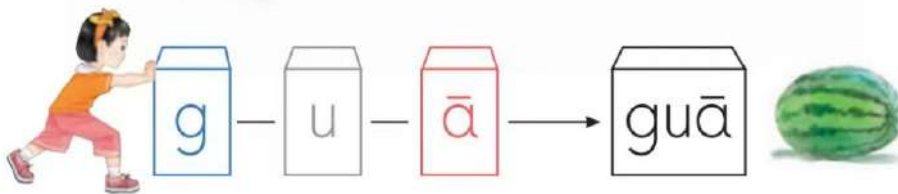


图 1. 《语文》(一年级上册)

现行统编教材的教师教学用书中采取兼容并蓄的指导原则, 主推“声-介-韵”三拼法的同时, 仍保留“声介合母”与“介韵合母”作为辅助拼读策略, 建议教师依据学生认知水平弹性选择。^[11]但教学实践显示, 由于教师对汉语音节知识储备不足, 难以准确辨析不同拼读策略的理论差异。同时介音在不同拼读框架中的功能解释存在理论裂隙, 加剧了教师对汉语音节结构的认知模糊性。

三、介音在汉语音节中的音系功能与协同机制

语言作为高度抽象化的符号系统, 在自然语流中展现出显著的动态特质。这种动态特质不仅显现在语句层级的韵律流转中, 更深层地作用于音节内部的音素交互过程, 即相邻音素通过协同

发音机制形成非线性耦合, 其发音特征(包括发音部位、方法及唇的形态)会因前后语音环境发生同化、异化等动态调整。林焘、王理嘉在《语音学教程(增订版)》(2016)中论述汉语语流音变规律时指出, 声母的发音特征会受到后续韵母区别性特征的同化性调节, 具体表现为当声母后接具有[+圆唇性]特征的元音时, 元音的唇形特征会逆向传递至辅音发音过程, 形成发音器官的协同预调整机制。例如, “都”[tu55] “去”[tɕy51]等音节的实际发音中, 受后接圆唇元音[u] [y]的影响, 声母均读成具有[+圆唇性]的[tʰ] [tɕʰ]^[12]。

然而, 这种跨音段协同发音机制不仅存在于声母与主要元音之间, 更作用于声母与介音的音

段衔接过程。例如,在“乱”[lwən55]的音节中,舌尖边音[l]受到介音[+圆唇性]特征影响,实际发音时舌体后缩、双唇拢圆,发音为唇化边音[lʷ]。相反,在“表[piao214]”“贴[dʰie55]”等音节中,声母因受到介音[i]的[+展唇][+高舌位]特征影响,发音部位迁移接近于舌面中音,分别读成[py] [dʰy]。由此可知,汉语辅音在实际发音过程中,其后接元音以及介音的区别性特征[±圆唇性]会通过逆向协同影响辅音的发音特征。

不仅如此,韵母系统内部同样存在协同发音作用,其作用路径主要体现为“韵腹-韵尾”的声学耦合以及“介音-韵腹”的链式发音协同。在鼻韵母的“韵腹-韵尾”交互中,辅音韵尾的发音部位特征会逆向渗透至元音发音过程,引发系统性音值偏移。例如,前鼻音韵尾[n]的[+前舌位]特征影响鼻韵母 an 的韵腹 a 产生前移音变,实际发音由央元音[A]演变为前元音[a];而后鼻音韵尾[ŋ]的[+后舌位]特征则驱动鼻韵母 ang 的韵腹 a 舌根后缩,音值实现为后元音[ɑ]。在“介音-韵腹”的协同层面,介音通过舌位预设对韵腹形成动态调音约束。例如音节“优”[iəu55]的发音过程中,韵腹[ə]受到前行介音[i]的[+高舌位][+前舌位]特性牵引,实际发音时舌面前部抬升向前;音节“烟”[ien55]在实际发音中则呈现更复杂的协同层级,即介音[i]的[+高舌位]特性使元音[a]舌面上移,同时与韵尾辅音[n]的[+前舌位]特性共同作用,构成[i]+[e]+[n]的协同发音链,使韵腹[a]的实际发音呈现为前舌中元音[ɛ]。韵母系统内部的发音协同机制证明了介音的发音特性介入到元音音值的实现过程当中。

综上,汉语音节的协同发音体系存在显著的跨层级性特征。即声母、韵母(韵腹)通过逆向协同作用,形成声母圆唇化、韵腹舌位偏移的非线性耦合;在韵母内部,介音-韵腹-韵尾构成连续协同链,通过发音器官的惯性传递实现元音音值的梯度演变。汉语音节内部的协同发音现象不仅反映了介音在音节发音过程中的双重归属感,也为理解汉语音节的非线性发音机制提供了关键切入点。

四、介音划分引发的拼读偏误分析与分层教学策略

1. 偏误成因与教学困境分析

张吉生(2008)在《汉语音节结构再分析》中曾指出,汉语音节结构的复杂性主要源于介音在声韵系统中的“双重归属”问题^[13]。传统音韵学坚持“声——韵”二分体系,将介音视作韵母成分之一,归入韵头。然而,林茂灿(1995)^[14]等学者通过语音实验研究,以及包智明(1996)^[15]基于方言语言游戏与密语语料的考察均表明,韵核和韵尾作为押韵单位是稳定的音节成分。上述研究提示,传统音韵学对音节内部结构的解释存在一定局限。因此,诸多学者尝试借鉴西方音系学经典理论,以寻求更能合理解释汉语音节特征的音节结构模式。其中沈家煊(1992)以西方音系学经典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普通话口误现象的分析,提出“声——介——韵”三分结构,主张介音应作为独立层级直接隶属于音节节点^[16]。沈家煊对介音的划分方式与统编语文教材的“声-介-韵”拼读策略形成学理呼应[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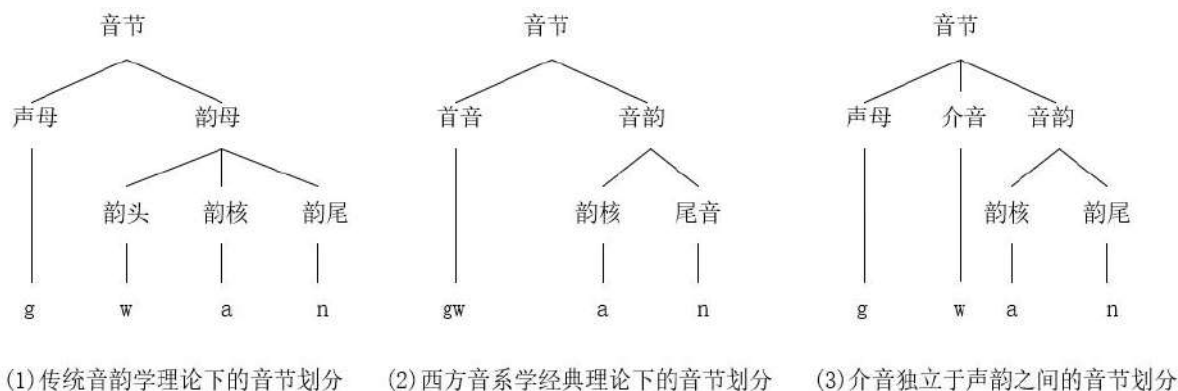


图 2 汉语音节结构的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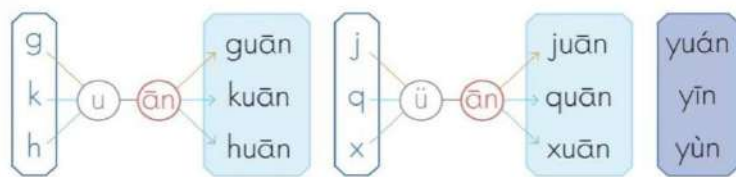


图3 《语文》(一年级上册)第13课

现行统编版一年级语文教材系统贯彻三分法理念,在辅音系统 g/k/h(32 页)、j/q/x(34 页)、z/c/s(36 页)、zh/ch/sh(38 页)以及元音 ai(45 页)、an(51 页)的教学模块中,均采用线性拆分法呈现含介音音节。如教材第 32 页的 g-u-ō→guō[kwuo], 51 页的 j-ü-ān→juān[tɕyuan]等,节,通过线性的声介韵排列方式,呈现出介音在声韵衔接中的独立位置。

然而上述分析表明,处于声韵过渡位置的介音实际具有半元音特性,其舌位前移程度与唇形圆展状态对相邻辅音的发音部位及韵母的开口度产生显著影响,且协同发音的作用模式因音节类型呈现差异。

教学实践反馈显示,当遵循教材所示将音节按照“声-介-韵”拼读法进行拼读教学时,部分学生易将 jiàn[tɕien]的韵腹[ɛ]误读为后元音[ɑ],或将 quān[tɕʰyæn]的韵腹[æ]混淆为[ɑ];而采用“声介合母”拼读法时,学生在音节听写练习中会出现漏写或者过度添加介音,将音节 jiàn 或 zhāng 误写成 jan 或者 zhang。不仅如此,刚刚接触汉语拼音拼读的低龄学生受拼音字母呼读音的干扰,在拼读过程中存在添加音的现象。例如,音节 guā 的实际发音应为[kwa],但受声母 g 呼读音[gr]影响,部分学生常衍生出过渡元音[ə],形成[gəwa]的偏误发音。学生在音节拼读过程中出现的偏误显现出语文教材理论化的结构拆分与语音的动态实现过程存在解释裂隙,教师普遍缺乏音系学知识储备难以进行有效引导。

2.面向音节类型的分层教学策略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表1 含介音音节的拼读法划分

		分类	介音划分/拼读方法	
零介音音节		-		声韵两拼
含介音音节	介音 i	介音+韵腹	ia[ia] ie[iɛ]	与声母拼读/声介合母拼读
		介音+韵腹+韵尾	iao[i a ɔ]	介音不划分，整体教学
				与声母拼读/声介合母拼读

首先,对汉语音节结构以及介母的语音学特性建立系统性认知。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重要规范,《方案》历经近七十年的教学实践应用,其科学理念始终影响着语文教材的编写逻辑。该方案继承了传统音韵学“声韵”二分法体系,但在教学实践中改良形成的“声-介-韵”三分结构则有效降低了低龄学生掌握复合韵母的认知难度。从语音学角度分析,介音具有独特的音系属性,其语音实现方式与承担音节核心功能的韵母存在本质区别。语文教材采用“声-介-韵”线性排列结构呈现音节教学表征,虽然减少了 13 个复韵母的学习负担,却容易使教师形成介母与声母、韵母具有等位组合关系的认知偏差。深入语音生成机制分析可见,介音在实际发音过程中并非独立存在的音段单位,而是通过协同发音机制对相邻声母以及韵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产生制约,其影响路径随音节类型差异呈现显著区别。小学一线教师只有明悉汉语音节结构的音系表征与语音实现的非对称性以及介音的功能特性,才能精准识别学生在拼读训练与听写练习中产生的系统性偏误根源。

其次,以音节类型为单位,实施分层式拼读教学策略。针对零介音的常规音节,教师可延续传统的声韵两拼法,通过声韵滑动的无缝衔接训练,强化学生对音节整体性的认知。对于含介音的音节,建议以“声——介——韵”三元结构作为核心教学框架,同时结合“声介合母”或“介韵合母”等辅助策略,针对特定音节类型的拼读偏误(韵核舌位偏移或辅音唇形不准)及拼写错误(介音脱落或冗余)进行专项纠正。

介音 u	介音+韵腹	ian[iɛn]	与韵母拼读/介韵合母拼读
		iong[iʊŋ]	与声母拼读/声介合母拼读
	介音+韵腹+韵尾	ua[ua]	与声母拼读/声介合母拼读
		uo[uo]	与声母拼读/声介合母拼读
介音 ü	介音+韵腹	uai[uai]	与韵母拼读/介韵合母拼读
		uan[uan]	与韵母拼读/介韵合母拼读
	介音+韵腹+韵尾	uang[u a ŋ]	与声母拼读/声介合母拼读
		ü e[yɛ]	介音不划分, 整体教学
		ü an[yæn]	与韵母拼读/介韵合母拼读

在汉语拼音专项纠正过程中, 针对不同音节结构可以采取差异化介音处理策略。如表 1 所示, 对于“介音+韵腹”型音节(如 ia、ua、uo), 由于介音对声母舌位与唇形的影响显著, 在教学实践中, 建议采用声介合母拼读方法, 首先将介音与声母绑定为整体发音单位, 随后衔接韵腹完成音节拼合。教学中需要训练学生在声母发音前预先形成介音对应的唇形状态(如拼读“gua”时提前圆唇), 从而消除声母呼读音的负迁移影响。对于 ie、üe 类特殊韵母, 虽保留整体认读的传统教法不对介音进行划分, 但需特别强化声母发音与介音唇形的动态同步机制。例如教授“jue”时, 需引导学生在舌面前部抬升(声母 j 的发音动作)过程中同步完成撮唇动作(介音 ü 的特征), 避免出现声介分离的机械化拼读。

对于“介音+韵腹+韵尾”型音节, 需依据音系特征细分处理。首先是由 iao、iong、uang 构成的音节, 由于韵尾[-u]/[-ŋ]具有[+后舌位]的发音特征, 导致韵腹语音实现时产生舌位后移现象。在此类音节中, 介音的[+展唇]或[+圆唇]特征主要作用于声母发音部位, 因此建议将介音归入声母系统进行拼读。特别是当舌面音 j、q、x 与 iao、iong 组合时, 需对学生加强字母与音节的区别认知以避免介音 i 书写遗漏。其次是由 ian、üan、uai、uan 构成的音节。这类结构的特殊性在于介音与韵尾双重作用, 导致韵腹 a 在拼读时舌的高低、前后位置发生变化。针对此类音节, 建议教师可以采取“介韵合拼”策略将介音纳入韵母系统进行拼读, 同时确保声母发音全程保持与介音的协同性。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2][5][9]刘丹丹.小学汉语拼音教学中的音节划分与拼读[J].语文建设,2021(20):67-70.
- [3]许梦麟.反切拼读入门[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 [4]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专题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6][8]李华灿.关于汉语音节中“介音”的处理问题[J].文字改革,1961(3):18.
- [7]拓牧.谈声介合母连拼法[J].文字改革,1961(2):16-19.
- [10]莘乃珍.汉语拼音教学的历史和现状[A]//课程教材研究十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11]课程教材研究所.《义务教育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
- [12]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13]张吉生.汉语音节结构再分析[J].外国语,2008(31):45-52.
- [14]林茂灿.北京话声调分布的知觉研究[J].声学学报,1995(6):437-445.
- [15]Bao Zhiming. The syllable in Chinese [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6, (24): 312-354.
- [16]沈家煊.口误类例[J].中国语文,1992(4):306-316.

从“描写”到“规范”

——《汉语大字典》修订中的义项增删与当代汉语词汇知识库的建构

沈士博¹ 熊灿¹ 张程^{1*}

(1.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 本研究以《汉语大字典》第一版与第二版为核心研究对象, 通过对 642 条新增义项与 96 条删减记录的全量系统对比, 揭示其修订的内在逻辑与深层动因, 探讨大型历时性语文辞书在现代性转型中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命题。研究采用逐字对比的穷尽性方法, 建立涵盖字头、语义类别、时代分布等维度的封闭性数据库, 综合运用计量统计、历时比较、个案深描等手段, 从语言本体(语义、语法、语音)与外部社会文化双维度展开分析。

关键词: 汉语大字典; 义项增删; 辞书修订; 汉语词汇系统

基金项目: 成都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202511079013)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555

From Descriptiveness to Prescriptiveness: The Addition and Deletion of Lexical Senses in the Revision of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xical Knowledge Bas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hen Shibo¹, Xiong Can¹, Zhang Cheng^{1*}

1.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f Chengdu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106,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1st Edition and the 2nd Edition of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as its core research object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642 newly added lexical senses and 96 deletion records, it reveals the inherent logic and underlying motivations for its revision, and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positions confronted by large-scale diachronic Chinese dictionaries in their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adopts an exhaustive character-by-character comparison method, constructs a closed database covering dimensions such as head characters, semantic categories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employs approaches including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diachronic comparison and in-depth case description to conduct an analysis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 ontology (semantics, syntax, phonetics) and external social culture.

Keywords: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Addition and Deletion of Lexical Senses; Dictionary Revision; Chinese Lexical System

作者简介: 沈士博(2005—),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中外语言文化比较;

熊 灿(2006—),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汉语汉字文化;

张 程(1990—), 男,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汉语词类、海外汉文研究、认知语言学。

通讯作者: 张程

一、引言

《汉语大字典》作为我国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语文工具书，是汉字研究与辞书编纂领域的权威著作。2010年出版的第二版在第一版基础上，对字形、释义、书证等核心内容进行了全面修订完善，但随着汉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出土文献的持续新发现，以及方言用字、民族用字等专题研究的推进，其在义项设置、字词关系界定、特殊用字规范收录等方面仍有可商榷之处。辞书中字词关系的精准界定、义项的科学设置关乎工具书的权威性与实用价值，因此开展其义项增删专项研究，对完善辞书编纂体系、深化汉语词汇史与文字学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自第二版问世以来，学界围绕其修订展开多维度研究，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字形辨误、注音校正、释义补苴、书证指瑕等基础层面，涵盖体例规范、条目编排、疑难字考释等方向，部分研究聚焦特定部首字类、异体字、通假字及方言字展开探讨，为后续校勘与修订提供了具体参考。但现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对义项增删、

二、新增义项的分布与动因分析

（一）新增义项类型分布

本文通过图表直观呈现《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新增义项的类型构成与占比特征，核心反映：其一，新增义项以引申义、通假义、外来义、专业术语义为核心类别，类型分布多元且有明确主次；其二，引申义占比居首，凸显汉语词汇系统内部语义演变是义项新增的主导动因；其三，通假义类占比可观，体现修订对古文字用字规律与字际关系的考据补正；其四，外来义、专业术语义均有相应占比，印证语言接触、科技发展、专业术语规范化等外部因素的重要推动作用；其五，整体分布格局清晰展现义项新增是汉语内部自我完善与外部社会文化动因协同作用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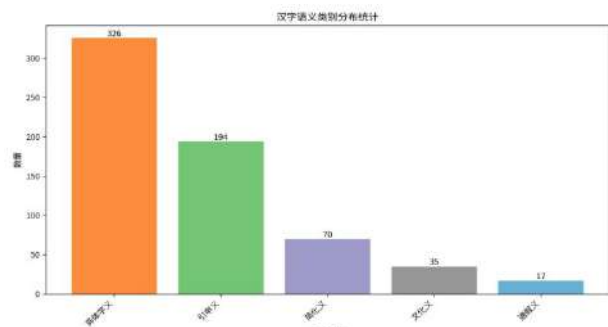


图1 新增义项语义类别分布统计柱状图

字词关系界定的系统性、全量性对比分析，通假与异体关系混淆等核心问题未得到全面梳理；二是对修订逻辑的深层探讨薄弱，未充分结合文献互证及语言内外变迁视角解读修订动因；三是方言字、民族字相关专题研究有短板，缺乏跨字典对比与长效修订机制探讨，尚未形成全面系统观照，存在明显研究空白。

基于此，本研究以《汉语大字典》第一版与第二版为核心研究对象，围绕两版间的义项修订展开系统研究，聚焦义项增删这一核心环节，旨在明确两大核心问题：第二版义项增删的具体类型有哪些？其背后的形成动因与运作机制为何？为解答上述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结合、宏观统计与微观个案互证的思路，采用逐字穷尽性对比、计量统计、历时比较、个案深描等方法展开分析，以期揭示义项增删的内在规律，为《汉语大字典》后续修订及当代汉语词汇知识库建构提供切实参考。



图2 新增义项语义类别分布占比统计饼状图

（二）新增义项的类型分析

2.2.1、词义系统的自我完善

词义的系统性强调词义之间的联系性。王力先生曾经指出：人们很容易体会到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却往往忽视了词汇的系统性，其实词与词之间联系是十分密切的。洪成玉认为：“词汇系统实际上就是词义的结构系统。词义的结构系统表现为词义之间的各种联系形式”^[1]。武占坤、王勤认为，由于词汇的组织形式比语音、语法松散得多，个体符号之间的制约性比较弱，给个体符号的增减以较大的自由。

因此,汉语词汇系统对新成分的加入开放性强,对旧成分的脱落封锁性弱,词义与词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语的词汇系统就是以词之前的这种相互关系为基础才得以形成的。

词义系统具有较强的自我完善能力有两个原因,从客观上,词义作为语义的最基本单位,将客观世界的各种联系和系统性反映到意识之中,使得词义具有系统性,这种系统性为词义系统的自我完善提供了基础。从主观上,受人类思维的概括性和整合性的影响,人类在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会对新出现的事物、现象等进行概括和分类,赋予其新的词义,同时也会对已有的词义进行调整和完善,以更好地适应认知和交流的需要,从而推动词义系统不断自我完善。例如:汉语大字典第二版补充第一版漏收的引申义,如“下”的“鄙视”义“之”的“生长,滋生”义,语法功能义,如“甚”作“什么”“壹”作“稍,暂”。

2.2.2、语言接触与外来概念的融入

语言接触提供了新的概念和表达需求,促使外来概念融入,外来概念融入促使义项新增。语言接触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直接接触如:相邻民族间交流,间接接触如:通过媒体、文学作品等非直接人际交流。在语言接触中,不同语言使用者交流,会带来外来概念。像广州地区古粤语(今壮语)为底层融合外来移民语言形成今粤语,这一过程中就有外来概念融入。如:第二版中新增“粢”的“一种食品。将糯米掺和粳米,用冷水浸泡,沥干后煮熟,中间裹油条等捏成饭团。”“郎”的名词意“屎壳郎”在方言文化调研中,挖掘出“郎”在中国北方地方语境对“蜣螂”的俗称用法

外来概念融入使得义项新增:汉外语言接触中,汉语吸收外来词时,一些固有词语会吸收对应外语词的义项,使汉语词语增添新义项,丰富词义系统。例如汉语新词汇“宅”。“宅”字来源于日语文化中“御宅族”的引进,“御宅族”通常指那些整体待在家里,依赖电脑和网络的人(汪靖 顾晓晨,2008)。而文化被引进后,汉语词汇中并没有对应表示此意义的词汇,新词汇“宅”便诞生了。“宅”这一指代“住宅”的词汇就增加了新词义“御宅族”^[3]。“酷”从本义的“寒冷”“程度深”“严厉”新增“厉害”“时尚”的义项,这是受英语 cool 的影响。“Cool”本义也是“凉的”,在 20 世纪美国青年文化中,cool 发生了语义引申,从“冷静、不激动”引申

为“沉稳、有范儿、不做作”再进一步引申为“时髦、帅气、令人佩服”最终形成了正面评价、夸赞人/事物时尚、厉害的核心义项。这一用法随流行音乐、电影、时尚、青年亚文化扩散到全球,成为跨文化通用的赞美词。汉语在与英语接触过程中,并非简单音译,而是采用了语义借用(借义)方式:找到汉语中与 cool 本义相近的词:

“酷”,直接把英语 cool 的新引申义移植到“酷”身上,让“酷”在保留原有词义的基础上,新增了赞美义。变革和外来文化涌入中原时,也会使汉语词汇义项增加,这体现了外来概念融入对义项新增的推动。

2.2.3、专门领域术语的规范化

专门领域术语的规范化,是指在科学、技术、法律、医学、经济等专业领域中,对概念、名称、定义进行统一、明确、系统的整理与确立。这一过程不仅是整理旧义,更是催生新义,其促进《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义项新增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几方面:专业概念细化,推动词义分化。如:“艇”的新增名词义“排水量在 500 吨以下的军用船只。但潜艇不论吨位大小,均称艇”,这反映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填补专业空白,创造全新的义项。许多专业概念是现代科学与技术发展产生的全新事物、全新关系,日常语言中没有对应表达。术语规范化为这些新概念命名或赋予旧词新义,直接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义项。如:“盖”的新增名词意“农具名又名‘耒’或‘耨’。长方形,用荆条或藤条编成,用来平整地面或松田保墒”,这反映生产工具的发展。跨学科交流推动词义扩展与迁移。现代学科高度交叉,术语规范化常需要借用其他领域的成熟术语。一个词在原领域有本义,被借用到新领域并规范化后,就会新增一个跨学科义项。例如:“翼”的新增名词意为“飞机等飞行器两侧伸出像鸟翼的部分”这反映时代科技的发展,赋予旧词新义专门领域术语的规范化,推动了词语义项的分化、扩展与新增,是词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专门领域术语的规范化也体现了文献发掘与学术进步:基于新出土文献或古籍整理成果增加的古义(如“ ”同“削”)。

2.2.4、汉字简化与异体字整理的产物

汉字简化与异体字整理,通过字形合并、词义归并、用法规范,打破了原有的形义平衡。它不仅没有减少意义,反而通过词义负载加重、使用频率提升、职能分工细化,极大地促进了词语义项的分化、叠加与新增,是现代汉语词义丰富

化的重要文字动因,如简化字(如“ ”“玕”)的正式收录。

(三) 新增义项的动因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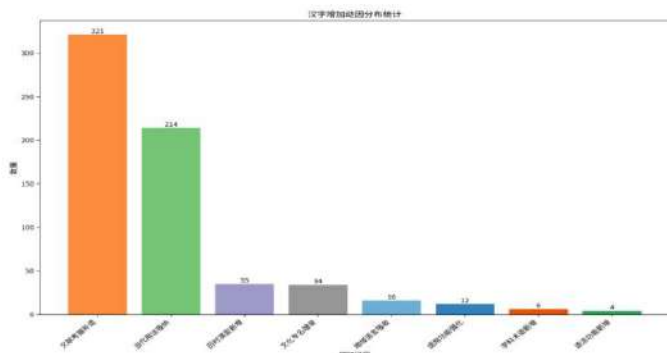


图3 新增义项动因分布柱状图

2.3.1、语言内部动因

语义扩展：词义从原有意义，通过引申，比喻，联想等方式，延伸出新的意义。这一过程受语言经济性，认知关联性以及使用频率固化的影响。如“下”的“鄙视”义：本义为“位置在低处”，隐含“低下”色彩。汉语常用空间高低隐喻地位价值，如《礼记》“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老子》“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这些文献中“下”常与“卑贱”关联，逐步引申为“品行、地位卑贱”，再转化为对人的“轻视、鄙视”态度。“下人”“下视”等结构反复强化这一用法，使“鄙视”义固化为“下”的独立词义。

语法化：语法化是指实词逐渐变成虚词或其他语法成分，同时产生新的语法意义的过程。词的功能发生转移，高频句法位置逐渐固化，语义不断虚化，实词的实在意义慢慢变淡，语法意义则不断增强，最终形成独立的语法义项，使得一个字既保留原本的实词义，又新增了新的语法义。以“甚”字为例，其本义是形容词，表程度深、过分、厉害，如“甚急”“甚好”，此时它是纯粹的实词，仅仅表示程度，不具备疑问功能。在中古汉语及近代汉语中，“甚”频繁出现在疑问语境里，最初的结构为“何等事 + 甚”，如《晋书·刑法志》“此何等事，而乃甚乎！”，高频使用后，结构紧缩为“甚事”（《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甚”从句末补语前移到名词前作定语，句法功能发生质变。到唐宋时期，“甚”开始向疑问代词过渡，至元明时期，彻底脱离程度义，直接表示“什么”，语义虚化后被重新分

析为疑问代词。后世为区分原形容词“甚”和新疑问代词“甚”，造“什”字专门表示疑问义，因此今天“什（什么）”的疑问功能，源头就是“甚”的语法化。

通假弱化：古代用字不严，常以音同或音近字通假本字。后世用字逐渐规范，通假现象减少，但通假时所承载的意义多被保留下来。随着通假义独立化、文献用例长期沉淀，最终推动字典新增义项的形成。以“琢”为例：“琢”本义为治玉、雕刻玉石，是本字；“砣”从石，本义与石击、雕琢相关，二者音近，古籍中常以“砣”通假代“琢”。这一用法长期稳定出现，如汉《校官碑》“如切如磋，如砣如磨”，《礼记·学记》日本古钞本、朝鲜刻本异文“玉不琢，不成器”，《篇海类编·石部》亦载“砣……同‘琢’，治玉也”。后世用字规范后，“砣”不再随意通假“琢”，但其通假阶段形成的“治玉、雕琢”义已被文献固定，不再依附通借关系，直接成为“砣”自身的稳定义项，因此在字典修订中被正式新增。异体，俗字，讹字的义项归并：《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吸收俗字、异体、讹字研究成果，将分散义项归并、补全。汉字书写变异导致义项分散，校勘与字际关系研究推动整合，一批俗字，异体字的用法被考证，补充为正字的义项。如：“朗”同“朗”。朗不等于朗的本字，是俗写，讹写，异体。朗：《说文》从月、良声，本义明亮、清朗，正字。朗：从刀、良声，《说文》未收，属后世俗字/讹字/异体。朗，同朗（《康熙字典》）。在隶书，楷书里，月（月）与刀（刂）字形极近，手写极易互讹。朗（良+月）在抄写，刻写时，月旁误作刀旁，遂成朗（良+刀）。朗（lǎ ng）、朗（lǎ ng）读音完全相同（卢党切/卢坦切）。音同加上形近，为“朗”代“朗”提供了替换条件。刀旁（2画）比月旁（4画）更易写，以简代繁，形成稳定俗写。另有古籍书证中证明通用。如：“耳聽滔朗奇麗激湔之音”（《淮南子·原道训》）朗等于朗，指声音清朗、响亮。“抑揚爽朗，莫之與京”（《笺注陶淵明集·序》）朗等于朗，指文辞清朗明快。“朗”由“朗”的月旁讹为刀旁形成，属形近讹字，俗写异体；因音同、义同、长期通用，后世字书将其义项完全归并入“朗”，最终确立“朗，同朗”的规范认定。由于字的构造也会产生异体字和俗字。这种异体字常见的特点是结构互相置换。例如，“此”字在《冠军将军刘氏墓志》中刻为“𠂔”，《宁懋墓志》中将

“房”字刻为“𡩂”等。这种结构置换可能是由于书写者对字形结构的理解不同,或者是为了书写方便而进行的调整。

2.3.2、外部社会文化动因

科技发展:科技发展是《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新增义项的重要外部动因,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普及,使大量传统汉字被赋予新的科技含义,成为义项增补的重要来源,填补了科技发展带来的语义空白,反映了科技对汉语词汇系统的深刻影响。如“帕”新增义项“帕斯卡的简称,压强单位”:其本义是手帕、头巾。帕斯卡(Pa)是1971年确立的国际标准压强单位,1984年我国明确采用该单位并淘汰旧单位,广泛应用于工程、物理、医学等领域。“帕”作为其简称,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高频出现(如“1帕”“千帕”“帕斯卡定律”),从外来音译词变为稳定单字义项,《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据此收录该义项。再如“翼”新增义项“飞机等飞行器两侧伸出像鸟翼的部分”:其本义是鸟的翅膀,飞行器的侧伸升力面在形态、功能上与鸟翼高度相似,故沿用“翼”命名,形成“机翼”“尾翼”等高频搭配,经航空出行与科技传播,该用法从临时借代变为稳定词义,被正式收录。还有“艇”新增义项“排水量在500吨以下的军用船只;潜艇不论吨位大小,均称艇”:其本义是轻舟、小船,与“舰”形成大小对立。1975年《海军军语(试行本)》明确军用船吨位分界,500吨以下水面军用船及各类潜艇统称“艇”,导弹艇、核潜艇等高频使用该称谓,用法稳定后成为新增义项。

方言进入通语:方言进入通语之所以造成义项新增,是因为方言为汉字提供了普通话不具备的新用法、新意义,这些用法经社会传播被全民接受后,需要在字典中独立设项,以反映现代汉语真实的词义系统。如“纠”新增动词义“拧”:《说文解字》中“纠”本义为“绳三合也”,核心是绞合、缠绕(如“纠缠”)。在四川、西南官话及部分官话区,“纠”长期作为高频口语动词,表“用手拧、扭、绞”,如“把瓶盖纠紧”“把毛巾纠干”,覆盖上亿人口,使用稳定。现代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如李劫人《大波》“郝又三正待伸手纠他的脸”。相较于普通话“拧”的多音多义,“纠(jiū)”读音单一、指向明确,可避免歧义,最终成为独立义项。再如“踮”新增字义“方言,踢到”,主要通行于以北京话

为核心的北方方言区,口语使用频率高,如老舍《骆驼祥子》“他脚底下一滑,踮在门槛上,差点摔出去”,其用法经传播固化,成为规范义项。

民族政策: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名称规范化、法定化,使原本不通用、写法混乱,甚至带歧视的字,变成全国通用、必须书写、必须读音的规范用字,词典必须为它们新增专用义项。国家确认各少数民族为法定民族,民族名称从民间称谓变成国家正式名称,必须有固定汉字。(如:“僂僂”)。同时过去很多民族用字带“彡”“夷”等歧视偏旁,或写法混乱,《汉语大字典》作为权威工具书,必须反映国家语言规范,体现民族平等,满足社会使用需求,因此必须新增义项。以“僂僂”为例,“僂”“僂”原本为生僻字,无通用义。新中国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开展民族识别,20世纪50年代正式确认僂僂族为单一少数民族,国家民委、语委统一规范“僂僂”为唯一法定写法,废除“栗栗”等异体字,其在行政、教育、媒体等领域高频通用。《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据此新增专用义项:僂、僂均用于“僂僂族”。此外,“怒”新增义项“我国少数民族名,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满”新增义项“我国少数民族名”,均是民族政策推动下的义项新增。

文献考据新发现:文献考据的新发现是《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新增义项的重要学术动因。第一版《汉语大字典》主要依据常见古籍、经史子集,很多字的古义、僻义、假借义没有被发现或证据不足,只能缺注、误注或不立义项。而后世出现大规模新材料与新考据,包括:出土文献,古籍新整理、方言,民族文献新校勘,大量传世文献未载、旧注疏漏或误释的汉字古义、僻义、假借义与专用义得到实证。《汉语大字典》第二版补立过去缺失的义项,纠正旧误释义,补充新的假借义、古义、专用义,于是就出现了新增义项。如:“伎”新增“古代指百戏杂技艺人”意,“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后汉书》)第一版主要依据《说文》“伎,与也”的本义与后世通行的文献,将“伎”的核心义项定为“技能”“歌舞女子”,未区分“歌舞”与“百戏杂技”的职业边界,对汉唐“百戏”体系下的“伎”缺乏专义收录。近现代对《后汉书》《通典》等典籍的校勘与训诂,明确了“伎”在汉唐语境中可统摄歌舞、杂技、角抵等所有表演艺人,并非仅指女性歌舞者。如《后汉书·仲长统传》“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含百戏杂技),《南史·宋

废帝纪》“作羌胡伎为乐”（指少数民族杂技表演）。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补证“伎”通“技”的表演义，近现代训诂进一步区分“伎”的“技艺”本义与“百戏艺人”的引申义，纠正了首版将二者混同的问题。古籍整理与训诂新证通过挖掘传世文献中的百戏书证、辨析“伎”与“妓”的历时分化，证实“伎”在汉唐时期确有“百戏杂技艺人”的专义，促使《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新增该义项，实现了汉字语义的精准化与完备化。“羴”新增“剽悍”意。第一版仅依据《说文》《玉篇》《急就篇》等基础字书，将“羴”限定为动物义：阉割过的公羊（騊羊、犍羊），母野羊（西方野羊之牝者），未收录其形容人性情剽悍的引申义，没有系统梳理《史记》等典籍的语境用例与古注互证。“其民羯羴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獬犇”（《史记·货殖列传》），描述赵国、中山一带民风，“羯羴”与“獬犇”对举，明确指民风强悍、桀骜不驯。徐广在《史记集解》中点明：“羴，犍羊名”，“羴”本指健羊，引申为人性如健羊般剽悍。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悍而不均也”直接释“羴”为捷悍、剽悍。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很如羊也”训“很”为不听从也，坐实“羴”^[4]的引申义理据。第二版中拆分“羴”的义项，明确区分了动物本义和形容引申义，纠正了首版语义缺失，既可以指健羊，也可形容剽悍的民风与人。“橙”新增“香囊”义。晋·傅玄《西长安行》：“何用存问妾，香橙双珠环。”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物异》：“晋时有徐景，于宣阳门外得一锦麝橙。”“橙”不见于《说文》《玉篇》《集韵》，属于后起字，其“香囊”义仅存于中古至唐宋文献，属于文献新证。此前字书仅存“毛带”义，诗文与笔记提供了“香囊”的名物用例。“醋”新增“据《封氏闻见记·蜀无兔鹅》：“酱菜似殖火，若象豆屑、胡芹、澤瀉葉之屬，並自西域而來，色類甚衆。”义。是依托《玉篇》《集韵》的字书训诂，及唐代饮食文献《封氏闻见记》的新考据。

三、删减义项的分布与动因分析

通过上一个部分对于《汉语大字典》第一版和第二版的新增义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影响字词发生义项变化的动因是十分多样的，同时汉语字词本身丰富的语义组合也影响着变化类型的多样性。至于删减义项部分的分析，将会继续沿用类似的分析模式以求对照效果更加明显。

（一）删减义项的类型分布

通过对比两版汉语大字典，共得到 96 条具有分析价值的删减义项变化。其中变化类型以“整义项删除”为主，共计 69 条，占删减总数的 71.88%；其次是“修饰语删除”，共计 16 条，占删减总数的 16.67%；之后为异体字或通假字删除，共计 11 条，占删减总数的 1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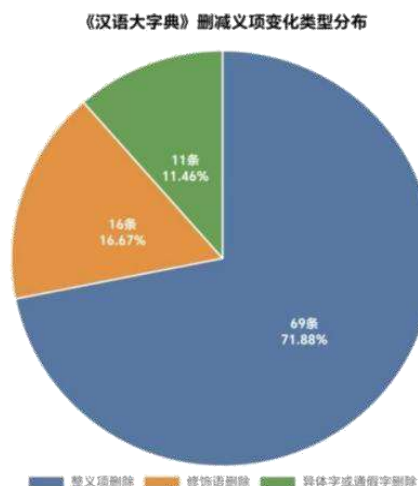


图4 删减义项类型分布柱状图

（二）删减义项的类型分析

从删减义项的三种分布类型何变动内容上来看，极少存在整字义项发生完全淘汰式的改变，绝大多数都是温和式的渐进式的变化。在这些删减变化中，以整义项删除为主，此处的整义项指的是某字的其中之一完整的释义。例如：“一”字的其中之一释义为“相同、一样”，那么“相同、一样”为“一”字的其中一个整义项。在“相同、一样。”之后的“如：长短不一、一视同仁”这部分内容为修饰语。分类中的第二个部分修饰语删除便是对这部分对于释义补充说明内容进行了删减。至于第三个类型异体或通假删除，便是对于字际关系的梳理，对于异体关系加以沟通，本质上是对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不统一的现象进行整理^[5]，很少涉及字义本身的变化。

在上述三种形式类型的基础之上，还可以根据具体删减的内容再次将其归类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历时元素的当代筛选、语义系统的内部调整、释义科学性和规范性的提升、辞书编纂体例的优化。

3.2.1、历时元素的当代筛选

此类删减内容的核心特征是被删内容往往是

极度生僻的死字、死义,不具备当代的使用价值。例如:“初”字的其中之一释义为“鼻”,这与当代人的使用习惯完全不同,并且现有“鼻”本字可以更好地契合这一义项,这便是典型的死义被删减。再如:“璩”字的第一版释义为“玉色”,第二版释义则为“同‘璩’”,“璩”继续表示“玉色”一义,而“璩”字作为“璩”的异体字,因为其书写繁杂和其他历史原因已经变为极少用的死字而被删除义项。

3.2.2、语义系统的内部调整

此类删减内容的核心特征是被删内容大多是具有多个释义的汉字内部的释义整合、调整;或者在异体字、通假字等字形字际关系曾经存在意义关联但现在联系弱化的汉字。例如:“炕”字的其中之一释义为“坐床”,俗作炕。而“炕”已经不具有“坐床”的意思,同时“炕”取代了“炕”来继续表示“坐床”的意思,这正是一个因字际关系调整,由形近汉字取代本字的表意而被删减的例证。再如:“滄”字的第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以石垒小堤不让水分流”,而在第二版中释义则变为了“水流不动”,而“滄”字本身还具有“水无波”这一释义,也就可以发现“滄”字的意义就与水流的状态密切相关。那么由第一版的“以石垒小堤不让水分流”删减为第二版的“水流不动”,就是围绕着水流的状态进行了字词语义的整合和调整。

3.2.3、释义科学性和规范性的提升

此类删减内容的核心特征是被删内容主要是由于原先的字词释义不严谨、不规范、不科学而无法适应辞书严谨性的要求或由于时代发展,该字词不再指代此类概念而进行的删减。例如:“刺”字的第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围棋的一种战术,连子直入曰刺”,第二版就对这个释义进行了删除。结合第一版的释义内容“连子直入曰刺”,可见“刺”字的“围棋战术”意是由于棋子在棋盘上的形式表现、动作态势符合“刺”字的本义,所以用“刺”字来命名此类的围棋战术,这样的命名方式基于直观的观察,往往未能说明其本质特征,并不科学,也不规范。再如“衡”字的第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北斗杓三星,玉衡的省称”,第二版中将此释义进行了删除。北斗七星分别是“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其中后三位又称北斗杓三星,意为斗柄处的三颗星,玉衡星位于斗柄的首位,是连接斗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和斗柄(玉衡、开阳、摇光)

的关键位置,是北斗七星轮廓的核心所在。故而,用“衡”来简称玉衡星,也是在利用“衡”字本身具有“平衡、平正”的本义,并非因其玉衡星本身的“衡”字属性,所以第二版对该释义进行了删除。

3.2.4、辞书编纂体例的优化

此类删减内容的核心特征是被删内容是为了适应辞书编纂的种种原则而进行了舍弃和合并的。这些编纂的原则中最常见的、最具代表性的是释义经济性原则,即尽量简洁地表达字词释义。例如“言”字的第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说话;说,讲。”,第二版对应的释义表达为“说话;说”,将第一版中的“讲”进行了删减,正是因为“讲”义与“说”存在重合,根据辞典释义的经济性原则,将“讲”舍弃掉了。再如:“射”字的第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古代六艺之一。有关弓箭制作规范和使用技能的训练。”,第二版的对应释义则是“有关弓箭制作规范和使用技能的训练。”,删去了“古代六艺之一。”这个部分,也是因为前一部分的解释与后一部分解释存在重合,所以只保留核心意义,将社会地位等冗余描述删去。

(三) 删减义项的动因分析

在现收集的96条语料之中,我们按照动因来看,可以大致分为:语义磨损与替代、通假机制弱化、社会文化变迁、释义经济性原则四个主要动因。当然了,一个字词含义的减少一定是长期的磨损过程,并且在其中伴随着语言内部和社会环境的多重动因,在把握和界定一个字词的变化动因时,往往是多元丰富的,不可以孤立地仅仅观察这一字词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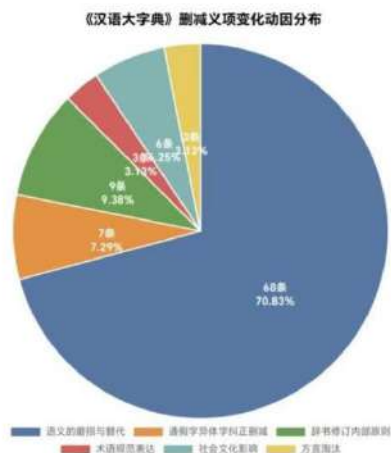


图5 删减义项动因统计饼状图

3.3.1、语义磨损与替代

语义磨损:指语义在使用中会产生磨损的一

种新兴语法现象^[6]。该义项所承载的语义随语言发展逐渐淡化,使用频率持续降低,核心义素不断流失,不再具备独立存在的语言价值,成为词汇系统中的边缘语义。语义替代:新的词汇形式逐步承接该义项的表达功能,在交际中形成固定使用习惯,原义项对应的表达形式被自然取代,语义功能被新词汇完全覆盖,最终失去保留的必要性。例如:“言”字被删除的“讲”义。“讲”的语义更偏向“详细阐述”或“特定场景表达”,与“言”偏书面化、简洁化的表达。不属于“言”的核心语义范畴,删除后可让义项更聚焦核心义,避免语义混淆。先秦时期“言”是高频动词,如《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可独立表“说话”;但随着语言演变,“言”逐渐向名词或书面语固定搭配转型。当代语境中,“言”作为独立动词已极少使用,且与“讲”的使用场景完全分离,如“言故事”不是规范表达,“讲故事”才是,删除“讲”是对二者功能分化的客观确认,符合词汇发展的自然规律。将二者语义剥离,是基于“言”本身的“讲”义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磨损了,并且“讲”义可以用新的字词来替代。同时,这样的删改也有利于学习教育,对非专业用户而言,“讲”是高频口语词,“言”是低频书面词,二者在日常使用中几乎无交集,保留“讲”易让学习者混淆。删除“讲”后,义项简化为“说,说话”,直接指向“言”的核心功能,降低了学习门槛。

3.3.2、通假机制弱化

对于通假机制弱化导致的删减,可以再划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通假关系消解:该义项对应的通假用法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随着语言规范化发展,原有的通假对应关系逐渐被标准化用字取代,在现代汉语体系中不再被认可和使用。其次是语义独立:通假字与本字的语义在发展中逐渐分化,各自形成独立的语义体系,二者的关联度持续降低,通假义项无法融入现当代的语义表达逻辑,成为冗余语义。

例如:“幹”字被删掉的“通“管”,主管。”义。“幹”与“管”并不存在广泛认可的通假关系,现代工具书不再标注“通管”,核心原因是所谓通假本质是古代个别语境的临时借用或用字混淆,未形成稳定通假传统,且随着文字规范化进程被逐步厘清。从字词本身意义来看,个别古籍中“幹”表“主管、从事”义,如《后汉书·伏湛传》“欲令幹任内職”,被误认作“管”的通假,但这是“幹”自身的本义引申,从“主干”

义引申为“主持、担当”义,并非替代“管”。此外,在中古音系统中,“幹”属“古案切,去声,翰韵。”,声母为见母;“管”属“古满切,上声,缓韵。”,声母同为见母,但声调、韵母存在差异,不符合“同/近音通假”的核心条件,从音韵演变来看,二者古音距离较远,缺乏通假的语音前提。因此,可以判断“幹”字与“管”字不存在稳定的通假关系,可能是某些古籍的错误使用影响了第一版辞书编纂过程,随着训诂学等学科的发展,在第二版的修订过程中予以了改正。

3.3.3、社会文化变迁

被删减的义项所关联的文化内涵、社会场景随时代发展逐渐消失或转型,其语义表达与现当代的社会文化语境脱节,无法在当下的交际中发挥实际作用。同时,社会文化的发展推动相关语义场发生重组,该义项所在的语义范畴被新的文化概念和表达形式重构,原有义项被挤出主流语义表达体系,失去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例如:

“音”字被删减的“歌谣”义。社会文化角度来看,现代音乐形式,如流行音乐、电子音乐更依赖“音”的技术属性,而“歌谣”作为传统艺术形式,其文化价值更多通过“民歌”“非遗”等概念体现,与“音”的现代用法渐行渐远。同时,现代科技:声学、电子学等领域的术语,如“音频”“音波”占据了“音”现代用法,挤压了“歌谣”的语义空间。再看字词本身的发展,“歌谣”的核心义素是“口头传唱的韵文”,其音乐性依附于歌词内容,与“音”侧重纯乐音的属性形成对立。第二版删除“歌谣”,实为将“音”的语义场收缩至“无歌词的音乐形式”。此外,“歌谣”作为双音节词,已成为独立的语义单位,而“音”单用时更多指向抽象音乐概念,“音色”“音高”。这种分化在《广韵》等古代韵书中已见端倪——“音”注为“声也”,“歌”注为“咏也”,二者已经分属不同语义范畴。再如:“語”字被删减的“汇辑一时、一人的事迹和言论的书名。”表示“汇辑言论的书名”时,“语录”(《论语》)成为专用词,“语”作为语素与“录”(记录)结合,既保留“言论”义,又明确“汇辑”属性,语义更完整;表示“汇辑事迹的书名”时,“行状”“别传”等词承担此类表意功能,与“语”无关联。这种发展态势使“語”单独表示“汇辑类书名”的用法失去存在空间,语义功能被细分到其他词汇中,最终导致该义项因冗余被删除。

3.3.4、释义经济性原则

辞书学释义的经济性原则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看。分别是语义重叠：该内容所表达的语义已被同一词条的核心义项或其他相关义项涵盖，无独立的语义信息增量，保留易造成释义的重复与赘余，影响语义表达的简洁性。以及体例适配：从辞书编纂体例来看，该内容属于非核心信息，删除后可使词条的释义结构更清晰，层级更分明，符合辞书对信息筛选、提炼的基本要求。例如：

“说”字的第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旧时指说合，介绍。”，第二版的对应释义为“说合，介绍。”，将第一版释义的“旧时指”进行了删除。“说合”的核心义素“从中促成双方关系”在现代汉语中未发生本质变化。从历时角度看，该义项在《世说新语》等文献中已有记载，如“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并延续至今。尽管社会婚恋形式从“父母之命”转向“自由恋爱”，但“说合”仍在婚姻介绍、商业合作等领域保留其功能，如“说合亲事”“说合项目”。第一版标注“旧时指”误判了该义项的存续性，而第二版删除标注，是对其语义稳定性的确认。“说合”的核心用法（婚姻介绍）仍是其语义范畴的原型，而现代衍生的用法属于边缘用法。第一版标注“旧时指”可能将原型用法固化为历史现象，忽视了边缘用法对原型的反作用。第二版删除标注，反映了字典编纂对“说合”语义范畴开放性的认可，即原型与边缘成员共同构成完整的意义网络。因此，将“旧时指”这部分修饰语删去表现了辞书编纂的科学性和经济性原则。

四、修订机制的理论探讨

（一）词典修订反映汉语词汇系统的自我净化与优化

汉语词汇系统的自我净化与优化，在《汉语大字典》的修订中通过具体的义项增删数据得到实证性呈现，其核心表现为“低效语义淘汰”与“语义体系完善”。

从语义净化的角度来看，修订通过精准删减实现词汇系统的去冗余。两版对比共梳理出96条有效删减义项，其中整义项删除69条，占比71.88%，核心为历时元素筛选出的死字死义与语义重叠内容。例如“初”字第一版中“鼻”的义，因“鼻”本字已完全承担该语义功能，且该通假用法在现代汉语中零使用，属于典型的冗余语义被删除；“璩”字第一版“玉色”义，因自身为“璩”的异体字，书写繁杂且使用频率极低，第二版直接归并为“同‘璩’”，删除独立义项。这种删减并非随机取舍，而是对词汇系统中低效、

过时语义单位的清理，符合优胜劣汰的自我净化规律，使汉字的语义指向更集中。

从语义优化的维度来看，642条新增义项通过填补语义空白、细化语义分工，推动词汇系统的结构化升级。新增义项中，引申义占比最高。如“下”从空间概念延伸出“鄙视”义，“升”从具体动作扩展为“晋升”义，形成完整的语义链条；学科术语新增义项16条（占比2.5%），如“帕”新增“帕斯卡”压强单位义、“翼”新增飞行器部件义，填补了科技发展带来的语义空白。同时，词汇系统的经济性原则在修订中充分体现，“塑”字新增“塑料材料”义，使同一字形承担动作与材料双重语义，避免了新字创制，实现了语义资源的高效配置。这种基于内部规律的义项增补，使汉语词汇的语义网络更严密。

（二）从“描写性”到“规范性”的辞书功能转变

《汉语大字典》的修订清晰地呈现了大型语文辞书从客观描写语言事实到描写与规范并重的功能转型，这一转变通过具体的修订数据与实践操作得以落地，是在尊重语言现实的基础上，提升辞书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第一版的编纂以描写性为主，侧重记录汉字在历代文献中的使用原貌，未对不规范现象进行干预。释义方面，“刺”字第一版标注“围棋的一种战术，连子直入曰刺”，该释义基于直观动作描述，未揭示战术本质，缺乏科学性；在术语使用上，方言字释义中“别称”与“俗称”混用，体例不统一。这种纯描写性处理虽保留了语言的原始状态，但难以满足读者对规范信息的需求。

第二版修订显著强化了规范性导向，通过数据优化与学术考证实现规范引导。释义方面，删除“刺”字不科学的围棋战术义，新增学科术语均明确科学定义，如“酸”界定为“电离时产生的阳离子全为氢离子的化合物”；术语使用上，统一方言字释义术语，将“姐”的“别称”修订为“俗称”，使方言字的释义体例保持一致。此外，第二版删减16条修饰语（占删减总数的16.67%），如“言”字删除“讲”义，避免语义重叠，体现了释义的经济性与规范性。这种转变表明，当代大型语文辞书已从单纯的语言记录工具，转变为兼具描写真实性与规范引导性的权威参照。

（三）修订中体现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意识

《汉语大字典》的修订深度契合国家语言政策，其642条新增义项与96条删减义项的处理，

贯穿了规范汉字推广、术语标准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的语言规划目标,体现了辞书编纂的社会职能。

在规范汉字推广方面,修订严格落实《简化字总表》的类推简化原则,针对第一版中“車”“門”等偏旁类推简化不一致的问题,第二版逐步统一标准,补充类推简化形式,减少繁简混用造成的检索障碍。这种处理直接响应了推广规范汉字的国家政策,推动汉字使用的标准化。

在术语标准化方面,新增的16条学科术语项均依据国家学科术语标准审定,如“乏”作为电工学术语 var 的标准译名,“域”的“网络域”定义,实现了与国家标准的对接;方言字释义中,统一“称类”术语,推动了方言研究领域的术语规范,契合语言规划中“术语规范化”的目标。

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方面,修订通过语音标注与义项调整引导方言向普通话靠拢。以“刻”字为例,其方言音 kē i 不符合汉语拼音方案,第二版虽保留该义项,但明确标注为方言音,同时优先标注普通话读音 kè;“量”字的轻声化标注(liáng→liang),区分“测量”与“打量”的语义差异,契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范。此外,在民族政策推动下,“傈僳”“怒”等字新增民族名称义项,规范了民族用字,体现了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导向。

五、结论

5.1、核心研究与创新价值

本研究通过全量统计分析《汉语大字典》一、二版间642条新增义项与96条删减义项,得出核心结论:其一,义项增删呈现优化为主、净化为辅的特征,新增聚焦引申义补全、当代用法吸纳与文献考据补遗,删减以死字死义汰除、语义系统优化为核心,是汉语词汇系统自我净化与优化的外在体现;其二,辞书功能实现从“单纯描写语言事实”到描写与规范并重的转型,第二版通过释义规范、术语统一、注音校正,强化了权威工具书的规范引导职能;其三,修订深度呼应国家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在规范汉字推广、术语标准化、民族用字规范等方面充分体现了辞书编纂的社会职能。

本研究的创新点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系统性,首次对两版义项增删开展全量穷尽式分析,建立多维度封闭性数据库,突破现有研究零散订正的局限;二是动因分析的双重性,结合语言本体内部规律与外部社会文化动因解读修订逻辑,实现二者有机结合;三是研究结论的实证性,所有分析均基于具体修订数据,结论精准且有明确支撑,可为辞书修订提供实际参考。

5.2、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受数据可得性限制,研究仅聚焦义项增删核心维度,未涵盖字形修订、书证调整等内容;样本覆盖仅针对有义项变化的条目,对无修订字头缺乏探讨,难以完整呈现词典修订全貌;未追踪义项增删后的社会使用反馈,缺乏对修订实践效果的后续验证。

基于研究结论与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从两方面推进:一是完善《汉语大字典》后续修订工作,深化语义系统优化,淘汰冗余义项、补充新兴语义与弱势方言区义项;强化规范引导职能,统一释义术语体例、结合最新国家标准更新学科术语;完善文献考据支撑,吸纳出土文献与古籍整理新成果,增强释义严谨性。二是推进数字化辞书编纂建设,构建义项演变动态修订数据库,实时追踪新词新义,补充缺失的信息,探索语义拓展,系统化整合知识^[7];开发多模态规范模块,为方言字、专业术语等提供语音、图像、文献等多元资源;搭建用户反馈闭环,形成“反馈-考证-修订”的迭代机制,提升辞书的时代适应性与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 [1]洪成玉.词义的系统特征[J].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4):1-11.
- [2]曲丽玮,林明明.近五十年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06):200-201.DOI:10.16227/j.cnki.tyys.2013.06.015.
- [3]付慧琳,李俊.汉语词汇词义可变性初探[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4,12(03):149-151.DOI:10.13895/j.cnki.jimufe.2014.03.002.
- [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02.
- [5]雷汉卿,刘珂鑫.《汉语大字典》字际关系问题综论[J/OL].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1[2026-03-08].<https://doi.org/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50926.001>.
- [6]刘扬之.词语误用与语义磨损浅析[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20,(42):40-41.
- [7]姜永超,黄仁瑄.专题数据库建设与《汉语大字典》的修订[J].汉字汉语研究,2024,(02):47-57+126.DOI:10.13513/j.cnki.41-1041/h.2024.02.007.

MATLAB 软件在医学高等数学数字化改革的实践探索

王静¹ 顾锦裕¹ 陈唯贤¹ 丁有得¹

(1.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广州 511436)

摘要: 医学高等数学具有抽象性和严密逻辑性特点, 作为理工科专业的公共基础课, 存在教学模式单一、学习过程枯燥、评价体系不均衡的特点。为了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中的困局, 将 MATLAB 软件引入高等数学课堂, 探索使用软件辅助教学的实践, 将课堂理论和软件实验结合起来。软件辅助的实验教学能减少课堂理论讲解的压力, 有效改善学习枯燥的局面, 激发学习兴趣, 并且对于学生参与数模等课外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且丰富了课程的评价体系。

关键词: MATLAB 软件; 实践教学; 评价体系

基金项目: 广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 (2025JXGG017); 2025-2026 学年广州医科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20261131); 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40805211262351)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556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MATLAB Software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edical Advanced Mathematics

Wang Jing¹, Gu Jinyu¹, Chen Weixian¹, Ding Youde¹

1.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1436, China

Abstract: As a public basic cours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Medical Advanced Mathematics is highly abstract and rigorous logically.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characterized by a single mode, dull learning, and an unbalanced evaluation system. To break the dilemma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MATLAB software is introduced into the Advanced Mathematics classroom, exploring the practice of software-assisted teaching and integrating classroom theory with software experiments. Software-assisted experimental teaching can reduce the pressure of theoretical instruction in class,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dullness of learning, stimulate interest, and positively impact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othe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while enriching the course's evaluation system.

Keywords: MATLAB Software; Practical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作者简介: 王 静(1986—),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生物医学工程、医学大数据分析;

顾锦裕(2004—),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可穿戴移动医疗设备、信号分析;

陈唯贤(2005—),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医疗仪器设备;

丁有得(1981—), 男,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心电信号处理、医疗仪器设备研究。

通讯作者: 丁有得

在我国高等医学院校,《高等数学》是一门公共基础课,作为高等教育中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其课程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数值运算能力,提高其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的水平,为学习后继基础医学课程及从事医学科学研究打下基础。高等数学课程在传统教学中存在教学目标偏重理论,教学模式单一,考试评价模式单一,技术应用不足,忽视对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的问题^{[1][2]}。传统模式教学导致学生认为该课程乏味、沉闷、学习意愿薄弱。并且多年以来本门课程主要以期末闭卷考试作为考核指标,教学和学习目标演变为做题和公式推导,更加减弱了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兴趣。有很多学生在考前突击刷题,而平时出勤率不高,导致该课程评价体系有失公允。

在高等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如何能将抽象的内容变得生动,化繁为简地传授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所有高等数学教师需正视与探讨的课题。为了改善高等数学目前的教学现状,特引入使用 MATLAB 软件的实验课时,并将实验课时作为平时成绩纳入考核要求。将 MATLAB 软件融入高等数学的教学,已有很多高校进入实施^[2],这种尝试将知识和应用转化,软件辅助教学的方式还可以减少理论课堂的推导过程,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率,增强教学互动性。

MATLAB 软件将可视化、计算和编程功能集于一身,是一个交互式的、以矩阵计算为基础的科学和工程计算软件。在很多高等院校, MATLAB 已经成为基础课和电子信息、电器、自动化等专业课程的基本教学工具。它具备编程效率高、计算功能强、使用简便、易于扩充等优点。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将 MATLAB 软件与医科类院校高等数学教学有机结合起来,设置相关的实验课时,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动手能力,丰富课程评价体系,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数学实验本质上是依托计算机平台开展的实践性学习活动——它以数学理论为底层逻辑框架,选取数学问题或模型作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人机交互界面或编写程序代码实现操作交互,运用数值求解、符号推导、动态可视化等多元技术手段作为核心内容载体,采用案例剖析、虚拟仿真、规律提炼等系统性方法作为研究路径,最终目标聚焦于深化数学概念理解、强化数学应用能力或支撑数学创新实践,并以标准化实验报告作为成果呈现载体。这种实践模式将抽象数学理论与具体计算工具深度融合,在动态交互中实现知识建

构与能力提升的双重目标。因此数学实验是数学学科里十分重要的尝试和探索^[3]。

1 MATLAB 软件辅助实验教学设计案例

高等数学主要内容包括函数与极限、导数与微分、不定积分、定积分、微分方程等。在设置实验时,按照章节分模块设置实验内容,主要通过绘图、MATLAB 集成函数演示、验证、求解具体问题,验证及分析极值、极限、积分、导数、微分等实例。

1.1 极限、间断点、极值的物理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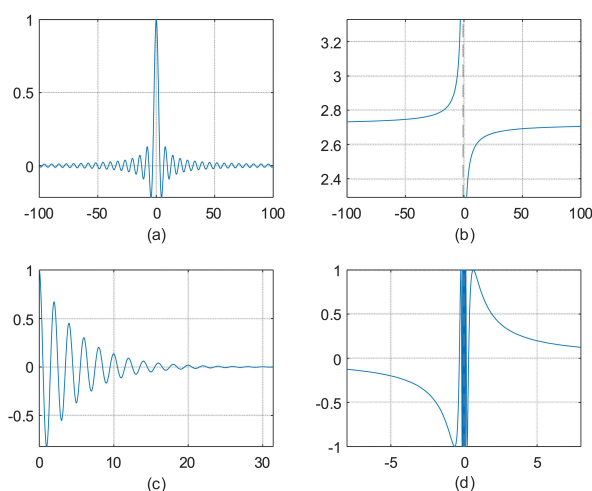
极限描述自变量的某个变化过程中,函数值的变化趋势。自变量的变化过程通常有两种:自变量趋于无穷或者自变量趋于有限常数值。函数连续的含义是,定义域内的某点处左右极限存在且相等,并且等于该点函数值。如果不满足该条件则是间断点。极值点是函数的某定义域内某一点处的函数值是其邻域内所有点的函数值中的最大或最小,该点称为极大值点或极小值点。为了验证这几个物理概念,设置以下演示题目。

图 1 中分别绘制四个常见函数的曲线,分别是(a) $y=\sin(x)/x$, (b) $y=(1+1/x)^x$, (c) $y=e^{-0.2x}\cos(\pi x)$, (d) $y=\sin(1/x)$ 四个函数,在图 1 (a) (b) (c) (d) 四图中分别可以观察在自变量 $x \rightarrow 0$, $x \rightarrow \infty$, $x \rightarrow +\infty$, $x \rightarrow \infty$ 时四个函数的极限。

绘图的语句分别是:

```
fplot('sin(x)/x',[-100,100]);
fplot('(1+1/x)^x',[-100,100]);
fplot('exp(-0.2*x)*cos(pi*x)',[0,10*pi]);
fplot('sin(1/x)',[-8,8]);
```

图 1 四个函数的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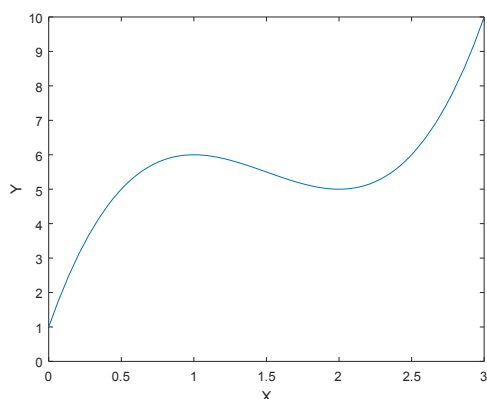
如果将本例中的变量 x 改变为 n , 则函数变为序列, 可以通过图 1 看出序列的收敛性。并且

根据 (b) 图可以观察到 0 点是该函数的一个无穷间断点, 根据 (d) 图可以观察到 0 点是该函数的一个振动间断点。通过该实例的演示, 使同学们了解序列收敛性和函数极限的意义, 并且认识了两类间断点。

例 寻找函数 $y=2x^3-9x^2+12x+1$ 在区间 $[0,3]$ 上的极值。

根据 MATLAB 绘图函数绘制函数的图形, 如图 2 所示。

图 2 函数 $y=2x^3-9x^2+12x+1$ 在区间 $[0,3]$ 上的曲线



首先根据图 2 曲线观察, 函数在 $x=1$ 和 2 附近取得极值, 选用 MATLAB 局部最小值函数 `fminbnd` 寻找函数的极值, 由于是局部最值函数, 寻找极值的区间必须在 $1, 2$ 点附近, 通过观察曲线, 选取两个极值区间: $[0.5, 1.5]$ 和 $[1.5, 3]$, 注意区间选择不宜过大, 因为是采用最小值函数, 如果选用过大的区间, 可能在端点位置处取到最小值。由于函数 `fminbnd` 是最小值函数, 因此寻找极大值时, 将函数取负号, 通过寻找极小值的方式寻找极大值。

代码如下:

```
y='2*x^3-9*x^2+12*x+1';
```

```
fplot(y,[0,3])
```

```
[x1,y1]=fminbnd(y,1.5,3)
```

```
y='-2*x^3+9*x^2-12*x-1';
```

```
[x2,y2]=fminbnd(y,0.5,1.5)
```

返回值分别是 $[x1,y1]=[2,5]$; $[x1,y1]=[1,-6]$ 。

所以函数在 $[0,3]$ 区间上有一个极大值一个极小值点, 分别是 $(1,6)$ 和 $(2,5)$ 。

MATLAB 绘图带来的好处是使图像可视化, 学生不必根据公式想象曲线的走势, 将函数的间断点、极限、极点等都一一呈现, 这样的学习方式减少了难度, 增加了学生学习兴趣, 并且对于知识概念的理解更加深刻。

1.2 积分的求解以及积分的概念

积分包括多种积分, 如定积分、不定积分和重积分等, 积分常用的方法有第一换元法、第二换元法、分部积分法、有理函数的积分等。求解积分涉及很多技巧, 这些积分技能是需要大量的习题习得, 在练习中不断总结方法, 积分的学习过程比较沉闷, 一道题目可能要往返验证, 最终才能求得结果, 这样的学习过程比较呆板无趣。在 MATLAB 中, 利用 `int` 函数求解不定积分的解析解; 常用 `integral` 函数计算定积分, 这些函数的使用使积分看起来十分有趣而简单, 如果将理论课堂和软件积分函数联合使用, MATLAB 积分函数验证课堂理论推导, 辅助理论推导的学习理解, 可以降低学习难度, 提高学习兴趣。

例 计算不定积分 $\int x^2 \sin x dx$

使用积分函数时, 用到了符号变量 `syms`, 代码如下:

```
syms x;
```

```
int(x^2*sin(x))
```

```
ans = -x^2*cos(x)+2*cos(x)+2*x*sin(x)
```

用微分命令 `diff` 验证上述积分正确性, MATLAB 代码为:

```
syms x;
```

```
diff(-x^2*cos(x)+2*cos(x)+2*x*sin(x))
```

```
ans = x^2*sin(x)
```

该例中, 联合使用 `int` 和 `diff` 函数, 验证了微分和不定积分是互为逆运算。

例 计算定积分 $\int_1^3 x^3 - 2x^2 + x dx$

```
f = @(x) x.^3 - 2*x.^2 + x;
```

```
result = integral(f, 1, 3);
```

```
result = 6.6667
```

例 计算积分 $\int_0^{\infty} e^{-x^2} (\ln x)^2 dx$

仿照上述例子, 计算函数的定积分, 代码如下:

```
fun = @(x) exp(-x.^2).*log(x).^2;
```

```
q = integral(fun,0,Inf);
```

```
disp(['数值积分结果:', num2str(q)]);
```

```
数值积分结果: 1.9475
```

由于上面例子一个积分限是 ∞ , 因此也可以计算不定积分, 用符号积分计算上述实例, 代码

如下:

```
syms x;
f=exp(-x.^2).*log(x).^2;
result2 = int(f, 0, Inf);
disp(['符号积分结果: ', char(result2)]);
符号积分结果: (pi^(1/2)*((eulergamma +
log(4))^2 + pi^2/2))/8
```

eulergamma 直接表示 Euler-Mascheroni 常数 (γ), 其数值约为 0.5772156649015329。根据微积分基本定理 (Newton-Leibniz 公式), 可以根据函数 $f(x)$ 的原函数, 求出定积分的值。但在实际问题中, 会存在的问题是, 比如有些函数的原函数虽然存在, 但却无法用初等函数表示; 或者有些函数是用图表表示的, 这样就不能直接运用 Newton-Leibniz 公式。

高等数学定积分常见的应用问题有曲边梯形面积和旋转体体积的求解。学生存在的问题是对旋转体缺少想象力, 对于积分元没有深刻的认识。课堂授课时, 对于旋转体的积分问题, 如果预先采用 MATLAB 绘制旋转体的图像, 将复杂抽象的旋转体体积模型 3D 展示, 结合具体的旋转曲面问题逐层展示曲面的旋转过程, 则定积分问题会更加容易分析, 从而提高课堂的授课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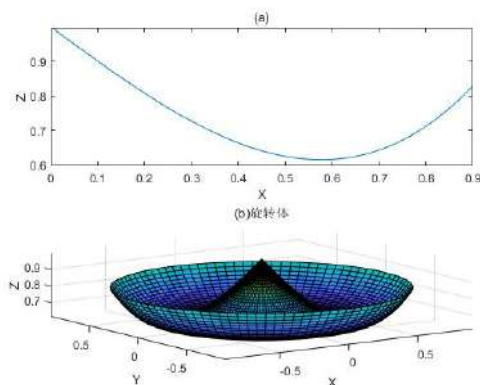
例 旋转体的绘图。绘制曲线 $z=x^3-x+1$, $x \in [0,0.9]$ 绕 z 轴旋转生成的旋转体。

绘图语句如下:

```
[theta, r] = meshgrid(linspace(0,2*pi,100),
linspace(0,0.9,50));
X = r.*cos(theta);
Y = r.*sin(theta);
Z = r.^3-r+1;
surf(X, Y, Z);
```

图 3 (a) 绘制的是 $[0,0.9]$ 区间内曲线的图形, 图 3 (b) 表示的是曲线绕 z 轴旋转一周而形成的旋转体。

图 3 旋转体的绘图



本例研究了一般曲线绕某一坐标轴旋转一周得到的旋转体, 通过修改参数, 可得到更多的旋转体绘图。MATLAB 绘图功能强大, 可将枯燥的数学公式转化为 3D 图片, 如果计算有关旋转体的体积, 通过 3D 图片可以一目了然的展示并选取积分体积元, 减少了同学们学习中的难度, 增加了对旋转体的认识。强大的绘图功能可以绘制各种形状的旋转体, 课堂理论讲解时配合讲解典型的异形曲面, 如生物医学人体相容性曲面设计, 采用双曲面、抛物面等异形曲面设计, 以匹配人体解剖结构并优化生物相容性; 工业设备异形曲面的选取, 有美学表现、降低风阻系数等作用; 3D 打印采用曲面设计, 有提高内部强度, 降低打印成本的需求等实际应用方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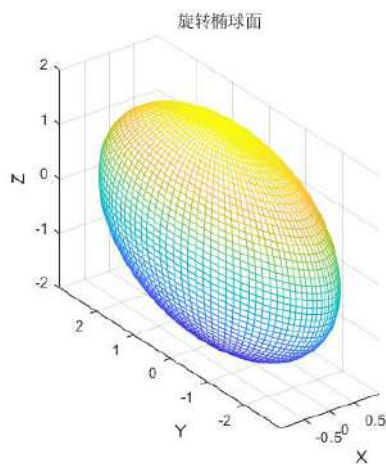
例 旋转椭球面 ($x^2/a^2 + y^2/b^2 + z^2/c^2 = 1$), 由椭圆 $x^2/a^2 + z^2/c^2 = 1$ 绕 z 轴旋转生成, 当 $a=b$ 时形成标准椭球面。

绘图语句如下:

```
a = 1.0; % x 轴半轴长
b = 3.0; % y 轴半轴长
c = 2.0; % z 轴半轴长
% 生成球坐标系网格
[u, v] = meshgrid(linspace(0, 2*pi, 100),
linspace(0, pi, 50));
x = a * sin(v) .* cos(u); % 转换为笛卡尔坐标
y = b * sin(v) .* sin(u);
z = c * cos(v);
```

```
mesh(x,y,z);
```

图 4 旋转椭球面



本例研究曲线是椭圆闭合曲线, 因此由闭合曲线旋转一周形成的旋转体是闭合的椭球体, 椭圆围绕长轴和短轴分别旋转可得不同的旋转体。由于原始曲线函数是隐函数表达式, 因此绘图时, 采用了坐标系转换。

1.3 微分方程的建模与求解

微积分方程的学习核心在于掌握其求解的方法。然而, 由于微分方程的求解复杂, 学生常面临方法适配性判断的困境——面对具体问题时难以迅速锁定最优解法, 在推导过程中又易陷入计算卡壳, 导致学习动力衰减甚至放弃继续探索的心理倾向。微分方程的求解教学中急需降低难度, 以及激发学习兴趣。

微分方程在医学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一个典型应用是传染病模型的建模, 世界上存在各式各样传染病, 传染病的传播模型往往可以用微分方程表达, 根据传染模型预测感染人数, 对于控制和管理传染病意义十分重大。常见的传染病有指数传播模型、SI 模型、SIS 模型、SIR 模型。SIR 模型是典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突出特点是模型的形式是关于多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变量之间的常微分方程组。

另一个应用模型是生物体生长或肿瘤发展的 Gompertz 数学模型^[4]。考虑氧气浓度、温度、营养供应、各种酶的活性和化疗环境的变化引起的随机波动影响, 癌细胞生长模型需要加上乘性噪声^[5]。则含有随机波动影响的 Gompertz 数学模型是含有动态变量的常微分方程组。

医学微分方程建模的问题大多采用单变量模型, 如果采用的是多变量, 则这些问题很难求得解析解, 但可以使用软件求解全局最优解。MATLAB 提供了符号函数 dsolve 求解常微分方程。

例 求解微分方程 $y' = -2y + 2x^2 + 2x$, $y(0) = 1$

```
syms y(x)
y=dsolve(diff(y)==-2*y+2*x^2+2*x,y(0)==1)
y=exp(-2*x)+x^2
```

例 求解二阶线性微分方程 $y'' - 2y' + y = e^x$, $y(0) = 1, y'(0) = -1$

```
syms y(x)
dy=diff(y)
y=dsolve(diff(y,2)-2*diff(y)+y==exp(x),y(0)==1,dy(0)==-1)
```

```
y=exp(x)+(x^2*exp(x))/2-2*x*exp(x)
```

例 求解微分方程

```
y^(4)+10y^(3)+35y''+50y'+24y=u", y(0)=1,
```

```
y'(0)=-1, y''(0)=1, y'''(0)=1, u(t)=e^t*cos(t)
```

```
syms y(t)
```

```
dy=diff(y); d2y=diff(y,2); d3y=diff(y,3);
```

```
u=exp(-t)*cos(t);
```

```
y=dsolve(diff(y,4)+10*diff(y,3)+35*diff(y,2)+50*diff(y)+24*y==diff(u,2),...
```

```
y(0)==0,dy(0)==-1,d2y(0)==1,d3y(0)==1)
```

```
y = -(exp(-4*t)*(70*exp(3*t) - 135*exp(2*t) + 84*exp(t) + 6*exp(3*t)*sin(t) - 19))/30
```

上述几个实例表明, 使用微分方程求解函数求解单变量微分方程, 可以很容易得到解析解。

2 实验教学的验收以及评价

实验通过提交实验报告以及典型题目的运算绘图, 验收结果。每次实验课后, 根据演示的内容, 适当布置一些利用 MATLAB 求解的习题作业, 有绘图类的, 也有计算类的, 让学生动手实践, 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以及运用数学软件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根据同学们完成度以及创新思维方面合理给分, 并且作为平时成绩的给分项, 激发同学对实验的完成积极性。

除了实验考评之外, 我们还布置了在线作业, 作业成绩也作为考评选项纳入成绩。在线作业也可以根据 MATLAB 软件提供的函数完成, 使作业和实验相辅相成。

建立多种激励机制, 助力每个学生在不同方面发现自己所长。展开多种活动, 如数模竞赛等,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使学生全面展示自身特长与所学知识, 进而提高学习效果。

3 学习效果的提升

通过实验课, 使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对极限, 导数, 积分等重要数学概念有更加深刻的认知, 从理性认知到感性认知, 提升了教学效率。实验教学 and 课堂教学互相辅助, 减轻了课堂教学的压力, 多模式教学同时改善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高等数学 MATLAB 软件实操课堂中, 多数学生展现出良好的学习适应性, 他们会提前抵达机房完成课前准备事项, 少数同学主动携带个人电脑并提前完成软件安装, 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自主练习。这种积极的学习行为充分表明, 绝大多数学生对 MATLAB 软件的接受度较高, 且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主动性与探索热情, 形成了良好的学习生态。

通过数学实验软件的实际操作, 有效激发了学生参与数学建模竞赛的内在动力。这种实践模式不仅显著提升了学生对陌生编程环境的适应能

力——在接触新程序语言时表现出更强的学习效能,更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凸显出计算效率的优势,最终转化为竞赛成绩的显著提升,形成“实践-能力-成绩”的正向循环,充分验证了数字化工具在数学建模教育中的赋能价值。

4 总结

采用 MATLAB 软件进行医学高等数学的实践探索,有效促进了学生对知识概念的理解和消化,软件的可视化功能强大,而高等数学具有抽象的特点,可视化使一些难以理解的概念以图像的形式呈现,使同学们更加容易理解概念的意义。

在编写代码的过程中,提升了动手能力,一些概念参数的修改带来不同的结果。并且计算机语言的训练加强逻辑思维。实验实践可以给大学生参加数模等竞赛带来一些锻炼,提升了参加竞赛的积极性。

传统的课程评价单一而且单向,有时候造成

评价的不公平,实践探索丰富了课程的评价体系,从实践的结果能看出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的深度,使得评价结果更加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1] 粟一凡,陆汛,夏文华,田智鲲.六位一体创新式教学打造“高等数学”金课[J].大学,2025,S1:241-243.

[2] 王立雄,马迪.人工智能赋能的高校数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探究——以《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为例[J].中国现代教育学报,2026,2(2):237-240.

[3] 李瑞,但炜.数学建模思想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探究[J].高教学刊,2023,11:112-115.

[4] 王凤筵.周期随机 Gompertz 模型的最优收获策略[J].集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27(2):181-185.

[5] 姜翠翠.基于癌症治疗的动力学模型研究[D].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11

课内到课外：教师支持与校园体育氛围对大学生课外锻炼意向的影响——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

胡海红¹ 丰华²

(1.淮北理工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2.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 体教融合背景下, 高校体育课内教学效果如何有效转化为大学生课外自主锻炼行为, 是当前学校体育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以自我决定理论为框架, 构建了教师支持、校园体育氛围、学生体育课内自主动机与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之间的关系模型, 采用便利抽样法对 386 名选修公共体育课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并运用分层回归分析检验变量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教师支持与校园体育氛围均显著正向影响学生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 学生体育课内自主动机在教师支持与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校园体育氛围对学生课内自主动机的促进作用尤为突出。研究结论揭示了体育课内动机向课外锻炼意向的跨情境转化机制, 建议高校从提升教师支持教学能力、系统营造校园体育氛围、推动课内外一体化融合三方面深化体育改革。

关键词: 体教融合; 自我决定理论; 教师支持; 校园体育氛围; 课内自主动机; 课外锻炼意向

基金项目: 安徽省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重点项目: 程序教学法在体育舞蹈伦巴舞教学中的应用与研究 (编号: 2023jyxm0504)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557

From Classroom to Outside-of-Class: Teacher Autonomy Support, Campus Sports Atmosphere, and College Students' Exercise Intention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Hu Haihong¹, Feng Hua²

¹ Huaib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bei, China

²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how to effectively transform the teaching effects in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into students' autonomous exercise behaviors outside class is a key issue facing the current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relational model involving teacher autonomy support, campus sports atmosphere, students' autonomous motiv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and their autonomous exercise intention outside clas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作者简介: 胡海红(1984—), 女, 助教,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通讯作者: 丰华(1982—), 男,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体育教学。

conducted among 386 college students who took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variabl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both teacher autonomy support and campus sports atmosphe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 students' autonomous exercise intention outside class; students' autonomous motiv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eacher autonomy support and autonomous exercise intention outside class; and campus sports atmosphere demonstrates a particularly prominent effect on promoting students' autonomous motivation in class. The findings reveal the cross-contextual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from in-class autonomous motivation to out-of-class exercise inten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eepen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by enhancing teachers' autonomy-supportive teaching competence, systematically fostering a supportive campus sports atmosphere, and promoting an integrated mechanism that links curricular and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activities.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eacher autonomy support; Campus sports atmosphere; In-class autonomous motivation; Out-of-class exercise intention

1. 引言

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这标志着体教融合从局部试点上升为学校体育改革的顶层设计,要求高校体育突破“课内教学”的单一模式,构建“教会、勤练、常赛”一体化的育人体系。2025年发布的《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显示,全国总体体质合格率达84.9%,较2020年提高0.8个百分点。然而,大学生体质健康的形势依然严峻。有研究指出,教育部2021年发布的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大学生体质健康不及格率高达30%,远高于小学生(6.5%)和初中生(14.5%);高年级学生体力活动不足问题尤为突出,大三学生的不达标率达35.5%。课外锻炼的参与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在课外锻炼方面,中国青年网2023年对全国25125名大学生开展的调查显示,每周运动不足三次的大学生占比高达48.19%,58.7%的大学生每次运动时间不超过30分钟。体能下降与锻炼不足的叠加效应,已成为制约高校体育育人实效的现实困境。

上述数据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高校体育“教了”,但大学生课外“不练”或“练得不够”,课内教学效果未能有效转化为课外自主锻炼行为。从理论层面审视,这涉及一个关键的学术问题:体育课内学习经验能否以及如何“溢出”到课外情境?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为该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SDT认为,自主支持的社会情境能够满足个体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的基本心理需求,进而促进动机内化,激发持续的自主行为(Ryan & Deci, 2017)。

然而,已有研究更多关注教师支持对课内动机的直接影响,对课内动机能否跨情境迁移至课外锻炼意向的传导机制探讨较少,更鲜有研究将校园体育氛围作为宏观环境变量纳入模型,检验其对上述传导路径的调节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以自我决定理论为框架,聚焦探讨体育课内学生自主动机在教师支持与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之间的跨情境研究,并检验校园体育氛围对学生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之间的影响。研究旨在揭示高校体育从“课上教”到“课下练”的行为转化机理,为体教融合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与校园体育生态建设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实证依据。

2.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自我决定理论(SDT)认为,当社会环境支持个体的自主性、胜任感与归属感需求时,动机将沿着从无动机、外部调节、内摄调节、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到内在调节的连续体逐步内化(Ryan & Deci, 2017)。其中,认同调节与内在调节构成自主动机,是驱动持续行为的核心动力(Ryan & Deci, 2017)。在体育教育领域,Vasconcellos等在综合265项研究后证实,自主、胜任与归属需求的满足与自主动机呈强正相关,且教师对学生自主性与胜任感体验的影响尤为显著(Vasconcellos et al., 2020)。一项以中国大学生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教师支持通过自主动机的中介路径显著预测体育课学习投入(2025, PLoS ONE)。另一项新近元分析则揭示,教师的自主支持行为对学生的满意度、动机、胜任感与参与度均表现出强正向效应(2024, Frontiers in Psychology)。上述证据为“教师支持

到体育课内自主动机”的研究路径提供了稳健的实证支持。

SDT 进一步假设,在某一情境中形成的自主动机可跨情境迁移。Huttmacher 等基于纵向设计对 1681 名中学生进行追踪发现,体育课自主动机可显著迁移至休闲时间情境,并通过意向、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的多重中介间接促进课外身体活动 (Huttmacher et al., 2020)。国内学者也指出,体育教师的自主支持可通过自主动机的传递效应影响校外身体活动,其潜在机制即跨情境模型(毛志雄, 2025)。然而,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中小学群体,较少将“课内动机”作为正式中介变量检验该传导链在大学生群体中的适用性。

校园体育氛围作为宏观生态变量,其调节作用亦不容忽视。许昌 (2010) 发现,大学生感知的校园体育氛围由体育锻炼氛围、体育交往氛围与体育组织管理氛围三个维度构成,对个体体育心理与行为结果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力。一项 2024 年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则证实,体育氛围通过心理韧性等中介变量影响大学生适应结果,且环境变量的介入显著改变了主效应的作用强度。体教融合政策倡导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生态,这意味着校园体育氛围可能放大或缓冲教师个体的影响力:在浓厚氛围下,教师支持的动机激发作用或更强;反之,若校园缺乏整体运动生态,教师的个体努力可能事倍功半。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教师支持对课内自主动机的促进作用已获充分验证,但课内动机能否跨情境“溢出”至课外锻炼意向,以及校园体育氛围如何调节教师支持与课内动机的关系,仍有待系统检验。

3. 研究模型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本研究以教师支持及校园体育氛围为自变量,学生体育课内自主动机为中介变量,学生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为因变量。模型旨在检验课内自主动机在教师支持及校园体育氛围与课外锻炼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H1-1: 教师支持正向影响学生体育课内自主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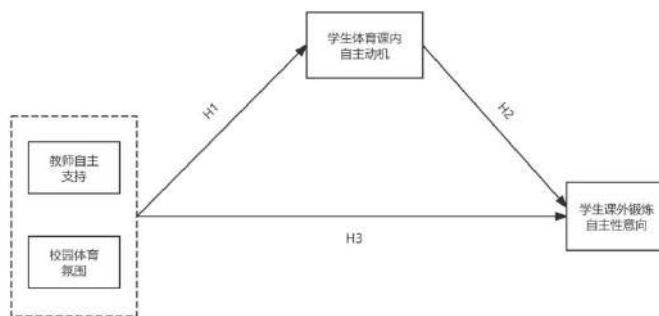
H1-2: 校园体育氛围正向影响学生体育课内自主动机。

H2: 学生体育课内自主动机在教师支持与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之间起中介作用。

H3-1: 教师支持正向影响学生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

H3-2: 校园体育氛围正向影响学生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

图 1 研究模型



4. 研究设计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所有量表均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 (1=完全不符合, 7=完全符合), 并在正式施测前经两名体育教育学方向教授审阅及小范围预试 (n=80) 修订, 确保题项表述清晰准确。正式调查采用便利抽样法, 于 2025 年 3 月至 2026 年 3 月, 选取选修公共体育课的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为: (1) 已修读体育课一学期以上; (2) 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420 份, 回收后剔除规律性填答、漏填超过两题及填答时间短于 60 秒的无效问卷,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386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1.90%。其中, 男生 176 人 (45.60%), 女生 210 人 (54.40%); 大一 132 人 (34.20%), 大二 157 人 (40.67%), 大三及以上 97 人 (25.13%); 年龄范围为 18—23 岁, 平均年龄 20.14 ± 1.32 岁。

5. 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 具体分析如下。

(一) 信度检验

表 1 调查信度检验结果

变量	Cronbach's α	信度评价
教师支持	0.940	很好
校园体育氛围	0.942	很好
学生课内自主动机	0.954	很好
学生锻炼自主性意向	0.947	很好

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与 KMO 值分别检验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与结构效度, 结果如表 1、表 2 所示。教师支持、校园体育氛围、学生课内自主动机及学生锻炼自主性意向四个量

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940、0.942、0.954 和 0.947, 均高于 0.90, 表明各测量工具信度理想。KMO 值分别为 0.748、0.742、0.763 和 0.775, 均大于 0.70 的最低标准, 且球形检验结果均显著, 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量表结构效度良好。上述结果表明, 本研究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能够满足后续分析的要求。

(二) 效度检验

表 2 效度分析检验结果

变量	KMO 值	结构效度评价
教师支持	0.748	很好
校园体育氛围	0.742	很好
学生课内自主动机	0.763	很好
学生锻炼自主性意向	0.775	很好

(三) 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教师支持 (X1) 与学生课内自主动机 (M) 呈显著正相关 ($r=0.441$), 与学生锻炼自主性意向 (Y) 亦呈显著正相关 ($r=0.456$); 校园体育氛围 (X2) 与学生课内自主动机 ($r=0.543$) 及锻炼自主性意向 ($r=0.521$) 均呈显著中等正相关。值得注意的是, 学生课内自主动机与锻炼自主性意向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 ($r=0.624$), 提示课内动机与课外锻炼意向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关联。

此外, 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 0.70, 初步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3 相关性检验结果

变量	X1	X2	M	Y
X1	1			
X2	0.519	1		
M	0.441	0.543	1	
Y	0.456	0.521	0.624	1

(四) 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结果如表 4 所示。

模型 1 以学生课内自主动机为因变量, 以教师支持与校园体育氛围为自变量。结果显示, 教师支持对学生课内自主动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beta=0.152$, $p=0.026$), 校园体育氛围同样正向影响学生课内自主动机 ($\beta=0.319$, $p<0.001$), 两个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分别为 1.546 和 1.388, 均远低于 10, 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 2 在引入学生课内自主动机后, 结果显示该变量对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的正向作用显著 ($\beta=0.271$, $p=0.004$), 表明学生课内自主动机对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产生正向影响。

模型 3 检验了教师支持及校园体育氛围对学生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的影响, 结果表明其正向作用显著 ($\beta=0.162$, $p=0.013$)。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因变量	自变量	Beta	T	p	VIF
模型 1	学生课内自主动机	教师支持	.152	1.854	.026	1.546
		校园体育氛围	.319	6.778	.000	1.388
模型 2	学生锻炼自主性意向	学生课内自主动机	.324	4.361	.000	1.686
模型 3	学生锻炼自主性意向	教师支持	.271	3.761	.004	1.676
		校园体育氛围	.162	2.967	.013	1.667

根据上述结果, 本研究的三个假设均获得支持: H1-1 及 H1-2 成立, 教师支持及校园体育氛围均正向影响学生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 H2 成立, 学生课内自主动机正向影响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 H3-1 及 H3-2 成立, 学生课内自主动机及校园体育氛围均对学生课内自主动机产生正向的影响。

6. 结论及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 构建了以教师支

持、校园体育氛围、学生课内自主动机与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为变量的关系模型, 通过对 386 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教师支持与校园体育氛围均对大学生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产生了正向的影响。这表明, 在体育课堂上教师能否提供给学生选择空间、尊重学生观点并给予有意义的反馈, 以及整个校园是否具有浓厚的体育锻炼风气, 是决定学生后续是否愿意在课外主动参与锻炼的关键因素。这一发现呼应了体教融合政策所倡导的一体化育人理

念,揭示出高校体育改革不能仅停留在对课堂教学的改进,而应同步关注校园体育生态的系统建设。

第二,学生课内自主动机对大学生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产生正向的影响。这说明,教师支持不仅直接作用于学生的课外锻炼意向,还通过可以过激发学生在体育课上的自主动机间接产生效果,说明体育课上形成的高质量动机可以“溢出”至课外,转化为主动锻炼的行为意向。

第三,教师支持($\beta=0.271$, $p=0.004$)与校园体育氛围($\beta=0.162$, $p=0.013$)依然对课外锻炼自主性意向存在显著影响。且相关系数高于教师支持,这一结果为体教融合的“全方位育人”理念提供了数据支撑。这说明,教师的个体努力固然重要,但如若缺乏校园整体运动生态的支持,效果可能事倍功半。

(二) 实践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从以下三方面提出高校体育改革的实践建议:

一是在课堂教学层面,高校应着力提升体育教师的自主支持教学能力。通过定期组织体育教师开展自主支持教学策略的专题培训,帮助教师掌握提供选择、尊重差异、给予正向反馈等具体技巧。体育课不应只是技能传授和体能达标,更要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和内在动机。

二是在校园生态层面,学校应从制度建设、文化培育和设施保障三方面协同发力。制度上,将课外锻炼参与纳入评奖评优体系;文化上,通过体育明星宣传、运动社团扶持、赛事常态化等方式,营造“人人参与、处处可运动”的校园体育文化;设施上,优化场地预约机制,延长夜间和周末开放时间,降低学生参与锻炼的现实门槛。

三是在政策落地上,高校应积极推动课内外一体化的体教融合机制,将体育课教学、课外锻炼、运动竞赛和体质监测纳入统一的管理闭环,建立“课堂引导、课外延伸、竞赛驱动”的联动机制,形成“课上培养动机、课下提供机会、校园提供氛围”的良性循环。

7.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

第一,本研究仅选取一所高校的公共体育课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样本覆盖范围较窄,未来研究可扩大抽样范围至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高校,

并采用纵向追踪或实验干预设计,增强结论的普适性与因果解释力。

第二,本研究所用变量均采用学生自陈式问卷,可能存在偏差。后续研究可引入客观行为指标,如运动APP打卡记录、场地使用后台数据等,实现主观报告与客观行为的交叉验证。

第三,调查设计中校园体育氛围量表为自编工具,虽在本研究中信效度尚可接受,但未经过大规模检验,需进一步完善。此外,课内向课外的动机转化可能还涉及其他中间变量,未来可扩展理论模型,纳入更多中介路径以深化机制解释。

参考文献:

- [1]Ajzen, I. (2002). Constructing a TPB questionnair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s://people.umass.edu/aizen/pdf/tpb.measurement.pdf>
- [2]Hutmacher, D., Eckelt, M., Bund, A., & Steffgen, G. (2020). Does motiv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have an impact on out-of-school physical activity over time? A longitudin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19), 7258.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7197258>
- [3]Markland, D., & Tobin, V. (2004). A modification to the Behavioural Regulation in Exercise Questionnaire to include an assessment of amotivation.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6(2), 191 – 196.
- [4]Qi, G., Samsudin, S., Ramlan, M. A., Lin, X., & Yuan, Y. (2024). Effect of teacher autonomy support on college students' autonomous motiv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Revista de Psicología del Deporte*, 33(3), 433 – 442.
- [5]Q Guo, X Wang, Z Gao, J Gao, X Lin, S Samsudin. (2025).The influence of teacher support on student engagement in physical edu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autonomous motivation and self-efficacy. (2025). *PLoS ONE*, 20(9), e033187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331876>
- [6]Ryan, R. M., & Deci, E. L. (2017).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in motivation, development, and wellness*. The Guilford Press.

- [7]Vasconcellos, D., Parker, P. D., Hilland, T., Cinelli, R., Owen, K. B., Kapsal, N., Lee, J., Antczak, D., Ntoumanis, N., Ryan, R. M., & Lonsdale, C. (2020).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pplied to physical educ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12(7), 1444 – 1469. <https://doi.org/10.1037/edu0000420>
- [8]Williams, G. C., Grow, V. M., Freedman, Z. R., Ryan, R. M., & Deci, E. L. (1996). Motivational predictors of weight loss and weight-loss mainten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1), 115 – 126.
- [9]Wilson, P. M., Rodgers, W. M., Loitz, C. C., & Scime, G. (2006). “It’s who I am…”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ed regulation in exercise context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Research*, 11(2), 79 – 104.
- [10]朱姣, 毛志雄. (2025). 从体育课到休闲时间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促进的探索: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
- [11]中国青年网. (2023, August 21). 近五成大学生每周运动不足三次. *中国青年报*.
- [12]国家体育总局. (2025). 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 国家体育总局.
- [13]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 (2020).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
- [14]教育部. (2021). 全国约3成大学生体质健康不及格 (教育部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抽测复核数据). 教育部.
- [15]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2021). 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报告. *中国学校卫生*, 42(9), 1281 – 1284.

UbD 理论在初中历史单元教学设计中的应用与优化路径

骆建豪¹ 马子含²

(1.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00 2.新疆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 UbD 理论以“理解”为核心, 主张从预期学习结果出发, 依次确定评价证据并设计学习经历, 为素养导向的初中历史单元教学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支持。当前初中历史教学仍不同程度存在目标表述宽泛、活动组织零散、评价滞后于教学等问题, 影响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结构化理解和迁移运用。文章立足《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关于核心素养培育与课程内容整合的要求, 分析 UbD 理论与初中历史单元教学在目标统整、证据导向和深度学习方面的内在契合, 进而提出“确立理解目标—设计评价证据—组织学习活动—实施反馈改进”的优化路径。研究认为, 基于 UbD 的历史单元教学应以大概念和核心问题统摄教学内容, 以表现性任务和过程性证据诊断学习成效, 以史料研读、情境探究、项目学习等活动促进学生形成历史解释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该路径有助于推动初中历史教学由知识传授走向理解建构, 实现教学目标、学习过程和评价方式的一致。

关键词: UbD 理论; 初中历史; 单元教学设计; 逆向设计; 历史核心素养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558

The Appl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UbD Theory in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Unit Teaching Design

Jianhao Luo¹ Ma Zihan²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China

2.School of Psycholog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 centered on enduring understanding,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competency-oriented unit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In current practice, problems such as vague objectives, fragmented activities and delayed assessment still weaken students' structure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er.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History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UbD and history unit teaching in terms of coherent objectives, evidence-based assessment and deep learning. It proposes an optimization path of defining understanding goals, designing assessment evidence, organizing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improving instruction through feedback. The study argues that history unit teaching based on UbD should use big ideas and essential questions to integrate content, employ performance tasks and process evidence to diagnose learning outcomes, and promot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and value judgment through source analysis, situational inquiry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Keywords: UbD theory;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unit teaching design; backward design; core historical competencies

作者简介: 骆建豪(2000—), 男, 硕士研究生, 学科教学(历史);
马子含(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一、问题提出：从“完成教学”走向“促进理解”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初中历史教学的重心正在由单纯的知识传递转向核心素养培育。历史课程内容时段跨度大、概念密度高、因果关系复杂，学生既要记忆基本史实，又要理解历史发展的线索、结构与意义。如果课堂仍以单课时知识点推进为主，教师容易把教学理解为“讲完教材”，学生也容易把学习窄化为“记住结论”。这种教学方式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提高事实性知识的熟悉程度，却不利于学生形成解释历史现象、辨析史料证据和联系现实问题的能力。

UbD 理论强调以“理解”为中心开展逆向设计，其基本逻辑是先明确学生最终应形成怎样的理解和能力，再思考用何种证据判断目标是否达成，最后设计相应的学习活动。这一思路与历史学科素养导向具有较强一致性。历史教学并不只是让学生知道“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理解“为什么发生”“如何产生影响”以及“我们应怎样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因此，将 UbD 理论引入初中历史单元教学，有助于纠正目标、评价和活动相互脱节的问题。

从教学实践看，当前初中历史单元设计主要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目标设计较为笼统，常以“了解”“掌握”“认识”等动词概括学习要求，缺少可观察、可评价的行为表现。其二，教学活动重形式轻逻辑，一些课堂虽然设置讨论、展示或角色扮演，但活动与核心问题、学习证据之间缺乏清晰关联。其三，评价多集中于单元结束后的知识检测，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理解变化、史料运用和历史解释水平关注不足。UbD 的价值正在于以结果为导向重构教学流程，使教师在单元起点就思考“学生需要形成什么理解”“怎样证明其已经理解”“哪些活动能够支持这种理解”。

二、理论基础：UbD 与初中历史单元教学的契合

UbD 理论由“确定预期结果、确定合适的评价证据、设计学习经历和教学”三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强调教师必须从课程标准、学科本质和学生发展需要出发，提炼持久性理解、核心问题和关键知识技能。第二阶段要求教师在教学开始前设计评价证据，包括表现性任务、学习过程记录、测验、作品展示和反思文本等。第三阶段则围绕目标和评价证据组织教学活动，使学习经历真正服务于目标达成，而不是活动本身的堆砌。

初中历史单元教学与 UbD 具有天然的结合

空间。首先，历史课程强调时序性、关联性和解释性，适合以单元为单位整合相关史实与概念。例如，在学习中国古代史相关内容时，教师可围绕“国家治理如何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调整”设置单元问题，将制度演变、民族交往、经济发展和文化成就置于同一理解框架。其次，历史核心素养本身需要通过可观察的学习表现加以呈现，如学生能否依据史料提出观点，能否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解释事件，能否辨析不同历史叙述的立场。再次，历史学习具有较强的情境性和探究性，适合通过材料研读、问题讨论、项目学习等方式促进深度理解。

由此可见，UbD 并不是在历史课堂外部添加一种新的教学标签，而是为单元教学提供了更严密的设计程序。它要求教师把“目标—评价—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避免目标高悬、评价滞后和活动碎片化。对于初中历史教学而言，UbD 的核心启示在于：单元教学应以历史理解为中心，以评价证据为支点，以学习活动为路径，最终服务于学生历史思维和价值认同的形成。

三、目标重构：以历史理解统摄单元设计

基于 UbD 的单元教学设计，首先要重构教学目标。传统目标往往按照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三个维度分列，虽然形式完整，但容易出现目标之间缺乏内在联系的问题。UbD 强调从“学生最终应理解什么”出发，将目标整合为若干具有统摄性的历史理解。例如，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关单元中，教师可将持久性理解表述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断探索、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制度创新、思想解放和社会实践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这样的目标能够把分散史实纳入较高层次的解释框架。

目标设计还应与历史核心素养相衔接。时空观念要求学生能够将历史事件置于特定时间与空间结构中加以认识；史料实证要求学生理解史料来源、提取信息并判断证据效力；历史解释要求学生基于史实和证据说明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唯物史观要求学生从生产力发展、社会矛盾和人民实践等角度理解历史进程；家国情怀则要求学生在理性理解历史的基础上形成价值认同。教师在确定单元目标时，应避免把这些素养简单罗列，而要转化为学生可表现的学习结果。

例如，“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可进一步细化为：学生能够结合会议文献、统计数据和社会生活材料，说明改革开放对经济体制、社会

结构和国家发展道路的影响；能够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社会生活的变化，并解释变化背后的政策因素；能够联系现实案例，认识国家发展道路与人民生活改善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目标既体现历史学科特点，也具有可评价性。目标越清晰，后续评价和活动设计越容易形成闭环。

四、评价前置：以证据判断学习是否真正发生

UbD 理论区别于一般教学设计的重要特征，是强调评价先于教学活动设计。历史学习中的“理解”不能仅靠学生是否背出结论来判断，而应通过多类型证据加以呈现。教师在单元开始前就应思考：学生完成学习后，哪些表现能够证明他们已经形成了结构化理解？哪些证据能够反映其史料分析、历史解释和价值判断能力？

评价证据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础性证据，主要包括时间轴、概念图、随堂检测和史实梳理表，用于判断学生是否掌握基本史实和时序关系。第二类是过程性证据，主要包括史料阅读单、课堂讨论记录、小组研究笔记和学习日志，用于观察学生理解生成的过程。第三类是表现性证据，主要包括历史小论文、主题展示、项目报告、角色论证和现实案例分析，用于考查学生能否迁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较复杂的问题。

表现性任务是历史单元评价的关键。以“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与救亡探索”为例，教师可设计任务：“请你以历史研究者身份，结合两则以上史料，说明近代中国不同阶层救亡方案的共同目标与局限，并评价其历史意义。”这一任务要求学生综合运用史实、史料和解释能力，远比单纯回答选择题更能呈现理解深度。评价标准可围绕史实准确、证据充分、解释合理、逻辑清晰和价值判断恰当等维度展开。通过评价前置，教师能够明确教学的“证据方向”，学生也能清楚学习的努力目标。

五、活动优化：以核心问题组织深度学习

在目标和评价证据明确之后，教师需要设计能够支持学生达成理解的学习活动。UbD 并不排斥讲授，而是要求讲授、讨论、探究和训练都围绕核心问题展开。历史课堂中的核心问题应具有开放性、解释性和迁移价值，能够引导学生持续思考。例如，“为什么说制度选择必须适应时代条件？”“历史转折是如何改变国家发展方向的？”“我们如何依据史料认识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这些问题能够把学生从事实记忆引向

历史理解。

史料研读是初中历史深度学习的重要抓手。教师可依据学生认知水平选择文字史料、图片、地图、统计图表和口述材料，设计“史料来源—核心信息—可证明观点—局限说明”的分析框架，引导学生从证据出发形成观点。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可提供关键词提示和问题支架；对于能力较强的学生，可增加多材料比较和观点论证任务。这样既能保证课堂的可操作性，也能体现差异化教学。

情境任务能够增强历史学习的现实感。教师可通过历史现场、社会生活、地方资源和现实问题创设情境。例如，在学习改革开放相关内容时，可呈现家庭消费、城市建设、交通发展和产业变化等材料，引导学生讨论“普通人的生活变化如何反映国家发展道路的调整”。在学习古代制度史时，可设计“为某一朝代提出治理建议”的模拟任务，让学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思考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与局限。情境活动的关键不是表演热闹，而是让学生在情境中运用史实和证据进行解释。

项目化学习也可与 UbD 相结合，但应避免泛化。历史项目不宜仅停留在制作海报、拍摄视频等展示层面，而应突出问题研究和证据运用。教师可围绕单元核心问题设置小型项目，如“家乡历史变迁中的国家发展”“一件文物背后的时代信息”“从地图变化看历史进程”等。项目实施中，应提供资料检索、史料辨析、观点组织和成果表达的支架，并通过阶段性反馈不断修正学生的研究方向。

六、实施路径：构建“目标—评价—活动”一致的单元流程

基于 UbD 的初中历史单元教学可按照四个步骤推进。第一步，研读课程标准和教材内容，提炼单元大概念与核心问题。教师要从教材目录中走出来，思考本单元最值得学生长期保留的理解是什么。第二步，确定可观察的学习结果，把抽象素养转化为学生能够完成的任务表现。第三步，设计评价证据和评价量规，明确不同层级学生在知识掌握、证据运用、解释表达和价值判断方面的表现标准。第四步，安排学习活动和反馈机制，使每一项活动都能为目标达成提供支撑。

以“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单元为例，教师可将单元大概念确定为“文明是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创造互动中逐渐形成的”。核心问题可设置为：“我们如何判断一种

早期文明已经形成？”“不同区域文明为什么既有差异又能交流融合？”评价任务可要求学生选取一处考古发现或一种制度现象，说明其反映的文明特征，并与其他材料进行比较。学习活动则包括地图定位、考古材料解读、概念图绘制和小组展示。这样，目标、评价和活动围绕同一理解主线展开。

在课堂推进中，教师还应建立及时反馈机制。单元学习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线性过程，而是不断诊断和修正的循环。教师可通过出口卡、课堂追问、学习单批注和小组汇报了解学生理解情况。如果发现学生只能罗列史实而不能解释联系，就需要增加因果分析和比较任务；如果发现学生引用材料但不能说明证据作用，就需要补充史料实证训练；如果发现学生价值表达空泛，就应引导其回到具体史实和现实案例。反馈越具体，教学改进越有效。

七、实践注意：避免 UbD 应用中的形式化倾向

UbD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需要防止三种倾向。第一，防止概念空泛化。有些教学设计虽然写入“大概概念”“核心问题”等词语，但实际课堂仍然按照教材段落逐一讲解，概念并未真正发挥统摄作用。教师应检验每个活动是否回应核心问题，每项评价是否能够证明学生理解了大概概念。第二，防止评价标签化。评价前置并不意味着简单增加量表，而是要让评价标准真正指导学生学习 and 教师反馈。量规设计应简明、具体，避免维度过多导致学生难以理解。

第三，防止活动表演化。历史课堂中的角色扮演、项目展示和小组讨论必须以史实和证据为基础。如果学生脱离历史情境自由想象，活动就可能削弱学科严谨性。教师应在开放探究与必要支架之间保持平衡，既给学生表达和选择的空间，又确保其观点建立在可靠材料之上。对于初中阶段学生而言，支架设计尤为重要，包括问题提示、材料注释、表达模板和评价示例等。

此外，UbD 的实施还应考虑课时容量和学生差异。并非每个单元都适合大型项目，也并非每节课都要安排复杂任务。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学情选择适当深度：对于事实密集、学生基础薄弱的单元，可先通过时间轴和概念图建立结构；对于关联性强、探究空间较大的单元，可适当增加史料比较和表现性任务。真正有效的 UbD 设计不是追求形式完整，而是追求目标明确、证据充分和学习真实发生。

八、结语

UbD 理论为初中历史单元教学提供了从“教什么”走向“为什么教、怎样证明学会、如何促进理解”的设计框架。其价值不在于替代历史教学的基本规律，而在于帮助教师重新组织目标、评价和活动之间的关系。以 UbD 为指导，历史单元教学可以从零散史实的传授转向结构理解的建构，从单一知识检测转向证据化评价，从教师单向讲授转向学生基于问题和材料的主动探究。

在后续实践中，教师还应进一步加强课堂数据和学生作品的积累，通过前测、后测、访谈、学习日志和作品分析等方式检验 UbD 单元设计的实际效果。只有将理论框架转化为可操作、可观察、可改进的课堂流程，UbD 才能真正服务于初中历史课程改革，促进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发展。

这一课例说明，UbD 的关键并非增加课堂环节，而是使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功能定位。导入环节用于激发问题意识，材料研读用于提供证据支撑，小组论证用于促进解释生成，展示评价用于检验理解深度，反馈修正用于推动学习改进。教师在实施中还可根据学生基础调整材料难度和任务开放度，使同一单元既保持学术逻辑，又具有课堂适配性。

评价任务可设计为“改革开放主题证据包解读”。学生需要从教材、统计图表、地方发展图片、口述访谈材料中选择若干证据，完成一份短报告，说明改革开放前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或思想观念的变化，并对变化原因作出解释。教师可依据“史实准确、材料关联、因果解释、表达规范、现实联系”五个维度进行评价。学习活动则按照“问题导入—材料研读—小组论证—成果展示—反馈修正”的流程推进。这样的设计能够使学生在真实证据和具体问题中理解历史，而不是停留在对教材结论的重复。

以统编版初中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关内容为例，教师可将单元理解目标确定为：学生能够认识改革开放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回应现实问题和顺应时代发展的基础上作出的关键抉择，并能说明这一抉择如何推动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围绕这一目标，可设置核心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被称为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我们如何从不同类型材料中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影响？”这些问题既能统摄会议决策、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社会生活变化等内容，又能

引导学生把国家发展与个人经验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2] WIGGINS G, MCTIGHE J. Understanding by Design[M].Alexandri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2005.

[3] 格兰特·威金斯,杰伊·麦克泰格.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4] 崔允漷.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设计[J].全球教育展望,2019(6):3-13.

[5] 朱汉国.历史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6] 陈志刚.教学设计的变革与大概念、大单元教学的实施[J].历史教学,2021(9):4-10.

[7] 黄卫平.“大概念”视域下初中历史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与实施 [J].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22(7):12-16.

[8] 钱霞.基于 UbD 理论的单元教学设计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21(10):58-64.

数字化赋能：应急管理课程思政的融合模式与教学实践

张瑞¹ 程兵芬¹ 高蕾¹

(1.应急管理大学, 河北 三河 065201)

摘要: 在“大思政课”理念引领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双重背景下, 如何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议题。本文聚焦应急管理类专业课程, 提出“数字化+思政”融合教学模式, 以GIS平台、虚拟仿真等技术为载体, 构建知识、能力、价值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体系与沉浸式教学场景。通过课程内容价值解构、数字资源开发、多维度成效评价等路径, 探索思政教育从显性灌输向隐性浸润的转变机制。研究可为新工科背景下理工类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可迁移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 课程思政; 数字化融合; 应急管理; 教学模式; GIS

基金项目: 2025年河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5cxcy248); 应急管理大学2025年度校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编号:JY2025B37);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559

Digital Empowerment: Integration Mode and Teaching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Courses

Zhang Rui¹, Cheng Bingfen¹, Gao Lei¹

¹ Universit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Sanhe 065201, Hebei,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r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cept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how to leverage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university teaching reform. This paper focuses on emergency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proposes a "digital + ideological-political"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Utiliz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GIS platforms and virtual simulation as vehicles, it constructs a tridimensional teaching objective system integrating knowledge, competence, and values, as well as immersive teaching scenarios. Through pathways including value deconstruction of course content,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multi-dimensiona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echanism for transform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explicit indoctrination to implicit infiltration.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a transferable practical paradig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s under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digital integration; emergency management; teaching mode; GIS

作者简介: 张瑞(1989—), 女, 讲师, 研究方向为洪旱灾害与应急管理;
程兵芬(1987—), 女,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洪旱灾害与防灾减灾;
高蕾(1989—), 女, 讲师, 研究方向为应急管理法律法规;

通讯作者: 张瑞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2022年，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强调要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拓展课堂教学内容与形式^[1]。

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地理信息系统(GIS)、虚拟现实(VR)、数据可视化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深刻重塑教育生态^[2-3]。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赋能教育教学，创新教学模式^[4]。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借助数字化手段，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全过程，成为亟待破解的现实课题^[5]。

应急管理类专业具有高度的现实关怀性与跨学科特性，课程内容涉及灾害应对、风险评估、应急救援等与国家治理、人民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这类课程天然蕴含着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生命至上等丰富的思政元素，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独特载体^[6]。然而，当前应急管理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仍面临三重困境：一是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两张皮”，缺乏系统性融合框架；二是教学手段单一，难以激发学生的价值共鸣；三是成效评价机制缺失，思政育人效果难以量化与优化^[7]。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立足“大思政课”理念与数字化转型双重背景，构建“数字化+思政”融合教学模式，以应急管理专业核心课程为实践载体，探索基于数字技术的课程思政实施路径，旨在为理工类课程思政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一) 课程思政的内涵深化

课程思政的本质是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教育理念，强调所有课程均具有育人功能。与传统思政课程不同，课程思政追求盐溶于水的隐性教育效果，使价值引导与知识传授同向同行^[1]。这一理念的落实需要三个关键转变：从加法思维转向融合思维，从教师中心转向学生中心，从单一评价转向多元评价。

(二) 数字化赋能思政教育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是在真实情境中通过主动建构获得的。数字技术为创设高仿真、

强交互的学习情境提供了可能。情境认知理论进一步指出，学习应嵌入真实的实践活动与文化语境中。GIS平台、灾害模拟软件等工具能够还原灾害场景、模拟应急响应过程，使学生在“做中学、学中思”的过程中自然生成价值认同^[2]。

此外，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体验对认知的塑造作用。虚拟仿真技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能够激发学生的共情反应与责任意识，实现从“理性认知”到“情感共鸣”再到“价值内化”的升华。

(三) “数字化+思政”融合教学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构建“数字化+思政”融合教学框架(见图1)。该框架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以数字化工具为技术支撑，围绕价值引导、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条主线，形成从课程学习到教学实施再到评价反馈的闭环系统。

框架的核心要素包括：(1)内容层面：梳理专业知识中的思政节点，形成价值导向型教学内容体系；(2)方法层面：运用GIS、虚拟仿真等技术开发沉浸式教学资源；(3)评价层面：构建“认知—情感—责任”三维评价指标体系，实现教学效果的动态监测与持续优化。



图1 “数字化+思政”融合教学框架

三、应急管理课程思政的数字化融合路径

(一) 课程内容价值解构与思政节点挖掘

应急管理类专业课程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安全性”“责任性”特征。以《灾害学》、《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应用》、《应急管理概论》三门核心课程为例，可从以下维度挖掘思政元素：

国家战略维度：灾害风险管理与国家公共安全体系建设、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应急管理现代化等教学内容，可融入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

社会责任维度：灾害预警、应急响应、灾后

重建等知识节点可承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

科学精神维度：灾害机理分析、风险评估建模等环节可培养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与批判性思维。

人文关怀维度：灾害中弱势群体的保护、心理援助等内容可强化学生的人文素养与同理心。

以“GIS在洪涝灾害风险评估中的应用”教学单元为例，可设计的思政融合点包括：运用GIS分析城市脆弱性区域，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公平问题；通过模拟不同应急预案的效果，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与决策伦理意识等，可挖掘的模块非常充分。

（二）基于数字技术的沉浸式教学场景开发

数字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创设出可进入、可操作、可共情的学习情境，本研究开发了三类数字化思政教学资源：

第一类：GIS任务驱动型教学模块

以ArcGIS Pro等平台为工具，设计“某市洪涝灾害避难所选址优化”任务。学生需综合人口密度、交通可达性、地形高程等要素进行分析。在技术操作之外，教师设置引导性问题：“避难所布局是否兼顾了弱势群体？”“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等，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自然接受社会责任与伦理决策教育。

第二类：灾害模拟与应急推演系统

基于AnyLogic或Unity引擎，开发地震、洪涝、危化品泄漏等灾害场景的虚拟仿真系统。学生以“应急指挥官”身份参与全流程推演，面对信息不完整、资源有限等约束条件做出决策。系统记录决策路径并生成反思报告，教师组织课堂研讨，聚焦“决策中的价值权衡”这一思政议题。

第三类：案例库与数字叙事资源

收集真实灾害事件，已收集的案例包括“7·20”郑州特大暴雨、四川木里森林火灾等，整合新闻报道、遥感影像、现场视频等素材，构建多媒体案例库。采用数字叙事方式，呈现救援人员的英勇事迹、受灾群众的生命故事，激发学生的共情反应与职业认同感。

（三）“认知—情感—责任”三维教学评价体系

科学的评价机制是检验课程思政效果的关键。传统评价多侧重知识层面，难以衡量价值内化程度。本研究构建三维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课程思政三维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评价指标	数据来源	评价方式
----	------	------	------

认知维度	对国家安全观、应急管理政策等的理解程度	课堂提问、作业、形成性评价+测验	终结性评价
	对灾害中弱势群体的共情反应、对应急管理职业的认同感	课堂观察、反思日志、问卷	质性评价+量化评价
情感维度	课堂参与度、团队协作表现、志愿服务意愿	行为轨迹数据、同伴互评、自评	过程性评价
责任维度			

评价数据的采集采用多源融合策略：学习管理平台自动记录学生的登录频次、资源浏览时长、讨论区发言等行为数据。课堂观察表根据课堂表现记录，课后统一填写。学期初与学期末分别施测思政素养问卷，对比分析价值认同的变化。

四、教学实践与效果分析

（一）实践设计与实施

本研究以某高校应急技术与管理学院2023级本科生为对象，选取《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应用》、《灾害学》两门课程开展为期一学期的教学实践。实验组（n=62）采用“数字化+思政”融合教学模式，对照组（n=58）采用传统教学模式（专业知识讲授为主，思政元素简单植入）。

实践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完成课程思政内容体系设计与数字资源开发，中期开展16学时的融合教学，每节课设置10-15分钟的思政研讨或情境体验环节，后期实施多维评价，收集过程数据与期末反馈。

（二）效果分析与讨论

学期结束后，对本学期学习成果进行不同维度的评估，主要包括知识掌握、价值认同以及学习投入，结果如图2所示。从知识掌握层面来分析，发现实验组期末平均成绩为85.6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9.3分（ $p<0.05$ ）。尤其在案例分析题和方案设计题上，实验组表现更为突出，表明沉浸式任务有助于知识的深度理解与迁移应用。而价值认同方面，思政素养问卷前后测对比显示，实验组在应急管理职业认同感、公共安全意识、社会责任感三个维度上均有显著提升，分别提升了23.6%、18.9%、15.4%，对照组提升幅度均低于5%。而根据学习管理平台数据显示，对于学习的投入，实验组平均每周登录平台4.7次，讨论区发帖量是对照组的3.2倍，资源浏览完成率达92%。质性反馈中，86%的学生认为GIS任务很有意义，79%的学生表示对灾害中弱势群体的关

注增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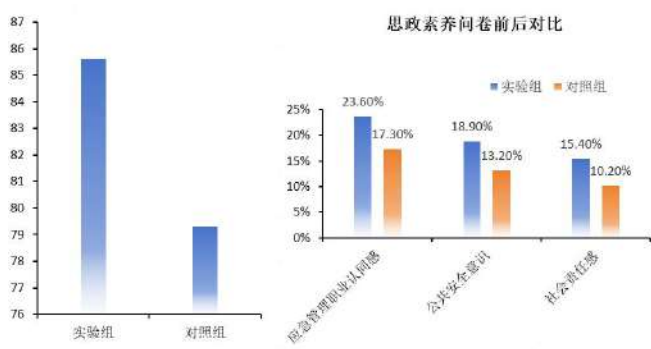


图2 教育教学改革实验成果分析

除了三个维度的评估外，在教学中选取典型案例让学生进行分析，以“洪涝灾害避难所选址”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其中一组学生在分析中发现某老旧小区周边无障碍设施匮乏，主动提出增设临时接驳点的方案。学生在反思日志中写道：“技术不是冷冰冰的工具，它关乎人的生命安全。这次作业让我真正理解了‘人民至上’不是一句口号。”这一案例生动诠释了“数字化+思政”融合的育人实效。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面向应急管理类专业课程，提出了“数字化+思政”融合教学模式的理论框架与实施路径。研究表明：数字化手段能够有效破解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两张皮”的难题，GIS、虚拟仿真等技术为价值引导提供了情境化载体。而知识—能力—价值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体系，实现了从隐性浸润到价值内化的育人逻辑，三维评价机制为课程思政效果的量化评估与持续改进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但本研究教学实践周期较短，价值内化的长期效应有待追踪验证，不同技术工具的教学适配性差异尚未深入探讨，评价指标体系中部分质性指标的标准化仍有提升空间，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三个维度深入开展：

第一，开展跨校、跨课程的对比研究，验证模式的可迁移性。单一院校或课程的成功往往受限于特定学情与资源禀赋。未来需选取不同类型（如综合性大学与行业特色院校）、不同层次（本科与高职）的应急管理相关课程，通过准实验设计，检验该模式在不同教学环境下的适配条件与边界阈值，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核心要素与可调整的弹性参数。

第二，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在课程思政中的深度嵌入。一方面，利用大语言模型构建应急管理思政案例的自动生成机制，通过提示

工程与专家审核相结合的方式，解决“案例陈旧、更新滞后”的痛点，形成覆盖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场景的活态案例库；另一方面，开发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个性化反馈工具，针对学生在案例分析、模拟演练中展现的价值倾向，提供差异化、引导式的反思建议，实现从“千人一面”的说教到“千人千面”的浸润。

第三，建立课程思政效果的长周期追踪机制。突破传统研究以学期为周期的横断面测量局限，构建覆盖学生入学至毕业后3-5年的追踪数据库。通过纵向比较学生在职业伦理认同、灾害风险认知、公共服务动机等维度上的变化轨迹，考察育人效果的持续性与转化力——即能否真正转化为应急管理岗位上的科学决策与担当精神。

在“大思政课”建设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双重浪潮下，应急管理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正迎来历史性机遇。数字技术为价值引领提供了精准化、场景化的新载体，而专业教学则为立德树人锚定了知行合一的实践场域。二者的深度融合，有望突破传统思政教育“两张皮”的困境，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理工类课程育人新范式，为培养“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新时代应急人才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 [1] 高德毅，宗爱东. 课程思政：有效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的必然选择[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7(1): 31-34.
- [2] 范功利. 虚拟仿真技术与思政课实践教学融合路径探索——以建设高校虚拟仿真思政课体验教学中心为例[J]. 辽宁高职学报, 2022, 24(6): 67-69.
- [3] 杜冬阳，李晓燕，黄正. 高校国防教育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构建与应用：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例[J]. 现代职业教育, 2022(6): 19-21.
- [4] 刘富胜，王仕勇.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6(4): 100-106.
- [5] 吴满意，高盛楠.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逻辑、图景与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8): 38-44.
- [6] 冯刚，张欣. 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 中国高等教育, 2021(5): 15-18.
- [7] 李蕉. 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高校思政课数字化教学的双重逻辑[J]. 中国高等教育, 2021(10): 28-31.

广东省民办高校英语教师数字素养调查报告

——基于扎根理论与 NVivo12 的质性研究

丛蕊

(东莞城市学院, 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 本报告聚焦广东省民办高校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现状, 采用扎根理论为核心范式, 通过对 24 所民办高校 30 名英语教师开展半结构化深度访谈, 并运用 NVivo 12 软件进行质性数据编码与分析, 系统考察教师在数字意识、数字知识与技能、数字应用、数字创新和数字伦理五个维度的发展特征。研究发现: 教师整体数字意识较强, 但呈现意识先行、技能滞后的结构性特征; 基础工具应用能力较为扎实, 但内容创作与数据分析等高阶技能明显不足; 数字应用多停留于辅助传统教学层面, 真正的深度融合与教学创新尚不成熟; 数字伦理认知普遍偏低, 尤其在数字公平与数字公民责任方面亟需强化。本报告在分析区域差异、教龄差异与能力结构失衡的基础上, 提出构建系统化培训体系、优化数字教学环境、完善激励机制与加强数字伦理教育等多维提升策略, 以期为民办高校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实证参考。

关键词: 民办高校; 英语教师; 数字素养; NVivo; 扎根理论; 质性研究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GD23WZXC01-01); 东莞城市学院校级科研项目 (JY2025008901)。

A Survey Report on Digital Literacy of English Teacher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A Qual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and NVivo12

Cong Rui

Dongguan City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report focuses on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English teacher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dopting grounded theory, it conducts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0 English teachers from 24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uses NVivo 12 for qualitative coding and analysis to examine teachers' performance in five dimensions: digital awareness, digital knowledge and skills, digital application, digit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eth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achers generally have strong digital awareness but lag in practical skills. While proficient in basic digital tools,

作者简介: 丛蕊, 出生日期 1981 年 5 月,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 英语教师发展。

通讯作者: 丛蕊

they lack high-level competencies such as content creation and data analysis. Their digital applications mostly assist traditional teaching rather than achieving deep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Moreover, digital ethics awareness is inadequate, especially regarding digital equity and civic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regional, seniority-related and structural disparities, this paper proposes strategies including systematic training, improved digital teaching environments, incentive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ed ethical education,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olicy-making on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development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Keywords: Private Universities; English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NVivo; Grounded Theory; Qualitative Research

一、引言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的深刻推动下,教育领域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革。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了教学内容与方式,更对教师专业素养提出了全新要求。教师数字素养已成为衡量教师专业发展水平、适应未来教育趋势的关键指标[1]。在高等教育阶段,建设高水平数字素养师资队伍,对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

2022年,教育部正式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标准,明确了教师在数字时代应具备的知识、技能与态度,构建了涵盖数字意识、数字知识与技能、数字应用、数字创新和数字伦理五个一级维度的系统框架[2]。这标志着我国教师数字素养建设进入规范化、体系化的新阶段。

民办高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满足社会多样化教育需求、促进高等教育普及的重要职能。然而,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资源配置方面普遍面临更多挑战[3]。英语教师作为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核心力量,其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影响教学效果与学生学习体验。随着在线教育、混合式教学及人工智能辅助教学模式的兴起,对民办高校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开展系统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4]。

本研究以广东省民办高校为研究场域,以扎根理论为核心研究范式,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与 NVivo 12 软件质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以期政策制定与实践改进提供实证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 教师数字素养的概念与框架

教师数字素养 (Digital Literacy for Teachers) 是指教师在数字化环境中有效教学所需知识、技能、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体现,其内涵经历了从“

计算机素养”到“信息素养”再到“数字素养”的演进历程[5]。国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在《教师 ICT 能力框架》中将教师数字素养定义为教师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改进教学、支持学生学习和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能力,该框架强调技术与教学法的深度融合[6]。

目前,国际主流理论框架主要包括: Mishra 和 Koehler 提出的 TPACK 框架 (技术—教学法—内容知识框架), 强调三类知识的交叉融合[7]; 欧盟委员会的 DigCompEdu 框架,从六个维度构建了教育者数字能力体系[8]; UNESCO 的 ICT-CFT 框架,将教师数字素养分为技术素养、知识深化和知识创造三个发展阶段[6]。在国内,教育部 2022 年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标准构建了最具权威性的五维框架,是本研究的核心参照体系。

(二) 民办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研究现状

已有研究表明,影响教师数字素养的因素涵盖个人因素 (年龄、教龄、学科背景)、学校因素 (技术支持、培训体系、激励机制) 和外部因素 (政策环境、社会发展) 等多个层面[9]。徐珍珍 (2025) 对民办高校商科人才培养的数字化调研发现,教师数字融入教学能力越强,越能促进学生运用数字工具分析实际问题,强调师资队伍数字化建设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助推力[3]。《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查报告 (2024)》显示,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数字素养的关键因素,大学本科及以上人群高级数字素养占比高达 53.49%,凸显了高等教育群体数字素养发展的迫切需求[10]。

然而,现有研究多采用量化问卷方法,对特定学科群体数字素养深层内涵的质性探索相对不足;针对民办高校英语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专项研究更为稀少[11]。这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空间。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以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为核心研究范式。扎根理论强调从经验资料中归纳概念与理论,而非验证既有假设,适用于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深度探索性研究[12]。选择该方法的原因在于:其一,民办高校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相关研究尚属新兴领域,需要通过质性研究揭示其内在规律;其二,本研究旨在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模型,扎根理论的归纳性特点与此目标高度契合;其三,数字素养是多维复杂现象,需要通过深度访谈理解其丰富内涵。

(二)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与理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在广东省民办高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教龄在1年以上、愿意参与深度访谈并分享教学经验。最终确定30名民办高校英语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涵盖24所不同民办高校。受访者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受访教师基本信息

类别	分组	人数	占比	说明
性别	女性	22	73.3%	年轻教师 中期教师 资深教师
	男性	8	26.7%	
教龄	1~5年	10	33.3%	
	6~10年	10	33.3%	
	11年以上	10	33.3%	
学历	硕士及以上	26	86.7%	
	本科	4	13.3%	
地域	东部地区	15	50.0%	广州/深圳/东莞等
	中西部地区	15	50.0%	韶关/清远/云浮等
合计	—	30	100%	覆盖24所民办高校

(三)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作为主要手段。访谈提纲围绕《教师数字素养》标准的五个一级维度设计,每次访谈时长约60~90分钟,全程录音并征得受访者同意。访谈结束后进行逐字转录,形成约50万字的访谈文本。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同步记录受访者的非语言信息,以丰富数据的深度与广度。

(四) 数据分析

运用NVivo 12软件对转录文本进行系统性编码分析。按照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程序,依次开展开放式编码(逐行标记重要概念,共产生286

个初始编码)、主轴编码(归类形成5个主范畴和23个子范畴)和选择性编码(识别核心范畴,构建理论模型)。同时通过词频分析、文本查询和交叉分析深入挖掘核心主题与群体差异。

四、研究发现

(一) 数字意识: 认知积极, 行动分化

30名受访教师均表达了对数字技术教育价值的高度认同。92%的教师明确表示,数字技术在当前教学中不可或缺。疫情期间大规模在线教学的实践经历,进一步加深了教师们对数字技术潜力的切身感受。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教龄段教师在数字意识向实际行动转化方面存在显著分化:年轻教师(教龄5年以下)呈现出更高的积极性与行动力,资深教师(教龄15年以上)虽认识到学习的必要性,但受惰性惯性影响,实际行动相对滞后。

在数字伦理与安全意识方面,教师认知普遍停留于较浅层次,多数能意识到版权保护的基本要求,但对数字公平、算法偏见、数据隐私等深层次伦理议题的关注严重不足。

(二) 数字知识与技能: 基础扎实, 高阶薄弱

大多数教师能够熟练使用Word、PowerPoint、Excel等基础办公软件,以及学习通、雨课堂、腾讯会议等主流在线教学平台,可满足常规教学的数字化需求。然而,在数字内容创作(视频编辑、动画制作、交互式内容开发)和学习数据分析等高阶技能方面,教师能力普遍薄弱。调查显示,超过80%的教师表示不具备有效分析在线平台学习数据的能力,难以利用数据驱动精准教学改进。

在数字资源管理方面,教师面对海量网络资源,普遍缺乏有效筛选、评估与系统管理的能力,这制约了教学资源建设的质量与效率。

(三) 数字应用: 辅助为主, 融合不足

教师的数字应用主要体现在辅助传统教学层面:几乎所有教师使用多媒体课件、音视频资源和在线词典等工具,通过在线平台进行作业布置与批改。部分教师开始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但多数仍处于初级阶段,以“翻转课堂”尝试为代表,常因学生自学能力差异和技术平台支持不足而效果不稳定。

在个性化学习支持与跨学科数字化协作方面,教师普遍表现出能力不足:受制于班级规模较大与个性化技术工具缺乏,实现差异化指导存在较大困难;跨学科融合意识虽有萌芽,但缺乏具体技术路径与支持。

（四）数字创新：意识萌芽，实践匮乏

多数教师表达了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教学创新的意愿，部分教师尝试翻转课堂、游戏化学习等新型教学模式，但整体而言，数字创新仍停留于对现有资源的整合与改编，原创性数字教学资源开发极为稀少。真正从数字技术特点出发、进行系统性教学模式重构的案例凤毛麟角。

数据驱动教学创新的能力缺失尤为突出：教师普遍依赖经验和直觉进行教学调整，难以基于客观数据开展科学决策，这与高阶数据分析能力薄弱直接相关。

（五）数字伦理：初步认知，深度不足

教师对版权保护有初步意识，在使用网络资源时基本能够注明出处或选择免费可用资源；随着在线教学普及，教师开始关注学生隐私保护问题。然而，对于数字公平（不同经济背景学生在设备和网络条件上的差异）及数字公民责任等议题，认知程度普遍偏低，缺乏系统化的数字伦理教育框架与应对策略。

（六）NVivo 编码与分析结果

对 50 万字访谈文本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去除停用词后，高频词汇直观反映了受访教师关注的核心议题。出现频率最高的前 20 个词汇如表 2 所示，教学、数字、学生、技术、学习等词的高频出现印证了本研究的核心主题；培训、平台、学校等词表明外部支持是影响教师数字素养的重要外部因素；创新、问题、提升等词则揭示了教师在数字素养实践中的内在需求与现实挑战。

表 2 访谈文本高频词汇统计（前 20 位）

序号	词汇	出现次数	占比 (%)	主题归属
1	教学	1250	3.5%	核心维度
2	数字	1120	3.1%	核心维度
3	学生	1080	3.0%	核心维度
4	技术	980	2.7%	核心维度
5	学习	950	2.6%	核心维度
6	学校	870	2.4%	外部支持
7	教师	780	2.2%	核心角色
8	平台	650	1.8%	技术支持
9	使用	620	1.7%	技术应用
10	培训	580	1.6%	能力提升
11	课堂	550	1.5%	教学场景
12	资源	520	1.4%	资源管理
13	英语	480	1.3%	学科特征
14	提升	450	1.2%	发展需求
15	方面	420	1.1%	多维分析

序号	词汇	出现次数	占比 (%)	主题归属
16	经验	380	1.0%	实践经验
17	创新	350	0.9%	创新需求
18	问题	320	0.8%	实践问题
19	发展	300	0.8%	专业发展
20	教学效果	280	0.7%	评估维度

通过三级编码共构建了 5 个主范畴、17 个子范畴，形成较为系统的民办高校英语教师数字素养范畴体系（见表 3）。各维度的总体评估与优劣势分析如表 3 所示。

表 3 民办高校英语教师数字素养五维度综合评估

维度	总体水平	优势表现	主要不足
数字意识	较强	普遍认可数字技术重要性，学习意愿积极	意识与行动脱节，主动性存在个体差异
数字知识与技能	中等	基础办公软件及在线平台操作熟练	内容创作、数据分析等高级能力薄弱
数字应用	中等偏下	教学辅助工具常规使用，混合式教学初步探索	深度融合与个性化支持明显不足
数字创新	较弱	部分教师有创新意识 and 初步尝试	系统性创新方法缺乏，数据驱动能力不足
数字伦理	弱	版权意识与隐私保护有初步认知	数字公平、公民责任认知严重不足

进一步的编码体系详见表 4，呈现了各子范畴的主要内容、编码频次与发展水平。

表 4 民办高校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编码体系与分析结果

一级范畴	二级范畴	主要内容	编码频次	发展水平
数字意识 (A)	A1 数字化认知	对数字技术重要性的认识及学习意愿	56	积极
	A2 数字化行动	主动学习与尝试新工具的行为表现	38	中等
	A3 伦理初识	对数字版权、安全等基本伦理的认知	22	薄弱
数字知识与技能 (B)	B1 基础技能	办公软件、邮件等常规数字工具应用	68	扎实
	B2 平台操作	在线教学平台（学习通等）的使用熟练度	55	较强
	B3 资源管理	数字资源获取、筛选与整理能力	33	待提升
	B4 内容	视频、交互式内容等	18	薄弱

一级范畴	二级范畴	主要内容	编码频次	发展水平
数字应用 (C)	创作	数字教学资源开发	12	严重不足
	B5 数据分析	学习数据分析与精准教学评估能力		
	C1 辅助教学	多媒体课件、在线资源的常规课堂应用	72	成熟
	C2 混合教学	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	41	初级阶段
	C3 个性化支持	基于数字技术的学	15	明显不足
数字创新 (D)	D1 创新意识	生差异化学习支持利用数字技术改进教学的想法与愿望	44	萌芽状态
	D2 模式创新	翻转课堂、项目式学习等新模式尝试	23	有限尝试
	D3 资源开发	原创数字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开发	9	极为稀少
	D3 资源开发	原创数字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开发	9	极为稀少
数字伦理 (E)	E1 版权意识	教学资源引用规范与版权保护行为	31	表层
	E2 隐私保护	学生信息安全与平台数据保护意识	25	初步
	E3 数字公平	关注不同学生数字设备与网络差异	14	认知不足

五、讨论

(一) 意识先行、技能滞后的结构性失衡

研究发现，民办高校英语教师普遍具有较强的数字意识与学习意愿，但这种积极认知并未完全转化为相应的数字技能与深度应用能力，呈现出意识先行、技能滞后的结构性失衡特征。这一现象与全国数字素养调查中教师群体普遍存在的认知—行动落差相呼应[10]。其深层原因在于：系统性培训资源匮乏、教学任务繁重导致自主学习时间受限，以及缺乏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与持续实践机会[13]。

(二) 区域差异与群体间的发展不平衡

交叉分析揭示，东部地区（广州、深圳、东莞等）民办高校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韶关、清远、云浮等），主要体现在技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培训资源可及性和外部数字化发展环境等方面。这与中央网信办发布的调查结论高度一致：东部地区成年人具备初级及以上数字素养的比例（63.23%）显著高于西部地区（56.90%）[10]。此外，年轻教师（教龄5年以下）与资深教师（教龄15年以上）在技术接受度与学习积极性方面存在明显代际差异，提示需要采取差异化的培养策略。

(三) 与《教师数字素养》标准的差距分析

对照教育部2022年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

标准，受访教师在数字意识维度表现相对较好，但在数字化教学设计、数字化评价、数字创新与数字伦理等高阶维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与徐珍珍（2025）对商科院校的调研发现相似——学生和教师均呈现出感知能力与融通能力较强、实践能力与数据应用能力相对薄弱的“五力失衡”特征[3]。

六、结论与建议

(一) 主要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30名民办高校英语教师的深度访谈和NVivo 12质性分析，形成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民办高校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总体呈现数字意识较强、基础应用尚可、高阶能力薄弱、创新伦理不足的层级递减特征；第二，教师数字素养发展存在维度间、群体间和技能层次上的多重不平衡；第三，学校层面支持是影响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个人学习意愿是重要内在动力，外部政策环境提供发展方向与制度保障；第四，所有受访教师均对高质量、有针对性的培训表达了强烈需求，当前培训供给与教师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

(二) 提升路径与策略建议

基于研究发现，本报告提出以下多维提升策略（见表5），供民办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参考。

表5 民办高校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路径与策略

策略	主要内容	责任主体	实施周期
系统化培训	构建初/中/高级分层培训课程，设计英语学科专项模块	教师、学校	短期
实践导向培训	项目式学习，建立“学—练—思—改”改进循环模式	教师、学校	短期
优化技术环境	完善网络与设备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数字资源库	学校、政府	中期
技术支持体系	配置专业技术支持团队，建立问题响应机制	学校	中期
激励机制建设	将数字素养纳入职称评定与绩效考核，设立创新奖励	学校、政府	中期
数字伦理教育	将版权、隐私、数字公平纳入必修内容	教师、学校	短期
协作分享平台	建立校内教研团队与校际数字素养联盟	学校	长期

策略	主要内容	责任主体	实施周期
政策保障 支持	出台专项政策文件, 设立民办高校数字 化建设专项资金	政府	长期

在具体实施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培训内容应兼顾通用技能与英语学科专项数字素养,如语言学习软件应用、口语测评数字工具使用等;二是激励机制应将数字化教学创新成效纳入职称评定与绩效考核,激发教师内生动力;三是数字伦理教育应超越版权保护的基础层面,重点加强数字公平意识与数字公民责任教育;四是校际协作网络建设应发挥民办高校联盟的集约化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与经验互通。

(三)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样本主要来自广东省,在全国代表性方面有所局限;定性研究方法深度有余而普遍性不足;横截面设计无法反映数字素养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未来研究可考虑扩大样本范围至全国、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提升研究效度、开展纵向追踪研究以揭示动态发展规律,以及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其他学科教师群体,以构建更具普适性的民办高校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祝智庭,彭红超,雷云鹤.教师数字素养的构成要素与生成路径[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7,(2):62-70.

[2] 教育部.教师数字素养[S].北京:教育部,2022.

[3] 徐珍珍.民办高校商科人才培养现状的调查报告[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22(7):131-134.

[4] 余胜泉,胡翔.人工智能教师的未来角色[J].开放教育研究,2018,24(1):16-28.

[5] 钟绍春,张琢,唐烨伟.教师数字素养内涵、价值及提升路径[J].电化教育研究,2021,42(1):13-19.

[6] UNESCO. ICT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M]. Paris: UNESCO, 2018.

[7] Mishra P, Koehler M J.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Framework for Teacher Knowledge[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2006, 108(6): 1017-1054.

[8] Redecker C. European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Competence of Educators: DigCompEdu[R].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7.

[9] 李芒,乔凤天,赵国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20,30(3):5-11.

[10] 姜春艳.《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查报告(2024)》发布[J].乡村科技,2024,15(22):5.

[11] 吴砥,朱莎,王美倩.学生数字素养培育体系的一体化建构:挑战、原则与路径[J].中国电化教育,2022,(7):43-49.

[12] Strauss A, Corbin J.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M].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0.

[13] 王竹立,林君芬,胡小勇.基于TPACK框架的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发展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9,37(2):58-66.

[14] 蒋敏娟,翟云.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公民数字素养:框架、挑战与应对方略[J].电子政务,2022,(1):54-64.

[15] 肖鹏,赵庆香.通往数字人才强国之路:《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与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战略[J].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1,33(12):6-15.

[16] 丘小玲,颜中庆,李慧.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调查报告——以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生为例[J].秦智,2026,(4):94-96.

[17] Krumsvik R J. Situated Learning and Teachers' Digital Competence[J].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08, 13(3): 221-235.

[18] 潘燕桃,张羽可.应用数字化学习工具提升大学生数字素养[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2(4):28-38.

劳动精神融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索

尹雪雪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潍坊 262100)

摘要: 高职教育作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使命。劳动精神所蕴含的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核心要义,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将劳动精神融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从目标定位重塑、实践教学深化、课程体系重构、校园文化浸润、师资队伍提升及协同机制构建等多个维度提出具有高职特色的劳动精神融入路径,能够增强高职人才培养的适应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培育更多德技并修的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 劳动精神; 高职院校; 人才培养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561

Exploring Pathways to Integrate the Spirit of Labor into Talent Develop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Yin Xuexue

School of Marxism, Weif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ifang, Shandong 262100

Abstrac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s distinctiv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ears th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professional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front lines of production, construction, service, and management. The core tenets of the spirit of labor—valuing labor, loving labor, diligent labor, honest labor, and creative labor—are highly aligned with the objectives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tegrating the spirit of labor into the entire talent cultivation proc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on this basis proposing pathways for integrating the spirit of labor with higher vo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including redefining objectives, deepening practical teaching, restructur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fostering campus culture, enhancing the faculty, and establishing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can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relev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ultivating more master craftsmen and skilled artisans who excel in both moral integrity and technical proficiency.

Keywords: Spirit of Lab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lent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 尹雪雪(1997—),女,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 尹雪雪

一、引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知识，必须依靠劳动，必须依靠广大青年。”^[1]这一深刻论断，明确了知识、劳动与青年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基石作用。劳动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璀璨篇章，是激励全体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劳动与劳动教育，多次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青年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2]

高职院校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其培养的人才直接投身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相较于普通高等教育，高职教育更强调职业性、实践性和应用性。这使得劳动精神的培育在高职院校中不仅具有一般的育人价值，更具备特殊的职业奠基意义。将劳动精神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高职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职业观和成才观，锤炼过硬的劳动技能和职业素养，塑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提升高职教育质量、回应产业升级需求、支撑制造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然而，当前部分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仍不同程度存在“重技能轻素养”、“重实操轻精神”、“重就业轻育人”的倾向，劳动精神的培育尚未完全实现与专业教学、实习实训、校园文化的有机融合与系统设计。因此，系统探析劳动精神融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破解融入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

二、劳动精神融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时代价值与内在契合

从时代价值与内在同构两个维度来看，将劳动精神融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不仅能显著提升培养质量与岗位适应性，更能深度契合“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目标，为培养堪当大任的“大国工匠”奠定坚实基础。

（一）劳动精神培育对提升高职人才培养质量的时代价值

强化立德树人，促进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3]^[276]因此，高职院校将劳动精神融入人才培养，是实现“德技并修”育人目标的有效途径。它能在技能传授的同时，同步完成价值引领、品格塑造

和精神培育，促进高职生在思想道德、专业知识、实践能力、身心健康和审美素养等方面的综合提升，实现真正的全面发展。

深化产教融合，增强岗位适应性。劳动精神源于实践，其培育也离不开真实或仿真的职业环境。将劳动精神融入实习实训、项目教学、现代学徒制等环节，能使学生在更早体验职场文化、理解职业规范、内化职业精神，显著增强其岗位适应能力和职业发展潜力，为从“学校人”向“职业人”的顺利过渡奠定坚实基础。

培育工匠精神，提升核心竞争力。工匠精神是劳动精神在特定职业领域的集中体现和升华，其核心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劳动精神的系统培育，特别是崇尚劳动、辛勤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强调，为工匠精神的生发提供了肥沃土壤，有助于培养更多具有“匠心”的高素质劳动者，提升我国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

服务国家战略，支撑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要“推动建设宏大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4]。高职院校作为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的主阵地，加强劳动精神培育，输出大批具备坚定劳动信念、扎实劳动技能、高尚劳动品格和创新劳动能力的人才，正是直接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呼唤。这既契合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也彰显了高职教育在支撑高质量发展中的独特使命。

（二）劳动精神的核心内涵与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内同构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劳动精神的内涵也与时俱进，具体表现为崇尚劳动的价值认同、热爱劳动的积极态度、辛勤劳动的优良品格、诚实劳动的底线意识和创造性劳动的创新思维。这五个维度与当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高度同构。

崇尚劳动与职业认同：高职生未来大多会投身一线技术技能岗位，因此强化崇尚劳动的价值认同，有助于他们深刻理解“劳动创造价值”的真理，自觉摒弃对体力劳动或基层岗位的偏见，树立“行行出状元”的职业自信。这种认同感为其扎根岗位、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使劳动光荣成为内在信念。

热爱劳动与乐业精神：培养对劳动本身的热爱，能使高职生在未来工作中保持持久的热情与主动性，将职业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事业，而非单纯的谋生手段。乐业精神要求劳动者从“要我”转向“我要”，在平凡岗位上发现意义、创造快乐，这正是高职人才从合格走向卓越的内

在动力。

辛勤劳动与奋斗精神：技术技能的掌握、工艺精度的提升无不依赖反复练习和刻苦钻研。辛勤劳动的品格教育，有助于培养高职生不怕苦、不怕累、持之以恒、勇于攻坚的奋斗精神，应对未来工作岗位上的挑战。

诚实劳动与职业操守：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也是从业人员必备的职业操守。筑牢诚实劳动的底线意识，关乎产品质量、生产安全和企业信誉。对于高职生而言，诚实劳动既是安身立命的“护身符”，更是职业生涯行稳致远的压舱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偏离。

创造性劳动与创新素养：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简单重复性劳动逐渐被自动化替代，岗位对创造性能力的要求日益凸显。培养创造性劳动的创新思维，激励高职生在技术革新、工艺优化、服务升级中主动作为，是其实现更高层次发展、适应未来智能化生产的关键所在，也是从“合格劳动者”迈向“卓越工匠”的必由之路。

二、劳动精神融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现实挑战与困境分析

尽管劳动精神培育与高职人才培养具有高度同构性，但在实际融入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与深层困境。这些障碍既来自观念层面的偏差，也体现在课程、实践、评价与保障机制等多个环节，亟待系统审视与破解。

（一）认识层面：“技能至上”观念挤压劳动精神培育空间

部分高职院校的管理者、教师存在“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技能硬指标，精神软任务”的片面认识，将主要资源和精力投向学生专业资格证书获取率、技能大赛获奖率和一次性就业率等可量化的指标上，对劳动精神培育这类需要长期浸润、成效难以立即显现的工作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导致其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被边缘化。

（二）实践层面：实践载体丰富但精神引领深度不足

高职院校普遍拥有较多的实习实训基地和校企合作项目，实践教学课时占比高。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有时过于关注操作流程的熟练度和任务完成度，对学生在劳动过程中应养成的吃苦耐劳、团结协作、诚实守信、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等精神品质的引导和挖掘不够深入，使得实践环节停留在“授技”层面，未能充分实现“育人”功能。

（三）课程层面：融入渠道单一，与专业教学“两张皮”

当前，许多高职院校的劳动精神培育主要依赖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少量的劳动教育必修课，与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环节结合不够紧密，甚至相互脱节。专业教师往往认为劳动精神培育是思政教师或辅导员的责任，未能将劳动态度、职业规范、创新意识等要素有机融入专业技能知识的传授过程中，导致“两张皮”现象，削弱了育人合力。

（四）文化层面：产业文化、工匠文化融入校园不深

校园文化是隐性育人的重要载体。然而，许多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产业文化对接不够，反映现代工业文明、彰显工匠精神的元素不足。劳模事迹、大师风范、优秀校友成长故事等未能通过常态化、立体化的宣传展示深入人心，导致崇尚劳动、尊重工匠的校园氛围不够浓厚。

（五）协同层面：校企合作“壁炉现象”阻碍精神共育

校企合作是高职教育的典型特征，但在劳动精神共育方面，常出现校热企冷或合作浮于表面的情况。企业方可能更关注学生的即时生产效率，对参与其职业精神塑造的积极性不高；学校与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共同的育人标准，使得劳动精神培育难以在真实工作场景中得到延续和强化。

（六）评价层面：缺乏对劳动素养的有效评估与激励

现有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多侧重于知识掌握和技能水平，对于学生的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创新精神等素养维度，缺乏科学、可操作的评价指标和方法。这导致劳动精神培育的效果无法准确衡量，也难以对师生形成有效的激励和反馈。

三、劳动精神深度融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路径构建

破解劳动精神融入高职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高职院校应以《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纲要》）为指导，进行系统性改革与创新，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劳动精神融入路径。

（一）重塑人才培养目标，明确劳动精神培育定位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指导纲要》指出，普通高等学校要将劳动教育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主要依托的课程^[5]。因此，高职院校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修订中，应明确将劳动精神培育作为重要目标之一，并将其核心要求分解落实到具体的课程目标、毕业要求中，确保劳动精神培育有明确的地位和清晰的要求。

细化素质能力图谱。高职院校应围绕劳动精神核心内涵的五个维度，深入分析不同专业的行业需求、岗位特征及职业发展规律，逐层细化形成各专业学生所应具备的劳动素养能力图谱，并将其转化为课程设计、教学实施与考核评价的基本依据，从而确保劳动教育不流于形式，而是贯穿于各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真正实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的育人目标，并为高职院校分类推进、特色化实施劳动教育提供清晰路径与可操作的着力点。

（二）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在真操实练中淬炼劳动品格

强化实习实训的劳动教育功能。在校内实训和校外实习中，明确要求将劳动态度、规范意识、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创新意识等纳入教学目标和考核内容。推行“双导师制”，校企导师共同负责学生的技能指导和精神引领。

丰富劳动实践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取适应当前环境和条件的有效措施，加强劳动教育，组织好形式多样的劳动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养成劳动习惯，学会劳动、学会勤俭。”^{[3]350}高职院校要广泛开展与专业结合紧密的志愿服务、技术下乡、社区维修、技能竞赛、创新创业项目等。鼓励学生参与实训室管理、设备维护等校内劳动，在真实任务中培养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搭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好用好众创空间、创新工场等平台，支持学生基于专业进行技术革新、工艺改进和创业尝试。将创造性劳动的要求落到实处，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三）重构课程教学体系，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频共振

强化思政课程主渠道作用。在《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思政课程中，深度融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劳动伦理、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内容，讲清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幸福的深刻道理。

推动专业课程全面融入。深入挖掘各专业课程蕴含的劳动精神元素。例如，在工科类专业课程中强调标准规范、精度意识、安全意识和创新思维；在商贸服务类专业中强调诚信经营、客户至上、精益服务。鼓励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技术发展史、行业标杆、典型案例，潜移默化地渗透劳动教育。

开发特色劳动教育课程模块。除劳动教育必修课外，可开设如“工匠精神导论”、“职业伦理与法规”、“技术创新方法”等选修课或专题讲座，构建多元化的劳动教育课程模块，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四）营造特色校园文化，以文化人涵养劳动情怀

融入产业文化与工匠文化。《指导纲要》指出，学校要将劳动习惯、劳动品质的养成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5]。在校园环境布置中，引入企业标识、生产流程、安全规范、质量标语等元素；设立大师工作室、劳模讲堂、技能展示廊，定期邀请行业大师、劳动模范、优秀校友进校园，讲述奋斗故事，传播工匠文化。

打造品牌文化活动。结合职业教育活动周、技能文化节、五一劳动节等节点，组织开展技能比武、创新成果展、职业素养大赛、劳动主题征文摄影等活动，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浓厚氛围。

发挥学生社团作用。支持成立专业技能协会、科技创新社团、志愿服务队等，引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在社团活动中锻炼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

（五）提升教师队伍素养，强化育人主体能力

加强教师培训。定期组织专业教师、实训指导教师、辅导员进行劳动教育专题培训，提升其对劳动精神内涵的理解和在教学中融入劳动教育的能力、意识与方法。

引进企业兼职教师。大量聘请企业技术骨干、技能大师、劳动模范担任兼职教师，他们将鲜活的职业体验、严谨的职业作风和崇高的职业精神直接带入课堂，言传身教，增强教育的感染力。

建立考核激励机制。将教师在劳动精神培育方面的投入和成效纳入绩效考核、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的考量范围，激发其参与劳动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六）构建校企社协同机制，汇聚劳动育人合力

深化校企协同。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建实习基地、共组教学团队、共评学生素

养。推动企业文化进校园、校园文化进企业,实现劳动精神培育在校企间的无缝衔接。

激活家庭作用。《意见》指出:“家庭要树立崇尚劳动的良好家风,家长要通过日常生活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让孩子养成从小爱劳动的好习惯。”^[6]因此,高职院校要重视家庭教育的基础性作用,积极通过家长信、家校联系平台等方式,引导家长认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鼓励孩子参与家务劳动、社会实践,形成勤俭节约、自立自强的家风。

争取社会支持。积极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社区合作,争取政策与资源支持,拓展学生参与社会调查、公益服务、技术应用的渠道,在更广阔的社会课堂中锤炼劳动精神。

(七) 完善综合评价体系,发挥评价导向激励作用

建立劳动素养档案。为每位学生建立劳动素养成长档案,全过程记录其参与课程学习、实践活动、创新项目、志愿服务等方面的表现、成果和反思。

实施多元综合评价。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教师评价、企业导师评价、同学互评、自我评价等多种手段,全面评估学生的劳动观念、能力、习惯和品质。

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将劳动素养评价结果与奖学金评定、优秀评选、推荐就业等挂钩,树立鲜明导向,激励学生重视劳动精神的自我养成。

四、结语

劳动精神是驱动个人成长、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的宝贵精神财富。劳动精神有效地融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全过程,是新时代赋予高职教育的重大命题,关乎人才培养的质量,关乎职业教育的声誉,更关乎国家发展的未来。高职院校必须立足类型教育定位,凸显职业教育特色,以系统思维进行顶层设计,以改革勇气破解现实难题,将劳动精神培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管理服务、文化营造的全方位、各环节。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30(002).
- [2] 张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报,2018-09-11(001).
- [3]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4]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4-29(002).
- [5] 教育部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20,(Z2):2-11.
-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0-03-27(001).

艺术类大学生消极完美主义与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

王莹莹¹ 杨绿¹

(1.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 为了探究艺术类大学生消极完美主义与负面评价恐惧之间的关系, 并分析反刍思维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选取某高校艺术类专业 745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运用消极完美主义量表、中文版反刍思维量表以及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进行测查。结果显示: (1) 消极完美主义、反刍思维与负面评价恐惧三者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 消极完美主义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水平^[1]; (3) 消极完美主义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反刍思维水平; (4) 反刍思维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水平; (5) 反刍思维在消极完美主义与负面评价恐惧之间起中介作用^{[1][2]}。结论: 消极完美主义不仅会直接加重艺术类大学生对负面评价的担忧, 还会通过增强其反刍思维水平进一步提升其评价焦虑。研究结果对艺术类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实践具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 艺术类大学生; 消极完美主义; 负面评价恐惧; 反刍思维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Perfectionism and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Art: The Mediating Role of Rumination

Wang Yingying¹, Yang Lv¹

¹ Jilin Sport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perfectionism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among art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role of rumination thinking in this relationship. Method: A total of 745 art college students from a sports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negative perfectionism scal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rumination thinking scale, and the brief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scale were used for measurement. The results showed: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negative perfectionism, rumination thinking,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2) Negative perfectionism could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the level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3) Negative perfectionism could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the level of rumination thinking; (4) Rumination thinking could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the level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5) Rumination thinking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negative perfectionism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作者简介: 王莹莹(1999—),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杨绿(1977—),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理论与实操

通讯作者: 杨绿

m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Conclusion: Negative perfectionism not only directly increases the anxiety of art college students regarding negative evaluations, but also enhances their rumination thinking level, thereby further increasing their evaluation anxiety.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certain implications for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intervention practices of art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Art college students; Negative Perfectionism;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s; Recurrent Thought

由于艺术类大学生是高等教育中的特殊群体,在他们学习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表现性、开放性和评价性的特点。无论是专业训练、作品创作、舞台表演,还是汇报展演、考试考核以及外出比赛等环节,都需要接受教师、同学乃至外校评委等人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求有较高的工作绩效;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自我调适对外部信息的关注度及容忍度。所以艺术类大学生更易在高要求、高比较和高暴露的条件下产生压力体验并出现害怕失败、担心被批评以及恐惧受到否定性评价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作为不适应性人格特征之一的消极完美主义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消极完美主义者倾向于担心犯错、对自己过于严格及将失败归因于不可挽回的结果^[3]。有研究指出,消极完美主义会导致焦虑、抑郁、社交回避、自我否定及学业倦怠等一系列消极结果。对艺术生来说,高标准严要求及对自己过分苛求的心理容易导致其在被他人评价自己的作品或在台上表演时产生紧张逃避的现象。

与此同时,负面评价恐惧是个体在社交互动或表现情境中担心自己受到他人消极看法、批评或否定的一种稳定倾向^[4]。高负面评价恐惧者往往更关注他人是否在意自己的失误,更容易预期外界批评,并在实际情境中表现出回避、退缩或高度警觉。

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来说,由于其专业活动天然伴随展示与评价,负面评价恐惧可能直接影响其学习投入、舞台表现与心理适应。另外,反刍思维是消极的认知加工过程,在受到负性生活事件或者负性情绪的影响后,反复、被动地思考该事件的原因、后果以及其对于自己的意义^[5]。反刍会影响负性情绪的时间长度,同时也会降低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及灵活性,使人陷入“想的越多,越走不出来”的境地。有研究表明,反刍思维与焦虑、抑郁、社会适应不良及评价敏感性有关。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取艺术类大学生作为调查群体,拟检验如下假设:H1:消极完美主义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H2:消极完美主义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反刍思维;H3:反刍思维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1][2][6]};H4:反刍思维在两者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在2026年3月针对吉林省长春市某体育高校的艺术类专业75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745份,有效率100%;详见表1。

表1 参与者的统计特征描述 (N=745)

		计数	占比
性别	男	224	30.1
	女	521	69.9
专业	瑜伽	141	18.9
	技巧啦啦操	150	20.1
	流行舞	153	20.5
	舞蹈表演	161	21.6
	冰雪舞蹈	140	18.8
		140	18.8
年级	大一	183	24.6
	大二	195	26.2
	大三	191	25.6
	大四	176	23.6

1.2 研究工具

1.2.1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

本研究采用訾非等修订的Frost多维完美主义问卷中文版,共有27个项目,包括积极完美主义和消极完美主义两个分量表^[7]。本研究选用消极完美主义分量表中的21个项目进行测量。该量表采取5点计分法,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消极完美倾向越严重^{[3][8]}。本研究所用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64。

1.2.2 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是陈祉妍于2002年在中国文化与社会背景下修订、并被认为契合中国人特点的《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BFNES)(Leary,198

3)^{[9][10]}。该量表为单维度结构, 共含 12 个题目, 其中包括 4 个反向计分条目和 8 个正向计分条目, 采用 5 点 Likert 评分方式, 1 表示“完全不符合”, 5 表示“完全符合”。量表得分总分越高, 说明被试对负面评价的恐惧程度越强, 得分越低则表明其负面评价恐惧水平越弱^[11]。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36。

1.2.3 中文版反刍思维量表

采用 Nolen-Hoeksema 在其编制的反刍思维问卷的基础上, 经韩秀、杨宏飞修订的中文版反刍思维问卷^[12]。该量表包含症状反刍、反省深思以及强迫性思考 3 个因子, 共有 22 个项目组成。该量表使用四级评分法, “从未”为 1 分、“很少”为 2 分、“有时”为 3 分、“经常”为 4 分。全部项目均是正向计分, 分数越高表示被试者的反刍思维程度越高^{[3][13][14][15][16]}。本研究中此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是 0.978。

1.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23.0 软件和 PROCESS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及中介效应等分析^[3]。探究艺术类大学生消极完美主义与负面评价恐惧之间的关系, 并分析反刍思维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自我报告式量表获取数据, 因此运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评估。分析结果显示共有 7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 其中第一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 39.802%, 未达到 40% 的阈值, 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3][13][16][17][18][19][20][21]}。

2.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艺术专业大学生的消极完美主义、反刍思维以及负面评价恐惧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 其结果见表 2。

表 2 艺术类大学生消极完美主义、反刍思维与负面评价恐惧之间的相关 (r)

变量	$\bar{x} \pm s$	1 消极完美主义	2 反刍思维	3 负面评价恐惧
1 消极完美主义	56.41±20.029	1	0.918**	0.773**
2 反刍思维	53.91±23.413	-	1	0.798**
3 负面评价恐惧	32.83±8.816	-	-	1

** . 在 0.01 级别 (双尾), 相关性显著。

消极完美主义的总分均值为 56.41 (SD=20.029), 反刍思维总分均值为 53.91 (SD=23.413), 负面评价恐惧总分均值为 32.83 (SD=8.816)。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消极完美主义与反刍思维呈显著正相关 ($r=0.918, p<0.01$), 消极完美主义与负面评价恐惧呈显著正相关 ($r=0.773, p<0.01$), 反刍思维与负面评价恐惧呈显著正相关 ($r=0.798, p<0.01$)^{[3][14]}。上述结果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

2.3 中介效应检验

在控制性别、专业和年级的前提下, 使用 Hayes(2022)编制的 PROCESS 宏程序中的 Model4 模型并采用 Bootstrap 方法(重复抽样 5000 次), 检验反刍思维在消极完美主义对负面评价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8]。结果见表 2。

表 2 消极完美主义与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 (反刍思维为中介)

效应	路径	效应值	95%CI
直接效应	消极完美主义→负面评价恐惧	0.1107	[0.0626, 0.1589]
间接效应	消极完美主义→反刍思维→负面评价恐惧	0.227	[0.1827, 0.2726]

注: CI 表示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法得到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 纳入的控制变量为性别、专业和年级。

首先, 消极完美主义对反刍思维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a=1.0587, SE=0.0167, p<0.001, 95\% CI[1.0258, 1.0916]$)。其次, 在控制消极完美主义后, 反刍思维对负面评价恐惧的预测作用也显著 ($b=0.2144, SE=0.0213, p<0.001, 95\% CI[0.1726, 0.2562]$)。最后, Bootstrap 检验表明, 间接效应 (消极完美主义→反刍思维→负面评价恐惧) 的 95% 置信区间为 [0.1827, 0.2726], 不包含 0, 效应值为 0.2270。同时, 直接效应 ($c'=0.1107$) 的 95% 置信区间为 [0.0626, 0.1589], 也不包含 0, 说明反刍思维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67.2%。假设 4 得到支持。

3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艺术类大学生的消极完美主义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及反刍思维在其中的中介作用^{[8][22]}。首先, 本研究表明消极完美主义与负面评价恐惧存在显著正向预测关系 (由上表 2 所示), 说明对于艺术类高暴露、高评价环境下的大学生来说, 如果对自己的要求较高并伴有灾难

性解释的话, 对他人负面评价更为焦虑。这种焦虑感会影响学习专注度以及表演状态, 并进一步诱发逃避、回避行为以及心理障碍。

其次, 消极完美主义也被证实可显著正向预测反刍, 表明高消极完美主义者遭遇负性事情或出现失败后容易反复思考犯错的原因及结果, 无法从负面情绪中抽离出来。反刍作为消极的认知加工方式也会延长不良情绪的时间, 影响其学习生活。

深入探讨发现, 反刍思维能够预测负性评价恐惧, 在消极完美主义和负性评价恐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1][14][22]}; 也就是说, 消极完美主义不但可以直接增加大学生的负性评价恐惧, 而且还可以通过提高反刍思维水平来增加负性评价恐惧, 即消极完美主义对负性评价恐惧的作用是多途径、多层次的。中介作用占比大表明, 在进行心理干预及教育中除对消极完美主义本身的重视外, 还应注重减少并控制反刍水平, 让学生提升其认知弹性以及自我调适的能力。

综上所述,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艺术类大学生特殊心理特点的认识, 并可以为艺术类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如加强对于消极完美主义以及反刍的认知干预, 从而降低负性评价恐惧感, 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及学业成绩。

4 小结

本研究采用量表法和相关性分析对某体育院校艺术类大学生进行了研究发现: 体育院校艺术类大学生的消极完美主义会显著正向影响其负性评价恐惧, 并通过反刍自我意识而间接正向预测其负性评价恐惧; 综上所述, 反刍思维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这对认识艺术类大学生心理压力及适应困境具有一定的意义, 同时也为开展针对艺术类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干预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今后的工作中, 高校应该更加重视对艺术类大学生心理的需求, 围绕主题设定合理的目标并开设相对应的课程并给予相应的心理健康教育及认知行为方面的干预, 使其形成积极的自我期望、降低反刍思维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评价焦虑情绪, 以利于学生的学习生活顺利进行。教师也要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更加注重过程而非结果, 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面对学生的诉求要积极帮助解决, 不断鼓励学生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对于家长, 建议要减少对学生过高的期望, 接纳学生的不完美, 减少对学生

的过高期望, 将对学生的指责改为激励表扬式教育, 学会转变思维方式, 更好的促进学生成长。

参考文献:

- [1] 朱婷婷.大学生反刍思维与完美主义、抑郁的关系及干预研究[D].闽南师范大学,2014.
- [2] 韩越.高中生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回避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及干预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25.
- [3] 张月,张野,陈颖.大学生消极完美主义与抑郁的关系: 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11):123-126.
- [4] 刘洋,张大均.评价恐惧理论及相关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01):106-113.
- [5] 邓金艳,姜淑梅.反刍思维述评[J].心理月刊,2022,17(05):235-237.
- [6] 许瑾.高中生完美主义对社交焦虑的影响: 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及干预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22.
- [7] 訾非,周旭.中文 Frost 多维度完美主义问卷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06):560-563.
- [8] 许珊珊.消极完美主义对研究生学业拖延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黑龙江大学,2025.
- [9] 陈祉妍.中学生负面评价恐惧与考试焦虑的相关性[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2, 16 (12) : 855-857.
- [10] 彭淑超.职场欺凌对员工职场孤独感的影响: 社交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的链式中介作用[D].曲阜师范大学,2020.
- [11] 刘洪文.大学生自尊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及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D].贵州师范大学,2025.
- [12] Nolen-Hoeksema S. Sex differences in unipolar depression: evidence and theory[J]. Psychol Bull, 1987, 101(2): 259-282.
- [13] 王凯,张野.校园排斥对初中生内外化问题的影响:同伴关系与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0,36(05):594-604.
- [14] 胡淼.大学生完美主义与社交焦虑的关系: 负面评价恐惧与自我批评反刍的链式中介作用[D].内蒙古师范大学,2024.
- [15] 王婉钰.负性生活事件与初中生学业倦怠的关系: 反刍思维和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D].牡丹江师范学院,2025.

[16] 汤雅婷.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社交焦虑的影响[D].西北师范大学,2025.

[17] 曾玲娟,银露,江丽晶.教师支持与中学生学业拖延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1):86-96.

[18] 陈思梦,张懂蓓.网络营销工具对客户关系管理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南多锐科技有限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导刊,2024,(04):36-39.

[19] 常松,徐帆,王春煦,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父母冲突的中介作用和成

长型思维的调节作用[J].心理技术与应用,2024,12(06):333-342.

[20] 王新宇,孙雷,李亚茹,等.大学生多维度完美主义与社交外表焦虑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J].心理月刊,2025,20(05):81-84+113.

[21] 刘洪文.大学生自尊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及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D].贵州师范大学,2025.

[22] 陈郭伟,缪伟吉.女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在外表完美主义与负面评价恐惧间的中介作用[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02):43-45.

学习场景驱动下大学生 AI 学习工具使用意愿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实证分析

汪琪¹, 章瑶¹, 魏晨¹, 陈宇²

(1.淮北理工学院, 安徽淮北 235000; 2.淮北市营商环境智能监测与优化重点实验室, 安徽淮北 235000)

摘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 大学生已成为其核心用户群体, AI 工具深度融入学习场景。为探究学习场景驱动下大学生 AI 学习工具的使用意愿及影响机制, 本研究整合技术接受模型与自我决定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实证分析法, 以 474 份有效问卷为样本, 运用 SPSS 和 PROCESS 进行信效度检验、回归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 1.智能交互性对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2.趣味性学习体验仅对感知有用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对感知易用性影响不显著; 3.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均显著正向影响使用态度, 且使用态度对使用意愿的解释力最强; 4.使用意愿显著正向影响; 5.感知有用性在智能交互性与使用态度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感知易用性在趣味性学习体验与使用态度之间亦发挥中介效应; 6.不同年级大学生在感知有用性与使用意愿上呈现显著差异, 大二学生得分最高, 呈现"大二峰值"特征。本研究揭示了大学生 AI 学习工具使用意愿的认知与情感路径, 为 AI 工具开发者、高校教育管理者及大学生自身提供了分层优化与针对性引导的实证依据。

关键词: 大学生; 人工智能学习工具; 使用意愿; 技术接受模型; 学习场景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安徽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 (2024jyxm0618); 淮北理工学院校级质量工程项目 (2025xAljy18); 淮北理工学院 2026 年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18

A Study on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Use AI Learning Tools in Learning-Scenario-Driven Contexts——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

Wang Qi¹ Zhang Yao¹ Wei Chen¹ Chen Yu²

1. Huaib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bei 235000

2. Huaibei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Monitoring and Optimization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Huaibei 235000

Abstract::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come its core users, and AI tools ar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learning environments. To investigate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use AI learning

作者简介: 汪琪(2006—),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整合营销传播;

章瑶(2005—),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新媒体营销传播;

魏晨(2006—),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整合营销传播;

通讯作者: 陈宇(1998—), 女, 讲师, 研究方向为消费者行为、市场调查、大数据营销。

tool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driving such willingness,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y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e have analyzed 474 valid questionnaires with SPSS and the PROCESS plugin fo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s, regression, and medi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 are as follows: First, intelligent interactiv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both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ease of use; Second, an engaging learning experie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ly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with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perceived ease of use; Third,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ease of use both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 usage attitude, and usage attitude has the strongest explanatory power for usage intention; Fourth, usage intentio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s ; Fifth, perceived usefulness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t interactivity and usage attitude, while perceived ease of use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aging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usage attitude; Sixth, college students in different academic years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usage intention, with sophomores scoring the highest, demonstrating a “sophomore peak” pattern. This study reveals th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pathways underlying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use AI learning tools,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stratified optimization and targeted guidance for AI tool developers, 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and student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arning tools; usage intenti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 learning scenario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技术迭代，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普及进程显著加快。据《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5）》数据，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 5.15 亿，渗透率 36.5%，较 2024 年 12 月提升 18.8%；2025 年上半年新增用户 2.66 亿，半年增幅达 106.6%。截至同年 7 月，国内大模型应用个人用户累计注册量突破 31 亿，API 调用用户超 1.59 亿，同时模型推理成本大幅降低，技术普及及门槛持续下降。

从用户结构来看，40 岁以下年轻群体占比 74.6%，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用户占比 37.5%，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核心用户群体，其中大学生市场规模持续扩容。当前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大学生学习场景，80.9% 的用户借助人工智能产品解答问题，在提升学习效率的同时，也引发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弱化、传统搜索平台使用频次下降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平衡人工智能工具应用与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已成为教育信息化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明确界定研究背景与核心问题，兼具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理论层面聚焦大学生群体，立足学生视角探究 AI 技术的实际应用现状与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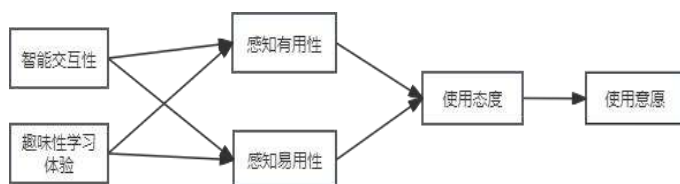
用意向，突破现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探讨 AI 教育影响的局限，以实证资料丰富了 AI 在高校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既为数字土著技术接受模型补充了新的实证依据，也为后续同类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研究思路与范式。实践层面可系统梳理 AI 工具的学习应用路径，助力大学生构建科学高效的学习策略，引导其理性使用 AI、培养独立思考与信息甄别能力；同时研究结论能够帮助学习者明晰各类 AI 工具的优劣特质，便于结合自身需求合理选用，也可为高校优化 AI 辅助教学方案提供真实的学生视角参考，助力降低技术使用门槛，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地赋能高校教育教学实践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基础与研究模型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以用户体验来探索影响使用 AI 学习工具意愿的因素。现有对 AI 学习工具接受行为的研究大多围绕着技术层面的设计或是教育供给端入手，但是缺少从用户感受出发的角度进行系统的阐述。在经过了前期查阅文献、追溯理论的过程中，本文以技术接受模型 (TAM) 为基础框架，结合自我决定理论、社会认知理论以及 UTAUT 模型的中心思想，在充分考虑到现阶段智能学习工具的交互特质及其使用者的应用环境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个 AI 学习工具可持续发展的意愿的影响要素模型。

图 1 假设模型



模型包含六个核心变量：智能交互性、趣味性学习体验、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与使用意愿。其中，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是 TAM 模型中决定用户技术采纳认知的基础维度；智能交互性和趣味性学习体验体现了 AI 平台相较于传统学习材料的独特价值，显著影响用户的产品感受与态度；使用态度在认知判断与行为意图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同时，纳入用户背景信息（学科类别、年级、性别、AI 工具应用程度）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个体差异对模型的影响。

2.2 研究假设

本研究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探讨 AI 学习工具的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用户感知体验和个体认知特征两方面进行探讨。借鉴前文对技术接受模型（TAM）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以及 UTAUT 模型理论的理解，具体的研究假设如下所示。

H1：智能交互性对感知有用性产生正向的影响

H2：智能交互性对感知易用性产生正向的影响

H3：趣味性学习体验对感知有用性产生正向的影响

H4：趣味性学习体验对感知易用性产生正向的影响

H5：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态度产生正向的影响

H6：感知易用性对使用态度产生正向的影响

H7：使用态度对使用意愿产生正向的影响

H8：感知有用性在智能交互性和使用态度中间起中介作用

H9：感知有用性在趣味性学习体验和使用态度中间起中介作用

H10：感知易用性在智能交互性和使用态度中间起中介作用

H11：感知易用性在趣味性学习体验和使用态度中间起中介作用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分层抽样方式选取不同年级、文理科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运用李克特 5 级量表从多维度测量 AI 学习工具使用情况与评价，通过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证研究法开展信效度检验、相关性与回归分析，定量识别影响大学生 AI 工具使用意愿的关键因素，同时辅以大数据分析法抓取网络文本数据并进行语义挖掘与交叉验证，从而系统揭示 AI 工具使用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为平衡工具应用与独立思考能力培养提供实证依据与对策参考。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数据处理

本研究面向有 AI 学习工具实际使用经历的大学生群体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600 份，经数据净化与无效样本剔除后，回收有效问卷 474 份，有效回收率为 79%，样本规模满足实证分析的基本要求。问卷设计通过文献梳理、预调研优化与正式调研三个阶段完成，以保障测量指标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数据分析采用 SPSS29.0 与 AMOS 软件，依次开展如下步骤：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与正态性检验，分析数据的集中趋势与离散程度；其次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检验量表信度，结合 KMO 检验与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验证结构效度；在此基础上开展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初步判断各变量间的关联方向与强度；进一步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各维度因素对大学生 AI 学习工具使用意愿的影响路径与显著性；最后通过差异化分析，对比不同群体间的使用差异，确保分析结果稳定可靠。

3.2 数据分析

3.2.1 信度检验

表 1 信度检验结果

维度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感知有用性	0.910	3
感知易用性	0.911	3
智能交互性	0.911	3
趣味性学习体验	0.913	3
使用意愿	0.904	4
使用态度	0.906	4
总体	0.923	26

结果显示，各维度的 α 系数均在 0.904 以上，整体量表的 α 系数为 0.923，均远高于 0.7 的通用标准，表明量表各维度及整体均具有极佳的内部一致性与稳定性，信度水平良好，可用于后续的数据分析。

3.2.1 效度检验

表 2 效度检验结果

维度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项数
感知有用性	0.745	3
感知易用性	0.715	3
智能交互性	0.735	3
趣味性学习体验	0.68	3
使用意愿	0.773	4
使用态度	0.729	4
总体	0.873	26

数据显示, 量表整体 KMO 系数为 0.875, 各研究维度 KMO 数值处于 0.680 至 0.773 区间, 整体综合 KMO 为 0.873。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结果显著, 卡方值 1841.007, 显著性趋近于 0。各项指标均达到分析标准, 表明本研究问卷题项适配性良好, 变量间存在稳定关联, 结构效度达标, 能够支撑后续实证研究与模型分析。

3.3 相关性分析

表 3 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智能交互性	趣味性学习体验	使用意愿	使用态度
感知有用性	1					
感知易用性	.798**	1				
智能交互性	.594**	.588**	1			
趣味性学习体验	.490**	.457**	.773*	1		
使用意愿	.579**	.547**	.587*	.644*	1	
使用态度	.514**	.496**	.544*	.548*	.769**	1

本研究对六个核心变量开展两两检验。结果表明, 各变量均呈显著正向相关。

3.4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影响机理、清楚各个维度对于研究结果所发挥的作用大小,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 建立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使用意愿作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来验证各个潜变量的影响效应。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endogenous	exogenous	Unstd.	S.E.	C.R.	P	假设	std.
感知有用性	智能交互性	0.53	0.07	7.033	***	成立	0.52
	趣味性学习体验	0.17	0.07	2.398	0.01	成立	0.17
感知易用性	智能交互性	0.64	0.08	8.064	***	成立	0.60
	趣味性学习体验	0.08	0.07	1.149	0.25	不成立	0.08
使用态度	感知有用性	0.54	0.10	5.336	***	成立	0.41
	感知易用性	0.35	0.09	3.691	***	成立	0.28
使用意愿	使用态度	0.81	0.03	26.08	***	成立	0.83

根据回归模型路径分析, 各变量间的标准化系数 (β) 及显著性检验结果如下: 智能交互性

对感知有用性 ($\beta=0.522$, $P<0.001$) 和感知易用性 ($\beta=0.601$, $P<0.001$) 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趣味性学习体验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beta=0.178$, $P=0.017$), 但对感知易用性的正向影响不显著 ($\beta=0.086$, $P=0.252$)。感知有用性 ($\beta=0.414$, $P<0.001$) 与感知易用性 ($\beta=0.286$, $P<0.001$) 均显著正向影响使用态度; 使用态度对使用意愿 ($\beta=0.833$, $P<0.001$) 以及使用意愿对自我效能感 ($\beta=0.586$, $P<0.001$) 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除“趣味性学习体验→感知易用性”这一路径外, 其余研究假设均获得统计支持。

3.5.1 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分析最早是由 Baron 和 Kenny 在 1986 年提出, 其主要目的是探讨一个中介变量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次研究采用 process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表 5 中介效应 1

	路径	Coeff	SE	t	p	LLCI	ULCI
总效应	X-Y	0.5635**	0.040	14.077	0.000	0.484	0.642
直接效应	X-Y	0.3823**	0.047	8.0015	0.000	0.288	0.476
	M-Y	0.2851**	0.044	6.3860	0.000	0.197	0.372
	X-M	0.6354**	0.039	16.035	0.000	0.557	0.713
间接效应	X-M-Y	0.1812**	0.035			0.113	0.249

以智能交互性为自变量、使用态度为因变量、感知有用性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智能交互性对使用态度的直接效应为 0.3823, 间接效应为 0.1812, 总效应为 0.5635, 各项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且 $p<0.001$ 。由此可知, 智能交互性不仅能够直接正向作用于使用态度, 还可借助感知有用性产生间接促进作用, 感知有用性的中介效应显著成立。

表 6 中介效应 2

	路径	Coeff	SE	t	p	LLCI	ULCI
总效应	X-Y	0.5165**	0.036	14.249	0.000	0.445	0.587
直接效应	X-Y	0.3678**	0.039	9.3792	0.000	0.290	0.444
	M-Y	0.3119**	0.040	7.7340	0.000	0.232	0.391
	X-M	0.4768**	0.039	12.220	0.000	0.400	0.553
间接效应	X-M-Y	0.1487**	0.027			0.099	0.206

以趣味性学习体验为自变量, 使用态度为因变量, 感知有用性作为中介变量开展检验。由分析结果可知, 趣味性学习体验对使用态度的直接效应为 0.3678, 间接效应为 0.1487, 总效应为 0.5165, 各项效应对应的 95% 置信区间均未包含 0, 且 $p<0.001$ 。可见, 趣味性学习体验既可直接正向

影响使用态度，也能经由感知有用性形成间接作用，感知有用性在二者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

表 7 中介效应 3

路径	Coeff	SE	t	p	LLCI	ULCI
总效应 X-Y	0.5635*	0.040	14.077	0.000	0.484	0.642
	**	0	2	0	9	2
直接效应 X-Y	0.3989*	0.047	8.3365	0.000	0.3049	0.493
	**	9	0	0	0	0
M-Y	0.2560*	0.043	5.8453	0.000	0.1699	0.342
	**	8	0	0	0	0
X-M	0.6429*	0.040	15.809	0.000	0.5630	0.722
	**	7	0	0	9	9
间接效应 X-M-Y	0.1646*	0.035			0.0968	0.236
	**	0				5

以智能交互性为自变量、使用意愿为因变量，感知有用性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智能交互性对使用意愿的总效应为 0.5635，直接效应为 0.3989，间接效应为 0.1646，各路径 95%置信区间均不含 0，且 $p < 0.001$ 。由此说明，智能交互性既可直接正向影响用户使用意愿，也能够通过感知有用性产生间接促进作用，感知有用性在该路径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表 8 中介效应 4

路径	Coeff	SE	t	p	LLCI	ULCI
总效应 X-Y	0.5165**	0.036	14.249	0.000	0.445	0.587
	*	2	7	0	3	8
直接效应 X-Y	0.3828**	0.038	9.9396	0.000	0.307	0.458
	*	5	0	0	1	5
M-Y	0.2946**	0.038	7.5958	0.000	0.218	0.370
	*	8	0	0	4	8
X-M	0.4541**	0.040	11.169	0.000	0.374	0.533
	*	7	2	0	2	9
间接效应 X-M-Y	0.1337**	0.024			0.088	0.185
	*	8			1	0

以趣味性学习体验为自变量、使用态度为因变量、感知易用性为中介变量进行路径检验。结果显示，趣味性学习体验对使用态度的总效应为 0.5165，直接效应为 0.3828，间接效应为 0.1337，各路径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且 $p < 0.001$ 。由此可知，趣味性学习体验既可直接正向影响使用态度，又能通过感知易用性产生间接作用，感知易用性在二者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成立。

3.6 差异性分析

为探究年级因素对 AI 学习工具感知有用性的影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合 LSD 事后检验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大二学生感知有用性显著高于大一、大三、大四及研究生群体 ($p < 0.05$)，其余各年级组间差异不显著。

表 9 差异分析 1

年级对比组	均值差(I-J)	标准误差	p 值	差异显著性
大一 vs 大二	-0.3544*	0.1183	0.003	显著
大二 vs 大三	0.2742*	0.1225	0.026	显著
大二 vs 大四	0.2623*	0.1225	0.033	显著
大二 vs 研究生及以上	0.2948*	0.1300	0.024	显著

年级对比组	均值差(I-J)	标准误差	p 值	差异显著性
大三 vs 大二	-0.2742*	0.1225	0.026	显著
大四 vs 大二	-0.2623*	0.1225	0.033	显著
研究生及以上 vs 大二	-0.2948*	0.1300	0.024	显著

以使感知有用性为指标开展年级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大二学生完成入学适应，课业任务繁重，常态化使用 AI 工具辅助学习，对工具价值感知最强；大一新生学习压力较小，工具使用程度浅，有用性认知偏弱；大三、大四学生重心转向考研、实习与就业，常规学习工具需求下降；研究生以科研需求为主，应用场景更为局限。整体而言，感知有用性无明显年级线性变化规律，主要受学习场景与阶段性需求影响。

表 10 差异分析 2

年级对比组	均值差值(I-J)	标准误差	p 值	差异显著性
大二 vs 大三	0.3629*	0.1177	0.002	显著
大二 vs 大四	0.3392*	0.1177	0.004	显著
大三 vs 大二	-0.3629*	0.1177	0.002	显著
大四 vs 大二	-0.3392*	0.1177	0.004	显著

以使用意愿为指标开展年级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大二学生使用意愿显著高于大三、大四 ($p < 0.05$)，大一与研究生群体各维度表现平稳，无显著组间差异。大二阶段学习任务集中，对智能学习工具依赖度更高；高年级受升学、就业分流影响，常规学习类 AI 工具使用意愿降低；大一处于探索适应阶段、研究生侧重科研用途，使用意愿整体趋于稳定。

结合各年级差异化特征，AI 学习工具研发与高校教育引导应实行分层优化：针对大二学生，聚焦课程学习需求完善智能交互、习题辅导等核心功能，并加大校内推广与应用培训；面向大一新生，简化操作流程、降低使用门槛，依托入学教育完成基础应用普及；针对大三、大四学生，增设考研备考、简历撰写、论文辅助等定制化服务；面向研究生群体，优化文献梳理、数据分析、学术润色等科研模块，并规范 AI 使用准则，严守学术诚信要求。通过贴合不同学段的学习特点进行差异化设计与针对性引导，可全面提升各年级学生对 AI 学习工具的认可度与使用效果。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围绕感知、态度、意愿构建测量指标，分析智能交互性、趣味性学习体验、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使用意愿、六个因素对大学生 AI 工具使用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智能交互性对感知价值的提升最高；使用态度是影响使用意图的主要原因；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共同正向作用于使用态度，使用态度显著正向影

响使用意愿。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感知有用性在智能交互性与使用态度/使用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感知易用性在趣味性学习体验与使用态度之间起中介作用。不同年级存在显著差异:大二学生在感知有用性与使用意愿上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而大一、大三、大四及研究生之间无显著差异,这一模式与各年级学习场景需求紧密相关(大二学业需求高峰期依赖度高,大一探索适应期,大三、大四多元化发展需求削弱学习工具需求),体现出“学习场景驱动”的核心影响。尽管存在局限,但大学生对AI工具便捷性的认可,以及使用意愿使用动机的转化,为AI工具发展及高校教学实践提供了实证依据。

4.2 研究建议

对于AI学习软件开发者来说,应根据学习环境,打磨有用的功能。增加互动问答、错题讲解、组队学习等功能,提供即时反馈;也可设计阶梯式学习任务以及个性化学习模式,如:朋友自学角,学习时长统计图等,通过培养自信心来提升用户成就感与使用粘性。同时积极响应高校要求,完善AI学习工具的学术规范辅助功能,提高工具对学生日常学习环境的适用性。

针对高校教育教学管理者,将AI技术融入教学当中,覆盖课前预习、课堂授课、课后复习、课外辅导等环节;或开设相关的培训课和选修课程,让学生在实的学习过程中体会到工具的作用,培养使用技能和自身信心;并且制定相应的规定,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使用引导。确定好使用标准。另外,可以汇聚学校中的资源,结合不同的课程特性和学生反馈的功能模块,给学生提供更多便利资源。

针对大学人群,要合理运用,独立思考。在疑难解答、写论文做笔记的学习情境下尝试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提高效率。并且,在使用过程中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避免AI带来的“幻觉”问题,避免过度信赖导致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下降以及学术道德问题。应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人工智能工具,不可一窝蜂地跟风使用。优先考虑适合中国本土的学习背景下的中文产品,最大化发挥工具的作用。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多重不足:样本集中于本科低年级学生,代表性有限;研究模型未纳入感知风险、社会影响等变量,解释力不足;采用横截面数据,难以反映学生AI使用意愿与行为的动态变化;且未将学习情境纳入实证分析,未区分学科与学习场景,结论适配性较弱,难以提供场景化教学参

考。同时,该局限也契合生成式AI教育应用的现实难题,AI幻觉、虚假引用等问题,对学术诚信、师生关系及高校教育治理带来系统性挑战。

未来可从多方面优化完善:拓宽调研范围,覆盖不同学段、专业师生群体,优化抽样方式以提升研究普适性;扩充研究变量,融入AI幻觉感知、技术依赖、学术诚信认知等维度,深化机理分析;采用纵向追踪调研,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弥补长期行为研究的短板;将学习情境纳入核心实证分析,按学科类型、学习任务划分场景,细化差异化研究;聚焦生成式AI应用痛点,探索学术诚信治理、师生信任构建与AI教育规范发展的可行路径,助力生成式AI与高等教育良性融合。

参考文献

- [1]陈娟,李金旭.大学生知识付费产品使用偏好研究——以广州大学城十所高校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12):119-126.
- [2]Balakrishnan J, Dwivedi Y K, Hughes L, et al. Enablers and inhibitors of AI-powered voice assistants: a dual-factor approach by integrating the status quo bias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J].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2024: 1-22.
- [3]SONG J H, ZINKHAN G M. Determinants of Perceived Web Site Interactivity[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8, 72(2).
- [4]陈志平. B2C 购物网站消费者感知互动对态度的影响模式研究[D]. 浙江大学, 2007.
- [5]张梦璇. 电商直播中顾客感知智能交互性对顾客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D/OL]. 吉林大学, 2021.
- [6]赵菲菲, 渠性怡, 周庆山. 在线问答社区用户知识付费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 2019, 40(01): 89-97.
- [7]姚唐, 黄文波, 范秀成. 基于组织承诺机制的服务员工忠诚度研究[J]. 管理世界, 2008(5): 102-114.
- [8]Shuhaiber, A.; Mashal, I. Understanding users' acceptance of smart homes. Technol. Soc. 2019, 58, 101110.
- [9]张晓. 家电零售商转型 OTO 模式影响因素研究[D]. 青岛理工大学, 2014.
- [10]魏浩冉, 姚娟, 李睿. 社会支持对农户秸秆持续资源化利用意愿的影响——基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的中介效应[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5, 39(12).
- [11]赵丽芳, 王袁欣. 技术接受模型视角下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 ChatGPT 的认知与应对[J].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2023, (06).

面向实战的大学生应急救援技能赋能路径研究与实践

王剑¹ 司俊鸿¹ 孙孟晨¹

(1.应急管理大学, 河北 三河 065201)

摘要: 随着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其应急救援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研究以Y高校402名大学生与53名教师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 系统分析了当前大学生应急救援技能教育的实际状况、面临的困境与课程改革方面的现实需求。研究发现, 大学生普遍具备一定的应急理论知识, 但在实践能力方面明显不足, 且对自身操作技能缺乏信心。教学方式上, 高达83.8%的学生倾向于情景模拟教学; 技能需求方面, 89.6%的学生选择创伤急救技能。教师层面则存在专业证书的持有比率低(仅为22.64%)、缺乏专用实训场地、相关教学器材不足等突出问题。基于上述发现, 研究提出构建“基础-进阶-专项”三级课程体系、实施分层次教师培养计划、建设虚实结合的实训基地等一系列改革路径, 为高校应急救援技能教育的实战化转型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应急救援技能; 实战化教学; 课程改革

基金项目: 应急管理大学2025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编号:YDJG202501)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20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Empowerment Path of Practical Emergency Rescue Skills for College Students

Wang Jian¹, Si Junhong¹, Sun Mengchen¹

¹ Universit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Sanhe 065201, Hebei,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universities, as the main front for talent cultivation, have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emergency rescue education.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from 402 college students and 53 teachers at Y Universit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actual situation of emergency rescue skills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difficulties they face,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for curriculum reform. The study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generally possess certain emergency theoretical knowledge, but they are significantly lacking in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lack confidence in their own operational skills. In terms of teaching methods, up to 83.8% of students prefer scenario simulation teaching; in terms of skill needs, 89.6% of students choose trauma first aid skills. At the teacher level, there are prominent issues such as a low holding rate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s (only 22.64%), a lack of dedicated training venues, and insufficient relevant teaching equipment.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a series of reform paths, including constructing a "basic-advanced-specialized" three-tier curriculum system, implementing a tiered teacher training plan, and building a virtual-physical combined training base,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reform of emergency rescue skills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Keywords: emergency rescue skills; practical teaching; curriculum reform

作者简介: 王剑(1988—),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应急救援与指挥

司俊鸿(1985—), 男,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矿井通风与应急管理

孙孟晨(1992—),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智慧应急

通讯作者: 王剑

一、引言

《“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将加强应急管理学科建设以及强化公众应急避险能力明确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这为高校应急教育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1]。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大学生的应急救援能力对校园安全稳定和全社会应急文化建设都具有示范引领的作用。然而, 当前我国高校应急教育普遍采用“讲座式”知识灌输模式, 教学内容与真实场景脱节, 教学方法单一, 评价体系重笔试轻实操, 导致教学成效仅停留在认知层面, 难以转化为突发事件下的实战处置能力。

本研究以 Y 大学为案例, 通过对 402 名学生和 53 名教师的实证调查, 揭示了当前教学模式存在的两大问题: 一是学生层面存在严重的“知行分离”现象, 例如关于心肺复苏 (CPR) 基础知识的回答, 尽管正确率达到了 84.08%, 但当学生独立完成操作时, 所具有的信心评分却仅有 3.37 分 (5 分制); 二是教师层面存在“专业资质赤字”, 调研发现仅有 22.64% 的任课教师考取了专业急救证书, 授课也存在缺乏实训场地、器材匮乏和自身经验不足等因素的诸多限制。这些数据清晰表明, 提升应急教育成效的关键点在于跨越从静态知识到动态能力的“最后一公里”。所以, 本研究力求突破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 以实证数据为基础, 去构建一套以“实战赋能”为导向的改革框架, 包括课程体系、师资建设、实训资源等多个方面, 为高校应急救援能力教育实现从“知”到“行”的实质转变提供参考途径。

二、问卷信效度分析

本调查以 Y 大学的大学生和教师为对象, 借助问卷星线上平台发放问卷, 最终的样本包括 402 名学生和 53 名教师。

(一) 信度检验

借助 SPSS 软件展开分析, 其中教师测量题项为基础信息和多选题, 此情况无需进行信效度验证。在学生样本中, 针对量表题项进行可信度分析, 得出问卷整体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2, 而 2 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 0.8, 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详见表 2.1。

表 1 信度分析

维度	项数	克隆巴赫 Alpha
主观信心	5	0.906
课程现状	2	0.916

(二) 效度检验

样本数据的 KMO 值为 0.845, 大于 0.6 且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低于 0.01, 表明数据结构良好,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问卷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详见表 2.2。

表 2 效度分析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845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971.333
	自由度	21
	显著性	.000

三、大学生应急救援课程现状的实证分析

(一) 大学生应急技能知识掌握情况

调查显示, 大学生在骨折处理 (97.01%)、海姆立克急救法 (87.31%)、灭火器使用 (85.32%) 和心肺复苏 (84.08%) 等知识掌握上表现良好, 但在止血带放松 (56.22%) 和绳结技能 (51.00%) 方面明显不足。这表明当前教学更侧重于基础生命支持类知识, 而对复杂或需精细操作的技能关注不够。

表 3 应急救援技能客观知识

技能项目	正确人数	正确率	掌握水平评估
骨折应急处理	390	97.01%	优秀
海姆立克操作位置	351	87.31%	良好
灭火器操作步骤	343	85.32%	良好
心肺复苏 CPR	338	84.08%	良好
止血带放松	226	56.22%	不足
绳结技能	205	51.00%	不足

(二) 大学生应急技能信心水平

尽管大学生在部分应急技能方面知识掌握良好, 但其实际操作信心明显不足。例如, CPR 知识正确率达 84.08%, 但实际操作信心仅为 3.37 分 (5 分制)。这种“知行分离”现象反映出当前教学“重理论、轻实操”的根本问题。

表 4 技能主观信心

技能项目	平均信心分 (1-5 分)	信心水平评估
疏散逃生与自我保护	4.01	高信心

技能项目	平均信心分 (1-5分)	信心水平评估
初期火灾应对(灭火器)	3.86	较高信心
海姆立克急救法	3.66	中等信心
出血判断与处理	3.35	较低信心
独立完成 CPR	3.37	较低信心

(三) 课程评价

从问卷数据来看,关于课程内容实用性方面,其平均分达到了3.9,教学方式有效性的平均分同样为3.89,说明Y高校现有教学体系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且93.03%的大学生认为应该将应急救援技能课程列为全校必修课,说明大学生对学习应急救援技能有强烈需求。

(四) 学生教学需求

在教学方式偏好上,87.6%的学生选择“户外演练”,83.8%选择“情景模拟”,仅40%选择“专题讲座”,说明学生更倾向于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学习。在技能需求方面,创伤急救(89.6%)、心肺复苏(89.1%)和海姆立克急救法(80.8%)位列前三,与国际急救教育“基础生命支持优先”原则高度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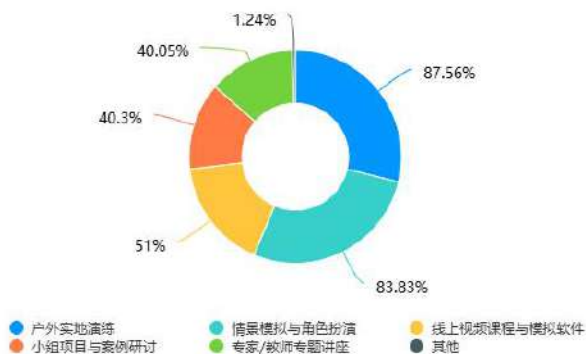


图1 应急救援技能学习方式

从应急救援技能的需求来看,创伤急救这一技能以89.6%的比例高居第一,其次是心肺复苏技能,比例达到了89.1%,再者是海姆立克急救法,比例也达到80.8%,此结果与国际急救教育所强调的“BLS(基础生命支持)优先”这一原则完全契合。

调查结果显示,当下大学生应急技能教育存在较严重的“知行分离”情况:大学生们在心肺复苏(CPR)、止血及绳结等一些关键技能方面,虽有一定知识储备,但他们缺乏实际操做的信心,尤其在CPR以及出血处理两个方面信心最为薄弱。

这种情况体现出传统的“重知识而轻实操”教学模式,已经无法契合大学生当下的实际需求了。而教学方式和应急救援技能的需求为课程改革提供了相应的方向。



图2 应急救援技能需求

四、教师教学现状实证

师资队伍是提升应急教育质量的关键。本调查教师样本中仅有22.64%的教师持有专业急救证书,目前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仍以理论讲解和视频学习为主,且在课程教学开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包括:缺乏专用场地(79.2%)、教学器材不足(60.4%)、学生人数多教学效果差(37.7%)以及安全责任风险担忧(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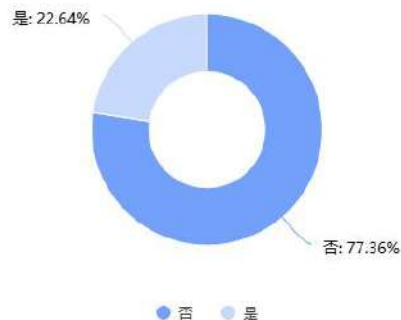


图3 教师是否持有专业急救证书

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着三重结构性矛盾:一是专业资质与教学要求不匹配;二是实战经验与教学需求脱节;三是培训机制与专业发展不同步。缺乏系统化、常态化的师资培训体系,严重制约了实战化教学的推进。

教学痛点方面的调查进一步凸显出资源约束所面临的严峻状况:有多达79.2%的教师明确指出“实训场地缺乏”,60.4%的教师反映“教学器材不足”,这两大硬件层面上的问题是主要的制约因素。与之相关的是,37.7%的教师面临“学生人数

多、教学效果差”的困境，此外还有 32.1% 的教师对安全责任风险感到担忧，这些软件层面的问题也是应急技能教学所面临的挑战。资源投入不足以及风险防控的压力共同对实战化教学起到了制约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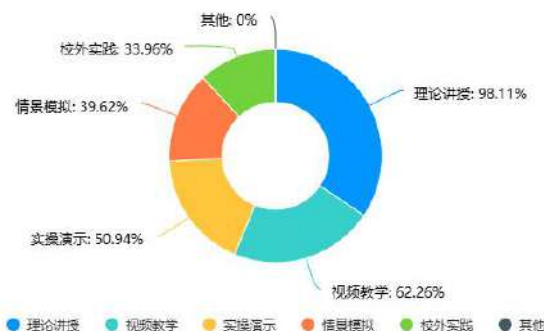


图4 主要教学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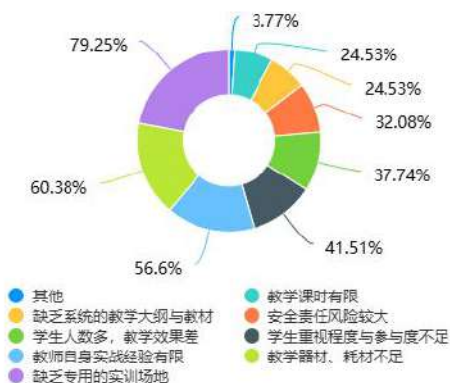


图5 教学面临的主要困难

五、构建以“能力进阶”为核心的课程体系

为解决学生“知行分离”这一问题，需打破“重理论、轻实操”的常规做法，构建一个目标清晰、内容模块化且评价方式多元化的“基础-进阶-专项”三级能力本位课程体系^[2-3]。

(一) 层级化课程内容设计

基础技能设置为全校通识必修课程，16 个学时。面向全体学生，坚持“基础生命支持”这一原则，课程内容按照调查中需求最高的创伤急救（占比 89.6%）、心肺复苏（占比 89.1%）及海姆立克急救法（占比 80.8%）。采用“理论讲授（20%）+技能分解实训（60%）+综合情景演练（20%）”这样的课时分配方式，确保每位学生掌握应急救援核心技能的肌肉记忆与初步应用能力。

进阶技能可设置为专业基础选修课程，32 个学时，面向特定专业学生，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现场指挥与团队协作能力，课程内容涵盖应急救援的组织方式与流程、突发事件心理危机干预、校园应急预案编制与推演等。

专项技能可设置为特定专业或应急救援志愿队的必修内容，以此来实现差异化培养目标和专业化的教学效果。结合工程、环境、体育等不同学科的特点，开发有限空间救援、危化品初步处置和户外运动伤害急救等特色模块。

(二) 以实操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从教师问卷结果来看，90.57% 的教师认为应急救援技能考核的最佳方式是实操技能测试和情景模拟演练评估，所以课程评价要废除单一笔试，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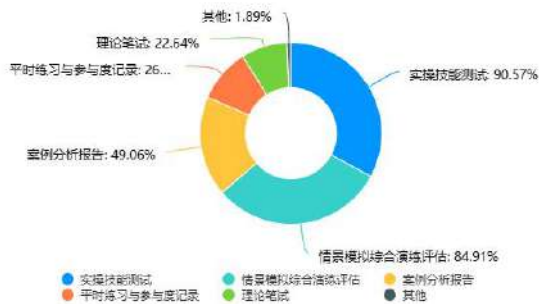


图6 多元化课程评价体系

(1) 过程性评价：建立一份“技能档案”，记录每一位学生在日常训练时的表现、关键操作数据。

(2) 形成性评价：将学生进行分组，完成特定的开放性任务，考核其综合知识应用和团队协作能力；

(3) 终结性评价：以综合实战演练替代陈旧的笔试考核，主要要求学生完成在复杂场景中完成风险评估、自救互救、报警等一系列的实操，考核人员应由任课教师和校外专家共同担任，依据主要得分点清单进行评分。

六、师资建设路径

师资力量决定着课程改革的成败，面对仅 22.64% 的教师持证率和实战经验匮乏的困境，高校可以制定一套兼顾全员达标计划、骨干成员卓越提升的分层发展计划，同时配以长效激励的机制。

(一) 分层培养计划

全员达标计划。与培训中心、紧急救援中心、红十字会合作,开办“高校应急救援技能师资培训专班”,利用教师寒暑假优势,对承担相关教学任务的教师进行集中培训,考取初级救援员证,同时培养教师现场教学能力。

骨干成员卓越提升计划。选拔一批有技能基础、热情的青年教师,形成一个教学团队,资助他们考取高级别证书,定期开展集体备课会,鼓励其参加教学比赛。同时,可以推动骨干教师到应急、消防基层进行短期实习,积累实战经验,建立教学案例库,申报教学研究项目,以形成良好的教学氛围。

(二) 创建激励机制

没有相关的激励机制,难以高质量完成培养计划,为保障师资队伍可持续发展,高校应建立一套相应的激励机制:

(1) 课时津贴:将承担应急救援技能课程的工作量系数予以倾斜上调,并按技能证书等级给予教师课时费用;

(2) 职称评审认可:教师取得高级别的应急救援员证,在职称评审、岗位聘任时应予以明确的认定,给予额外的分值或作为“双师型”教师评价的重要依据。

(3) 成果转化奖励:支持教师带领学生团队开展社区服务,资助教师开发实训脚本、案例库以及训练器材,并在教学成果奖申报时予以赋分。

七、实训基地建设

问卷中,79.2%的教师认为课程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乏专用的实训场地,73.58%的教师认为要建设仿真训练基地,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高校可以打造一个开放共享、虚实结合的实训基地^[4-5]。

(一) 实体实训基地

综合实训中心:自建或合作建设一个智能化、现代化的实习实训基地,配备智能化心肺复苏模拟人、交互式创伤模块、虚拟灭火系统以及逃生体验屋等设备,通过构造复杂灾害场景,以满足高强度、标准化基础训练。

院级特色实训室:依托各学院现有实验室进行改造,例如体育部可依托游泳馆建设水域救援训练点,依托体育场馆建设高空救援训练点;应急技术与管理学院依托虚拟仿真实验系统,建设逃生演练、心肺复苏模拟等场景。

区域共享实训场:积极与地方政府、消防支

队、红十字会建立合作,通过实习实训,让学生定期到对方的专业场地进行训练、参与综合演练等,以满足学生户外实地演练的学习需求。

(二) 虚拟仿真平台建设

与企业共同研究一套应急演练系统,通过模拟火灾、避险与疏散、交通事故急救等场景,记录分析学生的决策与操作,根据个人的评估报告,分析个人的技能不足之处和行为失误点,以不断提高学生决策和实操的正确率。

八、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明确了高校应急救援技能教育存在“知行分离”和“师资短板”两个关键的核心问题,并提出了以实战能力为导向的系统性改革框架。结论表明,只有同时从课程重构、师资赋能、资源扩容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才能将应急救援技能知识切实有效地转化为学生终身具备的能力。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一是样本来源于Y高校,所得出的结论在普适性方面有待进一步验证;二是研究方法主要以横截面调查为主,对改革成效的长期追踪评估目前属于空白。未来研究可着力于跨区域、跨层次的比较研究,探索在不同文化和资源背景下应急救援技能课程教学的最优模式;也可以追踪研究课程改革对大学生安全意识和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最终推动大学生应急救援技能的实战化发展,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平安校园和韧性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06):30-48.
- [2] 蒲文培.应急救援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今日消防,2025,10(09):126-128.
- [3] 常浩.应急救援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以XX职业学院为例[J].今日消防,2025,10(08):123-125.
- [4] 刘海妹,刘湘黔.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应急救援专业人才培养策略探究[J].现代职业教育,2025,(22):65-68.
- [5] 张风江.应急救援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依托基层应急管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程[J].湖北应急管理,2025,(08):60-62.

大概念统领下初中历史单元教学的设计逻辑与实施路径

骆建豪¹

(1.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强调以大概念统整课程内容,推动学生在结构化学习中形成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基于大概念的初中历史单元教学,旨在突破课时知识碎片化、教学目标离散化和评价方式单一化等问题。本文以统编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下册相关单元为例,从单元主题凝练、目标分层设计、知识结构重构、教学活动组织和评价闭环建构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研究认为,教师应以单元大概念统摄核心史实,以问题链和任务群组织学习过程,以多元评价诊断学生在知识掌握、史料运用、历史解释与价值认同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从而实现“教—学—评”一致。该路径有助于提升初中历史教学的整体性、探究性与育人实效。

关键词: 大概念; 初中历史; 单元教学; 核心素养; 效果评估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21

The Design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Unit

Teachi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Grand Concepts

Jianhao Luo¹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emphasize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content through big concep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through structured learning. Focusing on relevant units of the unified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textbook,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sign logic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unit teaching based on big concepts. It proposes that teachers should refine unit themes, construct hierarchical objectives, reorganize historical knowledge into a visual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promote deep learning through mind maps,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situational teaching. It further suggests establishing a layered evaluation system, designing tiered assignments and improving teaching through evidence-based feedback, so as to form an integrated cycle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Keywords: big concepts;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unit teaching; core competencies; effect evaluation

一、问题提出：大概念视域下单元教学的价值定位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初中历史教学正由知识点传授转向素养导向的整体设计。历史课程内容跨度大、概念多、线索复杂，若仍以单课时为基本单位逐点推进，学生容易停留在事件记忆和结论背诵层面，难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大概念教学强调以具有解释力、统摄性和迁移价值的核心观念组织知识，能够将分散史实置于相互关联的结构之中，引导学生从“知道历史事实”走向“理解历史为什么如此发展”。

单元教学是落实大概念的重要载体。与传统课时教学相比，单元教学更注重课程内容的整体规划、学习任务的连续推进和评价证据的前置设计。教师在设计时，需要先明确本单元希望学生形成的历史理解，再倒推需要掌握的史实、方法与学习活动。由此，教学不再只是教材内容的线性展开，而是围绕核心问题、关键概念和表现性任务形成结构化学习过程。

以统编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下册中国现代史相关单元为例，教材涉及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改革开放、制度完善与现代化建设等内容。其知识量较大，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线索交织，如果缺乏统摄性概念，学生往往难以理解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连续性与转折性。因此，本文尝试从大概念角度重构单元教学路径，并进一步探讨其效果评估方式，以期为初中历史课堂提供可操作的实践参考。

二、锚定单元核心：主题凝练与目标设计

大概念统领下的单元教学，首先要解决“教什么”和“为什么教”的问题。单元主题是教学设计的逻辑起点，也是知识整合与活动组织的中心线索。教师不能简单沿用教材目录作为单元主题，而应在研读课程标准、教材内容和学生学情的基础上，提炼能够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学科育人价值的概括性表述。

以上述单元为例，教师可围绕“历史转折与道路探索”确立单元主题，并进一步将其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更高层级概念之下。该主题既能统摄单元内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理论发展等核心史实，也能引导学生思考中国为什么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种道路如何在

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完善。由此，学生对历史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个别事件，而能够形成对国家发展进程的整体认识。

在主题确立之后，教学目标应体现“知识—能力—素养”的递进关系。知识目标强调学生能够梳理重大事件、关键会议、重要政策及其时序关系，形成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能力目标强调学生能够运用史料提取信息、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并对历史现象作出有依据的解释；素养目标则指向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的综合培育，引导学生在理解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理性认同。

目标设计还应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评价性。例如，“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可以进一步转化为“能够结合史料说明改革开放对经济体制、社会生活和国家发展道路的影响”；“增强制度自信”可以转化为“能够结合本地社会发展案例，说明国家制度和道路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这种表述既避免了目标空泛化，也为后续评价提供了明确依据。

三、重构知识体系：从零散史实到结构化理解

（一）梳理课程脉络，明确阶段特征

大概念教学的关键在于知识结构化。教师应先从纵向历史进程出发，梳理单元内部的时序关系和阶段特征，再从横向维度呈现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中国现代史相关单元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以作为贯穿性线索，将探索、转折、改革、开放、发展等内容纳入同一解释框架。

在课堂中，教师可引导学生绘制“阶段—事件—影响”三维时间轴：第一层标明历史阶段，第二层列出关键史实，第三层概括其历史意义。通过这一过程，学生能够认识到历史发展既具有连续性，也存在关键转折；既受到时代条件制约，也体现人民实践和制度选择的主动性。

（二）提炼核心概念，形成概念网络

单元大概念并非孤立存在，而应与板块概念、课时概念和具体史实构成层级清晰的概念网络。以本单元为例，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板块层级概念，将“历史转折与道路探索”作为单元大概念，将“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理论发展”“战略目标”等作为课时或专题概念。教

师在教学中应揭示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提供实践路径，制度创新保障发展方向，理论发展回应时代问题，战略目标指向国家未来。

概念网络的价值在于帮助学生建立解释框架。学生学习某一事件时，不只是记住时间、地点和意义，还要思考该事件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回应了什么现实问题、对后续历史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样，史实学习便能够转化为概念理解，历史解释也由简单复述走向有逻辑的分析。

（三）构建可视化框架，促进知识迁移

为降低学生认知负荷，教师可将单元知识框架可视化，形成“历史起点—实践路径—理论成果—战略目标”的逻辑链条。其中，历史起点强调关键转折的背景与意义；实践路径突出改革与开放的互动推进；理论成果呈现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认识的过程；战略目标则引导学生理解国家发展蓝图与现实建设之间的联系。

可视化框架不仅服务于知识记忆，更服务于思维建构。学生可以借助框架比较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分析政策变化背后的社会条件，解释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关系。在复习与迁移运用中，学生也能依据该框架处理新的历史材料，提高综合分析能力。

四、优化实践路径：多元活动推动深度学习

（一）运用思维导图，梳理知识关系

思维导图适合呈现单元知识的层次结构和逻辑关联。教学中可采用“三阶操作法”：第一阶段，教师提供时间轴模板，引导学生依据教材整理关键事件和基本概念；第二阶段，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补充史料、政策和现实案例，用连接线标明理论与实践、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第三阶段，学生结合本地发展变化完善导图，并在班级交流中说明自己的结构设计。

这一活动的重点不在于图形是否美观，而在于结构是否清晰、关联是否合理、解释是否有据。教师应引导学生说明每一条连线的依据，使思维导图成为历史解释的工具，而非知识罗列的装饰。

（二）开展项目式学习，探究道路选择逻辑

项目式学习能够将单元大概念转化为真实任务。教师可围绕“为什么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在历史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设计项目主题，将学生分为不同研究小组，分别聚焦探索起步、改

革深化、开放推进和新时代发展等阶段。每组围绕“背景条件—主要举措—实践成效—经验启示”展开研究，并以主题报告、展板或微视频形式呈现成果。

为保证项目学习的历史学科属性，教师应提供史料选择和分析支架。例如，可设置“史料来源、核心信息、可证明观点、局限性说明”四栏表，引导学生避免只摘抄结论，而要基于证据形成解释。展示环节则可采用同伴互评，评价维度包括史实准确、史料运用、逻辑论证和表达呈现。通过持续探究，学生能够认识到历史道路选择并非偶然结果，而是在时代条件、社会实践和人民需求中逐步形成的。

（三）创设历史情境，增强理解深度

情境教学有助于弥合学生生活经验与历史内容之间的距离。教师可通过影像资料、实物图片、统计图表和角色任务卡构建学习情境。例如，以改革开放前后衣食住行、城乡面貌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对比资料导入，引出“社会生活变化背后有哪些制度与政策因素”这一问题；再组织学生阅读材料、比较数据，分析历史变革对普通生活的影响。

在角色扮演环节，学生可分别从基层干部、企业经营者、普通劳动者、青年学生等视角讨论同一历史变化。教师应提醒学生尊重史实，避免脱离历史情境进行想象化表演。活动结束后，可引导学生反思不同群体感受差异与国家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多元视角中形成更全面、辩证的历史认识。

（四）把握实施原则，提升课堂适配性

多元教学方法的运用应服务于大概念理解，而不能停留在课堂形式的叠加。教师在选择方法时，应遵循三项原则。其一，坚持问题导向。每一项活动都应回应单元核心问题，避免活动热闹而思维浅表。其二，坚持证据支撑。无论是思维导图、项目报告还是情境讨论，都应以教材、史料和现实材料为依据，训练学生基于证据表达观点。其三，坚持适度开放。教师既要为学生提供必要支架，又要保留自主探究空间，使学生能够在选择材料、组织观点和展示成果的过程中形成学习责任。

在实际课堂中，教师还需关注课时容量与任务难度的平衡。大概念教学并不意味着压缩基础知识教学，也不意味着每一课都必须设计大型项

目。对于基础薄弱的班级，可先以时间轴和问题链帮助学生建立基本框架，再逐步引入史料分析与项目探究；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的班级，则可提高任务开放度，引导学生进行跨课时比较和现实案例分析。只有使教学方法与学生发展水平相匹配，大概念教学才能真正转化为课堂实效。

（四）嵌入课例片段，增强操作指向

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例，教师可围绕“关键转折如何改变国家发展方向”设计一课时活动。导入环节呈现改革开放前后社会生活变化的图片和数据，引导学生提出问题；探究环节提供会议文献节选、经济发展数据和地方变迁材料，要求学生归纳改革开放的背景、举措和影响；提升环节组织学生讨论“改革为什么需要不断深化”，并将讨论结果纳入单元概念图。这样，单课时教学既完成基础知识学习，又服务于单元大概念建构。

在课后延伸中，可要求学生访谈家人或查阅地方志资料，了解本地区在交通、产业、住房或教育方面的变化，并用“历史政策—地方实践—生活变化”的框架撰写简短说明。该任务把国家叙事与学生生活经验相连接，能够提升历史学习的现实感，同时避免价值教育停留在空泛表述层面。

五、完善评价闭环：以证据诊断教学成效

（一）建立分层评价指标

大概念单元教学的评价不能停留在选择题、填空题等知识检测层面，而应围绕教学目标收集多类型证据。评价指标可分为三个层级：知识掌握层，主要考查学生能否准确梳理核心史实并建构单元知识框架；能力发展层，主要考查学生能否提取、辨析和运用史料，形成有依据的历史解释；素养表现层，主要考查学生能否在理解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理性价值判断，并将历史认识与现实生活相联系。

表1 单元教学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层级	核心表现	证据来源	改进指向
知识掌握	能准确梳理关键史实、时间顺序和阶段特征	时间轴、概念图、基础测验	补充时序梳理和概念辨析
能力发展	能提取史料信息并围绕观点展开论证	史料分析单、项目报告、课堂发言	加强史料来源、证据意识和表达支架

素养表现	能联系现实案例表达理性认同和历史责任感	主题短文、访谈报告、展示互评	引导案例分析具体化、论证规范化
------	---------------------	----------------	-----------------

分层评价的意义在于避免“以分数替代发展”。同一学生可能基础知识较扎实，但史料论证能力不足；也可能表达积极，但时序关系不够清晰。教师只有通过多维评价，才能发现学生真实学习困难，并据此调整教学。

（二）设计阶梯式作业

作业是单元评价的重要载体。基础层作业可要求学生完成时间轴、概念填图和核心史实梳理，确保基本知识准确；发展层作业可要求学生围绕“改革开放与理论创新的关系”撰写短文，重点考查史实运用和逻辑表达；拓展层作业可要求学生选择本地发展案例，制作图文报告或开展小型访谈，说明国家发展道路在地方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阶梯式作业既照顾学生差异，也体现素养进阶。教师应提前公布评价标准，如史实准确性、材料支撑度、逻辑连贯性、现实关联度和表达规范性等，使学生明确努力方向。对于拓展作业，不宜片面追求形式创新，而应强调历史依据和问题意识，避免变成简单的手抄报展示。

（三）落实反馈改进机制

评价的最终目的在于改进教学。单元结束后，教师应从三个方面分析评价结果：一是学生对核心概念是否真正理解，二是学习活动是否有效支持目标达成，三是评价任务是否能够反映核心素养发展。如果多数学生在概念辨析上存在困难，可增加对比表和典型材料研读；如果项目成果中史料来源单一，可补充史料检索与辨析指导；如果学生现实案例分析空泛，则应提供“案例—史实—观点”论证模板。

教师还可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反馈单，既指出优势，也提出可执行的改进建议。例如，对“时序混淆”的学生，建议采用“时间—事件—影响”三栏卡片进行复习；对“观点有余、证据不足”的学生，建议使用“观点—史料—解释”三步表达法。通过反馈、再学习和再评价，单元教学才能形成持续改进的闭环。

六、结语

基于大概念的初中历史单元教学，是落实课程标准和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路径。其核心不在于为课堂增加新的概念标签，而在于以统摄

性问题重组教学内容,以结构化活动促进深度理解,以证据化评价推动教学改进。教师应从单元整体出发,准确提炼大概念,合理设计目标、内容、活动与评价,使学生在掌握历史事实的同时理解历史发展的逻辑,并在历史学习中形成理性认同和责任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大概念教学对教师的课程理解、资源整合和评价设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后续实践中,还应进一步加强基于真实课堂数据的效果检验,比较不同单元、不同学情下的实施差异,不断优化大概念教学的操作模型。只有将理念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课堂实践,历史课程的育人价值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实现。

从论文写作角度看,相关研究还可继续强化实证意识。除呈现教学设计外,可进一步补充前测、后测、课堂观察、学生作品分析和访谈材料,以说明大概念教学对学生结构化理解和历史解释能力的实际影响。这样既能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

度,也能使文章从经验总结走向更具学术规范的实践研究。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2] 黄卫平.“大概念”视域下初中历史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与实施[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22.
- [3] 姒建明,杜冰,曹彩虹.基于大概念的单元设计探讨[J].教育与教学研究,2021.
- [4] 崔文静,杨立君.核心概念统领下的初中历史单元教学设计[J].教学与管理,2022.
- [5] 陶健.学科大概念下的初中历史单元教学——以“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为例[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22.
- [6] 陈志刚.教学设计的变革与大概念、大单元教学的实施[J].历史教学,2021.

数智赋能·大创筑基·价值引领：

大学数学类课程教学改革新实践

田怀谷^{1*} 梅鹏¹ 章培军¹ 施阳婉婷¹ 曹云波² 李小敏¹

(1.西京学院 计算机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3, 2.西京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3)

摘要: 立足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2.0 与新质生产力人才培养要求, 针对当前大学数学类课程存在的重理论轻应用、数智技术应用浅层化、大创项目与课程教学脱节、课程思政形式化等现实痛点, 本文构建数智赋能·大创筑基·价值引领三位一体教学改革新模式。以人工智能、知识图谱、智能仿真为技术支撑, 重构数学课程知识体系, 创新课前、课中、课后闭环教学模式与过程化多元评价体系; 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为实践载体, 搭建项目驱动、赛创联动的实践育人链条, 打通数学理论与工程应用转化通道; 围绕科技强国、匠心精神、数学文化三大维度, 将价值引领深度融入教学、实践与科研全过程, 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同向同行。以大创项目为实践案例, 系统阐释改革实施路径与育人成效, 验证了该模式的可行性与实效性。研究可为应用型高校大学数学课程数智化转型、实践化升级与思政化融合提供可复制推广的改革范式, 助力培养具备扎实数理基础、创新实践能力与家国情怀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支撑教育强国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关键词: 数智赋能; 大创项目; 价值引领; 大学数学; 教学改革

基金项目: 西京学院 2025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JGYB2528); 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 2025 年度课题 (SGH25Y3713); 西京学院 2025 年基层党建工作课题研究项目 (XJDJ202518); 陕西本科和高等继续教育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5BY232)。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22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Innovation Training Found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New Practice on Teaching Reform of University Mathematics Courses

Tian Huaigu¹, Mei Peng¹, Zhang Peijun¹, Shi Yangwanting¹, Cao Yunbo², Li Xiaomin¹

¹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Xijing University, Xi'an 710123, Shaanxi, China

²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Xijing University, Xi'an 710123, Shaanxi, China

作者简介: 田怀谷(1994—), 男,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大学数学教育教学、数学模型分析;

梅鹏(1999—), 男, 硕士, 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教育教学管理;

章培军(1984—), 男,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大学数学教育教学;

施阳婉婷(2005—),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大数据分析及建模;

曹云波(1980—), 男,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党建与课程思政;

李小敏(1990—),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大学数学教育教学。

通讯作者: 田怀谷, 邮箱 tianhuaigu@foxmail.com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2.0 National Strategic Action for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promin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university mathematics courses, such as emphasizing theory over application, superficial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disconnection between innovation training programs and classroom teaching, and formalistic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constructs a three-in-one teaching reform model featuring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innovation training found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Suppor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nowledge graph and intelligent simulation technologies, the model reconstructs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mathematics courses, and innovates the closed-loop teaching mode covering pre-class, in-class and after-class links as well as the diversified process evaluation system. Taking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grams as the practical carrier, it builds a practice education chain driven by projects and integrated with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opening up the transformation channel from mathematical theories to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Centering on three dimensions of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craftsmanship spirit and mathematics culture, value guidance is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teaching, practic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realizing the coordination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value shaping. Taking innovation training projects as practical cas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educational effect of the reform, and verifies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l.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a replicable and promotable reform paradigm for the digital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practical upgrad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university mathematics courses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It helps cultivate high-quality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with solid mathematical foundation,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y and family and country feelings, and support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ducational pow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Innovation Training Program; Value Guidance; University Mathematics; Teaching Reform.

一、引言

2026 年全国两会将“人工智能+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列为高等教育改革核心议题^[1], 明确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全流程、强化高校实践育人与立德树人协同发力, 教育部同步启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2.0, 全面推进“人工智能+教育”落地见效, 为新时代高校课程改革提供了明确政策指引与实践遵循^[2]。

大学数学类课程作为理工科专业的核心基础课, 是支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装备、集成电路等国家战略领域人才培养的关键基石, 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生专业能力养成、创新思维培育与长远职业发展, 更是落实教育强国建设、夯实科技创新根基的重要抓手^[3,4]。在新工科建设持续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提速的背景下, 传统大学数学教学模式已难以适配新时代人才培养需求, 长期存在的诸多痛点日益凸显^[5,6]。当前大学数学课堂普遍重理论推导、轻实践应用, 线性代数等课程内容抽象晦涩, 与工程实际、产业需求脱节, 学生往往停留在公式记忆与习题演算层

面, 难以将数学知识转化为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数智技术应用多停留于签到、简单答疑、作业批改等浅层环节, 未能深度融入知识重构、个性化导学、学情精准诊断等核心教学环节, 教育数字化的赋能价值未充分释放;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与课程教学“两张皮”, 大创项目未能成为衔接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载体, 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缺乏系统性支撑; 课程思政多为“贴标签”式融入, 价值引领流于形式, 未能与教学内容、实践环节深度耦合,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实不到位。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大学数学课程的“两性一度”提升, 更与新质生产力对人才的数学应用能力、智能工具使用能力、工程实践能力与家国情怀素养的高标准要求相背离, 亟需构建系统化、创新性的教学改革路径予以破解。

立足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与应用型高校育人定位, 本文提出“数智赋能·大创筑基·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大学数学类课程教学改革新模式, 以回应时代需求、破解教学痛点。数智赋能以人工智能、知识图谱、智能仿真工具为技术支撑, 重

构课程知识体系、打造可视化教学资源、搭建智能导学平台,实现精准化教学与个性化学习;大创筑基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为核心载体,推动数学知识与工程实践深度融合,以项目驱动强化学生数学应用与创新实践能力,打通“学用转化”的关键环节;价值引领紧扣科技强国、匠心精神、数学文化三大主题,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教学全过程与实践场景,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本文以大创创新训练项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的忆阻电路系统动力学行为分析与计算》为具体实践案例,系统阐释三位一体改革模式的实施路径、操作方法与实践成效,探索适配应用型高校的大学数学教学改革新范式。本次改革既是落实 2026 年两会教育部部署与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的具体行动,也是破解传统数学教学困境、提升基础课育人质量的有益探索,旨在为同类高校数学类课程的数智化转型、实践化升级、思政化融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助力高校培养兼具扎实数理基础、突出创新能力与坚定家国情怀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二、数智赋能: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技术支撑

数智赋能是新时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抓手,更是破解大学数学类课程抽象性强、实践性弱、适配性不足等教学痛点的关键技术路径。其以人工智能、知识图谱、大数据分析、智能仿真等数智技术为核心载体,深度嵌入课程教学的知识传授、过程互动、学情诊断、评价反馈全流程,推动大学数学教学从“传统讲授式”向“智能精准式”转型,为课程改革提供底层技术支撑与创新动力。

2.1 数智赋能的核心内涵

数智赋能应用于大学数学类课程教学,并非简单将技术作为辅助工具,而是以技术适配教学、数据驱动教学、智能优化教学为核心逻辑,实现数智技术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育人目标的深度融合。针对线性代数等大学数学课程知识点抽象、逻辑关联紧密、应用场景隐蔽的特点,数智

赋能聚焦三大核心目标:一是通过技术手段破解数学知识的可视化、具象化难题,降低学生学习门槛;二是依托数据采集与智能分析,实现学情精准诊断与个性化导学,适配应用型高校学生基础差异大的学情特点;三是打通理论教学与工程应用的数字通道,让数学知识从“纸面”走向“实践”,真正发挥基础学科的支撑作用。

2.2 数智赋能下课程知识体系重构

依托数智技术重构大学数学课程知识体系,是打破传统教学碎片化、教条化局限的核心环节。以《线性代数》课程为例,项目组基于知识图谱技术完成课程核心知识点的数字化解构,将矩阵运算、线性方程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二次型等关键知识点拆解为 258 个基础节点,梳理知识点间的逻辑递进、交叉关联、应用延伸关系,构建基础模块、进阶模块、应用模块三级知识架构,形成可视化、可关联、可拓展的课程知识网络。

同时,针对线性代数抽象难点,开发 AI 赋能编程可视化教学资源,借助 MATLAB、Maple 等智能工具实现公式推导、矩阵变换、方程组求解的动态仿真,将抽象的数学符号转化为直观的图形与动态过程。此外,搭建课程专属 AI 智能导学系统,通过采集学生预习、答题、互动、作业等全流程学习行为数据,智能识别知识薄弱点,自动生成个性化学习路径与推送适配习题,实现精准辅导,改变传统教学授课模式。

2.3 数智赋能闭环教学模式创新与评价体系

数智技术推动大学数学教学流程全面升级,构建课前 AI 预研、课中双轨互动、课后智能反馈的全闭环教学模式,让教学各环节形成有机联动^[7]。课前,通过智能教学平台发布 AI 预研任务,将工程问题与数学知识点结合,引导学生借助 AI 工具自主探究,提前感知知识应用场景;课中,融合 AI 互动工具与工程案例开展双轨教学,一边通过智能投屏、实时答题等功能强化师生互动,一边用 AI 仿真工具验证理论推导结果,让学生在学中用、用中学;课后,依托 AI 平台完成作业自动批改、错题归集、难点解析,同步推送拓展学习资源,形成预习、授课、练习、反馈、提升的完整教学闭环,大幅提升教学效率与学习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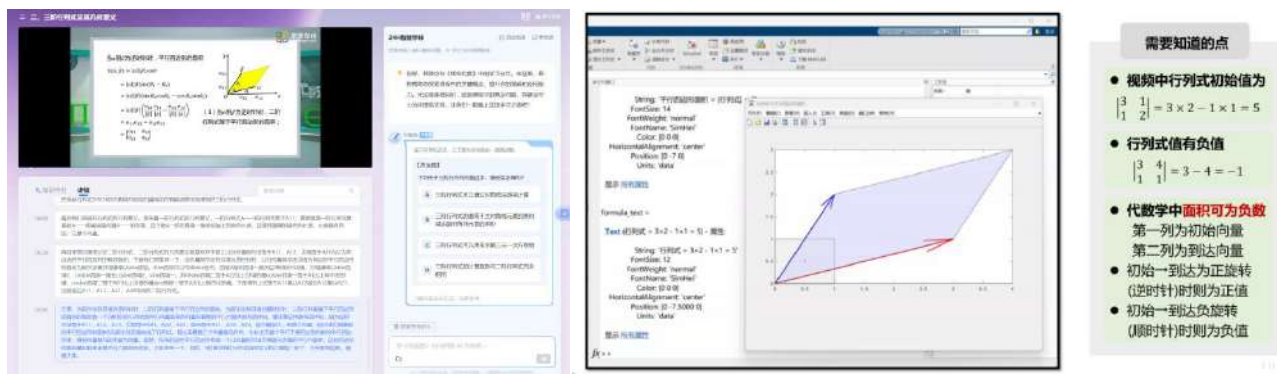


图1 数值赋能大学数学课程案例图

数智赋能推动评价体系向过程化、多元化、精准化转型,通过智能教学平台全维度采集课前预习、课中互动、课后作业、实践操作、竞赛参与等过程性数据,构建涵盖知识掌握、能力达成、素养提升的可量化评价指标。借助AI算法对评价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智能识别课程教学薄弱环节、学生共性知识盲区,自动生成教学诊断报告与优化建议,形成评价、分析、优化的闭环反馈机制,实现教学效果的实时监测与动态迭代,为教学改革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与实证依据。

三、大创筑基：大学数学课程实践育人的核心载体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简称“大创项目”)是应用型高校强化实践育人、提升学生创新能力与工程素养的核心载体,也是破解大学数学类课程“重理论、轻应用”“学用脱节”痛点的关键抓手。大创筑基以大创项目为实践纽带,将大学数学的理论知识与工程创新、人工智能应用深度绑定,构建以创促学、以践验知、以赛辅创的实践育人链条,让学生在真实创新任务中运用数学、理解数学、掌握数学,真正实现数学知识向实践能力、创新思维的有效转化,为大学数学教学改革筑牢实践根基。

3.1 大创筑基的融合逻辑

大学数学是人工智能、电路系统、数据建模、智能算法等工程创新领域的底层理论支撑,而大创项目则是数学知识落地应用的真实实践场景,二者具有天然的内在耦合性。大创筑基模式立足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定位,遵循数学知识为基、创新项目为体、实践能力为要的融合逻辑,将数学课程中的微分方程求解、特征值与特征向量、动力学分析等核心知识点,嵌入大创项目的选题、设计、建模、计算、验证全流程,让数学从抽象

理论变为解决创新问题的实用工具。同时,依托大创项目打通课程学习、项目实践、竞赛提升的通道,使数学教学从课堂内延伸至课堂外,从知识传授升级为能力培育,契合新质生产力对复合型创新人才的核心要求。

3.2 大创筑基的教学实施路径

以大创项目为根基搭建赛事培育体系,实现大创筑基、竞赛提质、赛创闭环。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创新要求,嵌入大创项目选题、方案设计、实施落地全流程,引导学生围绕人工智能应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数据建模等方向立项,把课程核心知识作为项目与竞赛的数理支撑。同时,对接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APMCM 亚太地区数学建模竞赛等专业赛事,以大创项目为原型备赛,让学生在竞赛中用数学工具完成建模、计算与验证;将竞赛获奖成果反哺优化大创项目,提升研究深度与创新性,形成大创选题、竞赛实战、项目迭代的递进式培育模式。

四、价值引领：大学数学课程立德树人的根本遵循

价值引领是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要求,也是数智赋能、大创筑基、价值引领三位一体教学改革的灵魂所在^[9]。大学数学类课程并非单纯的工具性学科,其蕴含的科学思维、人文精神与家国情怀,是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载体。本节立足大学数学教学本质,将价值引领深度融入课程教学、数智实践与大创项目全流程,摒弃浅层思政模式,以场景化、沉浸式、实践化的方式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同频共振,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筑牢精神根基。

4.1 价值引领的核心内涵与维度

大学数学课程的价值引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聚焦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育人要求,围绕三大核心维度展开:

一是科技强国引领,突出数学作为基础学科对国家战略科技领域的支撑作用,引导学生认识数学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国防军工、航天导航等卡脖子领域的关键价值,厚植家国情怀与科技自立自强信念;

二是匠心精神引领,传承数学研究严谨求实、精益求精、攻坚克难的科学品格,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持之以恒的创新毅力与团队协作的工程素养;

三是数学文化引领,挖掘数学发展史中的中外科学家精神、数学思想演进脉络,让学生感受数学的理性之美、逻辑之美,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三大维度相互支撑、有机融合,构成大学数学课程价值引领的完整体系。

4.2 价值引领与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路径

价值引领与大学数学教学的融合,坚持内容适配、场景自然、润物无声的原则,依托数智技术实现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的深度耦合。在知识教学层面,精准挖掘大学数学课程的思政切入点把数学在北斗导航共线判定、国产芯片矩阵运算优化、山东舰航母编队动力学分析中的应用作为教学案例,让抽象知识与国家重大工程紧密相连。数智教学层面,借助AI辅助编程的可视化、知识

图谱等技术,将思政素材嵌入智能导学系统,通过动态仿真、案例视频等形式直观呈现数学的国家价值,打破传统思政说教的枯燥感。

大创项目是价值引领落地生根的最佳实践场景,将思政教育贯穿大创项目选题、研究、攻关全流程,实现实践中育人、育人中创新。在项目选题阶段,引导学生聚焦人工智能应用、电子信息系统、智能算法优化等国家急需领域,紧扣人工智能国家战略方向,让学生在立项之初就树立服务国家需求的科研导向。在项目研究阶段,培养学生严谨求证、不畏困难的匠心精神,鼓励团队协作攻克技术瓶颈,感悟工程创新的艰辛与价值。

4.3 价值引领的育人目标与实施成效

价值引领的最终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工科人才。通过三位一体改革,学生不仅扎实掌握数学知识与实践技能,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坚定的家国情怀、严谨的科学精神与强烈的创新使命。在教学实践中,学生主动将数学学习与国家发展需求结合,在大创项目、学科竞赛中聚焦关键技术问题攻关;在数智化学习中,主动探索数学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的应用,深刻理解基础学科对科技强国的重要意义。价值引领真正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从外在要求到内在自觉的转变,让大学数学课程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为教育强国建设输送兼具专业素养与家国情怀的高素质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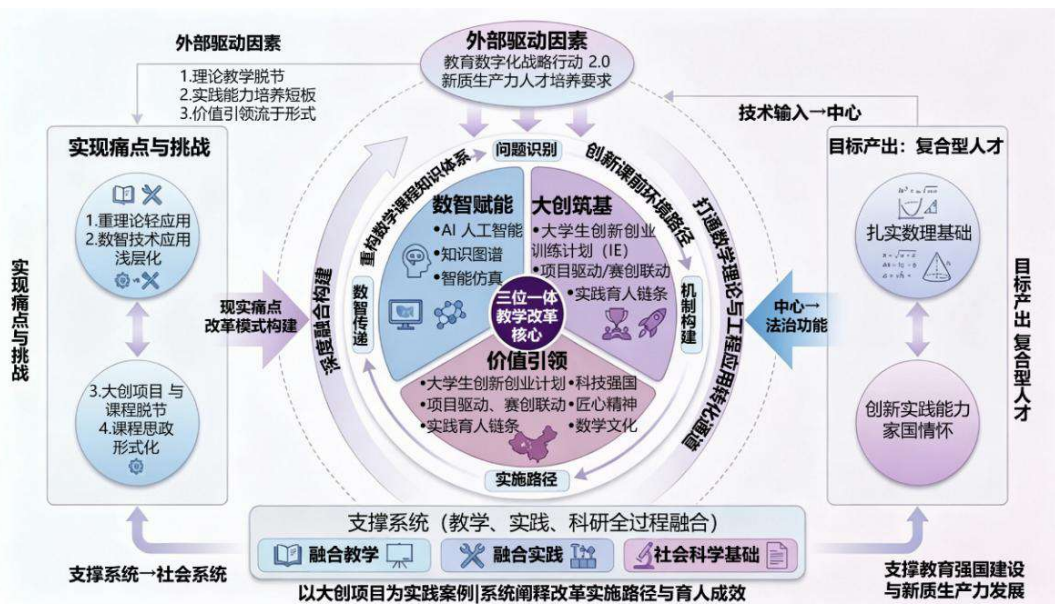


图2 创新教学实践案例路径图

五、创新实践案例

5.1 案例项目基本概况

本次教学改革选取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项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的忆阻电路系统动力学行为分析与计算》作为核心实践案例,项目紧扣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聚焦忆阻电路在神经形态计算、智能芯片、人工智能硬件系统中的关键应用,以大学数学为理论核心、数智技术为研究工具、大创平台为实践载体,完成项目的全流程研究。

5.2 大学数学知识为项目提供核心理论支撑

本项目将抽象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关键工具,在忆阻系统动力学行为分析环节,借助系统稳定性理论判定电路运行状态,精准分析分岔、混沌等动态特性;在数值计算与结果验证环节,通过数值优化方法完成复杂计算,为项目研究提供严谨的数理依据。学生在项目推进中直观感受数学在人工智能、电子信息领域的实用价值,实现数学知识从被动识记到主动应用的转变。

5.3 数智技术、价值引领贯穿项目研究全流程

数智赋能为项目研究提供高效便捷的技术支撑,大幅提升研究效率与实践效果。团队依托课程知识图谱与 AI 智能导学系统快速定位所需知识点,精准匹配工程应用案例;借助 MATLAB 等仿真工具完成忆阻电路动力学仿真,将抽象方程转化为直观相轨迹、时序波形;同时通过智慧教学平台实现团队协作、进度管控、资料共享,依托大数据学情分析功能记录研究过程,为项目迭代优化提供数据支持,充分体现数智技术对大创项目与数学教学的双重赋能。

将价值引领嵌入选题、研究、攻关、成果转化全过程,实现沉浸式、实践化立德树人。在科技强国引领上,项目聚焦人工智能核心技术领域,让学生深刻理解数学对国家战略科技、芯片硬件研发的支撑作用,厚植科技自立自强的家国情怀;在匠心精神引领上,针对参数调试、计算优化等难点,引导学生严谨求证、反复迭代,培养精益求精、攻坚克难的科学品格;在科研素养引领上,强化科研诚信、知识产权保护教育,规范数据记录、报告撰写与成果申报,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与科研观。

5.4 项目成果与育人成效验证

依托创新教学模式,本项目实现竞赛联动、成果转化、能力提升的多重育人效果。在竞赛联动方面,项目成果成功转化为参赛作品,参与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等高水平赛事,斩获多项省级及以上奖项,形成大创筑基、竞赛提质的良性循环;在育人成效方面,学生数学应用能力、数智工具操作能力、创新实践能力全面提升,家国情怀、科学精神与工程素养同步强化,充分验证了“数智赋能·大创筑基·价值引领”教学模式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为大学数学类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六、总结

本文立足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2.0 与新质生产力人才培养需求,针对当前大学数学类课程存在的重理论轻应用、数智技术应用浅层化、大创项目与课程教学脱节、课程思政融入形式化等突出问题,构建“数智赋能·大创筑基·价值引领”三位一体教学改革新模式。数智赋能以人工智能、知识图谱、智能仿真为技术支撑,重构课程知识体系、创新闭环教学模式、完善精准化评价体系,破解数学知识抽象难懂、教学针对性不足、学用转化不畅的难题;大创筑基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为实践载体,推动数学理论与工程应用深度融合,搭建项目驱动、赛创联动的实践育人链条,强化学生数学应用能力与创新实践能力;价值引领紧扣科技强国、匠心精神、数学文化三大维度,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教学全过程与实践场景,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通过大创项目的实践验证,该模式有效提升了教学质量、学生综合能力与课程育人实效,能够切实增强大学数学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与挑战度。本次改革既是落实“人工智能+教育”部署、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实践,也是应用型高校强化基础课育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有益探索,可为同类高校数学类课程的数智化升级、实践化改革与思政化融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参考,助力高校培养兼具扎实数理基础、突出创新能力与坚定家国情怀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教育强国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数学基础。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政府工作报告[EB/OL]. (2026-03-13) [2026-04-20]. http://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25.html.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召开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2026 年部署会, 全面深入推动“人工智能+教育”[EB/OL]. (2026-03-31) [2026-04-20]. http://www.moe.gov.cn/jyb_zzjg/huodong/202603/t20260331_1432621.html.

[3] 杨帆. 高等数学赋能新工科机械制造: 理论与实践的多维融合探索[J]. 机械设计, 2026, 43(05): 207-212.

[4] 潘小明. 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学教育: 为何? 何为? 如何? [J]. 数学通报, 2026, 65(03): 1-7+38.

[5] 石玮, 马树建. 人工智能驱动下数学赋能新工科建设路径研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

026, (01): 59-63.

[6] 焦德芳, 王杰. “三全五育”助力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探析[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03): 263-269.

[7] 张昆. 寻找合适认知出发点的教学设计策略[J]. 数学通报, 2026, 65(02): 31-34+42.

[8] 高超锋, 刘峥, 胡斌, 等.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成果转化效率评价方法及转化效率提升路径[J]. 科技管理研究, 2024, 44(14): 107-115.

[9] 王喆. 数字文明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与文化遗产创新研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6, 44(05): 108-113.

广西壮汉双语师范生定向培养政策的演进逻辑与优化路径

高超¹ 林明²

(1.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1, 2.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广东 湛江 524400)

摘要: 广西壮汉双语师范生定向培养政策是民族教育政策与乡村教师补充政策的重要交汇点, 亦是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本文以政策文本为基础, 结合项目多源数据, 系统梳理该政策从酝酿、确立、扩张、调整到深化升级的演进历程, 从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实践逻辑三个维度揭示政策演进的内在规律。研究发现: 十年间该政策已累计培养超1200名壮汉双语教师, 覆盖全区44个县(市、区), 为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输送了关键性师资; 但与此同时, 招生规模从2018年高峰期的184人骤降至2024年的8人、2025年仅5人, 反映出政策由“数量补充”向“质量提升”的结构性转型, 同时也暴露出设计张力、执行偏差、培养短板与保障不足等现实困境。基于此, 本文从优化政策设计、强化协同执行、优化培养体系、完善保障机制四个层面提出系统性优化路径, 以期统筹公共利益与个体诉求, 为新时代民族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与政策迭代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壮汉双语师范生; 定向培养; 政策演进; 制度逻辑; 优化路径

基金项目: 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广西大学生就业研究专项课题《广西壮汉双语师范生定向基层就业政策执行与就业质量跟踪调查研究》(课题编号: 2021ZJY1134)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23

The Evolutionary Logic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the Targeted Cultivation

Policy for Zhuang-Chinese Bilingual Normal Students in Guangxi

Chao Gao¹, Ming Lin²

¹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China

² Zhanjiang Central People's Hospital, Zhan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targeted cultivation policy for Zhuang-Chinese bilingual normal students in Guangxi is a key intersection of ethnic education and rural teacher supplementation policies. Based on policy documents and multi-source dat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olicy's evolution from gestation to upgrading, and analyzes its value, i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logic.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policy has cultivated over 1,200 bilingual teachers across 44 counties. However, enrollment has plummeted from a peak of 184 in 2018 to only 5 in 2025, signaling a structural shift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This transformation exposes dilemmas in policy design, implementation, cultivation, and safeguard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paths—improving policy design, enhancing collaborative implementation, optimizing the cultivation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safeguards—to balance public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inform

作者简介: 高超(1989—),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政策、教师教育;

林明(1977—), 男, 硕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医院教育管理、基层卫生人才培养;

通讯作者: 高超

future policy iterations in ethnic regions.

Keywords: Zhuang-Chinese bilingual normal students; targeted cultivation; policy evolution; institutional logic; optimization path

一、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与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三重时代背景叠加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广西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世居有壮、汉、瑶、苗等 12 个民族，壮语作为使用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在民族教育领域具有独特地位。自 201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人社厅、财政厅、编办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小学壮汉双语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的通知》(桂教民教〔2013〕6 号)，并于 2014 年正式招收首批 100 名定向师范生以来，该政策已逾十年。

十年间，该政策已累计为全区 44 个县（市、区）的壮汉双语小学输送超过 1200 名教师，有效缓解了基层双语师资短缺，成为我国民族地区双语师资定向培养的“广西样本”。然而，随着首批定向生服务期陆续届满，政策在微观执行层面逐渐暴露出服务期满教师去留两难、政策整体吸引力边际衰减（招生规模由 2018 年的 184 人收缩至 2024 年的 8 人、2025 年仅 5 人）、专科层次培养质量与现实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叠加 2024 年起培养层次正式由专科为主升级为本科为主的重大转型，该政策已进入需要系统反思与迭代的关键期。

（二）研究价值

从理论维度来看，将政策科学的演进分析框架引入壮汉双语师范生定向培养领域，有助于深化民族地区定向师范生政策研究，揭示其特殊的治理逻辑，并丰富公共政策学在民族教育领域的本土化应用。从实践维度来看，系统剖析该政策的演进规律与现实困境，能够为广西“十四五”收官与下一阶段民族教育规划、双语师资保障政策的优化迭代提供有针对性的决策参考，亦可为其他民族地区双语师资政策设计提供借鉴。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三种方法：一是政策文本分析法，以教育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及相关部门历年发布的双语教育与师范生定向培养相关政策文件为基础语料，涵盖桂教民教〔2013〕6

（一）研究缘起

号、桂教规范〔2016〕20 号、桂教民教〔2016〕10 号、桂教教师〔2021〕5 号、桂教民教〔2022〕9 号、桂教教师〔2024〕1 号等关键文件；二是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既有关于公费师范生、壮汉双语教学的学术成果与公开统计资料；三是历史分析法，通过 2014—2026 年的纵向时序梳理，探寻政策演进的阶段性特征与内在规律。

二、广西壮汉双语师范生定向培养政策的演进历程

梳理历史脉络是理解政策现状的前提。广西壮汉双语师范生定向培养政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双语教学倡导到专门师资培养制度化、从专科补充型到本科引领型的渐进演进过程。基于政策文本与招生数据的整体回溯，该政策可划分为五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

（一）萌芽期（1957—2012）：双语教育政策的奠基阶段

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以语言文字推广和传承为主，师资配套政策相对薄弱”。1957 年壮文方案正式公布，广西各地开始试点壮汉双语教学，这是壮汉双语教育的历史源头。1979 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召开，标志着“壮汉双计划”等双语教育政策在宏观层面的启动，是对 1957 年以来壮文试教传统的延续与制度化探索。2012 年，教育部等五部委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师〔2012〕9 号），明确支持民族地区定向培养双语教师，为广西后续政策提供了国家级依据。

然而，在此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广西尚未形成专门针对双语师资的“定向培养”政策。基层壮汉双语师资的来源，主要依赖于地方师范院校的常规培养输出以及对现有乡村教师的转岗培训，师资供需矛盾和队伍不稳定性问题逐步成为制约双语教育推进的瓶颈。

（二）确立期（2013—2015）：定向培养政策的制度化

面对基层双语师资断层的危机，政策由“教学指导”向“师资保障”发生实质性跨越。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人社厅、财政厅、编办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小学壮汉双语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的通知》（桂教民教〔2013〕6号），确立了2014—2018年每年从壮汉双语乡镇招收100名优秀毕业生、定向培养专科层次小学全科壮汉双语教师的核心制度安排，这成为该政策正式确立的标志性文件。

该阶段初步搭建了政策的核心制度框架：一是确立了定向乡镇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三定向”机制；二是明确了主体安排，初期由广西师范学院（现南宁师范大学）集中承担培养任务，学制设为两年，层次为专科；三是落实了配套保障，实行免学费、免住宿费及发放生活补助；四是规定了履约约束，毕业后定向到生源乡镇壮汉双语小学或教学点服务，首批服务期为8年。

（三）扩张期（2016—2020）：“十三五”规划下的体系化推进

随着政策的深入实施，初期制度设计的局限性开始显现，政策进入体系化推进与规模扩张期。2016年自治区同步出台《广西中小学教师培养“十三五”规划》（桂教规范〔2016〕20号）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汉双语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桂教民教〔2016〕10号），明确“十三五”期间培养500名壮汉双语师资的目标，标志着政策由单一文件推动转向系统性规划引领。

这一阶段呈现三大特征：一是培养质量的直接干预，2016年9月起培养学制从两年延长至三年，以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与教学胜任力；二是承接主体的多元化，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北部湾大学、玉林师范学院等多所院校相继加入，形成了多校协同的培养格局；三是招生规模波动扩张，2016年招收172人，2017年147人，2018年达到阶段性峰值184人，2019年145人，2020年159人，五年累计招生约807人，定向范围覆盖南宁、百色、崇左等25个壮汉双语教育实验县，其中边境县招生计划占比约30%。这一时期，政策与国家层面《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及《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实现了深度协同。

（四）调整期（2021—2023）：规模收缩与结构优化

进入“十四五”后，外部政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2021年自治区出台《关于实施新时期地方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的通知》（桂教教师〔2021〕5号），将壮汉双语师范生纳入“地方优师计划”统筹管理，政策进入结构性调整期。

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规模锐减与结构优化并行”：招生规模大幅收缩，2021年招生73人，较2020年减少超50%；2022年进一步降至36人；2023年仅25人，创下历史新低。规模收缩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专科层次的培养质量已无法满足壮汉双语教育升级需求，据自治区教育厅调研，专科师范生在教育科研能力、课程设计创新上与本科层次存在明显差距；二是民族地区师资需求已从“数量缺口”转向“质量缺口”，2023年广西壮汉双语小学师资合格率已达92%，但能独立开展双语课程研发的教师占比仅23%。与此同时，2022年起在南宁师范大学试点本科层次招生，启动“本专并行”探索，为后续全面升级积累经验。

（五）升级期（2024年至今）：本科层次跃迁与高质量发展导向

2024年是政策演进的又一里程碑。当年出台的《关于做好2024年地方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桂教教师〔2024〕1号）首次明确“小学教育（壮语文方向）”本科专业的单独招生计划（8人），并全面取消专科层次招生，这标志着广西壮汉双语师范生培养体系正式从“专科补充型”转向“本科引领型”。2025年继续招收5人，2026年延续小规模、高质量的本科招生格局。

这一阶段政策关注的重心发生根本性转移，从解决“招得来、培养好”的基础问题，转向“留得住、用得好、发展好”的质量与生态问题。其表现为：培养层次全面升级为本科四年制；承接主体聚焦南宁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两所核心院校；服务期由专科的8年调整为本科的6年；培养目标从“补充农村小学一线师资”跃升为“培养具备教育科研与课程开发能力的双语骨干教师”。学术界与决策层亦同步开始密集关注服务期满教师的流失率与职业发展通道，标志着政策正式进入以高质量为导向的深化调整期。

(六) 历年招生与培养概况

为直观呈现政策演进的轨迹，现将2016—2026年广西壮汉双语师范生招生与培养概况汇总如下表：

表1 2016—2026年广西壮汉双语师范生招生与培养概况

年份	招生人数	培养层次	主要培养院校	阶段特征
2016	172人	三年制专科	广西师范学院等	规模扩张起点；面向20县（市、区）
2017	147人	三年制专科	广西师范学院等	体系化扩展
2018	184人	三年制专科	多校协同	十年招生峰值；扩展至25县
2019	145人	三年制专科	多校协同	规模平稳
2020	159人	三年制专科	多校协同	“十三五”规划收官
2021	73人	三年制专科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等	结构性调整启动
2022	36人	专科+本科试点	南宁师范大學等	规模收缩；启动本科试点
2023	25人	本科为主	南宁师范大学	十年最低规模
2024	8人	四年制本科	南宁师范大学	全面升级本科；质量导向确立
2025	5人	四年制本科	南宁师范大学	精英化招生格局形成
2026	5人	四年制本科	南宁师范大学	巩固高质量发展格局

三、政策演进的内在逻辑

政策的流变并非随机，而是潜藏着深刻的价值诉求、制度转型与实践驱动。基于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维度的耦合分析，可以揭示其演进的深层机理。

（一）价值逻辑：民族教育公平与乡村振兴的双重诉求

定向培养政策承载着三重交织的价值诉求。

首先是民族教育公平维度。该计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衔接

——既保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又满足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旨在保障民族地区儿童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并通过双语教学传承壮族语言文化。

其次是乡村振兴维度。通过强制性的定向协议，为偏远乡村输送并稳定一批“下得去”的青年教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截至2026年，该计划累计已为44个县（市、区）的壮汉双语小学输送师资，边境县（如靖西、那坡、德保等）毕业生占比约60%，有效缓解了边境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师资困境。

最后是个体发展维度。免学费、免住宿费、发生活补助以及“带编入职”的承诺，为民族地区特别是乡村寒门学子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与体面就业的上升通道。政策演进的过程，实际上是文化传承、社会公平与个体发展这三重价值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协调张力的过程。

（二）制度逻辑：从行政推动到协同治理的转型

借鉴霍尔（P. Hall）的政策工具理论，该政策的演进呈现出清晰的工具转换轨迹：确立初期主要依赖“编制绑定”与“定向协议”等单一的强制性工具；随着演进，逐渐转变为融合津贴激励、能力建设与违约约束的混合型工具，违约成本由“退还公费费用并按50%缴纳违约金、并记入人事档案与社会信用体系”的复合机制所支撑。

在治理主体上，经历了从教育行政部门单向主导，向教育、人社、财政、编办多部门联动，再向“政（政府）、校（培养院校）、地（生源及就业所在地）”多元协同治理的转型。这一制度逻辑演变，折射出现代民族教育治理体系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刚性管控走向柔性引导的客观规律。

（三）实践逻辑：问题导向下的渐进式调整

政策的每一轮迭代均是对特定阶段现实问题的直接回应。例如，“学制从两年增至三年”是对基层学校反馈双语师范生“教学胜任力不足”的回应；“单一院校向多校扩容”是对民族地区双语师资供需矛盾持续扩大的回应；“2024年专科向本科全面升级”是对民族教育现代化对教师专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的系统性回应；而近年来开始关注“职后发展通道”，则是对首批履约期满教师高流失率焦虑的回应。政策演进呈现出经典的“遇到问题—政策回应—调整优化—面临新问题”的螺旋上升轨迹。

(四) 三种逻辑的耦合关系

价值逻辑为政策演进提供了宏观的“方向坐标”，制度逻辑构筑了政策运行的“结构框架”，而实践逻辑则充当了推动政策不断微调升级的“内生动力”。三者深度耦合，共同推动着广西壮汉双语师范生政策从解决“有没有”的温饱型政策，向追求“好不好”的发展型政策迈进——这一跃迁在2024年的本科升级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四、政策演进中的现实困境

尽管成效显著，但在多元诉求交织下，政策的执行系统仍面临诸多深层次的现实困境，这些困境也是下一阶段政策迭代必须直面的核心议题。

(一) 政策设计层面的张力

约束与期待的冲突。专科层次长达8年的服务期、本科层次6年的服务期及严格的地域限制，与青年教师个人在婚恋、职业发展、城市生活等方面的现实诉求产生强烈摩擦，“人在心不在”的隐性流失现象凸显。

退出机制的僵化。政策具有清晰的“准入门槛”，但缺乏弹性的“退出通道”。违约者除需退还已享受的全部公费费用外，还需缴纳费用50%的违约金，并被记入人事档案与社会信用体系，影响公务员报考、事业单位招聘、银行信贷等。高昂的违约成本不仅增加了师范生的心理负担，也导致部分留任教师产生消极态度。

招生规模与培养目标的失衡。2024年起本科层次每年仅招生5—8人，壮语听说能力达标且愿意扎根基层的考生本就稀缺，本科分数线又较普通小学教育专业高出约20分（2025年历史类录取分数线达535分），生源范围进一步收窄，长期来看难以满足民族地区可持续的师资需求。

(二) 政策执行层面的偏差

协同机制不畅。教育、人社、财政与编办在落实编制与待遇时，由于部门利益与行政流程差异，往往存在衔接壁垒，导致政策落地存在“时间差”——例如部分定向县曾出现“毕业入编延迟”“生活补助标准长期未调整”等问题（自2016年至今每月300元的补助标准始终未变）。

供需对接错位。培养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与用人地的实际教学需求（如具体的壮语方言差异、跨学科教学需求）存在信息不对称。约30%的毕业生入职后须同时承担2门以上课程的教学，而院校培养方案对“多科兼教”能力的训练仍显薄弱。

政策认知偏差。虎技能（2020）的研究发现，部分壮汉双语师范生在签订协议时对服务期细则、违约后果及基层环境全貌缺乏理性认知，政策评价虽倾向积极但认为政策不够明朗，这为日后的履约不稳定埋下隐患。

(三) 培养体系层面的短板

学科与资源匮乏。壮汉双语属冷门交叉领域，高校内部学科建设投入往往不足，专业梯队薄弱；本科升级后，“壮语语言学”等核心课程的高水平师资数量有限，且严重缺乏适应新时代需求的乡土化、地方化教材体系，部分教材编写仍处于试点阶段。

学习动力内耗。“免学费+包分配”的保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学生学业压力软化、竞争意识薄弱，产生群体性的“搭便车”心态。陈媛媛（2020）指出，“优待政策”使部分壮汉双语师范生成“60分等同于90分”的学业心理，学习倦怠现象较为明显。

实践教学的纵深不足。尽管“双导师制+双基地+双证书”的“三双”培养模式已具雏形，但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的协同深度、实习基地与高校教研的互动频率仍待加强，部分实习仍存在“走过场”现象。

(四) 保障机制层面的不足

待遇保障的地区差异。受制于各县（市、区）地方财政实力的差异，基层教师津贴的兑现程度参差不齐，部分边境县虽享有民族教师生活补贴，但补贴标准较低且增长缓慢。

职后发展“天花板”。尽管《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教育促进条例》规定民族双语教师可单独分组开展职称评审，但针对该群体职称晋升空间窄、继续教育机会少、跨区流动困难等问题，实施细则仍待完善。服务期满后的可持续发展通道（如学历深造、骨干培育、跨区交流等）尚未形成体系化的制度安排。

评估反馈闭环缺失。政策运行至今，尚缺乏由独立第三方介入的、系统性的追踪评价机制，对毕业生的职业流动轨迹、就业满意度、双语教学成效等关键指标缺乏官方的统计跟踪数据，影响了政策迭代的科学性。

五、政策优化路径

针对上述困境，需统筹考量公共利益与个体诉求，从四个维度对现行政策进行系统优化，推

动其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引领型”再迈进一步。

(一) 优化政策设计: 构建弹性化、阶梯化的制度框架

完善全流程制度安排。打破“一纸定终身”的刚性约束, 探索建立“准入—履约—退出—续约”的弹性机制。允许确有特殊困难者(如重大家庭变故、健康原因)通过合理梯度的违约金制度合法退出; 同时对主动续约服务者给予重奖(如增发服务期满奖励金、优先解决配偶就业等), 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体选择权。

巩固本科层次定位, 适度扩容招生计划。2024—2025 年本科层次仅招收 8 人、5 人, 规模过小不利于民族地区师资可持续供给。建议在保持本科层次质量底线的前提下, 逐步将年招生规模回升至 30—50 人区间, 并探索“本硕连读”“免试推荐研究生”等更高层次的培养路径, 适配新时代对双语骨干教师的需求。

(二) 强化协同执行: 构建政校地多元联动机制

打破部门壁垒。建议由自治区教育厅牵头, 建立包含人社、财政、编办、民语委在内的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 确保编制“池化”管理与资金按时足额拨付; 并适时调整生活补助标准——自 2016 年至今每月 300 元的补助标准已与物价水平脱节, 亟须建立动态联动调整机制。

搭建三方对接平台。建立“培养院校—生源地—用人学校”的信息互通机制。在招生环节, 强化基层学校对面试的参与度, 并将壮语方言适配纳入面试考核; 在入职前, 完善政策宣讲与知情同意制度, 消除信息盲区, 减少政策认知偏差。

(三) 优化培养体系: 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厚植学科与资源基础。加大对南宁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等核心院校壮汉双语相关学科的专项经费投入, 培育高水平教研梯队; 联合地方教育局开发标准化与乡土化相结合的教材、教法资源库, 系统编写适配各地壮语方言的双语教学案例集。

深化“三双”实践教学模式。扩大“双导师制+双基地+双证书”的“三双”模式在本科层次的覆盖深度, 要求校内导师每学期到实习基地听课不少于 2 次, 实施“置换顶岗”机制, 让在职双语骨干教师与高校教师进行流动培训, 实现“教学相长”。

重塑内生动力机制。引入淘汰与竞争机制, 创新教学评价; 同时强化职业信仰与民族文化自觉教育, 通过壮语经典诵读大赛、非遗进校园、民族文化调研等活动, 引导学生从“工具性从教”向“价值性从教”转变。

(四) 完善保障机制: 构建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

强化差异化激励。提高乡村双语教师的整体待遇标准, 并建立向艰苦边远地区倾斜的动态津贴调整机制; 探索设立“壮汉双语教师成长基金”, 对在民族文化课程开发、双语教学创新方面取得突出成绩者给予专项奖励。

拓宽职后发展通道。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教育促进条例》关于民族双语教师单独评审的规定, 设立专项职称评定通道与骨干教师选拔名额; 探索“县管校聘”框架下, 服务期满考核优秀者向县城中心校流动的畅通机制; 同时拓宽“免试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等学历深造路径。

建立追踪评估机制。引入独立智库或高校科研团队, 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定期评估与动态数据追踪, 重点关注招生质量、培养效果、就业满意度、流失率等关键指标, 形成政策制定的闭环管理。

六、结语

研究表明, 广西壮汉双语师范生定向培养政策在十年间经历了“萌芽—确立—扩张—调整—升级”五个演进阶段。其深层逻辑是价值诉求(公平与振兴)、制度演变(协同治理)与实践问题驱动的深度耦合。十年间, 该政策已累计培养超 1200 名壮汉双语教师, 覆盖全区 44 个县(市、区), 为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输送了关键性师资。

然而, 政策在设计张力、跨部门执行、高校培养质量与后期保障体系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 尤其是 2024 年起本科层次招生规模收窄至个位数的现实, 凸显了规模与质量、刚性与弹性、个体与公共三重矛盾。下一阶段的政策迭代, 必须超越单纯的人数扩张或单纯的精英化收缩, 统筹公共政策的刚性与个体发展的弹性, 通过“四位一体”的优化路径(优化设计、强化协同、提质培养、完善保障)实现高质量发展, 真正实现“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发展好”的政策初心。

参考文献:

- [1]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人社厅,财政厅,编办. 关于实施小学壮汉双语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的通知: 桂教民教〔2013〕6号[Z]. 2013.
-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中小学教师培养“十三五”规划: 桂教规范〔2016〕20号[Z]. 2016.
- [3]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汉双语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 桂教民教〔2016〕10号[Z]. 2016.
- [4] 国务院办公厅.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Z]. 2015.
- [5]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编办.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Z]. 2018.
- [6]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关于实施新时期地方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的通知: 桂教教师〔2021〕5号[Z]. 2021.
- [7]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关于做好2022年定向培养壮汉双语教师公费师范生招生工作的通知: 桂教民教〔2022〕9号[Z]. 2022.
- [8]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关于做好2024年地方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 桂教教师〔2024〕1号[Z]. 2024.
- [9] 刘慧. 广西壮汉双语师范生培养的现实困境与路径研究[J]. 民族教育研究, 2018(3): 65-71.
- [10] 袁善来. 壮汉双语定向师范生职业认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6): 78-85.
- [11] 江凤娟. 壮汉双语教学的政策演变与实践反思[J]. 广西社会科学, 2021(4): 152-158.
- [12] 李郭倩. 民族地区双语教师专业发展困境与对策[J]. 教师教育论坛, 2020(5): 22-28.
- [13] 麦凯. 乡村振兴背景下壮汉双语教育的价值重构[J]. 教育观察, 2022(7): 35-39.
- [14] 黄诗婷. 新媒体时代下壮汉双语师范生壮语写作教学策略研究——以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为例[J]. 创新教育研究, 2023(8): 156-162.
- [15] 韦兰明. 壮汉双语教育的多元功能及其实现路径[J]. 民族教育研究, 2014(3): 88-93.
- [16] 苏尚锋,常越. 地方公费师范生政策的制度逻辑与实践反思[J]. 教育研究, 2018(11): 34-40.
- [17] 刘全国. 地方公费师范生基层从教意愿及影响因素[J]. 教育发展研究, 2020(8): 42-49.
- [18] 吴东照.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实施十年: 回顾与展望[J]. 中国高教研究, 2017(9): 16-21.
- [19] 王智超. 地方师范生定向培养的政策张力与优化调适[J]. 教育科学, 2021(2): 28-34.
- [20] 商应美. 免费师范生基层就业状况及政策优化研究[J]. 教育研究, 2017(5): 86-92.
- [21] 陈振明. 公共政策分析[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22] 薛澜,陈玲. 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研究: 西方学者的视角及其启示[J]. 中国行政管理, 2005(7): 99-103.
- [23] 丁煌.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教育政策变迁研究[J]. 行政论坛, 2015(4): 69-74.
- [24] 顾明远. 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中的民族地区教育问题探讨[J]. 民族教育研究, 2014(6): 5-9.
- [25] Qiao X, et al. Rural Teacher Retention in China: The Role of Targeted Polic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21(83): 102-115.
- [26] 虎技能. 乡村定向师范生政策执行偏差的微观分析——以广西壮汉双语师范生为例[J]. 教师教育研究, 2020(2): 76-82.
- [27] 陈媛媛. 免费与内耗: 定向师范生学业动力的社会学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20(4): 57-64.
- [28] 林明. 广西壮汉双语师范生定向基层就业政策执行与就业质量跟踪调查研究[R]. 广西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 2021.
- [29] 腾星. 民族双语教育的概念辨析与理论建构[J]. 民族教育研究, 2012(1): 12-17.
- [30] 杨丽萍. 双语教育从工具向资源性转化的理论思考[J]. 民族教育研究, 2018(2): 45-51.

AI 赋能幼儿教师融合教育实践的个案研究

田俞茜¹ 何书瑶¹ 张家瑶¹ 郑萱琪¹

(1.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为解决融合教育中幼儿教师的困境, 本研究以 X 市 S 融合幼儿园两班教师为对象, 用观察法、访谈法开展 11 周研究 (3 周观察、5 周 AI 介入、3 周评估)。AI 从特殊儿童行为、集体活动、教学策略维度生成个性化策略, 评估显示正向强化等策略显著改善特殊幼儿问题行为与参与度, 缩小普特幼儿社交壁垒, 但受教师精力、家校协同制约。研究构建 AI 支持、教师主导的双驱动模式与“诊断-建议-实践”闭环, 为全纳教育提供实践范式。

关键词: 融合教育; 学前教育; 人工智能

基金项目: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项目 (202510718072)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24

AI Empowerment in Preschool Teachers' Inclusive Education Practice:

A Case Study

Tian YuQian¹, He ShuYao¹, Zhang JiaYao¹, Zheng XuanQi¹

1.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To solve preschool teachers' dilemmas in inclusive education, this study studied two classes' teachers in X City's S inclusive kindergarten via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for 11 weeks (3-week observation, 5-week AI intervention, 3-week evaluation). AI generated personalized strategies for special children's behaviors, group activitie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Evaluation showed such strategies as positive reinforcement improved special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s and participation, narrowed the social gap between typical and special children, but were limited by teachers' energy and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The study built an "AI-supported, teacher-led" dual-drive model and a "diagnosis-suggestion-practice" loop, offering a practical paradigm for inclusive education.

Keywords: Inclusive Education; Preschool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作者简介: 田俞茜 (2003-),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融合教育
何书瑶 (2004-),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融合教育
张家瑶 (2003-),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融合教育
郑萱琪 (2004-),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融合教育

一、问题提出

随着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要求,近年来融合教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2024年1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从法律层面强调要统筹推进融合教育发展[1]。国际层面,美国2001年出版了《早期融合教育:聚焦变革》,阐述美国过去15年融合教育的研究成就、政策举措等,并对未来发展作出规划[2]。但融合教育在推进中也存在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幼儿园教师习惯于传统的隔离式教学,难以及时转变自身教育观念并调整教学方法[3]。因此,当今研究应当聚焦教师在实施融合教育时的困境,探索解决这些困难的路径。

2022年教育部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指出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X市S幼儿园两个融合班级的教师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特殊儿童行为、集体活动、教师教学策略来发现教师具体需求,提供相应策略。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以AI为辅助工具,为两融合班级教师提供AI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应对特殊儿童行为、集体活动管理、教学策略三个维度。教师结合现实需求与AI生成策略匹配,运用于实际教育教学。再进行反馈,筛选出切实有效的策略,为普通幼儿教师开展全纳教育提供一个科学有效的实践范式。

(三) 研究方式

1. 观察法

研究过程持续11周,主要包括观察阶段(3周)、介入阶段(5周)与后效评估阶段(3周)。

A 班级

1. 观察阶段

(1) 特殊幼儿行为

日常行为中,A班的吉米对一日生活活动缺乏积极性。一旦佩戴足弓矫正器,就几乎拒绝所有跑跳活动,运动量严重不足。且对绘画和手工等手部精细操作有抵触情绪。他在集体教学中持续发呆、玩头发或衣服,几乎从不听讲和回答问题,专注力短暂且极易受干扰。

语言方面,吉米有效使用语言进行沟通的能力明显不足。从不主动回答问题或发起对话,语言表达多为零散的短语,难以清晰地表述自己的想法。并且他的倾听习惯薄弱,极易受到干扰。

教师要有利用数字技术分析解决教育问题的意识与能力[4]。这为解决融合教育开展困境提供了新思路。作为新时代的生产力,AI是教师数字素养的一部分,能帮助教师学习科学的融合教育策略,转变认知。Marino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将有可能显著改变特殊教育实践并引领特殊教育未来发展[5]。李晓芳等也提到AI技术是特殊学生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之应然之举[6]。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展开了从教师角度探索利用AI辅助全纳教育开展,解决教师在融合班级教育教学与管理中的困境的个案研究。

二、研究设计

观察法是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通过感官和辅助仪器,对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客观实物进行系统考察,获取经验事实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7]。本研究针对选取的两个融合教育班级进行了包括教育教学策略、特殊儿童行为和班级集体活动三方面的观察与记录,以了解教师的现实困境,生成个性化策略提供支持;策略落地后,本研究又进行了上述三个方面的相关实践效果的观察与记录。

2. 访谈法

“访谈”是一种研究性交谈,是研究者通过口头谈话的方式从研究对象那里收集第一手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8]。本研究针对融合班级管理情况、AI策略使用情况,向两个班级老师进行访谈和询问,以便随时获得资料。

三、研究过程与结果分析

情绪方面,吉米情绪极易波动,情绪表达方式较为简单,当其需求未被满足或利益被侵犯时,会出现吼叫的行为。情绪轨迹较为单一,经常会沉迷于自己的世界,通常会忽略外界的人或事。

社会交往中,吉米社会交往水平较低,偏好单独活动或仅与固定玩伴互动,缺乏集体意识。他常游离于集体外,在区域活动时极其抵触其他幼儿触碰自己的玩具,也基本不参与别的幼儿的游戏。

吉米的问题行为主要有吼叫和注意力不集中,其中吼叫行为更为突出,吉米每天基本上吼叫3次左右,每次持续时间在1分钟左右,而注意力不集中则主要体现在集体活动中。现对吼叫行为进行功能分析,同时检测环境中的不利因素,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吉米行为功能分析

事前刺激 (A)	行为表现 (B)	后果 (C)	行为功能 (F)
吃水果时, 吉米要求老师先分水果给自己但未被满足	持续吼叫	教师不予理睬, 同伴进行口头制止	获取实物或关注, 通过吼叫试图优先获得水果或引起老师注意
教师要求收区域, 吉米要结束他最喜爱的建构区游戏	大声吼叫并用手拍打积木	教师移走积木, 并要求他安静下来	回避任务, 通过吼叫拒绝服从指令, 试图逃避收区域
区域活动时吉米在建构区独自玩磁吸积木, 幼儿 A 想要加入吉米的游戏, 其同搭建积木	在幼儿 A 企图改变他的积木构造时大声持续尖叫	幼儿 A 停止行为, 教师 A 阻止吉米继续尖叫	逃避他人干扰, 维持游戏控制
集体游戏时, 教师多次向吉米发出参与活动的直接指令	大声吼叫, 身体后仰想远离集体	教师暂停口头要求, 暂时不再催促他	回避任务, 通过吼叫成功终止了被要求的活动

表 2 A 班教师教学策略记录表

幼儿行为	教师策略
时间地点:户外活动中回到教室 事件:幼儿 A 在户外活动中多次争抢其他幼儿的玩具, 总是发生争执	教师 A 回班后询问谁刚刚一直抢玩具, 并教育幼儿 A, “再好的朋友你一直这样对待他, 他也会有新的朋友, 要正确的对待朋友, 好好地和朋友玩。”
时间地点:教室集体教学活动中 事件:集体教育活动的主题是观察蚊子, 在课堂中幼儿偶然发现一只蚊子, 并用手捕捉到了蚊子, 其他幼儿纷纷围观。引起一阵课堂秩序混乱	教师 A 及时组织课堂纪律, 并让幼儿将捕捉到的蚊子放置矿泉水瓶中, 作为之后的观察样本
地点:户外、篮球与呼啦圈器械旁 事件:幼儿 C 在玩篮球和呼啦圈时, 偶然发现了一种新玩法并分享给老师	教师 A 及时回应并表扬幼儿 C, 根据幼儿 C 的随意游戏, 发起了竞赛游戏, 召集其他幼儿一起来玩游戏
时间地点:课堂开始前、教室 事件:户外活动中:有的幼儿总是被别的幼儿强行要走玩具	教师 A 教育特别乖巧听话的小朋友不要一味地答应别人的要求、可以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
时间地点:区域活动 事件:幼儿收区域时总是非常拖沓、慢, 只有少数幼儿会积极收区域, 大部分幼儿会抗拒逃避	教师 A 目前没有很有效的管理策略, 只是反复催促, 效果甚微。
时间:主班老师不在教室时 事件:幼儿不听副班老师的话, 不停的吵闹, 多次强调后仍无视副班老师	副班教师目前也没有很有效的管理策略

功能分析发现吉米的吼叫行为功能主要聚焦在回避任务和获取所需, 即用吼叫来表达情绪以及逃避任务。

(2) 集体活动

观察发现, A 班级户外活动有时缺乏包容性支持。例如教师常组织的“高处跳至垫面”一类的高强度跳跃练习, 幼儿吉米因佩戴足弓矫正器无法参与, 多数时间只能独自进行静态游戏或观察同伴。这不仅限制了幼儿自身的发展, 也造成了“事实上的隔离”。

A 班级部分幼儿在区域活动时, 呈现出活动范围狭窄、兴趣刻板的特点。具体表现为长期重复选择某一特定区域(如吉米在 11 周的观察中只玩建构区)。教师进行引导后依旧改变甚微。这限制了幼儿自身经验的获取, 也对教师实施个性化、多样化的教学带来挑战。

A 班级的特殊幼儿与普通幼儿之间存在显著的社交壁垒。二者之间缺乏主动交流意愿, 少有的互动也常因社交技能不足而爆发矛盾, 如吉米曾因争抢玩具而咬伤同伴。

(3) 教师教学策略

针对班级教师在班级管理中使用的教学策略，总结出以下典型案例，结果如表2所示。

2. 介入阶段

该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前期观察所记录总

结的融合班级问题及教师的班级管理困难，利用AI工具构建支持系统，为教师生成解决策略。教师依旧主导教学设计，AI仅作为辅助支撑供教师筛选使用，研究者同步观察。如下，图3为AI生成的A班个性化策略。



图3 A班级AI介入策略图

3. 评估阶段

将AI生成策略集投入使用5周后，研究者进行了为期3周的后效评估，并对A班教师进行深度访谈。

A班教师认为AI生成融合教育支持策略在整体上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其中以“正向强化”和“同伴支持”为代表的策略在实践中被证实对特殊幼儿的行为引导与情绪支持效果最显著。但策略落实也存在诸多问题，在班级人数较多的情境下，教师难以持续为特殊幼儿提供个别支持。此外，尽管策略提及了家校协同，但在如何深化家园配合的具体操作上，仍有待加强。实践表明，“以鼓励为主”和“适当调整期望”是文档策略之外的重要补充。教师还提出，若AI能提供更多真实案例能更有利于教师对策略的理解和实施信心，提高策略利用率。

此外，研究者观察发现，吉米的吼叫和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明显改善，吼叫次数由一天三次显著降低到一天一次，课堂参与度大幅提高。在集体活动中，促进区域轮换策略和同伴接纳策略成效显著，班级集体活动氛围较好。在特殊幼儿支持策略部分，研究者观察到教师精力有限，无法完全依据生成策略对特殊幼儿进行信号暗示等

个性化帮助，还需对已有策略进行完善。

B 班级

1、观察阶段

(1) 特殊幼儿行为

行为方面，小曹存在攻击、破坏等挑战性行为，运动能力有明显优势但精细动作发展滞后。具体表现为无故摔、扔玩具，攻击教师和同学；粗大动作灵活，能自如跑跳却在绘画活动中技巧生疏，线条无序。

语言方面，小曹能理解简单指令并回应。他能够通过短句表达基本需求，但缺乏逻辑梳理和复杂表达能力。在情绪激动、失控时能使用“我生气了”等语句发泄。但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和表达存在问题，回答问题时易偏离方向，偶尔发出尖锐叫声影响班级活动。

情绪方面，小曹在特定场景下易出现情绪失控。面对不感兴趣的、被控制行动或遭同伴拒绝时，会通过尖叫、破坏物品等方式宣泄情绪，犯错后面对教师询问会以微笑回应拒绝回答。

社会交往，小曹能与主班老师及少数同伴建立友好关系，但缺乏恰当的社交技能。他只与班里一对双胞胎同伴相处融洽，不愿回应配班老师和保育老师，集体活动参与度低，还会用攻击性

行为表达对部分幼儿的喜爱。

问题行为方面, B 班小曹的问题行为主要为间歇性破坏、攻击行为, 其中破坏行为更为突出, 小曹在一日活动中随机出现无理由破坏性行为。在观察期间, 他曾出现两次完全失控状态。而攻击性行为因为干预治疗等, 多出现在破坏行为被制止之后, 频次较低。对攻击性、破坏性行为进行功能分析, 同时检测环境中的不利因素, 结果如表 4 所示。

通过功能分析, 小曹攻击、破坏性行为的功
能主要聚焦在表达不满等反抗性情绪态度, 同样也体现出其缺乏正确的社交手段和能力, 选择的维护关系的方式不恰当。

(2) 集体活动

通过观察发现, 大部分时间 B 班级的集体活
动能够顾及不同水平幼儿。例如, 在绘画活动中,

教师会根据肢体发展水平将幼儿进行不同人数的
分组创作, 以避免肢体控制能力较弱幼儿碰撞到
同伴导致绘画活动受阻。

但是, 该班集体教学活动有时缺乏包容性的
环境。在多次的集体教学活动中, 活动内容难度
下限较高, 对于发展较弱的幼儿来说, 很多活动
难以深度参与。

此外, B 班级的特殊幼儿与普通幼儿之间存
在社交困难。但班级内一位发展水平较弱的幼儿,
因生活技能水平与小曹相近, 但情绪更稳定, 和
小曹成为了好朋友。二人在交往中有强烈的互助
意愿, 为彼此的发展带来了正向影响。

(3) 教师教学策略

针对班级教师使用的教学策略进行观察, 总结
出以下典型案例, 如表 5 所示。

表 4 小曹问题行为记录及行为分析

前事刺激 (A)	行为表现 (B)	后果 (C)	行为功能 (F)
户外建构活动时, 小曹 拿着大积木追逐打 闹, 被制止	面带微笑, 并不断用脚踢踹破 坏其他幼儿的建构成品	教师将其带离班级幼儿 活动区域, 小曹拉住教师 衣角	表达不满, 通过破坏行为 回应制止, 希望继续之前 活动
独自区角活动搭建雪花 片	突然情绪失控, 将所有玩具扔 到地上后, 举起椅子砸地	破坏性行为后出现攻击 性行为, 教师将其带至教 导主任处解决	宣泄情绪或回避挫折, 通 过破坏行为表达活动中的 挫败感或失控情绪
集体教学活动前准备 时, 小曹与同桌坐在一 起玩闹	率先出现攻击性行为, 拍打同 伴手臂, 在同伴还手后, 笑着 锤击同伴头部	教师将其带离教室, 进行 单独教育	维持互动, 通过攻击行为 延续与同伴的互动模式

表 5 B 班教师教学策略记录表

幼儿行为	教师策略
地点: 户外活动区 事件: 户外大型积木活动时间, 小曹始终不能静下来搭 建积木, 而是不断拿着积木和他在班级中亲近的同伴 (发展迟缓小孩) 追逐玩闹。	不断用语言指令, 警告小曹不认真搭建后果; 当小曹的 跑闹行为仍未停止时, 副班教师将小曹的双手紧紧握 着, 强制小曹和她面对面交流, 并询问其能否正常参与 活动以及是否知道自己不对。
地点: 户外活动区 事件: 小曹被老师制止, 小曹却未体会到教师对其行为 的不悦, 而是面带微笑地攻击教师并随机踢打身边同学	将小曹带离班级幼儿活动区域, 强势地告知小曹其攻击 性行为的不对和危害, 后续主班教师利用先前和小曹建 立的特殊互动方式进行教育。

幼儿行为

教师策略

地点：室内小型积木搭建区域

事件：在活动时，小曹开始能够安静玩耍拼图块，一段时间后突然无理地摔扔玩具，后续行为越发不受控，将所有桌子上的物品全部摔到地面并开始摔椅子，出现攻击行为

地点：室内空间

事件：在活动过渡环节，小曹与旁边两人打闹，突然将椅子后移，然后又拍打了右前方同伴的手臂，在该同伴回击一下之后，小曹用力拍打同伴脑部，并向教师说明是对方先打了他的手臂。

地点：室内

事件：小曹洗完手没有用毛巾擦干，而是把水故意甩到别人身上。其他幼儿几次表达抗议无效后，向老师告状。

副班教师先是放任小曹摔东西，并让其他幼儿离小曹远一点；后续进行控制，将他拉到远离桌子的空间，说明行为不良；在小曹攻击教师后，副班教师崩溃，求助保育老师管理班级其他幼儿，将小曹单独带走。

副班教师将小曹带离班级，要求其在班级外冷静并解释其行为是否正常，副班教师陪伴在旁；在之后，副班教师要求小曹数数到 100，就让其回到教室

将小曹拉到一边，反问其对错，在小曹意识到这件事不对，但依旧不肯承认错误说明自己会改正后，老师说明他如果他不改正他的行为老师会把同样的行为实施到他身上。

2. 介入阶段

介入阶段为 B 班级生成个性化策略，如图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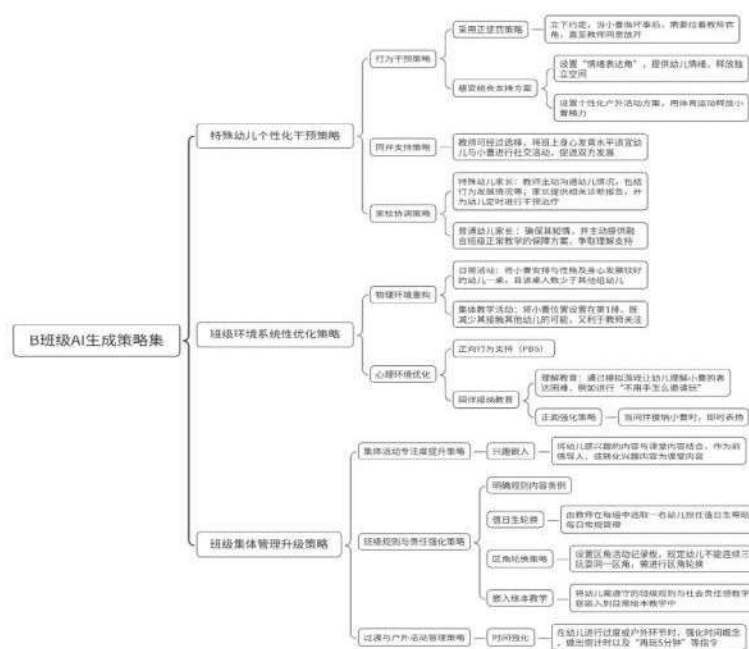


图 6 B 班级 AI 介入策略图

3. 评估阶段

研究者对 B 班级进行了观察并对教师展开了访谈，了解策略有效度。

观察发现，小曹的问题行为有了一定改善。小曹遇到问题时，虽然依旧有较大情绪波动，但能用语言和教师进行沟通，寻求帮助。对其他幼儿他也表现出友好态度，关系有所缓和。在集体

教学活动中，教师更多考虑到了低水平幼儿，设置了能力下限较低的梯度活动任务，让幼儿都能深入参与其中。规则类绘本教学也让教师在班级管理节省了一定精力。对于各类突发情况教师也有了更多元化的应对策略。

访谈中，B 班级教师提到 AI 生成策略带来了新的教学灵感。且班级内三位老师对生成方案感

受都有所不同。配班和保育老师对 AI 生成策略表现出更强烈的认同感。主班老师因小曹本身对她有较高信赖则对 AI 生成策略使用较少。老师们还提出, 希望未来 AI 能够生成更加节约精力的科学策略, 提升班级管理效率。改善当前师生比下融合教育极度消耗教师精力, 影响教育教学效果的问题。

四、建议提出

(一) 强化教师 AI 素养, 构建园所支持体系

AI 技术与以往信息数字技术存在显著差异。它不仅能够执行指令, 还具备类人化的特性, 有高度可扩展性和自适应性[9]。在使用 AI 时, 教师不仅需要掌握基础操作技能, 还需理解其决策逻辑、协作潜力及伦理规范[10]。在此背景下, 园所应承担起教师专业发展的责任, 逐步构建适应融合教育教师的 AI 素养发展体系。并在伦理规范下将各类策略投入实践。这样可以促进更具创新性的决策与教学实践[11]。

(二) 深化 AI 教育适配研究, 完善个性化支持策略

深入开展 AI 技术的教育适配性研究, 开发针对不同类型教师的个性化教学支持[12]。AI 技术的迭代速度快, 部分 AI 技术的教育应用存在着教育支持难落地、不适配的情况。为提高 AI 技术对融合教育教师的支持, 应不断深化 AI 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提高针对不同类型的教育情境下的策略支持。

(三) 坚守人本教育理念, 平衡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

幼儿园教师应建立边界意识, 理性评估 AI 技术在教育情境中的适切性, 灵活调整教育教学策略[13]。反思性实践和情境学习可以增强教师批判性和整合 AI 策略的能力[14]。AI 只是提高教育有效性的辅助工具, 而师幼间的情感交流仍是儿童社会性与情绪能力发展的核心。教师需通过自身真切的观察与互动, 精准把握幼儿情感需求, 实现技术与人文的有机融合。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EB/OL].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411/t20241108_1161363.html. (2024-11-08)[2025-11-9].

[2] GURALNICK M J. Early childhood inclusion: focus on change[M]. Baltimore, MD: Brookes, 2001: 3-35.

[3] 张俊韬, 雷江华. 理想与现实之间: 学前教育发展困局何以突破? ——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J/OL]. 当代教育论坛, 1-12[2025-11-09].

[4] 教育部关于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302/t20230214_1044634.html. (2022-12-02)[2025-11-9].

[5] Marino M T, Vasquez E, Dieker L, et al.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pecial education technology[J].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Technology, 2023(3): 404-416.

[6] 李晓芳, 雷江华. 人工智能赋能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J]. 残疾人研究, 2023, (03): 58-65.

[7] 裴娣娜.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M].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 第 184 页.

[8]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9] Lu J, Yan Y, Huang K, et al. Do we learn from each other: Understanding the human-AI co-learning process embedded in human-AI collaboration[J]. Group Decision and Negotiation, 2025(2): 235-271.

[10] 郑勤华, 覃梦媛, 李爽. 人机协同时代智能素养的理论模型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 2021 (1): 52-59.

[11] Daly S J, Hearn G, Papageorgiou K. Sensemaking with AI: How trust influences Human-AI collaboration in health and creative industries[J].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Open, 2025, 11: 101346.

[12] 陈昱蓉. 人工智能辅助技术在融合教育中的应用探索[J]. 现代特殊教育, 2025, (19): 23-24.

[13] 幼儿园教师需具备反思 AI 应用边界的意识, 理性评估技术在特定教育情境中的适切性, 灵活调整教育教学策略。

[14] Ahumada, Francisco Sereño. "La formación docente en la era digital: práctica reflexiva, aprendizaje situado e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Ensayos Pedagógicos 19.2 (2024): 4.

虚拟仿真赋能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 理论逻辑与实现机制

李霞¹, 丁惠炯^{2*}

(1.包头技师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30; 2.梧州学院管理学院, 广西 梧州 543000)

摘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学校教育的重大使命, 但当前教育实践面临认知浅表化、情感疏离化与实践虚化三重困境。虚拟仿真技术凭借沉浸性、交互性与构想性特征, 为突破上述困境开辟了新的技术路径。然而, 既有研究多囿于“工具赋能”的浅层论述, 尚未系统揭示虚拟仿真促进认同建构的内在机理。本研究立足具身认知、空间生产与叙事转化三重理论视角, 提出“虚实互构”分析框架: 具身认知维度揭示虚拟仿真通过多感官沉浸与身体参与实现从“离身认知”到“具身认同”的转化; 空间生产维度阐明虚拟场域作为“第三空间”使共同体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得以重新生产; 叙事转化维度论证虚拟仿真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可感知的微观体验叙事。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感知激活—情境体验—反思内化”三重实现机制, 并从顶层设计、课程开发与评价创新三个维度构建实践路径, 以期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南。

关键词: 虚拟仿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学校教育; 虚实互构; 具身认知

基金项目: 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基于LOS理念的应用型地方高校“公共管理类”人才培养模式——公共管理专业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设计与实现(编号: 2025JGB401);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课题: 虚拟现实技术在室内设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编号: NZJGH2023034)。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25

Theoretic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Virtual Simulation

Empowering School Education for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Xia Li¹, Hui-Jiong Ding^{2*}

1. Baotou Technician College, Baotou, Inner Mongolia, China, 014030;

2. School of Management, 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Guangxi, China, 543000.

Abstract: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is a major mission of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yet current educational practice faces a triple dilemma of superficial cognition, emotional alienation, and virtualized practice.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with its characteristics of immersion, interaction, and imagination, opens up a new technological pathway for overcoming these dilemmas.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remains largely confined to the superficial discourse of "tool empowerment" and has not systematically reveal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how virtual simulation promotes identity construction. Grounded in the trip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embodied cognition, spatial

作者简介: 李霞, 女, 教育硕士, 包头技师学院高级讲师, 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学、管理哲学;

丁惠炯, 男, 管理学博士, 梧州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体制创新、管理哲学。

通讯作者: 丁惠炯

production, and narrative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virtual-real mutual construction." The embodied cognition dimension reveals that virtual simulation achiev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disembodied cognition" to "embodied identity" through multi-sensory immersion and bodily participation; the spatial production dimension elucidates how the virtual field, as a "third space," enables the reprod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historical memory and cultural symbols; the narrative transformation dimension demonstrates how virtual simulation converts grand narratives into perceivable micro-experiential narrative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oposes the tripl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perception activation - situational experience - reflective internalization" and constructs practical pathways from three dimensions: top-level desig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innovation,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for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Keywords: virtual simulation;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school education; virtual-real mutual construction; embodied cognition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与社会凝聚的精神根基,其培育与铸牢是任何多民族国家教育体系都无法回避的根本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将其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赋予学校教育以新的战略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学校教育指明了根本遵循。学校作为国民教育的主阵地,承担着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归属感与责任感的核心任务,其教育成效直接关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然而,一个亟待正视的学术追问是:学校何以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传统教育模式遭遇认同建构的深层困境时,教育实践应当如何寻求范式突破?

审视当前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践样态,三重现实困境日益凸显。其一,认知浅表化问题突出。传统课堂讲授偏重知识灌输与概念记忆,学生往往停留于对“五个认同”“四个与共”等命题的表层理解,难以深入体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生成逻辑与当代实践意义。课堂上,学生可以熟练复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定义,却难以阐释这一概念与自身生命经验的内在关联。其二,情感疏离化现象普遍。宏大叙事的抽象性与学生生活经验的有限性之间存在显著张力,学生难以在情感层面产生对共同体

命运的深切共鸣。当教师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时,学生虽能理解其事实,却往往缺乏“感同身受”的情感卷入。其三,实践虚化困境亟待突破。教育过程缺乏有效的情境支撑与行为引导,认知认同与行为意向之间的转化通道尚未有效打通,学生“知而不信、信而不行”的知行脱节现象较为突出。三重困境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共享着同一深层症结:传统教育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离身化”的认知实践,它将认同建构简化为符号操作,剥离了身体体验、情境感知与意义反思等关键环节,使共同体认同沦为“关于共同体的知识”而非“对共同体的认同”。

虚拟仿真技术的兴起为突破上述困境开辟了新的可能。其沉浸性使学习者得以“身临其境”地感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弥补了传统教育“去情境化”的不足;交互性使学习者能够主动参与意义建构而非被动接收信息,回应了“离身化”认知的局限;构想性使学习者能够在虚拟空间中创造性地想象共同体的未来图景,拓展了认同建构的想象空间。近年来,虚拟仿真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已从知识习得型、技能训练型逐步拓展至情感体验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了技术支撑。然而,既有研究多囿于“工具赋能”的浅层论述,或聚焦于虚拟仿真的技术特性与教学设计,或停留于应用案例的经验描述,尚未深入追问虚拟仿真何以能够促进认同建构、其内在机理如何运作、认同转化的传导链条由哪些环节构成等根本性问题,更缺乏整体性的理论框架来阐释“技术—体验—认同”之间的传导逻辑。

基于此,本文提出“虚实互构”的分析框架,

试图回答以下核心问题：虚拟仿真赋能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理论逻辑是什么？其内在实现机制如何运作？如何在实践层面构建有效的教育路径？选择具身认知、空间生产与叙事转化三重理论视角，并非任意组合，而是基于对认同建构逻辑的递进式追问：认同何以在身体层面发生（具身认知）？认同何以在空间中建构（空间生产）？认同何以通过叙事转化（叙事转化）？三个视角分别从身体、空间与意义三个维度回应了“技术—认同”传导逻辑的核心环节。本文由此出发，系统阐释虚拟仿真赋能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理论逻辑与实现机制，以期为该领域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提供参照。

二、虚拟仿真赋能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时代诉求

（一）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现实困境

当前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虽然在政策推动下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践层面仍面临深层次的结构困境。第一，教育方式的“离身化”倾向。传统教育模式以语言符号为中介，强调概念记忆与逻辑推理，学生以“旁观者”姿态接受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知识，身体与感知被排除在认知过程之外。这种“离身化”教育方式难以激活学生的具身体验，导致认同建构缺乏感知根基。正如梅洛-庞蒂所言，“身体是我们拥有世界的总体媒介”，认同的形成离不开身体的参与与感知的激活。当教育过程剥离了身体维度，认同便沦为抽象的符号操作，难以深入学生的生命经验。

第二，教育内容的“去情境化”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根植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与社会实践，但传统教育往往将丰富的历史场景压缩为干瘪的文本叙述，将鲜活的民族交往故事简化为抽象的理论命题。学生无法“回到”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现场，无法“走进”茶马古道的商贸盛景，无法“亲历”各民族共同抗日的烽火岁月，因而难以在情境中生成对共同体命运的深切体认。情境的缺失使教育内容成为悬浮于生活世界上空的抽象话语，难以与学生的经验世界建立实质性联结。

第三，教育评价的“单一化”局限。当前评价体系偏重认知维度的纸笔测试，忽视情感认同与行为意向的测量，导致教育评价无法全面反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真实效果。学生

可能在试卷上准确写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定义，却在情感层面缺乏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在行为层面缺乏促进民族团结的主动实践。评价的单一化不仅遮蔽了教育的真实成效，也反向塑造了“重知轻情”“重记轻行”的教育导向，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陷入“知行脱节”的困局。

（二）虚拟仿真技术嵌入学校教育的必然趋势

虚拟仿真技术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产物，其嵌入学校教育具有深刻的技术逻辑与时代必然性。从技术演进维度看，虚拟仿真经历了从桌面式虚拟现实到沉浸式虚拟现实、从单机交互到多人协同、从视觉主导到多感官融合的发展历程，技术成熟度与教育适配性持续提升。特别是近年来，随着5G通信、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加速融合，虚拟仿真在教育场景中的应用门槛显著降低，应用范围从高等教育逐步向基础教育延伸，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条件。

从教育变革维度看，虚拟仿真技术契合了当代学习科学从“离身认知”向“具身认知”的范式转型。具身认知理论主张，认知并非大脑的孤立计算，而是身体、环境与心智的耦合过程，感知—行动循环形成认知的基本机制。虚拟仿真通过构建沉浸式、交互式的学习环境，使学习者能够以身体参与的方式完成认知活动，实现了从“关于世界的知识”到“在世存在的知识”的认识论转变。这一转变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具有特殊意义——共同体认同的形成不仅需要认知层面的理解，更需要身体层面的体验与情感层面的共鸣，虚拟仿真恰恰为这种“具身性认同”提供了技术可能。

（三）二者耦合的时代逻辑

虚拟仿真与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耦合，并非简单的技术嫁接，而是具有深层的时代逻辑。从需求侧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亟须突破“离身化”“去情境化”“单一化”的困境，实现从知识灌输到体验生成、从抽象认知到具身认同、从单向传递到交互建构的范式转型。虚拟仿真的沉浸性、交互性与构想性特征，恰好回应了这一转型的核心需求。从供给侧看，虚拟仿真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已从“效率导向”的知识传授拓展至“体验导向”的情感培育，其技术优势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的内在诉求形成高度契合。

更为深层的是,二者的耦合反映了数字时代认同建构方式的根本变革。在传统社会中,共同体认同主要通过面对面交往、仪式参与与集体记忆传承来建构;在数字时代,虚拟空间日益成为认同建构的新场域,“虚拟在场”成为共同体参与的新形式。虚拟仿真不是对现实教育的简单模拟,而是建构了一种“虚实互构”的认同生成新范式——虚拟体验与现实实践相互渗透、相互增强,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知”到“信”再到“行”的深层转化。这一“虚实互构”范式,正是本文分析虚拟仿真赋能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核心理论框架。

三、虚拟仿真赋能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理论逻辑

(一) 具身认知:从“离身认知”到“具身认同”的认识论转向

具身认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科学的重要范式转型,其核心主张在于:认知并非大脑的孤立计算,而是身体、环境与心智的动态耦合过程。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身体主体”概念,强调身体是认知的原始维度,一切意识活动均以身体图式为基础。莱科夫与约翰逊在《具身哲学》中进一步论证,人类的概念系统根植于身体经验,抽象思维通过身体隐喻得以建构。在此基础上,4E认知范式——即具身的(embodied)、嵌入的(embedded)、延展的(extended)与生成的(enactive)认知——从更宏观的视角揭示了认知的生理依赖性、环境嵌入性与行动生成性,为理解虚拟仿真中的认知过程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

将具身认知理论引入虚拟仿真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分析,可以揭示一条从“离身认知”到“具身认同”的转化逻辑。传统教育模式下,学生以“离身”方式接受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知识——阅读文本、记忆概念、理解命题,认知过程与身体经验相分离。虚拟仿真则通过多感官刺激(视觉、听觉、触觉)与身体交互(手势操作、空间移动、物体操控),使学习者以“具身”方式参与认知活动。当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走进”敦煌莫高窟感受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壮美,“参与”茶马古道的商贸活动体验各民族经济互补的紧密,“亲历”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体悟各民族共赴国难的团结,认知过程便不再是对抽象符

号的被动接受,而是身体在情境中的主动建构。这种从“离身”到“具身”的转向,使共同体认同从“关于共同体的知识”转化为“在共同体中的体验”,为认同的深层内化奠定了感知基础。

(二) 空间生产:虚拟场域中的认同建构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理解虚拟仿真赋能认同建构提供了另一重视角。列斐伏尔提出,空间并非先于人类实践的“容器”,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空间本身即是被生产出来的。他将空间生产划分为三个维度:空间实践(感知的空间)、空间的表象(构想的空间)与表征性空间(生活的空间),三者构成辩证统一的空间三元辩证法。这一理论启示我们,虚拟仿真所建构的学习环境并非中性“容器”,而是承载着特定价值取向与认同逻辑的“生产性空间”。

虚拟仿真所建构的虚拟场域,可以理解作为一种“第三空间”——既非纯粹的物理空间,也非纯粹的想象空间,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建构的“表征性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文化符号与身份认同被重新生产与再建构。具体而言,虚拟仿真通过数字建模与场景重构,将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等承载共同体记忆的物质空间转化为可进入、可交互的虚拟空间,使学习者得以“在场”感知这些空间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同时,虚拟仿真通过叙事设计与交互机制,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实践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虚拟实践,使学习者在“虚拟行动”中完成对共同体身份的意义建构。

尤为重要的是,虚拟场域中的空间生产具有“跨时空性”——它能够打破物理空间的限制,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空间的民族交往场景进行跨时空重组,使学习者在同一虚拟空间中“穿越”不同时代、“游历”不同地域,从而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连续性与空间整体性的直观感知。这种跨时空的空间生产,是传统教育手段无法实现的,也是虚拟仿真赋能认同建构的独特优势所在。它使安德森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获得了一种可感知、可体验的“虚拟具象化”形态,学习者不再是共同体叙事的旁观者,而是通过空间实践成为共同体意义的共同生产者。

(三) 叙事转化:宏大叙事的微观体验

叙事是认同建构的基本方式。麦金太尔在《追寻德性》中指出,人是“讲故事的动物”,自我

认同通过叙事得以建构与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同样依赖于叙事——关于共同起源、共同历史、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的宏大叙事。然而，宏大叙事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概括性，其与个体生活经验之间存在显著的距离。传统教育往往直接呈现宏大叙事，要求学生从宏观层面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四个与共”等命题，但由于缺乏微观体验的中介，学生难以将宏大叙事与自身生命经验建立联结，导致认同停留于认知层面而难以深入情感与行为层面。

虚拟仿真为宏大叙事的微观转化提供了独特的技术路径。通过虚拟仿真，宏大叙事可被转化为三种微观体验叙事：一是“个体生命叙事”——学生以特定历史人物的视角进入虚拟场景，如以文成公主的身份经历入藏之旅，以马帮成员的视角行走茶马古道，在个体生命的微观叙事中感受民族交往的真实与温度；二是“日常生活叙事”——学生进入虚拟的各民族日常生活场景，参与节庆活动、体验民俗文化、品尝民族饮食，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叙事中感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交融性；三是“情境抉择叙事”——学生在虚拟的道德困境或历史关头中做出抉择，如在虚拟的抗日战争场景中选择参与支前行动，在情境抉择的微观叙事中体验共同体命运的休戚与共。三种微观体验叙事共同构成了从宏大叙事到个体认同的转化通道，使共同体意识从“被讲述的故事”转化为“被经历的故事”，从“外在的话语”转化为“内在的体验”。

四、虚拟仿真赋能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现机制

基于上述三重理论逻辑，本文提出虚拟仿真赋能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感知激活—情境体验—反思内化”三重实现机制。三重机制并非线性递进，而是螺旋交织、相互增强的动态过程，共同推动共同体认同从浅层认知向深层内化转化。

（一）感知激活机制：多感官沉浸与身体参与

感知激活是虚拟仿真赋能认同建构的逻辑起点。传统教育主要依赖视觉与听觉两种感官通道，信息输入的单一性限制了认知的丰富性与深度。虚拟仿真则能够同时激活视觉、听觉、触觉乃至嗅觉等多感官通道，形成“感觉替代”与“感觉增强”效应。当学生在虚拟环境中看到丝绸之路

的壮阔景观、听到驼铃与市井的声效、触摸到虚拟织物的纹理质感，多感官的协同激活使认知过程从“关于世界的表征”转化为“在世界中的存在”，为认同建构提供了丰厚的感知基础。

身体参与是感知激活的关键维度。虚拟仿真中的身体参与包括三个递进层次：第一层次是“感知性参与”，即学习者通过头部转动、视线移动等方式感知虚拟环境；第二层次是“操作性参与”，即学习者通过手柄操作、手势识别等方式与虚拟对象进行交互；第三层次是“行动性参与”，即学习者在虚拟环境中完成具有目标导向的行动任务，如协作搭建蒙古包、共同完成民族服饰制作等。三个层次的身体参与逐层深入，使学习者从虚拟环境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从“被动感知”转变为“主动建构”。身体参与的程度越深，认同建构的效果越显著。

（二）情境体验机制：跨时空在场与共情生成

情境体验是虚拟仿真赋能认同建构的核心环节。虚拟仿真的情境体验具有“跨时空在场”的独有特征——学习者能够“穿越”到不同的历史时空，“进入”不同的地理场景，“参与”不同的社会实践，形成一种“虚拟在场”的体验。这种跨时空在场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使学习者得以“亲历”那些无法在现实课堂中再现的历史场景与社会实践。当学生“站在”长征路上感受红军与各族人民的鱼水深情，“坐在”围炉旁聆听各民族老人讲述共同的记忆，“走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田野上见证各民族共同奋斗的成果，时空的距离被虚拟在场所消弭，历史的隔膜被情境体验所打破。

共情生成是情境体验机制的核心目标。共情不同于同情，它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设身处地”的理解与“感同身受”的共鸣。虚拟仿真通过“角色代入”与“视角转换”两种路径促进共情生成。角色代入是指学习者以特定角色的身份进入虚拟情境，如以藏族学生的身份体验内地西藏班的生活、以维吾尔族青年的身份参与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在角色扮演中理解他者的处境与感受。视角转换是指学习者在同一虚拟情境中切换不同角色的视角，如从汉族商人、蒙古族牧民、回族手工业者等不同视角审视同一段历史，在视角的多元转换中形成对共同体内部多元性与互依性的深层理解。两种路径相互补充，共同推动学习者从“自我中心”走向“他者理解”，从“族群认同”走向“共同体认同”。

(三) 反思内化机制：意义建构与认同升华

反思内化是虚拟仿真赋能认同建构的深化环节。感知激活与情境体验为认同建构提供了感知基础与情感动力，但如果缺乏反思性加工，体验可能停留于“感动”层面而难以转化为稳定的认同结构。反思内化机制的核心在于引导学习者对虚拟体验进行有意识的意义建构，将情境中的感性体验提升为理性的认同自觉。

反思内化包括两个相互交织的过程：一是“叙事性反思”，即学习者通过讲述自己在虚拟情境中的经历与感受，将碎片化的体验整合为有意义的叙事，在叙事中完成对共同体身份的自我确认。教师可组织“虚拟体验分享会”，引导学生讲述“我在虚拟世界中看到的民族交融”“我作为某角色的感受”等，通过叙事将个体体验与集体记忆建立联结。二是“批判性反思”，即学习者对虚拟体验本身进行审视与追问，如“虚拟体验与现实实践有何关联？”“虚拟在场能否替代现实行动？”“技术中介是否会扭曲对共同体的理解？”。批判性反思不仅深化了认同的理性基础，也培养了学习者的媒介素养与批判意识，有助于规避技术沉浸可能带来的认同浅表化风险。

认同升华是反思内化的最终指向。通过叙事性反思与批判性反思的双重加工，学习者的共同体认同经历三个层级的升华：从“认知认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与命题）到“情感认同”（对共同体产生归属感与自豪感），再到“行为认同”（在实际行动中践行共同体价值）。三个层级并非简单的线性递进，而是相互渗透、螺旋上升的动态过程。虚拟仿真的独特价值在于，它通过“感知—体验—反思”的完整链条，打通了从认知到情感、从情感到行为的转化通道，使共同体认同得以在“虚实互构”中实现深层内化。

五、虚拟仿真赋能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 顶层设计：构建“虚实融合”的教育体系

虚拟仿真赋能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首先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构建“虚实融合”的教育体系。当前，虚拟仿真在教育中的应用多为“点缀式”“项目式”的局部探索，缺乏系统性的顶层规划与制度保障。构建“虚实融合”的教育体系，需要在以下三个层面协同推进。

第一，政策制度层面。教育行政部门应将虚

拟仿真纳入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整体规划，制定专项政策文件，明确虚拟仿真在教育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实施与评价考核中的定位与功能。同时，建立虚拟仿真教育资源的准入标准与质量评估机制，确保虚拟仿真内容的政治性、科学性与教育性。第二，资源建设层面。应依托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等平台，系统开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虚拟仿真资源库，涵盖历史场景重现、文化体验互动、社会实践模拟等多种类型，形成覆盖不同学段、不同主题的资源矩阵。资源开发应注重历史真实性与文化多样性的统一，避免对民族文化的刻板化呈现与碎片化拼贴。第三，师资培训层面。应将虚拟仿真教学能力纳入教师培训体系，提升教师运用虚拟仿真技术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专业素养，培养一批既懂民族理论又掌握虚拟仿真技术的复合型教师队伍。

(二) 课程开发：打造“情境—体验—反思”教学链

课程是虚拟仿真赋能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核心载体。基于前文提出的“感知激活—情境体验—反思内化”三重机制，本文构建“情境创设—沉浸体验—反思内化”三阶教学链，为课程开发提供实践框架。

第一阶“情境创设”：教师根据教学目标与内容，选择或设计虚拟仿真情境。情境创设应遵循三项原则：一是真实性原则，虚拟情境应基于历史事实与文化真实，避免虚构与歪曲；二是代表性原则，虚拟情境应选取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场景，如文成公主入藏、郑和下西洋、抗日战争等；三是适切性原则，虚拟情境的复杂度与难度应与学生的认知水平相匹配，避免因情境过于复杂而影响学习效果。第二阶“沉浸体验”：学生进入虚拟仿真情境，通过多感官感知与身体交互完成沉浸式学习。教师应设计具有目标导向的体验任务，如“在虚拟丝绸之路中完成一次跨文化商贸活动”“在虚拟抗日战争场景中参与一次支前行动”，使学生的体验具有方向性与深度性。同时，教师应关注体验过程中的“情感事件”——那些引发学生强烈情感反应的瞬间，如看到各民族共同抗敌的场景时的震撼、体验民族文化交融时的感动，这些情感事件是认同建构的关键触点。第三阶“反思内化”：体验结束后，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反思性学习活动。反思

活动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叙事性反思(撰写虚拟体验日志、进行小组分享)、批判性反思(开展主题辩论、撰写批判性论文)、创造性反思(设计虚拟仿真改进方案、创作跨文化艺术作品)。通过反思,学生将虚拟体验中的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同,将个体体验与集体记忆建立联结,实现共同体意识的深层内化。

(三) 评价创新:建立“认知—情感—行为”三维评价体系

评价是教育过程的“指挥棒”,评价方式的创新直接关涉虚拟仿真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际效果。当前评价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重知轻情”“重记轻行”,无法全面反映认同建构的多维性与动态性。本文提出建立“认知—情感—行为”三维评价体系,以回应虚拟仿真教育评价的特殊需求。

认知维度评价关注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知识的理解深度与结构化程度。虚拟仿真情境下的认知评价不应局限于纸笔测试,而应充分利用虚拟仿真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记录学生在虚拟情境中的信息搜索路径、交互选择策略与知识应用表现,形成过程性认知评价。情感维度评价关注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自豪感与责任感的生成状况。情感评价可采用虚拟情境中的生理指标监测(如皮肤电反应、心率变化等)与体验后的情感量表测量相结合的方式,同时重视学生在虚拟体验中的情感表达(如叙事中的情感词汇、分享中的情感语调)作为评价依据。行为维度评价关注学生在现实情境中践行共同体价值的意向与行动。行为评价应追踪学生虚拟体验后的行为变化,如跨民族交往的主动性、民族文化学习的积极性、促进民族团结的实际行动等,通过行为观察、同伴评价与自我报告等方式进行综合评估。

三维评价的关键在于“虚实贯通”——虚拟情境中的表现与现实情境中的行为应相互参照、相互印证。虚拟仿真中的认知表现与情感反应为现实行为预测提供了参考依据,而现实行为表现则为虚拟体验的实效性提供了验证证据。通过“虚实贯通”的三维评价,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评估虚拟仿真赋能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真实效果,为教育改进提供科学依据。

六、结语

虚拟仿真赋能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深刻的范式变革。本文提出的“虚实互构”分析框架,试图超越既有研究“工具赋能”的浅层论述,从具身认知、空间生产与叙事转化三重理论视角揭示虚拟仿真促进认同建构的深层逻辑。研究表明,虚拟仿真通过感知激活、情境体验与反思内化三重机制,打通了从“离身认知”到“具身认同”、从“抽象理解”到“情境体验”、从“宏大叙事”到“微观体认”的转化通道,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与实践路径。

当然,本文的研究亦存在一定局限。其一,本文以理论阐释为主,尚未通过实证研究验证“虚实互构”框架的解释力与“三重机制”的运作效果,未来研究应采用准实验设计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其二,虚拟仿真赋能认同建构并非没有限度——技术沉浸是否会导致“虚拟依赖”而削弱现实行动?算法驱动的内容呈现是否会窄化对共同体的理解?这些问题有待批判性审视,未来研究应深入探讨虚拟仿真的边界与风险。其三,不同学段、不同民族地区的学生在虚拟仿真体验中的认同建构路径可能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应关注群体差异与情境特异性,构建更加精细化的教育方案。尽管如此,本文所构建的“虚实互构”框架为理解虚拟仿真与共同体认同之间的深层关联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思路。

参考文献:

- [1] VARELA F J, THOMPSON E, ROSCH E.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172-180.
- [2]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叻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22.
- [3]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 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85-102.
- [4]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33-68.
- [5] 麦金太尔.追寻美德[M]. 宋继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24:145-168.
- [6]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15-130.
- [7] 丁惠炯,程曼曼,王贤.新时代铸牢大学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探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8):91-93.

[8] 李德有,王安若,李凌霞.生成式 AI 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机制及 风 险 防 控 [J]. 黑 龙 江 民 族 丛 刊,2026,(3):30-37+154.

[9] 李雄,孙路遥.虚拟仿真教学的内涵、设计及应用[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9(06).

[10] 逯行,朱陶,徐晶晶,张丽萍.高校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的基本问题与趋势[J].现代教育技术,2021(12).

[11] 汤显峰,沈丽燕,董榕,杨玉辉,张宇燕.基于云渲染的 VR/AR 智慧教室的设计与应用[J].现代教育技术,2021(05).

[12] 张敏,文福安,刘俊波.高校虚拟仿真教学环境构建逻辑探讨 [J]. 实 验 技 术 与 管 理,2023,40(03):1-6.

数字营销视域下品牌管理课程教学优化研究

张琬玥¹

(¹ 淮北理工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 数字营销业态下品牌运营逻辑发生全面迭代, 高校品牌管理课程需对接市场需求完成教学体系的适配性调整。本文首先梳理数字营销融入品牌管理课程的核心内涵与耦合逻辑, 明确课程优化的核心导向是在保留传统品牌理论内核的基础上补充数字实操类内容; 再从内容、场景、评价三个维度剖析当前课程存在的适配性痛点; 最终围绕内容重构、场景升级、方法创新、评价优化四个层面提出可落地的优化路径。相关调整融合了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工具, 能够有效缩小高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错位, 帮助学生搭建完整的品牌运营知识体系, 提升职业适配能力与核心就业竞争力。

关键词: 数字营销; 品牌管理课程; 教学优化; 人工智能; 应用型人才培养

基金项目: 淮北理工学院 2025 校级质量工程项目“品牌管理”(编号: 2025xAljy22)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26

Research on Teaching Optimization of Brand Management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Marketing

Wanyue Zhang¹

¹ Huaib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bei,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digital marketing landscape, the logic of brand operation has undergone comprehensive iteration, and university brand management courses need to align with market demands to achieve adaptive adjustments in the teaching system. This paper first clarifies the core connotation and coupling logic of integrating digital marketing into brand management courses, and identifies that the core orientation of course optimization is to supplement digital practical content while retaining th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brand management. Then,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adaptive pain points of the course from three dimensions: content, scenario, and evaluation. Finally, it proposes actionable optimization paths centered on content restructuring, scenario upgrading, method innovation, and evaluation optimization. The relevant adjustments integrate AI-assisted teaching tools, which can effectively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niversity talent cultivation and market demands, help students build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system of brand operation, and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adaptability and cor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Keywords: Digital Marketing; Brand Management Course; Teaching Optimiz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Cultivation

作者简介: 张琬玥(1997—), 女,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数字营销、社交媒体消费者行为、品牌传播与用户冲动购买决策研究;

通讯作者: 张琬玥

引言

工商管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始终需要锚定产业端的实际需求调整教学体系。品牌管理作为市场营销专业的核心课程，其内容设置与教学模式直接影响学生的职业适配能力。当前数字经济业态下，品牌运营逻辑已从传统线下场景延伸到数字全链路，对从业者的数字传播、用户运营、数据研判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品牌管理课程体系难以适配新的人才培养需求。因此，对品牌管理课程的适配性优化路径展开探讨，能够为高校工商管理类专业的教学内容迭代提供可参照的落地思路。本次研究以品牌管理课程中“品牌传播管理”板块为样本，面向市场营销专业本科大三学生的教学场景开展具体优化设计，所有调整路径均以轻量落地为核心原则，无需额外投入过多教学资源。同时，课程优化中引入了人工智能辅助分析工具（如用户评论情感识别、品牌声量预测模型），以提升教学内容的实时性与互动性。

一、数字营销视域下品牌管理课程的核心内涵

（一）数字营销融入品牌管理课程的核心特征

基于数字营销天然具备的实时性、交互性及数据化属性，其融入品牌管理课程的核心特征体现在内容维度的拓展上。该拓展打破传统品牌管理课程偏重经典理论梳理的固化框架，把当下品牌运营中适用的数字传播逻辑、用户关系维护逻辑及品牌价值量化逻辑纳入内容体系，契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对工商管理类专业强化市场适配性教学内容供给的相关要求。从实践维度看，实时性可以让教学内容的更新节奏对接市场端品牌运作的实际变化；交互性能够为教学过程中围绕品牌全链路运营的探讨提供支撑载体；数据化能够为实践环节的效果判定提供可参照的具象维度。上述特征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例如利用 AI 对品牌传播数据进行实时聚类分析，帮助学生在课堂上快速识别用户反馈模式。该模式的基础边界始终锚定品牌管理的核心理论框架，仅把数字营销的相关属性作为内容与实践环节的补充优化工具。严宇慈在数字营销课程教学设计研究中提出，课程内容应设置“基础理论模块 + 平台技能模块 + 综合实训模块”的递进式架构，以项目驱动和案例教学引导学生实现从知识输入到能力输出的转化^[1]。

（二）数字营销融入品牌管理课程的耦合逻辑

从人才培养目标匹配的角度看，工商管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核心是输送符合产业发展要求的品牌运营人才。数字营销的核心特性融入品牌管理课程，契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要求的强化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导向，能够把学科理论传导和数字时代的专业能力培育做深度融合。结合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现实，品牌全链路运营逻辑已发生迭代，品牌方对从业者的能力要求不再局限于传统品牌理论的掌握，更要求其具备数字传播、用户运营、数据化价值研判等综合能力。数字营销相关内容融入品牌管理课程，能够搭建起理论学习和产业实际需求之间的衔接通道，缩小高校人才能力供给与市场端需求之间的错位。王云在对高职市场营销专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中指出，专业课程内容必须随产业数字化进程动态调整，否则人才培养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的鸿沟将持续扩大^[2]。如后文表 1 所示，这种内容缺口具体体现在多个教学维度上。

二、当前品牌管理课程的教学适配性痛点

（一）品牌管理课程内容的适配性不足

现有品牌管理课程的内容设置大多仍围绕工业时代的经典品牌理论框架展开，核心内容偏向传统线下场景下的品牌定位、品牌资产累积、线下渠道传播、品牌延伸等方法，对数字环境下品牌运作涉及的算法推荐逻辑下的精准触达、私域运营中的用户长期维护、品牌数字资产的量化测算、内容平台的品牌内容运营等相关内容涉及较少。结合数字经济下品牌运营的实际需求，当前课程内容体系与市场端人才能力要求之间存在明显缺口，具体对比见表 1。

表 1 传统品牌管理课程与数字营销需求的内容缺口对比表

对比维度	传统品牌管理课程内容占比 (%)	数字营销视域下市场需求内容占比 (%)	内容缺口值 (%)
品牌定位方法	82	27	55
品牌传播路径	76	21	55
用户关系维护	19	72	53
品牌价值测算	22	68	46
品牌危机处置	71	29	4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23-2024 年主流招聘平台（前程无忧、智联招聘）中品牌运营岗位技

能要求统计整理。

鉴于数字营销背景下品牌全链路运营逻辑已发生明显迭代,课程内容层面的适配性不足直接影响学生知识结构的完善度。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往往对传统品牌理论的掌握程度较高,但对数字场景下的品牌运营方法熟悉程度较低,很难快速适配品牌方的实际工作要求。郑芳舒在市场营销基础课程的混合式教学实践中也注意到这一问题^[3]。这种内容偏差会进一步拉大高校人才培养供给与市场人才需求之间的错位,使得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需要花费较多时间补充数字品牌运营知识,无形中增加了品牌方的人才培养成本,降低了岗位适配效率。

(二) 品牌管理课程场景的交互性不足

当前品牌管理课程的教学大多依托常规线下教室完成,核心场景聚焦于理论知识点的单向传导,很少搭建适配数字营销逻辑的品牌运营模拟场景。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围绕数字品牌运作的交互多停留在理论观点的零散探讨层面,难以形成体系化的实践交互训练。现有教学场景对数字品牌运营相关的功能覆盖存在明显缺口。

结合数字品牌运营的实操需求,现有教学场景既无法为学生提供直观感受算法推荐下品牌精准触达逻辑的载体,也无法支撑学生开展私域用户运营维护的实操训练。学生对数字品牌资产测算的相关知识点仅停留在公式记忆层面,很难通过场景化的交互演练完成熟练应用。沈奕辰在新媒体技术与数字营销课程教学的研究中提出,新媒体技术融入教学的关键价值在于提供高仿真模拟环境^[4]。王禹心则从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与课程改革的关系角度指出,管理类通识课程若长期脱离实操场景,学生对数字化管理工具的运用和平台化运营的思维方式难以真正建立^[5]。为此,后文将提出基于 AI 辅助的模拟场景升级方案。

(三) 品牌管理课程评价的导向性不足

现有品牌管理课程的评价体系大多将终结性笔试成绩作为核心考核依据,部分院校即便设置了过程性考核环节,占比也普遍低于总成绩的三成。笔试内容侧重传统品牌理论知识点的记忆及线下品牌运作案例的书面分析,几乎没有针对数字品牌运营实操能力的考核,整体评价导向更偏向理论掌握程度的判定,难以对学生的数字传播实操、用户运营实践及品牌数字资产测算等核心能力形成客观评判。这种导向偏差与缺乏 AI 驱

动的过程性数据采集工具也有关系。

三、数字营销视域下品牌管理课程的优化路径

(一) 内容重构, 植入数字营销品牌运营模块

课程内容重构是适配数字营销视域下品牌管理课程教学需求的核心基础。需在保留传统品牌管理理论体系内核的前提下,围绕数字环境下品牌运营的实际逻辑调整内容模块设置方向,实现经典理论传承与前沿实操方法植入的有机衔接。具体而言,针对品牌管理课程中“品牌传播管理”板块,将原有传统线下品牌传播内容压缩至三成,剩余七成分配给数字品牌定位、社交媒体品牌传播、用户品牌资产运营三类新增模块。数字品牌定位模块涵盖算法推荐逻辑下的用户画像描摹、垂直赛道品牌差异化定位等内容;社交媒体品牌传播模块补充主流内容平台的品牌内容创作逻辑、公域流量投放规则、社会热点联动方法等;用户品牌资产运营模块涵盖私域场景下的用户分层运营、品牌数字资产测算维度、用户正向口碑引导等内容。此外,引入 AI 辅助内容生成工具(如智能文案、用户评论情感分析)作为实操教学的补充,帮助学生理解算法对品牌传播的干预机制。调整后的整体内容框架见图 1。



图 1 数字营销视域下品牌管理课程内容框架图

(二) 场景升级, 搭建数字营销品牌模拟场景

数字品牌运营实践能力的培育需要依托具象化的实操场景完成认知转化。现有常规线下教学场景很难承载数字传播逻辑下的品牌全链路运营训练需求,依托现有成熟实训资源搭建适配性模拟场景是填补教学功能缺口的高效路径。面向市场营销专业本科大三学生,在品牌管理课程的新媒体品牌传播教学过程中,将高校已普遍配置的

营销实训软件作为核心载体, 仅需对软件内的参数模块微调, 植入算法推荐规则、内容平台流量分发逻辑、用户互动反馈机制等核心要素。同时, 加入 AI 模拟用户行为模块——由人工智能扮演不同画像的虚拟消费者, 对学生的品牌传播方案产生差异化的互动反馈, 使模拟场景更具动态真实性。课程设置模拟本土大众消费类品牌新媒体账号运营的专项训练, 涵盖品牌传播方案设计、内容选题策划、公域流量投放策略制定、用户评论响应、效果复盘等完整链路。模拟场景的参数贴合主流内容平台的实际运营规则, 让学生能在接近真实的环境中调整传播参数, 直观观测用户触达量、互动转化率、品牌好感度变化。这种轻量化搭建方式降低了实践教学资源投入门槛, 帮助学生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可落地的实操能力。

(三) 方法创新, 引入项目式实践教学模式

小体量项目式教学方法能够搭建理论知识与产业真实需求之间的转化通道, 将学生的被动知识接收转化为主动的问题解决能力培育。该方法以轻量适配为核心原则, 不需要对接复杂的产业合作资源, 仅依托真实市场主体的实际运营需求即可完成教学设计。结合品牌管理课程中新媒体品牌传播板块的教学内容, 选用本地经营超过三年、布局三家及以上线下门店、尚未搭建系统化新媒体传播矩阵的茶饮品牌作为项目载体。学生以三至四人为单位完成分组, 结合前期学习的数字品牌定位、社交媒体品牌传播及用户品牌资产运营等知识点, 完成品牌核心消费群体画像描摹、新媒体传播核心定位确定。各组需完成完整的品牌传播方案设计, 涵盖内容平台内容风格设定、月度传播选题规划、热点联动方向、公域流量投放预算分配、用户评论响应机制及私域引流路径等, 同时明确可量化的效果判定维度。在方案优化阶段, 鼓励学生使用 AI 工具 (如 ChatGPT、文心一言) 生成备选文案, 并通过模拟场景中的 AI 虚拟用户进行 A/B 测试, 对比不同策略的效果差异。整个项目设计以真实品牌现状为依托, 保留足够创作空间, 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可落地的方案设计能力。

(四) 评价优化, 建立全过程多元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作为教学环节的导向性支撑, 其权重结构与考核维度的设置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重心及教师的教学内容排布。面向数字品牌运营相关能力的培育需求, 评价体系的优化需向过程性考核倾斜, 覆盖实践全流程的能力表现判定。针对品牌管理课程中新媒体品牌传播板块, 将过程性评价占比设置为总成绩的 60%, 终结性评价占

比 40%。过程性评价维度涵盖项目方案设计质量、模拟场景实操表现、小组协作贡献度三类核心板块。其中, 模拟场景实操表现可引入 AI 辅助评分——系统自动记录学生在模拟运营中的参数调整次数、策略迭代逻辑及效果提升幅度, 生成客观数据供教师参考。项目方案设计质量围绕数字品牌定位的适配性、内容平台传播策略的合理性、效果判定维度的可量化程度设置评分细则; 小组协作贡献度结合分工记录及成果汇报中的内容输出质量进行差异化评分。终结性评价调整为传统品牌理论与数字品牌运营知识点各占 50%, 减少纯记忆类题目, 增加结合实际品牌运营场景的分析题。同时把过程性评价的评分节点拆解到项目设计、实操训练、成果汇报各环节, 学生能及时获得能力反馈并调整学习重点。如前文所述, 该体系能够相对全面地反映学生综合能力水平,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实践训练, 逐步形成适配市场需求的品牌运营核心能力。

结语

品牌管理课程的教学迭代是一个长期动态调整的过程, 需要始终对接产业端的实际变化调整内容与模式, 不能脱离品牌管理的核心理论框架盲目求新。本次提出的优化路径立足现有高校普遍具备的教学资源基础, 在保留经典品牌理论传承的前提下, 完成数字品牌运营相关内容的植入与实操环节搭建, 并有机融入了人工智能辅助工具, 能够在不额外增加教学负担的前提下提升课程的市场适配性。后续可结合品牌运营业态的变化, 持续调整内容模块与实训场景设置, 进一步完善全过程评价体系, 逐步搭建更贴合产业需求的品牌管理教学体系, 为社会输送更多符合数字时代要求的复合型品牌运营人才。

参考文献:

- [1] 严宇慈. 大学数字营销教学的课程设计与实践 [J]. 山西青年, 2025 (04): 196-198.
- [2] 王云. 高职市场营销专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J].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 38 (02): 29-33.
- [3] 郑芳舒. 数字化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研究——以“市场营销基础”课程为例 [J]. 教师, 2024 (36): 96-98.
- [4] 沈奕辰. 新媒体技术在高校数字营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J]. 秦智, 2025 (06): 117-119.
- [5] 王禹心. 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下管理类通识课程教学改革策略研究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 (04): 98-100.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詹榕榕¹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国际学研究采用 SATI 在教育数字化推进的时代背景下, 人工智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既是现代教育技术演进的必然趋势, 也是思政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瞻性方向。其通过重塑互动协同的教学理念、拓展智能学习载体、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实施精准化个性施教, 推动思政教育从传统单向灌输转向动态体验与精准滴灌, 显著提升育人精度与有效性, 同时赋予教育深厚人文关怀。然而, 二者融合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 体制机制滞后, 缺乏统一数据规范与健全责任机制; 技术存在局限, 易忽视人的感性需求且难以适配思政教育的复杂人文属性; 伦理风险凸显, 数据隐私泄露与师生主体地位弱化问题突出; 教师数字素养不足, 制约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对此, 需通过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创新技术供给、强化伦理规约、开展教师智能技术培训, 实现技术与教育的辩证统一, 切实发挥人工智能赋能价值, 助力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关键词: 人工智能; 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路径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27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athways of Empow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anRongrong¹

¹Affiliatio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dvancing digital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provides key support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ut also a forward-looking direction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reshaping the philosophy of interactive and collaborative teaching, expanding intelligent learning platforms, integrat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delivering precise, personalized instruction, AI driv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shift from traditional one-way indoctrination to immersive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targeted cultivation. It greatly improves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while infusing it with profound humanistic care. Howeve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still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re backward, unified data standards and robust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remain absent; technological limitations may overlook the emotional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make it hard to accommodate the complex humanistic trai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minent ethical risks arise, including data privacy violations and the erosion of teacher and student roles; and the inadequate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hinder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we need to refin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upgrade technical support, reinforce ethical standards and provide teachers with training on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his will realiz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fully tap into AI's empowering value, and advanc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al Path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当今时代,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产物,正在不断重塑人类对宇宙、生命以及自身前途命运的理解,深刻变革着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也将肩负铸魂育人使命的思想政治教育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历史关口。目前,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尚处于探索初期,其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方面仍有待深入研究和实践。因此,明确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价值,针对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策略和建议,才能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人工智能为思想政治教育赋能,不仅在技术层面上提供了数据驱动和智能决策的手段,更在理念上推动了教育模式的根本转变。为现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注入了新活力,使得课堂教学从单向灌输逐步转变为个性化、交互化和精准化的教学模式,进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

(一) 重塑理念,引发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机

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革新了现有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思想政治教育在过程、方法及成果运用层面均得到了丰富,但思想政治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价值观塑造为核心的本质属性和育人价值并未发生改变。具体看来,人工智能从教学逻辑、体验维度和变革动力三个层面重塑了教育理念,为思政教育注入全新活力。

一方面,教学模式从“单向灌输”的传统讲授转变为“双向赋能”的互动协同。人工智能技术打破了课堂的时空限制及信息传递壁垒,不再局限于教师输出、学生承接的单向模式,而是构建起师生共建、生生互助的协同学习生态。例如部分高校依托虚拟现实(VR)技术打造“红色研学虚拟课堂”,还原长征途中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重要历史场景,学生通过虚拟角色参与历史事件讨论,教师则借助系统实时生成的互动数据(如发言频次、观点倾向、情感反馈),精准判断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理解程度,及时将讨论焦点从“事件回顾”引导至“精神传承”,旨在以

沉浸式互动深化学生对理想信念的认知。同时,在线讨论平台、智能问答系统及延展知识扩充等工具的应用,也让学生能够随时分享观点、提出疑问、补全谱系,真正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探究者”。

另一方面,教学方式从“书本静态”理论讲授转变为“场景动态”体验实践。借助多媒体、增强现实(AR)等技术,人工智能将抽象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具象化内容,让知识由书本走向现实。比如在讲解“乡村振兴”这一时代议题时,通过AR技术将浙江“千万工程”、陕西袁家村等典型案例的产业发展数据、村容村貌变迁、村民生活改善等内容,转化为三维动态模型,学生通过手机扫码即可“置身”乡村场景,直观观察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的运作模式,甚至能与虚拟的村干部、村民“对话”了解政策落地过程。这种“理论+实景”的体验式教学,有效弥补了抽象理论与现实可感的距离,帮助学生形成更高层次理论认知与情感共鸣。

与此同时,新时代学校能够依托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深度践行“人工智能思维”——即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以个性化、精准化、动态优化为准则,打破传统“一刀切”的教育惯性,激活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内驱力。例如学校可通过智能平台收集学生对思政课程模块的偏好数据、学习进度数据及掌握度数据,结合专业背景、兴趣方向及掌握程度,动态调整教学内容与资源推送。面向理工科学生增加“科技伦理与家国情怀”“大国重器背后的精神力量”等专题;面向文科学生强化“文化自信与国际视野”“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引领”等内容,让思政教育更加贴合学生需求,最终使思想政治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焕发出更具体、更可感、更有温度的生机。。

(二) 拓展载体,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智能转型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突破了传统思政教育以课堂、教材为核心的单一载体局限,构建起“线上+线下”“技术+场景”的多元载体体系,为思政教育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坚实路径支撑。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打造了“数智驱动”的教学辅助体系,大幅提升教学筹备与实施的效率。借助大数据技术,教育者不仅能采集受教育者的课堂出勤、作业完成

等基础数据,更能深度捕捉其思想动态与行为特征,例如学生参与“四史”学习活动的频次、线上思政论坛的发言倾向、对社会热点议题的评论立场、课后答疑中暴露的认知困惑等。通过搭建集数据采集、分析、可视化于一体的大数据平台,教育者可通过实时数据看板直观掌握学生思想变化趋势:若数据显示某班级学生对“共同富裕”议题的理解存在偏差,可立即调整后续课程中案例的选取;若发现部分学生参与线上讨论积极性低,可通过平台推送个性化话题邀请,如结合学生专业推送“科技工作者如何践行报国情怀”。这种动态化的信息处理模式,既优化了信息收集的全面性与时效性,也让教育者的教学决策更具针对性,有效降低了多元信息获取与应用的难度。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习者提供了“随时随地”的智能学习生态,推动学习场景从“固定课堂”向“泛在学习”延伸。翻转课堂模式下,学生可提前通过教师上传至智能平台的思政微课视频完成预习,并在平台留言区标注疑问,教师则根据预习数据在课堂上聚焦共性问题展开深度讲解;慕课平台则打破了校际壁垒,学生可自主选修国内重点高校的优质思政课程,并通过平台内置的章节测验、讨论区互动巩固学习效果。以“学习通”为代表的智能学习工具,更实现了“学-练-测-评”的闭环:学生可通过平台完成思政实践活动打卡、参与实时 quizzes(课堂小测),还能借助平台的AI答疑功能,在课后非教学时间获取即时解答,如深夜提问“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AI助教可结合案例给出基础解析,同时标注需教师深化讲解的难点。这些智能载体的应用,不仅促进了思政教学内容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更让学生从“被动听课”转向“主动探索”,显著提升了学习积极性与参与感,最大化释放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价值。

(三) 整合资源,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共享平台

确立教育目标、填充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式、运用教育载体,均离不开充足且优质的教育资源支撑,而人工智能恰好为思政教育资源的“破壁整合”与“高效共享”提供了技术解决方案。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打破地域、校际、学段间的资源壁垒,将分散的优质资源转化为可流通、可复用的数字化资产,进而构建起“开放性、共享性、精准化”三位一体的新型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借助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思政教育资源的供给范围得到极大拓展:从内容类型上,既涵盖重点高校的优质思政课程录像、资深教师

的教学设计方案,也包括红色文化资源、行业实践资源;从供给主体上,除了各级各类学校,政府部门、红色场馆、企事业单位均可通过共享平台贡献资源,形成“多方共建、优势互补”的资源生态。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术为资源开放共享与高效利用提供了关键支撑。各级各类学校可依托大数据、云计算、5G、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这些优质资源进行“标准化处理-分类化储存-精准化推送”的全流程改造:通过大数据分析区域内学校的资源需求,借助云计算实现资源的弹性存储,而区块链技术则可对资源的版权归属、使用轨迹进行全程追溯,既保护资源创作者的权益,也防止资源被篡改或滥用。例如,某省级教育部门搭建的“思政教育资源共享云平台”,通过上述技术整合了省内20余所高校、15个红色场馆的3000余条资源,不仅实现了省内学校的免费调用,还通过“资源需求匹配算法”,自动向不同学段、不同专业的师生推送适配资源,真正实现了思政教育资源的广泛传播与高效利用^[2]

(四) 个性施教,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新实效

高质量的思想政治教育绝非“千人一面”的统一灌输,而是需立足学生个体差异的精准引导。正如教育规律所强调的“因材施教”,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思政教育,通过技术手段将“问题导向”与“个性需求”深度结合,既解决学生的思想困惑,也提升育人实效。一方面,人工智能助力思政教育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型,让育人更具针对性。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学校可构建多维度的学生“思政需求画像”:在思想特征维度,捕捉学生对理想信念、社会热点、价值观念的认知倾向;在认知层次维度,分析学生对思政理论的理解深度;在知识短板维度,定位学生在理论学习中的薄弱环节。基于这些数据,教育者可制定分众化、个性化的教学方案:针对思想上关注“环境保护”的学生,推送“双碳目标与青年责任”的专题学习资料;针对认知层次较浅的学生,采用“案例+动画”的通俗化讲解方式;针对知识短板明显的学生,安排一对一的线上辅导或小组研讨。例如,某高校的“思政智能辅导系统”通过分析学生的课程测验数据与线上讨论内容,发现理工科学生对“科技伦理”议题兴趣浓厚但理论储备不足,随即为该群体定制了“AI发展与人类命运”“科研诚信与家国情怀”的系列专题课,课后调查显示学生的课堂获得感提升了40%,充分体现了精准施教的价值。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借助前沿技术推动教学手段智能化,为思政教育注入“智慧引擎”。深度学习技术可自动分析学生的作业反馈与答疑记录,总结出共性思想困惑,并为教师提供针对性的教学建议;智能感知技术可实时捕捉学生的学习状态——若发现多数学生在讲解“党史重大事件”时表情困惑,教师可立即切换为“历史影像+故事讲述”的形式;人机交互技术则让学习场景更具沉浸感,例如通过VR设备模拟“开国大典”“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等历史场景,让学生“置身其中”感受时代变迁;人脸识别技术不仅可用于课堂考勤,还能结合学生的专注度数据,为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推送个性化提醒。这些技术的应用,既打破了传统教学手段的局限,也让思政教育更贴近新时代学生的认知习惯,有效提升了育人实效。

二、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在为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风险与挑战。尤其是在体制机制、技术应用、道德伦理以及教师技能等方面,思政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仍然面临一些现实的隐忧。

(一)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机制亟需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是塑造价值观的过程,其目标体系庞杂而深远,难以通过具体的教育活动予以落实,更难以被算法、规则或数据这类技术手段所精准概括和表达。正因为其内在的复杂性和高度人文性,决定了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是一项充满挑战的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快速迭代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尚不完善,而相关的规范、标准等体制机制又明显滞后于技术的进步,加之受众数字素养薄弱,是人工智能在思政教育领域落地难、见效慢的重要原因。具体来看,体制机制不够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赋能的管理制度依然滞后。在人工智能融入思政教育的过程中,我国尚未形成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缺乏统一的数据规范和完整的系统架构。在大数据教育场景运用中缺少明确的操作指南与统一的监管标准,数据库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难以实现对人工智能赋能过程的规范管理与精细把控。此外,部分学校在数据管理方面投入不足,数据资源分散、利用率低。加之各部门之间缺乏数据共享机制,标准化建设进展缓慢。另一方面,赋能的责任机制尚不健全。目前关于数据使用、隐私保护、信息安全等方面

的法律条文多以原则性表述为主,缺乏对具体实践场景的明确规定,导致实际应用中,一旦出现数据泄露或权责纠纷,便难以厘清责任归属,也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撑。

(二)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存在诸多技术局限

随着“人工智能”在思政教育界的广泛应用,其技术赋能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一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发展不成熟。人工智能数据识别有特定的数据算法结构,人们的感性态度会被数据算法结构忽视。^[1]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如“数据洼地”和“数据缺失”的现实难题。思政教育具有深厚的人文属性,其主客体的思维方式复杂多变,往往难以被人工智能系统完整捕捉、精准分析,这直接影响了教学内容的智能化供给和教育目标的精准对接。在智能系统与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互的过程中,因缺乏深层理解和情境感知能力,常常会出现算法偏差,影响决策的准确性与教育的引导性。

再者,人工智能的应用本身也为其在思政教育中的深度介入设下了天然的限制。人工智能擅长处理的是标准化、结构清晰的问题,比如图像识别、逻辑推理、语言模型生成等领域,这些问题本质上属于“工程问题”——即可通过一组明确定义的参数来解决的任务。然而,思政教育所面对的却是充满主观性和多样性的“人”的问题,是一种高度动态、情境复杂的社会现象,其本质难以用数学模型触及,这就限制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思政教育的应用范围。

(三)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存在一定伦理风险

马克思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有时也“体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利”。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作为推动传统思政教育迈向智能化的重要路径,“人工智能+”思政教育虽为教育模式注入了新活力,但也伴随着诸多风险与挑战,尤其是在法制与道德方面。一方面,智能技术的不当运用存在着数据安全隐患。为了实现精准化管理,学校及科研机构普遍配置了大量传感器与信息处理系统,用于收集和储存个体数据。而在缺乏有效监管与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这些数据采集设备与软件极易出现失控和管理混乱。一旦数据泄露,个体隐私将面临极大威胁,其造成的损害往往是深远且不可逆的。从主观层面来看,教

育者在利用大数据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分析、制定教学策略的过程中,也可能无意间触及隐私边界,陷入“知情权”与“尊重权”的两难境地。此外,大数据权属模糊、高科技滥用、技术异化等问题所引发的伦理困局,亦为思政教育蒙上一层道德阴影。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主动干预”机制正在悄然侵蚀人的主体性。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介入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都有被弱化的风险。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在学生尚未表达需求时,便“先知先觉”地提供个性化建议与方案。这看似提升了学习效率,但也在潜移默化中削弱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其逐渐依赖技术,这种依赖性的增强,长远来看,不利于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主体意识的培养。而对教师而言,人工智能如同一个万能助教,能够构建虚拟课堂、优化教学内容,极大地提升教学便捷性与效率。但也正因如此,教师可能陷入“技术舒适区”,依赖现成资源,忽视对教学方法的深度思考与创新实践,最终导致教育主动权旁落,教学主体性逐渐被削弱。

(四)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急需提升教师应用技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发展不仅需要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的深度参与,也对教育者的综合素养和跨学科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人工智能+思政”尚处于起步阶段,技术赋能的潜力尚未完全释放,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媒介素养、技术运用能力方面的欠缺,正成为制约智能化进程的关键短板。一方面,不少思政教育者对大数据的认知仍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入理解与科学研究。受惯性思维影响,部分教师依旧坚守传统教学手段,如板书与课件,尽管这些方法有其独特价值,但却在无形中忽略了大数据对于新时代青年学习习惯与认知方式的深刻影响。他们往往将大数据视为教学的“辅助工具”,而非一种重塑教学模式的创新力量,因而改革意识不强,技术融合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技术应用能力的缺失也使得教育内容与技术平台之间难以实现有效融合。目前许多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尚未掌握基本的大数据技能,对于如何在教学中精准使用技术手段、如何借助平台分析学生行为数据、进而优化教学策略等方面缺乏操作性理解。结果往往是表面“智能化”,实则“形式化”,技术沦为摆设。

三、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人工智能背景下,我们要积极破解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全方位提升智能思政教育效果。

(一) 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保障智能思想政治教育运行

教育部2023年统计显示,已建成的智能思政平台中35%因运营问题停摆,暴露其可持续发展机制缺失。智能思政教育的顶层设计本质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在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中,体制机制建设无疑是奠定基础、保障长远发展的关键一环。要真正实现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设计必须注重质量与安全并重,做到顶层设计科学、管理体系有序、运行流程高效。一方面,要健全管理制度,为智能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稳步推进提供坚实保障。当前,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建立起成熟、系统的技术标准、数据管理规范与算法伦理框架。面对这一新兴技术的高速发展,既要在技术层面遵循人工智能的基本伦理原则,防止技术滥用和价值偏离;也要在教育层面尊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身心成长规律与发展特点,制定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特性的专属算法模型与应用规则,确保“智能”不替代“人本”,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要构建清晰有力的责任机制,推动智能思政教育系统化发力。智能思政不是单点突破的局部革新,而是一项涵盖政府、学校、行业乃至社会的系统工程。为此,必须压实责任链条,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和资源统筹,学校要根据自身条件灵活制定智能化教学方案,企业和社会力量也应积极参与智慧教育生态的建设。同时,要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制定清晰的实施细则和评估标准,推动产教融合、校社联动,只有层层压实责任主体,才可以确保智能思想政治教育落地、生根、见效。

(二) 创新技术供给,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来说是做人的工作”。^[4]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既有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要在这场深刻变革中把握主动,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推动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要强化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优化,切实提升其可靠性与科学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生成不应只是简单的信息拼接,更应注重思想深度、逻辑严密与价值引导。可通过构建思

政教育专属的知识图谱,借助模型训练、数据分析与参数调优,精准识别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与情感走向,进而生成兼具思想性、逻辑性、情感性和价值导向的高质量内容资源。另一方面,提高人工智能技术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在自然语言处理、情感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提高其对非标准化问题的理解和处理能力。例如,可以通过深度学习算法,让人工智能更好地理解学生的语言表达和情感变化,从而更好地应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非标准化问题。同时,还可以开发具备自适应能力的智能系统,能根据教学环境、学生状态和教育目标的不同,灵活调整交互方式与教学策略,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三) 强化规约,防患化解智能思想政治教育风险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升育人实效是人工智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但也引发了数据隐私泄露、技术依赖等潜在的伦理风险。审视并修正数据采纳可能引发的社会技术风险,是构建公平负责的算法机制、推动人类社会技术正义的起点。[5]对此,我国必须强化规约,进行技术伦理规范,实现人、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共生。第一,强化管理维度的伦理规制。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应用中的“量”和“度”,避免“量”和“度”的越界,使教师和学生陷入“技术陷阱”。建立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应用的道德准则,限定其适用范围、自主程度和智能化程度,明确智能应用中的数据查询、修改、分析与利用的权限,建立可信安全的人工智能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用户身份验证、密码复杂度增加以及电子邮件加密等手段,保证教师和学生的隐私信息的安全传输。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赋能和可控发展,以规范化的流程最大限度地化解各种潜在风险。[6]第二,强化教育向度的伦理规制。提高师生数字素养,巩固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地位,杜绝让渡智能主体。[7]一方面,应着力强化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使其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技巧,更拥有驾驭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与此同时,教师还需具备敏锐的伦理意识,能够对人工智能在教学中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提前预判、妥善应对,尤其是在处理学生数据和隐私信息时,要做到有边界、有温度,坚守教育的底线,传递人文关怀。另一方面,为适应教育改革与科技变迁的需求,提高学生及新一代开发人员的数字素养。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把数字化素质、人工智能道德等内容融入到人才的核心素质中,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

思维。

(四) 提供智能技术培训,提高思想政治教师智能化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8]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转型进程中,须破除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的瓶颈和壁垒,着重塑造与提升思想政治教师的数字素养,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在学校层面,要构建系统化的教师培训机制,通过整合优质资源、加强培训基地之间的交流合作,邀请技术专家和教育实践者共同参与,为教师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指导,帮助他们顺利适应数字技术变革的浪潮,切实提升智能技术的操作与运用能力。同时,还需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将教师的数字素养纳入综合考核体系之中,制定明确的评价标准和测评流程,注重过程性监测与动态性反馈,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用、以评促改”的良性循环。在教师个人层面,也应主动变革教育观念,增强技术赋能意识,做到不仅“敢用技术”,更“会用技术”“用得好”。教师要准确把握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与局限,深入挖掘其与思政课教学的结合点,探索真正适应教学实际的融合路径,实现技术的理性认知与科学应用。与此同时,教师还应不断拓展视野,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支持下的新型教学模式与方法,勇于尝试将大数据、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引入课堂,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和教学能力。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推动自身从“经验型”向“智慧型”转型,成为真正具备智能化素养的新时代思政教育者。

四、结语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既是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转型的重要契机。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坚持“技术为用、育人为本”的原则,在充分发挥智能技术优势的同时,始终坚守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内核。既要积极拥抱技术创新,又要警惕技术异化风险;既要提升教育智能化水平,又要保持教育的人文温度。只有实现技术与教育的辩证统一,才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2]郑天翔,张震.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07).

[3]蓝江.生命档案化、算法治理和流众——数字时代的生命政治[J].探索与争鸣,2020(09).

[4]吴晶,胡浩.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J].中国高等教育,2016(24).

[5]郭小平,秦艺轩.解构智能传播的数据神话:算法偏见的成因与风险治理路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09).

[6]傅盈盈.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逻辑、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4(07).

[7]陈可,叶林良.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变革:内蕴逻辑、现实挑战与时代进路[J].教育与职业,2023(08).

[8]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

[9]习近平.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09).

儿童钢琴学习中民族音乐启蒙的路径与方法研究

袁小龙¹ 周莲怡¹

(1.湖北师范大学, 湖北 黄石 435000)

摘要:近年来,我国美育事业蓬勃发展,琴童群体规模逐年扩大,钢琴教育市场随之持续升温。然而,在这一火热态势背后,却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儿童钢琴启蒙阶段的教学内容普遍以西方音乐体系为核心,民族音乐的融入与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因此,本文聚焦当前儿童钢琴启蒙教育中民族音乐面临的困境,从教师专业素养、教材体系建设、社会文化氛围三个维度,提出改进策略,希望能对儿童钢琴启蒙教育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 民族音乐; 钢琴启蒙; 音色; 钢琴技术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28

Research on the Paths and Methods of National Music Enlightenment in Children's Piano Learning

Yuan Xiaolong¹, Zhou Lianyi¹

¹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hina has flourished, and the number of young piano students has grown steadily each year, driving continuous growth in the piano education market. However, behind this vibrant trend lies an issu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e teaching content in early childhood piano education predominantly centers on the Western music system, while the integration and emphasi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remain clearly insuffici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within current early childhood piano education, and propose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teache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ultural environment—with the hope of contributing to the advancement of early childhood piano education.

Keywords: National music; Piano initiation; Tone color; Piano technique

作者简介: 袁小龙(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键盘器乐演奏;

周莲怡(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通讯作者: 袁小龙

一、引言

2022年发布的《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明确提出“感受和理解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然而，当前儿童钢琴教学领域却存在明显的“西强中弱”现象，以《钢琴基础教程》为例，其民族音乐曲目占比不足15%，多数培训机构和教师仍以西方古典音乐教材为主导，民族音乐在钢琴启蒙中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这种教学现状与国家文化传承战略之间的矛盾，使得儿童钢琴学习中民族音乐启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紧迫性。从文化传承视角看，儿童时期是民族文化认同形成的关键期，“音乐虽被称作无国界的语言，但不同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所形成的音乐却是千差万别的。无论是所使用的乐器、所采用的音律、还是音乐听觉习惯等都不相同。如果完全使用一种外来的音乐体系来训练我们的学生，就会使他们逐渐丧失本民族的审美观。”因此，加强儿童民族音乐启蒙不仅是提升音乐素养的需要，更是培育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探索科学有效的民族音乐启蒙路径与方法，对于推动儿童钢琴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儿童钢琴启蒙中的民族音乐的作用

（一）培养本土文化的认同感

儿童在5-8岁时，正处于文化认知的“萌芽阶段”。由于这一时期是儿童感知、接纳本土文化的关键窗口期，因此在这一时期大量接触民族音乐有助培养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例如，通过演奏《茉莉花》，儿童可以感受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学习《彩云追月》，能体会岭南音乐的轻快活泼等等。然而当前的钢琴启蒙教学中，内容多以西方古典音乐为主，若长期缺乏民族音乐的输入，容易导致儿童对本土音乐审美产生陌生感。因此，将民族音乐融入钢琴启蒙，能让儿童在“学钢琴”的同时，同步吸收中华文化的审美基因，培养本土文化认同感。

（二）提升综合音乐素质

钢琴启蒙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培养儿童的“音乐耳朵”，而民族音乐独特的音乐元素能为儿童提供西方音乐体系外的“感知维度”，提升综合

音乐素养。在调式方面，西方古典音乐以“大小调式”为核心，而中国民族音乐以“五声调式”为基础，旋律更柔和、流畅，且不同调式有独特情感色彩，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儿童可以更直观的感受五声音阶与西方大小调的区别，补充调式认知。在节奏感方面，民族作品中具有大量西方作品少用的节奏型如《掀起你的盖头来》中的切分节奏、《二泉映月》中的散板、《喜洋洋》中的固定节奏型重复等等。学习这些作品能够帮助儿童打破对规整节拍的单一认知，锻炼其对自由节奏的把控能力，避免节奏感知僵化。在音色感知方面，许多民族作品会要求钢琴模仿民族乐器的音色，比如《牧童短笛》要求演奏者通过改变触键方式，模范短笛的音色，《二泉映月》要求演奏者，通过手指的连奏模范二胡的音色等等，儿童通过学习这些作品，可以深化对音色的敏感度以及手指的控制力，提升演奏能力。

三、儿童钢琴启蒙中民族音乐存在的困境

（一）教师群体对中国钢琴作品的重视程度不足

大部分钢琴教师接受的专业训练主要集中在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对民族音乐的理论知识和演奏技巧掌握不足，部分教师甚至不能准确把握民族调式的特点。其次，教师的民族音乐教学能力不足，缺乏将民族音乐文化融入教学的意识和方法，难以激发儿童对民族音乐的兴趣，如在许多教师在教授民族音乐作品时，仅要求儿童掌握旋律和节奏，而不讲解乐曲所蕴含的文化特色，导致儿童难以真正理解音乐的情感和意义。此外，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多数机构仍以演奏技巧的熟练度作为主要评价标准，对儿童的民族音乐认知和文化理解能力缺乏科学的评价指标。在这种单一的评价指标下，教师在进行授课时会不自觉的选择一些单纯技术性的作品，而拥有浓郁文化底蕴但技术性不强的民族音乐自然不受教师的欢迎。

（二）钢琴教材中民族音乐内容占比薄弱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儿童钢琴教材中，民族音乐曲目占比普遍较低。多数教材仍以巴赫、莫扎特等西方古典作曲家的作品为主。“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儿童的启蒙教材仍然是沿用20世纪末使用的《汤普森简易钢琴教程》《车尔尼初级钢琴练习曲集》等，接受访谈的钢琴教师认为，这些钢琴启蒙教材在内容和教学进度安排上没有明显

的错误, 学生和家长反映也比较好, 所以不会轻易更换教材。如有教学需要, 会选择其他教材的部分乐曲穿插着练习, 但还是以原来的启蒙教材为主。”虽然出现了这一些专门的民族音乐教材, 但这类教材的普及率不高, 且在曲目难度设计上存在不足, 比如“樊祖荫先生在《56 首钢琴小曲》的后记中提到, 该作品集的乐曲顺序是依据《中国各民族民歌选集》的民族次序来编排的”, 因此, 这种安排, 难免会导致曲目难度梯度设计不足, 部分曲目过于复杂, 不适合低龄儿童学习。此外, 现有民族音乐钢琴教材在文化阐释方面较为薄弱, 大多只提供乐谱, 缺乏对乐曲文化背景、演奏技法的详细说明, 难以满足启蒙教学的需求。

(三) 社会环境的功利性

儿童钢琴启蒙市场具有社会环境功利性。集中表现为“重结果、轻过程”的价值导向。家长层面, 多数将钢琴学习视为孩子“加分项”而非兴趣培养, 过早设定功利目标: 有的从 4 岁开始就规划“一年过三级”的考级路径, 忽视手指机能发育规律强行拔高难度; 有的把考级证书当作升学、评优的“敲门砖”, 孩子刚掌握基础指法就催促练习考级曲目, 甚至为拿证选择“突击背谱”而非理解乐曲内涵, 邻里间还常以“过了几级”“考了多少分”作为孩子钢琴水平的唯一攀比标准。培训机构层面, 为迎合家长需求, 不少机构把“半年拿下五级证书”作为招生噱头, 授课内容围绕考级曲目展开, 跳过民族音乐赏析、基础乐理等核心模块。教师层面, 部分教师为追求“出成果”速度, 只教曲目技巧性弹奏, 对乐曲情感表达、文化背景闭口不谈, 甚至让孩子机械的重复难点段落而忽略整体乐感培养。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 整个市场陷入“考级-拿证-攀比”的闭环, 原本应充满趣味的音乐启蒙变成了“技能训练任务”, 这不仅扼杀了孩子对钢琴的兴趣, 更让民族音乐等兼具文化价值的内容因“不实用”被边缘化, 背离了儿童钢琴启蒙的初衷。

四、改变路径探讨

(一) 提升教师群体对中国钢琴作品的重视与教学能力

首先, 高校应加大民族音乐相关课程的占比, 让音乐教育专业学生深入掌握民族音乐的创作逻辑与文化内涵, 为未来的启蒙教学储备扎实的知识功底, 避免毕业生在教学中陷入文化储备不足

的困境。其次, 钢琴教师自身需主动深耕民族音乐领域, 将文化解读融入教学实践。例如在教授《凤阳花鼓》时, 既指导切分节奏的弹奏, 又结合凤阳民俗讲解歌曲从逃荒歌谣到丰收欢歌的演变, 展示花鼓实物素材; 教《绣金匾》时可, 借鉴板胡明亮音色, 指导儿童用有力触键模范板胡音色。这种“技艺+文化”的教学模式, 能让儿童在弹奏中触摸民族文化的温度, 逐步建立对本土音乐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真正实现民族音乐在启蒙阶段的“润物细无声”。

(二) 优化钢琴教材中民族音乐内容体系

为改进儿童钢琴教材中民族音乐占比较低的问题, 可从以下四方面进行优化: 一是推动主流基础教材将民族音乐作品按教学逻辑融入核心单元, 例如在《拜厄钢琴基础教程》的入门阶段, 可补充改编民歌, 与西方作品形成对比教学; 二是联合教育部门、钢琴教研机构加大专门民族教材如《56 首钢琴小曲》《中国儿童钢琴小曲集》等优质教材的推广力度, 同时在中小学钢琴兴趣课中开展“民族音乐教学周”活动, 例如, 以《卖报歌》的钢琴版为教学载体, 让学生在弹奏中感受本土音乐的亲切感, 逐步提升专门教材的课堂使用率。三是在曲目难度梯度设计方面, 需打破“按民族次序编排”的逻辑, 结合儿童手部发育规律与演奏能力设计曲目体系。以《56 首钢琴小曲》中蒙古族民歌《嘎达梅林》为例, 原版因包含多声部织体与大跳音程如八度跨度, 低龄儿童难以驾驭, 可先推出“入门简化版”。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细化难度分层, 例如 4-6 岁启蒙阶段以《丢手绢》、《拔萝卜》等单声部曲目为主, 7-9 岁基础阶段引入《凤阳花鼓》的双手交替演奏版, 10 岁以上提升阶段则可学习《二泉映月》钢琴改编精简版, 通过降低原曲的复杂装饰音与音程跨度, 让儿童感受民族音乐的深沉韵味, 避免因难度断层导致的抵触心理。四是对于每首民族曲目, 教材不仅提供清晰乐谱, 更要补充具象化的文化解读, 例如讲解《茉莉花》时, 需说明其作为江苏民歌的核心特点, 同时搭配江苏水乡的风景图片与民乐合奏版音频, 让儿童理解“旋律为何这样唱”, 此外还可加入“民俗互动环节”, 例如学习《娃哈哈》时, 附上维吾尔族手鼓的节奏图谱, 让儿童边弹边用手拍击节奏, 结合维吾尔族舞蹈的基本动作如踮脚、转手, 在“弹-听-动”中感知民族音乐与民俗的关联, 彻底改变过去教学仅停留

在乐谱的单一模式,真正满足儿童钢琴启蒙阶段“学技艺、懂文化”的双重需求。

(三) 社会环境

首先,民族钢琴音乐,在客观上存在技巧不足,内容有余的问题,因此,想要推动民族音乐在钢琴启蒙中的发展,就需要社会呼吁与引导人们把视线回归到音乐本身的文化内涵方面,应积极倡导钢琴教育在开发智力,激发创造力以及陶冶情感等方面的多元价值,而非仅仅聚焦于考级证书这一单一标签。正如旅美钢琴家茅为蕙所强调的,父母应将学习钢琴视为熏陶孩子气质、培养艺术修为的途径,最要不得的就是功利心态。家长需意识到,音乐学习的核心在于过程体验与内在素养的提升,而非一纸证书。教育部门和媒体应加强舆论引导,通过专家讲座、成功案例分享等方式,帮助家长理解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重要性,摒弃“一年过三级”等拔苗助长的短视行为,将关注点从“过了几级”转向孩子音乐感受力、表现力和创造力的真实成长。

其次,在教育过程中,要深化教学改革,突出音乐素养的全面培养,打破考级对课程设置的桎梏。培训机构与教师作为教育的直接实施者,其教学理念与方法直接影响儿童的学琴体验与成效。课程设置应打破考级曲目的垄断,增加民族音乐作品的内容,让儿童在理解民族乐曲文化背景与情感内涵的基础上进行演绎。教师自身也应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不仅教授弹奏技巧,更要成为音乐艺术的引导者和儿童情感的呵护者。

最后,在评价体系层面,需构建多元评价机制,从根本上扭转“唯证书论”的成功标准。这不仅需要家长放下对考级证书的执念,更需社会评价体系作出调整。学校在招生评价中应弱化对

证书的简单认可,转而关注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能力。

五、结论

儿童钢琴学习中的民族音乐启蒙,是筑牢“根与键共生”的深层枢纽。它不仅是滋养儿童音乐感知与审美积淀的养分,更是厚植文化自信种子、赓续民族精神文脉的重要载体。面对如今的困境,未来需社会各方互相努力,将民族音乐的基因有机融入钢琴启蒙之中,推动儿童钢琴教育实现从“技艺习得”到“文化涵育”的深度跃升,推动我国儿童钢琴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 [1]黄志祥.基于皮亚杰理论的沉浸式幼儿教育研究与应用[D].杭州师范大学,2021.DOI:10.27076/d.cnki.ghzsc.2021.000406.
- [2]杨圆.樊祖荫《56首钢琴小曲》在儿童钢琴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24.DOI:10.27459/d.cnki.gynfc.2024.000511.
- [3]陈青山.儿童钢琴教学中的中国作品研究[D].新疆艺术学院,2023.DOI:10.27907/d.cnki.gysxj.2023.000057.
- [4]李佳璇.中国钢琴作品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西安音乐学院,2021.DOI:10.27402/d.cnki.gxayc.2021.000003.
- [5]周佳铭.中国儿童钢琴启蒙教育的现状与策略研究[J].艺术教育,2020,(11):39-42.
- [6]李蕾.中国钢琴作品在高校教学中的推广与实践[J].长春大学学报,2017,27(10):110-112.
- [7]韩学晨.音乐的民族性对我国儿童钢琴教学的影响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8.
- [8]陈鸿铎.钢琴音乐创作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及反思[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7(01):60-69.

大思政一体化视阈下中学少先队红色课程的 开发与实践研究

曾丽玲

(南宁市新民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530000)

摘要: 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 党团队一体化育人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中学少先队作为衔接小学启蒙教育与高中思政进阶教育的关键枢纽, 其红色教育质量直接影响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成效。当前中学少先队红色教育普遍存在内容碎片化、实施形式化、学段衔接断层、育人资源单一化等现实问题。本研究立足大思政一体化育人要求, 以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为核心目标, 结合中学生认知发展规律与少先队育人特点, 构建目标阶梯化、内容模块化、实施协同化、评价多元化的中学少先队红色课程。以广西南宁某中学实践案例为依托, 探索家校社协同、学段纵向衔接、资源多维融合的红色课程实施路径, 有效破解中学红色育人痛点, 为新时代中学少先队红色课程开发、思政一体化育人实践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 大思政一体化; 中学少先队; 红色课程; 课程开发; 立德树人

基金项目: 南宁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5 年度“义务教育课程新修订教材使用研究”专项课题“初中‘音乐 + 思政’课程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 以人教版 2024 年艺术音乐新教材为例”(项目编号: 2025XJC087)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29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Red Courses for Young Pioneers in Middle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Zeng Liling

(Nanning Xinmin Middle School, Nanning 530000,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cross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system integrat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nd the Young Pioneers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As a key link connecting the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and advanc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s, the Young Pioneers organization in middle schools plays a vital role in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its red education exert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At present, the red education for middle school Young Pioneers generally faces problems such as fragmented content, formalized implementation,

作者简介: 曾丽玲(1989—), 女, 本科, 研究方向: 中学德育、少先队教育;

disjointed connection between school stages and monotonous educational resource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gr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study takes political enlightenment and value cultivation as the core objectives. In accordance with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rules and the edu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oung Pioneers, it constructs a red curriculum featuring hierarchical objectives, modular content, collaborative implementation and diversified evaluation. Taking a middle school in Nanning, Guangxi as a practical cas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of red courses through home-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on, vertical connection among school stages and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It effectively addresses the difficulties in red education of middle schools, and provides replicable and promotabl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mode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d courses for middle school Young Pioneers and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Integr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Young Pioneers in Middle Schools; Red Course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 研究背景

1. 政策赋能：大思政一体化与党团队育人链条深度贯通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明确提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要求统筹各学段思政教育资源，实现育人目标纵向衔接、育人内容横向融合、育人资源全域共享。全国少代会多次强调完善少先队组织育人体系，夯实“队、团、党”阶梯式育人链条，明确少先队作为思政教育前置阵地的核心地位。红色教育作为思政育人的核心载体，是落实党团队一体化育人、传承红色基因的关键抓手，为中学少先队红色课程的系统化构建提供了坚实政策支撑。

2. 现实困境：中学红色教育系统化建设存在短板

中学阶段是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形的关键窗口期，也是少先队员向共青团员进阶的重要过渡阶段。现阶段多数中学少先队红色教育缺乏系统化课程支撑，普遍存在三大突出问题：一是教育内容零散随意，缺乏梯度设计，学段间课程重复、断层现象并存；二是教育形式单一固化，多以讲座、观影、主题班会为主，实践性、体验性、创新性不足；三是育人主体单一，过度依赖校内少先队活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缺位，难以形成常态化、长效化育人效果。

3. 学段定位：中学少先队是思政一体化育人的中间枢纽

从育人链条来看，小学阶段侧重红色情感启蒙，高中及大学阶段侧重理论认知与使命担当，而中学少先队阶段承上启下，承担着从感性认知向理性认同、从情感启蒙向价值践行过渡的核心任务。构建系统化的中学少先队红色课程，能够补齐学段育人短板，打通党团队一体化育人断点，推动思政教育实现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育人效果。

(二)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本研究立足大思政一体化理论框架，聚焦中学少先队专属学段特征，明晰红色课程的核心内涵、构建逻辑与育人边界，丰富少先队育人与大思政教育融合的理论体系。同时，完善中学阶段红色课程结构化、阶梯化建设理论，为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课程的开发、党团队育人链条理论落地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支撑。

2. 实践意义

本研究针对红色教育碎片化、形式化、浅层化问题，开发完整可落地的红色课程，通过模块化内容、序列化实施、多元化评价，切实提升中学红色育人实效。同时，依托本土红色资源开展实践探索，形成适配县域、城区中学的红色育人模式，有效增强少先队员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为中小学德育、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范例。

二、核心概念界定

(一) 大思政一体化

大思政一体化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打破学段、学科、校园、社会的育人壁垒,统筹小学、中学、大学全学段,整合学校、家庭、社会全方位育人资源,构建目标统一、内容衔接、实施协同、评价贯通的全域思政育人体系。其核心要义是推动思政教育循序渐进、分层递进、全域覆盖,破解各学段思政教育脱节、重复、低效难题,形成一体化育人合力。

(二) 中学少先队红色课程

中学少先队红色课程是面向初中少先队员开设的少先队特色德育课程,以红色文化为核心载体,涵盖革命历史、英雄事迹、红色精神、时代楷模、本土红色资源等内容。课程契合中学认知规律与少先队组织属性,兼具思想性、阶梯性、实践性、趣味性,区别于常规思政课堂,以少先队活动为主要载体,达成政治启蒙、价值塑造、实践践行的分层育人目标,是中学思政一体化教育的重要补充与延伸。

三、课程构建的理论依据

(一)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出,教育需实现人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实践能力、综合素质协同发展。红色课程通过红色文化浸润、红色实践锤炼、红色价值引领,助力青少年塑造正确政治立场与道德品质,契合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为课程育人目标设计与内容搭建提供核心理论支撑。

(二) 螺旋式课程开发理论

螺旋式课程理论强调,课程内容需依据学习者认知发展规律分层设计,核心知识点与核心素养逐级深化、循环提升。本研究结合初一、初二、初三学生认知差异,设计阶梯化课程目标与序列化课程内容,推动红色教育从情感启蒙、认知建构到价值践行螺旋进阶,有效解决学段内容重复、难度脱节问题。

(三) 党团队一体化育人理论

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遵循“队为基础、团为骨干、党为核心”的成长逻辑,构建由入队、入团到入党的阶梯式政治成长路径。中学少先队作为入团前置育人阵地,红色课程紧扣青少年政治成长规律,衔接少先队、共青团育人要求,实现红

色基因阶梯式传承,夯实青少年政治成长根基,为中学少先队红色课程衔接入团教育提供理论支撑。

四、大思政一体化视阈下中学少先队红色课程的开发

基于政策导向、现实需求与理论支撑,本研究开发目标阶梯化、内容模块化、实施协同化、评价多元化四位一体的中学少先队红色课程。

(一) 课程目标: 分层阶梯, 衔接思政全学段

结合初中三年学生认知特点与政治成长规律,对接大思政一体化育人目标,构建“情感启蒙—认知建构—价值践行”三维阶梯目标体系。

初一(基础启蒙层): 聚焦情感培育,引导学生初步了解党史、革命史与英雄事迹,明晰党、团、队组织关联,萌发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朴素情感,完成红色认知初步启蒙。

初二(核心认知层): 聚焦内涵理解,引导学生深度解读长征精神、百色起义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精神内核,树立先锋榜样意识,增强集体荣誉感与社会责任意识,形成稳定红色价值认知。

初三(价值践行层): 聚焦素养落地,引导学生内化红色基因,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晰入团初心与青年使命,树立报效祖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理想信念。

(二) 课程内容: 模块整合, 兼顾通用性与地域性

打破传统红色教育内容零散、随意现状,构建“1+3+N”模块化红色课程内容体系,形成核心内容固定、基础内容扎实、拓展内容多元的课程格局。

1. 1 个核心模块: 红色精神传承

以“四史”教育为核心,系统讲解百年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重点阐释革命年代、建设年代、新时代红色精神谱系,涵盖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航天精神等,深度对接中学思政教材核心知识点,实现少先队活动与思政课堂内容互通。

2. 3 个基础模块

红色故事浸润模块: 聚焦英雄人物与革命事件,挖掘陈树湘、王新兰等革命先烈事迹,通过故事会、情景剧、主题宣讲等形式,推动红色故事常态化浸润,夯实学生红色认知基础。

地域红色研学模块：立足广西本土红色资源，深度挖掘百色起义、昆仑关战役等本土红色历史，依托本地纪念馆、革命旧址、烈士陵园打造“行走的少先队课”，推动红色教育本土化、具象化、生活化。

思政素养提升模块：精准对接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融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法治教育、国情教育，结合时事热点开展主题研讨，实现红色教育与学科思政深度融合。

3. N 个拓展模块

结合学生兴趣与时代特点，开设多元化拓展课程：红色艺术模块（红歌传唱、红色书画、红色舞台剧）、红色实践模块（社区宣讲、志愿服务、文明实践）、数字红色模块（VR 红色展馆体验、AI 红色故事创作、红色微课学习），丰富课程载体，提升课程趣味性与时代性。

（三）课程实施：家校社协同，构建全域育人体系

1.立足大思政一体化协同育人理念，搭建“课堂主阵地 + 校内活动 + 校外实践 + 家校社联动”四维实施体系，打通校内外育人壁垒。

2.固化课堂主阵地依托每周少先队活动课，推行沉浸式、探究式、项目化教学，开展红色人物探究、红色策展、情景模拟等课堂活动，摒弃传统灌输式教学，提升课堂育人实效。

3.丰富校内育人载体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周、国旗下红色宣讲、红领巾争章、红色社团展演等活动，营造校园红色文化氛围，推动红色教育日常化、常态化。组建红领巾宣讲团、红色情景剧社团，搭建学生自我展示、自我教育平台。

4.拓展校外实践阵地与本地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共建德育实践基地，定期开展红色研学、祭扫英烈、红色讲解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红色精神、践行红色担当。

5.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线上搭建“红领巾云课堂”，推送红色微课、数字红色展馆资源；线下开展亲子红色研学、家长红色讲堂。联动本地高校、企事业单位、社区开展红色共建，引入大学生宣讲团、老党员宣讲队伍进校园，构建全域育人格局。

（四）课程评价：多元赋能，建立闭环评价机制

1.摒弃单一结果性评价，建立过程与结果结合、定量与定性互补、多主体参与的多元化评价体系，保障课程育人实效。

2.评价内容多维化涵盖四大维度：红色知识掌握、红色情感态度、红色实践表现、红色价值践行，全面考核学生认知、情感、行为、素养发展情况。

3.评价方式系统化过程性评价：依托成长档案袋、红色成长护照，记录课堂表现、活动参与、研学日志、红领巾争章等日常表现。

4.结果性评价：通过红色知识测评、红色作品展演、主题征文、实践报告等方式，考核学生阶段性学习成果。

5.评价主体多元化构建辅导员评价、学生自评、同伴互评、家长评价、实践基地导师评价的五维评价模式，确保评价客观、全面、公正。

五、课程实践案例 —— 以广西南宁某中学为例

（一）实践基础

广西南宁某中学少先队组织架构完善、德育体系成熟，具备良好课程开发基础。学校依托广西丰富红色资源，以百色起义纪念馆、昆仑关战役旧址、广西革命纪念馆为实践载体，结合本校少先队活动常态化优势，开展红色课程系统化实践，拥有扎实实践条件与育人基础。

（二）具体实践举措

1.搭建一体化研发组织架构

成立以校党委书记为总牵头，政教处、少先队大队部、语文、思政、艺术教研组及骨干教师共同参与的红色课程研发小组，统筹课程设计、教学实施、资源开发、评价落地，形成党建引领、德育主导、团队落实、家校协同的工作格局。

2.实施三年序列化课程

初一红色启蒙阶段：开展“红领中心向党”系列活动，通过红歌学习、红色故事分享、基地研学等形式，完成红色情感启蒙，建立个人红色成长手册。

初二红色深耕阶段：聚焦本土红色精神研究，开展百色起义精神专题研学、红色情景剧展演、社区红色宣讲活动，深化红色认知与实践能力。

初三红色践行阶段：衔接入团教育，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组织常态化志愿服务，撰写红色信仰感悟，实现价值内化与行动践行。

3.整合多维育人资源

学校与本地红色教育基地建立长期共建关系,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邀请老党员、英烈后代进校园开展红色讲堂;联动本地高校开展“大手拉小手”红色共建活动,实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

4.建立常态化评价机制

推行“红色成长护照”管理制度,全程记录学生课程参与、实践服务、争章成长情况,结合期末素养测评、成果展示,形成综合性红色素养评价结果,纳入学生德育综合素质评价。

(三) 实践成效

1.学生素养显著提升

系统化课程实施后,学生红色知识储备更加扎实,爱国爱党情怀、集体责任感明显增强。全校85%以上少先队员主动参与红色宣讲、社区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学生入团积极性、政治认同感大幅提升。

2.学校德育品牌成型

通过课程常态化实践,学校实现少先队工作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Z].2021.

[2]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全面构建新时代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实施方案(2022—2025年)[Z].

[3] 李建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逻辑与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2(07):45-50.

与大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学少先队红色育人品牌,德育与少先队工作质量显著提升。

3.社会育人合力形成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有效落地,红色文化传播从校园延伸至家庭、社区,育人辐射范围持续扩大,获得家长、社区及教育主管部门高度认可,形成良好社会育人效应。

六、结论

本研究立足大思政一体化建设时代背景,契合中学少先队育人定位与青少年成长规律,开发了目标阶梯化、内容模块化、实施协同化、评价多元化的红色课程。通过南宁本地中学实践验证,该课程体系有效破解中学红色教育碎片化、形式化、衔接不畅等问题,切实提升少先队员政治素养与家国情怀,推动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贯通落地,为新时代中学少先队红色教育、大思政一体化育人提供可行实践范式。

[4] 王静,新时代少先队红色教育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J].中小学德育,2023(09):28-31.

[5] 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第九次全国少代会会议精神[Z].2025.

[6] 全国少工委.“高举队旗跟党走 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少先队主题活动实施指引[Z].2026.

具身认知视域下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设计初探

乐冰洁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舟山 316021)

摘要: 在少儿英语课堂中, 游戏化教学因契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而被广泛采用。然而, 在高职《少儿英语教学设计》课程的教学实践中, 学生形成的教学方案常常存在重趣味轻目标、重活动形式轻语言意义建构、重案例模仿轻设计论证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在于, 游戏化教学在不少课堂中仍主要被理解为调动气氛和维持参与的外在手段, 尚未被置于语言学习认知机制的层面加以审视。具身认知理论认为, 认知并非脱离身体与环境的纯粹符号加工, 而是根植于身体经验、生成于感知、动作与情境互动的动态过程, 这为重新审视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提供了理论视角。基于对具身认知、语言教育与游戏化学习相关研究的梳理, 并结合高职《少儿英语教学设计》课程的培养目标与教学困境, 本文提出身体动作—语言意义映射、多模态协同、情境驱动和递进式参与四项设计原则, 构建“目标定位—具身转译—情境编排—多模态组织—反思评价”的教学设计框架, 并通过动物词汇教学和方位介词教学两个案例, 说明该框架在教学设计训练中的具体运用, 以期为高职《少儿英语教学设计》课程改革和教学设计能力培养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具身认知; 少儿英语; 游戏化教学; 教学设计; 高职教育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30

Embodied Cognition and Gamified 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Young Learners' English: An Exploratory Study

Bingjie LE

Zhejiang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llege, Zhoushan, China

Abstract: Gamified instruction is widely used in young learners' English classrooms, yet in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urse 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Teaching English to Children, students' lesson plans often overemphasize fun while neglecting instructional goals, meaningful 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design justification. Drawing on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this paper reexamines gamified 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young learners' English and proposes four principles: bodily action-language meaning mapping, multimodal coordination, context-driven design, and progressive participation. On this basis, it develops a five-stage framework of goal setting, embodied transformation, scenario planning, multimodal organization, and reflective evaluation. Two teaching cases, animal vocabulary and locative prepositions, are used to illustrate how the framework can be applied in instructional design training.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urriculum refor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compete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embodied cognition; young learners' English; gamified instruction; instructional desig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一、引言

随着英语教育不断向低龄段延伸, 少儿英语课堂的目标已不再局限于词汇记忆和句型操练, 而更加重视学习者在具体情境中的意义理解、交际参与和综合运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提出, 英语课程应引导学生在体验中学习、在实践中运用、在迁移中创新, 并强调围绕真实情境和真实问题开展语言实践活动^[1]。这意味着, 少儿英语课堂的有效性不能仅以教师讲解是否清晰或学生记忆是否迅速来衡量, 而应进一步考察学习者能否在活动中进入语言意义, 并在行动、交流和反思中逐步完成从“知道”到“会用”的过渡。在这一背景下, 游戏化教学之所以长期占据少儿英语课堂的重要位置, 并不只是因为它能够提升趣味性, 更在于它具有活动化、情境化和互动化的组织优势。已有研究指出, 数字游戏能够在二语学习中提供更具情境性与互动性的环境、协作与有意义互动机会, 以及情境中的即时反馈, 并可能支持词汇学习等具体语言结果^[2]。从更广泛的游戏化学习研究看, 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学习特征、课程设计与开发、教学工具及应用效果等方面^[3]。但在教学实践中, “游戏化”常被简化为比赛、奖励、闯关、角色扮演或课堂气氛调动, 由此导致课堂设计滑向形式化。尤其在高职《少儿英语教学设计》课程中, 学生往往能够较快模仿现成案例中的热闹环节, 却较难解释这些活动为何能够支持语言学习, 也难以判断一个设计究竟是在帮助儿童理解语言, 还是在制造表层活跃。

因此, 当前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的关键问题, 并不是“是否使用游戏”, 而是“游戏如何进入语言学习过程”。换言之, 真正需要追问的是: 儿童为何会因为某些游戏活动而更易理解词义、掌握句型并形成表达意愿, 又为何不少看似生动的活动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学习质量。若仅以兴趣激发、学习动机或课堂氛围等概念解释这一问题, 仍然不足以触及语言学习的内在认知机制。

具身认知理论为重新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入口。该理论强调, 认知并非脱离情境的抽象计算, 而是与身体结构、感知通道、动作经验和环境互动密切相关^{[4][5][6]}。概念形成、意义理解和记忆提取, 都可能依赖学习者在身体和环境中的经验积累。对于儿童而言, 这一点尤为重要。儿

童往往不是先理解抽象规则, 再将其应用于现实经验, 而是先通过动作、节奏、图像和对象操作等经验线索进入语言意义, 再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语言表征。由此看来, 游戏化教学中的“动一动”“演一演”“找一找”“做一做”并不只是课堂气氛的附属工具, 而可能成为语言意义建构的组成部分。

现有研究虽已讨论具身学习、动作支持、全身反应法、数字游戏与语言教育之间的联系^{[2][7][8][9]}, 但仍存在进一步推进的空间。一方面, 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具身学习的一般价值或某些局部活动形态, 对于如何将具身认知进一步转化为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的设计原则与流程, 阐释仍不充分。另一方面, 在高职《少儿英语教学设计》课程实践中, 相关讨论常停留于案例展示与经验总结, 较少提供能够帮助师范生解释活动、比较活动和重构活动的中层框架。当前真正缺少的, 不是更多有趣的案例, 而是一个能够把理论、目标与活动连接起来的设计逻辑。

基于此, 本文将研究重心放在理论阐释与框架建构上, 拟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 具身认知理论为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提供了哪些关键启示; 第二, 这些启示如何转化为可操作的设计原则与流程; 第三, 该框架如何在高职《少儿英语教学设计》课程中通过案例分析与设计训练加以运用。本文的核心关注点是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设计, 高职课程则构成这一研究的应用场域与培养情境。本文并不旨在提出一套脱离既有教学设计理论的新术语体系, 而是尝试以“具身转译”为关键中介, 重新理解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中目标、情境、模态与评价之间的关系, 并为教学设计提供一种更具解释力的分析路径。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 具身认知的核心命题及其教育启示

具身认知是近年来认知科学和教育研究中影响较大的理论取向之一, 它对传统“离身认知”的基本假设提出了系统性质疑。传统认知观通常将认知理解为大脑内部的抽象符号加工, 身体更多只是信息输入与行动输出的外围装置; 而具身认知则认为, 认知从一开始就与身体的构造、感知运动系统以及个体在环境中的活动方式紧密相连^[4]。Wilson 在对相关研究的经典综述中指出, 具

身认知至少包含六种重要观点,其中“认知是情境化的”“认知是为行动服务的”“离线认知也以身体为基础”等命题,对教育研究具有直接启发^[5]。这些观点共同提示我们:知识并不是脱离经验而存在的静态对象,学习也并非单纯的信息接收和存储,而是身体、任务与环境共同参与的动态过程。

Barsalou 提出的知觉符号理论进一步从表征层面说明了身体经验为何会参与认知,该理论认为,人类概念并不是与感觉经验无关的抽象编码,而是与视觉、听觉、触觉、动作等知觉经验保持联系的多模态表征系统^[6]。当学习者理解某一概念时,其大脑并非只是在调用一个离散的语言标签,而可能同时调动与该概念相关的感觉和动作经验。由此可见,教学中的动作、空间位置、对象操作、节奏刺激和情境互动并不是“额外添加”的辅助要素,而可能直接参与概念的激活与提取。

在中文教育研究中,学者们也已对具身认知的教育含义作出较有代表性的讨论。叶浩生指出,具身认知强调身体状态与感觉运动系统对认知形成的根本性影响,这使教育研究必须重新审视身体在学习中的位置^[4]。王靖、陈卫东从教学设计与教育技术的角度讨论了具身认知对学习环境和教学活动设计的启示,强调学习不应仅被视为信息传递,而应被理解为身体参与和情境嵌入的过程^[10]。郑旭东等进一步从具身学习设计角度指出,学习是基于身体感知的即时性行动与借助技术工具的结构化反思两种认知模式的协调运作,知识意义在实践与经验互动中生成^[11]。这些研究共同为本文提供了一个重要前提:如果语言学习是具身的,那么少儿英语教学中的游戏化设计就应重新被理解为意义建构机制,而不只是课堂管理策略。

当然,具身认知并不是内部完全一致的单一理论阵营^{[5][7]}。相关研究中既有较强立场者主张认知表征本身建立在身体经验之上,也有较为审慎的研究者认为,身体与环境并不必然取代抽象表征,而是在不同任务中以不同程度参与认知加工。对教育研究而言,这一区分提醒我们,不宜把具身认知简单理解为凡教学皆须大幅运动,也不宜把身体活动机械等同于学习效果。本文采取的是较为审慎的应用性立场,即承认身体经验、动作组织和情境嵌入对语言学习具有重要支持作用,但并不将其绝对化为唯一机制。正因如此,本文所建构的框架强调的是身体经验如何进入语言意义建构。

(二) 游戏化教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及其局限

“游戏化教学”在国内外研究中并不是一个单一概念。广义上,它既可以指将游戏机制与游戏元素引入教学过程,也可以指通过游戏任务和游戏环境来组织学习活动;在语言教育中,它还常与游戏化学习、游戏辅助学习、数字游戏学习等概念相互交叉^{[2][3]}。Poole 与 Clarke-Midura 对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数字游戏研究进行系统综述后指出,游戏环境能够为目标语言的输入、输出和互动提供丰富场景,但不同类型游戏对学习的支持并不自动成立,其效果高度依赖任务设计和教学整合方式^[2]。顾怡雯等对国际游戏化学习研究的梳理表明,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学习特征、课程设计与开发、教学工具及应用效果等维度;相较之下,对不同学习内容如何在认知层面与游戏活动结合的讨论仍有进一步深化空间^[3]。

在少儿英语课堂中,游戏化教学因其符合儿童注意方式和活动偏好而具有现实吸引力。教师常使用歌曲游戏、卡片竞赛、肢体模仿、情境表演、寻物任务和奖励闯关等方式组织课堂。从教学直觉看,这些活动通常优于长时间的单向讲授,因为它们更容易维持参与和调动情绪;但从研究层面看,兴趣与参与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学习质量。若一个活动没有帮助儿童理解目标语言的意义,没有提供语言输入与输出的必要性,或没有把动作、对象和情境纳入同一学习链条,那么它即便形式丰富,也可能只是热闹的无效活动。

由此可以看到,游戏化教学研究虽然充分说明了游戏在组织学习中的潜力,却并未自然解决“为何某些游戏能支持语言理解而另一些不能”这一问题。当前很多讨论仍停留在“有趣—投入—喜欢”的表层逻辑上,而较少进一步解释:在语言学习中,活动如何通过身体参与、多模态信息与情境任务促进概念形成和表达迁移。对于少儿英语这样的实践性课程而言,这一解释缺口会直接转化为教学设计上的模糊:学生知道应该“设计游戏”,却不清楚究竟该怎样把语言目标、动作经验和活动组织连成一个整体。

(三) 具身认知与语言教育研究的结合及其研究空间

近年的语言教育研究已开始从具身认知的角度重新理解学习活动。Jusslin 等对语言教育中的具身学习研究进行混合研究综述后指出,具身活动在语言教育中的表现形式较为多样,既包括动

作、手势与对象操作,也包括戏剧、节奏和多模态资源参与的教学组织;从研究分布看,相关研究较多见于学前、小学和初级外语学习情境,其中词汇学习尤为突出^[7]。这表明,具身视角已不再只是认知科学中的抽象命题,而开始进入具体的语言教学研究之中。已有研究进一步表明,身体活动与语言学习任务的结合,可能对外语学习产生积极作用,但这种支持并非以单一方式呈现。Kuo 等发现,具身化 TPR 与常规 TPR 在后测和延时测验中的组间差异并不显著,但实验组在学习保持和接受度方面表现更好^[8]。Schmidt 等则指出,与静态教学相比,任务相关和任务无关身体活动均有助于提升儿童外语词汇学习表现,但三组在聚焦注意上未呈现显著差异^[9]。这些研究提示我们,身体参与对语言学习具有潜在支持作用,但其具体效果仍受任务设计、活动组织和教学目标等因素影响,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只要动起来就一定更有效”。

尽管如此,现有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具身学习的效果讨论或具体活动策略,如 TPR、手势教学、戏剧活动等,对于如何从具身认知的一般命题出发,进一步抽象出可供教师和师范生迁移使用的教学设计原则与流程,论述仍不充分。换言之,相关研究较多回答了“具身活动可能有何作用”,却较少进一步回应“教师应如何据此组织教学设计”这一问题。这一不足在高职《少儿英语教学设计》课程中尤为突出。对于学生而言,他们面临的核心挑战并不仅是理解具身认知是什么,而是如何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教学活动与设计判断。因此,本文的切入点在于尝试搭建一个介于抽象理论与零散案例之间的中层框架,使具身认知能够转化为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中可分析、可比较、可迁移的设计逻辑。

三、高职《少儿英语教学设计》课程中的现实问题

(一) 课程定位与研究场域说明

《少儿英语教学设计》通常是高职学前教育或英语教育专业中连接语言基础课程与教育实践课程的重要环节。其核心任务是帮助其从儿童学习特点出发,设计适宜的少儿英语活动、组织课堂流程并进行教学反思。换言之,这门课程具有鲜明的“转化性”特征:学生不仅要理解语言学习内容,还要学会将其转化为适合儿童的课堂活动。它比一般理论课程更依赖设计逻辑,也更需要能

够连接理论与操作的中层方法支持。将这一课程作为本文的探索场域,也在于高职培养情境具有较强的实践导向。学生在模拟授课、见习和实习中,往往首先面对“活动是否可实施”“课堂是否有参与度”等具体压力,却较难进一步解释语言目标与活动机制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常见的困难是难以判断哪些活动真正服务于语言学习,哪些只是形式层面的热闹安排。因此,本文在高职《少儿英语教学设计》课程中讨论具身认知,试图回应一种具体的培养需求:如何帮助学生从“会模仿活动”进一步走向“会解释活动、会改写活动、会构造活动”。

(二) 重趣味呈现,轻语言目标嵌入

结合课程教学实际可以发现,高职学生在进行少儿英语游戏化设计时,常常先考虑活动如何热闹,再考虑语言如何进入其中。结果往往是教学方案拥有完整的分组方式、竞赛规则、卡片材料和奖励机制,却没有围绕核心语言目标建立清晰的输入、操练和输出链条。例如,一节原本应围绕方位介词展开的教学设计,学生可能花大量篇幅设计“找宝藏”“抢答积分”“小组闯关”等形式,但在具体任务中,儿童并不一定真正需要使用 in、on、under、behind 等表达完成目标,活动反而变成了在游戏外壳之下对零散语言项目的重复识记。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学生缺乏将语言目标嵌入活动过程的设计能力。对他们而言,语言目标常常停留在教案首页,而游戏活动则另成一套流程,两者并未真正咬合。若缺少能够连接语言意义、身体动作和任务情境的设计框架,学生就很容易陷入“目标写得明确,活动却无法支撑目标实现”的分裂状态。

(三) 重身体调动,轻身体经验的认知功能

在不少教学设计中,身体参与通常表现为“站起来回答”“做动作猜词”“跑到黑板前贴图片”“拍手跟读”等活动形式。这些做法并非没有课堂价值,但它们往往只是把身体当作课堂节奏的调节手段,而没有进一步思考动作本身与词义、句意或任务情境之间是否建立了必要联系。换言之,学生知道少儿英语课堂需要动起来,却未必清楚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动起来。

这正是具身认知理论能够介入的关键。具身认知真正强调的是身体经验在意义理解中的作用。若动作与语言之间缺少映射关系,若身体参与只

是附着在活动表面的形式安排,那么“动起来”本身并不必然支持学习。高职学生之所以容易把身体活动理解为课堂装饰,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接触到的许多案例更强调活动形式,而较少解释动作的认知功能。其结果是,学生学会了不少“怎么做”的表层方法,却没有形成“为什么这样做”的设计判断。

(四) 重案例模仿,轻设计论证与迁移

高职课程中的另一个常见现象是,学生在模仿现成案例时往往表现较为顺利,但一旦教学主题、年龄段或语言项目发生变化,设计质量便明显下降。因为学生掌握的往往是零散技巧和表层模板,而非可迁移的设计逻辑。比如,他们可能知道动物词汇教学可以加入模仿动作和头饰表演,也知道颜色教学可以设计“找颜色”游戏,但当任务转换为方位介词、情绪表达或简单交际句型时,就不清楚应如何继续组织活动。

从能力培养的角度看,这说明课程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帮助学生拆解案例、解释设计并进行迁移重构的中层结构。只有当学生能够说明某个活动为何有助于语言理解、其身体参与是否支持意义建构、情境任务是否具有必要性,他们才可能真正从“会模仿活动”走向“会设计活动”。

四、基于具身认知的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设计框架

(一) 框架建构的基本思路

若承认语言学习是身体、环境与意义共同作用的过程,那么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的设计起点就不能只是“选择一个有趣的游戏”,而应首先回答三个问题:本节课希望儿童获得什么语言意义经验;这种意义经验需要借助哪些身体动作、空间关系、对象操作或感知线索才能更易进入;这些经验又应如何被组织进连续的情境与任务之中。由此,游戏化教学的重点不再是外部元素的拼装,而是具身经验与语言目标之间的系统组织。

基于这一思路,本文从两个层面建构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设计框架。第一,提出身体动作—语言意义映射、多模态协同、情境驱动和递进式参与四项设计原则,用以回答教学设计应遵循何种基本判断标准。第二,构建“目标定位—具身转译—情境编排—多模态组织—反思评价”的流程框架,用以说明教学设计可以如何展开。前者

强调设计判断的依据,后者强调设计实施的路径,两者共同构成具身认知视角下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的基本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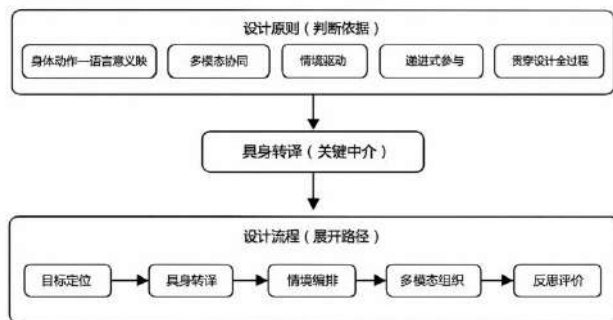


图1:基于具身认知的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框架

其中,“具身转译”是这一框架的关键中介。本文所谓“具身转译”,是将原本以文字或符号形式存在的语言项目,转化为儿童能够感知、模仿、操作和体验的意义支点。只有经过这一环节,语言目标才可能进一步进入情境编排与多模态组织之中,并在任务推进中获得实际的学习价值。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并非将具身认知附着在一般教学设计流程表面,而是试图以“具身转译”为中介,重新理解目标、情境、模态与评价之间的关系。本文所提出的流程框架试图在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中,为语言目标与活动设计之间补入一个更具解释力的中间层。相较于一般意义上强调活动趣味、流程完整与课堂参与的设计思路,本文更关注语言项目如何先被转化为可感、可做、可体验的经验支点,再被组织进具有任务必要性的情境链条之中。

(二) 四项设计原则

1. 身体动作—语言意义映射原则

这是整个框架的核心原则。具身认知的重要启示之一在于,语言理解并非完全依赖抽象符号系统,而可能借助身体经验形成意义表征^{[4][5][12]}。因此,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中的动作设计不应只是课堂热身、纪律维持或表演装饰,而应尽量与词汇、句型或交际意图建立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对儿童而言,这种对应关系能够降低抽象理解的难度,使语言学习获得更直接的经验支点。所谓“映射”并不等于机械比划,也不意味着每一个词都必须附带固定手势。关键在于动作是否真正服务于意义进入。例如,动物词汇可以借助具有识别度的模拟动作建立词义线索,方位介词可以通过身体位移和对对象摆放呈现空间关系,动作词和

情绪词则更适合结合表演、语气和情境反应凸显状态特征。相反,如果一个动作只是为了让儿童有事可做,却不能帮助其理解目标语言,那么这一动作的教学价值就十分有限。

2. 多模态协同原则

Barsalou 的知觉符号理论表明,概念通常通过多种感觉通道被激活与维持^[6]。在少儿英语课堂中,仅依赖单一听觉讲解或单一视觉识图,往往难以充分契合儿童的学习方式。因此,游戏化教学需要在不造成信息过载的前提下,有意识地整合视觉、听觉、动觉、触觉、节奏感和同伴互动等多种模态,使不同线索围绕同一语言目标发生协同。这一原则的重点不在于模态越多越好,而在于不同模态是否共同服务于同一意义建构过程。例如,在教授 *under* 时,教师可以让儿童实际把玩具放到桌子下面,同时听到句子、看到位置变化并说出表达,此时视觉、动作和语言便形成了协同关系。相反,若课堂中同时引入过多无关音效、花哨动画和复杂规则,就可能分散注意,削弱目标语言的突出性。因此,多模态协同本质上是一种围绕语言目标进行的资源编排原则,而非简单的刺激叠加。

3. 情境驱动原则

具身认知强调认知的情境嵌入性^{[4][5]}。这意味着,少儿英语课堂中的语言学习不宜长期停留在脱离语境的零散操练,而应尽可能进入具有任务性、关系性和行动必要性的活动场域。在游戏化教学中,情境并不是故事包装,也不是与教学内容分离的背景设置,而是决定儿童为什么要听、为什么要说、为什么要做的行动理由。例如,“动物园探险”“帮小熊找玩具”“生日派对准备”“在超市买东西”等情境之所以有效,除了趣味性,也因为它们能够形成连续的任务链条:儿童需要识别、比较、寻找、判断、回应和表达,语言因而成为完成任务的必要资源。若缺乏这一层结构,游戏化活动就容易沦为若干零散环节的拼接,儿童虽然完成了动作,却未必真正进入了语言使用过程。

4. 递进式参与原则

无论是儿童的语言学习,还是学生的教学设计训练,都不应被理解为进一步到位的结果,而应被看作逐步深化的参与过程。对儿童而言,具身参与通常经历由感知、模仿到操练和表达的推进:先看与听,再做与仿,继而在任务中使用,最终

在情境中表达。对学生而言,设计能力的发展也更可能经历由识别案例逻辑、改写案例到独立设计的递进过程。若忽视这种层次性,一味要求学生直接完成高质量教案,反而容易导致机械拼贴和概念套用。因此,递进式参与原则提醒教师在课程设计中通过分层任务,引导学生逐步学会分析动作与意义的关系、判断情境任务是否成立、比较多模态组织方式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立设计能力。

(三)“目标定位—具身转译—情境编排—多模态组织—反思评价”流程框架

1. 目标定位

任何少儿英语游戏化设计都应从语言目标出发,而不是从活动形式出发。设计者首先需要判断:本节课的重点究竟是词汇意义建立、句型操练,还是情境交际;儿童最需要掌握的是识别、理解、回应,还是表达;语言项目的主要难点是抽象概念、空间关系,还是发音与记忆。只有当目标被明确界定,后续的动作设计、情境组织和资源配置才有依据。

2. 具身转译

具身转译是指将原本以文字或符号形式呈现的语言内容,转化为儿童能够感知、模仿、操作和体验的意义支点。这一步是具身化设计与一般活动设计的重要分界线。它要求设计者判断:哪些内容适合通过动作呈现,哪些适合通过空间关系展示,哪些需要借助真实物品或对象操作,哪些则可以通过节奏、声音和表情辅助理解。若这一环节处理得当,语言就不再只是被讲解的对象,而成为能够被实际经历的内容。

3. 情境编排

在完成具身转译后,设计者还需要将分散的动作、对象和资源编入一个具有任务链条的情境中。情境编排的重点不在于故事是否复杂,而在于活动之间是否形成连续关系,儿童是否需要通过语言与动作的协同来推进任务。例如,从导入中的发现问题,到中段的识别与操练,再到后段的合作表达与结果反馈,语言应始终是完成任务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事后附着的口头标签。

4. 多模态组织

多模态组织关注的是教学过程中各种资源之

间的关系。设计者需要考虑：图片、卡片、音频、玩偶、身体动作、空间摆放和同伴互动等元素，是否围绕同一目标协同工作；哪些模态用于引发注意，哪些用于帮助理解，哪些用于支持表达；又如何避免资源过多导致目标语言被稀释。高质量的多模态组织并不追求复杂，而追求清晰、有序并服务于目标。

5. 反思评价

在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设计中，评价并不仅发生在教学结束之后，也应贯穿于设计过程本身。对高职师范生而言，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检视一个设计是否成立：其一，身体参与是否真正帮助语言意义进入，而非只是制造热闹；其二，情境任务是否使语言使用具有必要性和连贯性；其三，多模态资源是否协同服务于目标，而非彼此干扰。通过这样的反思评价，学生逐步形成分析标准，也更容易在不同主题之间进行迁移。

五、框架在高职《少儿英语教学设计》课程中的转化路径

（一）从理论输入到设计判断：课程内容的重组

若要使上述框架真正进入高职课堂，课程组织方式就不能停留在“教师讲理论—学生看案例—学生照着写教案”的线性结构，而应将设计判断能力作为核心培养目标。课程内容可以围绕三条线索重组：第一条线索是具身认知的基本概念及其教育含义，解决学生“为什么要关注身体和情境”的认识问题；第二条线索是对现有少儿英语案例的结构分析，帮助学生识别动作、情境、语言目标和多模态资源之间的关系；第三条线索则是分阶段设计训练，使学生在改写、比较和重构中掌握框架的使用方法。学生不再只是把理论当作背景知识记忆，也不再只是把案例当作现成模板套用，而是逐步形成用理论解释案例、用框架重组案例的能力。具身认知在这里的作用，不是增加一个时髦概念，而是为设计判断提供尺度。

（二）从案例欣赏到案例拆解：分析训练的实施

在很多课程中，学生看到优质案例时容易说“这个活动很好玩”“小朋友应该会喜欢”，但这类判断通常停留在表层印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教师可以把案例欣赏转为案例拆解，可以要求学生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分析：该案例的核心语言目标是什么；设计者通过哪些动作或对象操作帮助

儿童理解目标语言；情境任务是否形成连续链；活动中的语言使用是在真正完成任务，还是只是事后附着；多模态资源是否服务于同一目标。通过重复进行这类拆解训练，学生会逐渐意识到，一个看似简单的游戏活动背后其实包含若干关键设计判断。只有当他们学会拆解案例，才有可能改写案例和独立设计案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具身认知从抽象理论转化为课程中的分析工具。

（三）从局部改写到完整设计：分层任务的安排

对高职学生而言，直接要求其独立完成一份高质量教案往往难度过高。更有效的方式是设置分层任务：先从局部改写入手，再逐步过渡到完整设计。第一阶段可以只要求学生改写某一环节，例如把一个单纯的抢答活动改写为具有动作—意义映射关系的练习；第二阶段可要求学生围绕同一语言目标设计不同情境，并比较其优劣；第三阶段再进入完整教案设计和模拟授课。因为教学设计能力的形成本就具有递进性，学生若未经历局部分分析和局部改写，就很难在完整设计中作出稳定判断。分层任务的安排恰好对应了具身框架中的递进式参与原则，使理论不只体现在儿童课堂设计中，也体现在师范生自身的学习过程里。

（四）从结果评价到论证评价：课程考核方式的调整

在传统教案评分中，教师往往更关注流程是否完整、活动是否丰富、语言点是否出现，但对设计理由本身重视不足。若采用具身框架，课程评价就应从“结果导向”适度转向“论证导向”。也就是说，不仅要看学生设计了什么，更要看其能否说明为何这样设计。比如，某个动作为何有助于词义理解，某种情境为何更能支持目标句型使用，某些资源为何被纳入，而另一些被舍弃。只有当学生能够为设计选择提供论证，其设计能力才算真正形成。因此，在课程考核中，可以将“设计说明”作为与教案同等重要的评价对象，要求学生简要阐述自己对目标定位、具身转译、情境编排和多模态组织的考虑。这样一来，课程评价本身也成为培养学生设计思维的一部分。

六、案例阐释：框架如何进入具体教学设计

（一）案例一：Animal Adventure——动物主题词汇教学

动物主题是少儿英语中最常见的内容之一，

也是高职学生最容易设计成“热闹但浅表”的教学单元。若从具身框架出发,其设计重点不应只是让儿童模仿动物动作,而应思考动作如何真正参与词义识别和句型表达。该案例面向幼儿园大班至小学低年级学生,核心语言目标为掌握 dog、cat、bird、fish、elephant、monkey 等动物词汇,并在情境中使用“It's a ...”进行识别和表达。

在目标定位阶段,教师首先要明确本节课并不以复杂句型输出为主,而以词义建立和初步表达为核心。因此,具身转译的关键是为每个动物设计高识别度动作,并让动作与声音、图像、卡片和口头表达形成稳定对应。例如,模拟 dog 的耳朵、fish 的摆尾、elephant 的长鼻子等动作,本身就能为儿童提供视觉和动作上的意义线索。如果只是要求儿童大声跟读单词,即使课堂也能维持秩序,但词义与语言形式之间的联系会明显更弱。

在情境编排上,教师可以将课堂组织为“动物园探险”或“寻找失踪动物”的连续任务。儿童需要先通过声音和图片猜测动物,再通过模仿动作和小组表演完成识别,最后在“谁不见了”“它在哪里”等情境问题中使用“It's a ...”做出回应。此时,动作是服务于连续的识别、比较和表达过程。学生在分析这一案例时,应被引导去判断:哪些动作真的有助于词义进入,哪些动作只是表演性模仿;情境任务是否让语言使用具备必要性;多模态资源之间是否形成了清晰协同。这一案例还可进一步用于训练迁移能力。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将相同框架迁移到 farm animals、sea animals 或 zoo rules 等不同主题,比较在目标变化后哪些动作可以保留,哪些情境必须调整。通过这种对比,学生学会的就不局限于某个主题活动,还包括一个可迁移的设计方法。

(二) 案例二: Where Is the Teddy?——方位介词教学

相较于动物词汇,方位介词更能体现具身认知的解释优势,因为上、下、里、外、前、后等概念天然与空间经验相关。若仅依赖图片讲解,儿童虽然可能短时记住单词,却未必真正理解介词所指涉的空间关系。该案例面向小学低年级学生,核心语言目标为理解并运用 in、on、under、behind 等方位介词,并在寻找物品的活动中使用“Where is the teddy?”“It's under/on/in/behind ...”等表达。

在具身转译阶段,教师可以让儿童先通过身

体位移和对象操作体验这些方位关系。例如,让学生“站到椅子后面”“把小熊放进盒子里”“把铅笔放在书上面”“躲到桌子下面”等。此时,语言并非对静态图片的抽象说明,而是对正在发生的空间关系进行命名。儿童在身体和对象操作中获得的经验,会为介词意义提供直接支撑。

在情境编排上,课堂可围绕“帮小熊找玩具”或“藏宝游戏”展开。教师先隐藏玩偶,再给出提示,儿童根据位置线索寻找目标;之后让学生轮流成为“藏宝人”,用方位表达给同伴提供语言提示。这样,听、看、做和说被整合进同一任务链条中,介词不再是脱离用途的语言项目,而成为完成任务的必要资源。对高职学生而言,这一案例尤其重要,它能帮助他们认识到:并非所有少儿英语教学都适合简单唱跳,有些内容的关键恰恰在于对象操作和空间体验。

在案例分析阶段,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比较两种设计思路:一种是传统的看图讲解加连线练习,另一种是具身化的空间体验加任务表达。比较的目的是让学生具体说明:两种设计在意义进入方式、注意分配、语言使用必要性和儿童参与质量上究竟有何差异。通过这种比较,学生更容易把具身框架内化为设计判断标准。

(三) 案例的课程化功能

上述两个案例的意义在于它们能够作为高职《少儿英语教学设计》课程中的“分析样本”和“改写对象”。教师完全可以要求学生围绕同一框架,对案例进行删改、扩写和重组。例如,在动物主题中改造情境链条,在方位介词中调整任务难度,在多模态组织上比较使用真实物品与图片材料的差异。通过这样的课程化运用,案例从“给学生抄写的模板”转变为“促使学生思考的对象”,而具身认知也就真正进入了教学设计训练。

同时也应看到,本文所举两个案例都属于相对容易进行具身化处理的语言内容,这一选择有其便利性,也暴露了框架当前的边界。对于故事理解、情节复述、情感表达和更高阶语篇任务而言,具身设计未必仍然主要体现为单个词语与手势动作的一一对应,而更可能体现为角色姿态、事件路径、空间移动、情绪体验和互动结构的组织。换言之,语言任务抽象度越高,具身设计就越不能停留在“配动作”层面,而需要转向对叙事结构、角色关系和交流场景的整体编排。

七、结论

本文从理论分析与课程设计需要出发,讨论了具身认知如何为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提供更具解释力的设计逻辑。文章的基本判断是:少儿英语游戏化教学的价值,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兴趣激发、课堂活跃或规则丰富,而应放在身体经验、语言意义与情境任务的关系中加以把握。只有当身体参与真正成为意义建构的组成部分,游戏活动才不只是教学形式的装饰,而能够转化为支持理解、记忆与表达的学习过程。因此,本文提出了身体动作—语言意义映射、多模态协同、情境驱动和递进式参与四项设计原则,并构建了“目标定位—具身转译—情境编排—多模态组织—反思评价”的流程框架。

同时也应看到,本文所提出的框架主要基于理论归纳与课程实践观察,尚未通过系统的课堂实验、行动研究或学生作品分析加以检验,因此其适用性和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其次,文中所举案例主要集中于词汇和方位关系等较易进行具身化处理的语言项目,对于故事理解、语篇表达和更高阶语言任务,框架的适用方式仍需细化。再次,不同高职专业、生源基础和课程安排之间存在差异,同一框架在不同培养场景中的实施难度和教学重点也可能并不相同。

未来研究可沿三个方向继续展开:一是结合高职《少儿英语教学设计》课程中的学生教案、模拟授课与课堂观察资料,对该框架的实际适用性进行持续修订;二是将具身框架拓展到更多语言项目,如情绪表达、简单叙事、功能句型和跨文化主题活动,以检验其解释范围;三是在教育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进一步探索增强现实、交互式白板和数字游戏资源如何与具身设计原则结合,避免技术应用重新滑回形式热闹而认知空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2] Poole F J, Clarke-Midura J. A systematic review of digital gam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stud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Based Learning*, 2020, 10(3): 1-15.
- [3] 顾怡雯, 张佳怡, 张孔燕, 等. 近五年国际游戏化学习研究综述[J]. *开放学习研究*, 2020, 25(4): 10-18.
- [4] 叶浩生. 具身认知: 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J].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18(5): 705-710.
- [5] Wilson M. Six views of embodied cognition[J].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2002, 9(4): 625-636.
- [6] Barsalou L W. Perceptual symbol systems[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999, 22(4): 577-660.
- [7] Jusslin S, Korpinen K, Lilja N, et al. Embodi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approaches in language education: A mixed studies review[J].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2022, 37: 100480.
- [8] Kuo F R, Hsu C C, Fang W C, et al. The effects of embodiment-based TPR approach on student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achievement, retention and acceptance[J]. *Journal of King Saud University-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4, 26(1): 63-70.
- [9] Schmidt M, Benzing V, Wallman-Jones A R, et al. Embodi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Effects on primary school children's atten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vocabulary learning[J].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2019, 43: 45-54.
- [10] 王靖, 陈卫东. 具身认知理论及其对教学设计与技术的应用启示[J]. *远程教育杂志*, 2012, 30(3): 88-93.
- [11] 郑旭东, 王美倩, 饶景阳. 论具身学习及其设计: 基于具身认知的视角[J]. *电化教育研究*, 2019, 40(1): 25-32.
- [12] 殷融, 苏得权, 叶浩生. 具身认知视角下的概念隐喻理论[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2): 220-234.

智能算法驱动下青年价值引领的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

蔡蕊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重庆 400065)

摘要: 智能算法重塑了青年价值塑造的现实图景, 在提升引领精度效度的同时也引发了深层困境。智能算法内嵌资本逐利、技术偏好与工具理性三重逻辑加剧了信息茧房、泛娱乐化、算法权力扩张与即时满足成瘾的交织共振, 使青年价值认知呈现“窄化”与“偏化”、价值认同陷入“轻化”与“虚化”、价值选择面临“物化”与“从化”、价值践行则出现“韧性”不足与行为“退化”的现实困境。为破解上述难题, 需要构建“技术向善—制度规约—主体赋能”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格局, 提升算法时代青年价值引领实效性 with 方向性。

关键词: 智能算法; 价值; 价值引领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 年度一般课题“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数字化教学的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K23YGG2160403)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31

Practical Dilemmas and Solutions of Youth Value Guidance Driven by Intelligent Algorithms

Cai Rui¹

¹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Intelligent algorithms are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of youth value formation. While enhancing the precision and efficacy of value guidance, they have also precipitated profound dilemmas. Driven by the triple logic of embedded capital profit-seeking,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se algorithms exacerbate the interplay of information cocoons, pan-entertainment, algorithmic power expansion, and instant gratification addiction. Consequently, youth value cognition faces "narrowing" and "deviation"; value identity suffers from "trivialization" and "hollowing-out"; value choices confront "materialization" and "conformity"; and value practice exhibits insufficient "resilience" alongside behavioral "regression."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t is imperative to construct a tripartite systemic framework integrating "technology for good,"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 and "subject empowerment" to bolster the effectiveness and directionality of youth value guidance in the algorithmic era.

Keywords: Intelligent algorithms; Values; Value Guidance

当今时代, 智能算法日益融入社会生活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 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青年作为网络原住民, 他们的所见所闻、所喜所恶、所信所疑, 无不在智能算法的隐性调配中渐次形塑。然而, 智能算法并非冰冷的“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 而是重塑青年获取信息、建构认知、形成判断的重要性“价值变量”。它以偏好迎合为运行逻辑的推荐机制, 在选择性放大某些价值光谱的同时, 又系统性地遮蔽另一些意义向度。由此催生的深层悖论在于: 智能算法推荐在提升信息分发效率、满足个体偏好层面的“精准”与“高效”, 也构成青年价值引领“提质”与“铸魂”要求的根本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为此, 本文立足于智能算法重塑青年价值生态的现实图景, 揭示智能算法驱动下青年价值引领面临的多重困境, 并积极探索应对之策, 以期对数字时代青年价值观培育的理论深化与实践突破提供参照。

一、智能算法驱动下青年价值引领的运行逻辑

智能算法为何从一种技术工具演变成能够深度影响青年价值观形塑的力量? 回答这一问题, 首先需要我们透过技术的表象, 揭示其运行机理, 方能明晰智能算法作用青年价值观的底层逻辑。

(一) 资本逐利逻辑对铸魂育人逻辑的僭越

在智能算法开发和运作的实际场域中, 它以资本逐利为根本动力, 其底层代码已深度内嵌追逐利益的意志, 导致资本逐利逻辑对铸魂育人逻辑发生了严重的僭越。所谓“僭越”, 并非前者完全取代了后者, 而是智能算法充当了资本逐利逻辑的执行代理, 它以一种“客观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的面目, 通过技术执行层面的优先权, 持续侵蚀铸魂育人价值引领层面的实质性效力。这种僭越不仅颠覆了技术赋能教育的初衷, 更在深层结构上消解着青年价值观塑造的理性基础。在价值排序上, 智能算法将资本追逐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凌驾于铸魂育人目标的价值引领之上, 直接主导了什么内容被看见与什么内容被忽略的筛选过程。具体来讲, 智能算法通过对海量用户行为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建模, 识别并预测哪些内容最有可能触发点击、停留与转发行为, 从而实现流量变现。在此运行逻辑下, 具有高感官唤醒度、强情绪煽动性、低认知负荷特征的内容, 譬如悬念迭起的爽文式短剧、AI“魔改”视频、情绪化标题、争议

性话题、明星八卦等, 因具有天然的注意力吸附优势, 往往被判定为“高价值内容”, 从而在流量池中获得优先分发和持续加热。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真正探讨青年成长困惑、承载思想深度和价值厚度的优质内容, 因理解门槛较高、情绪唤起较难、难以在数秒之内完成完播动作, 在算法的运行逻辑中被判定“流量竞争力”不足被持续边缘化, 从而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效应。

(二) 技术偏好逻辑对多元平等逻辑的消解

智能算法虽然有不同的表现类型,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导向, 即技术偏好逻辑, 表现为“信息平台通过多种算法模型之间的交叉和配合来实现对不同用户群体的个性化推送。”^[1]智能算法将具有相似行为习惯和偏好特征的用户划归为同一信息群落, 并向其反复推送同质化的内容。表面上看, 这是智能算法满足个体需求的精准回应, 实则是一套数据将人分层归类、从而封堵异质信息渗透的运行机制, 违背了尊重主体差异、保障机会平等的多元平等逻辑。多元平等的起点, 即差异的相遇、非同质性的对话, 然而在智能算法分群的那一刻, 便已经被技术偏好逻辑悄然消解。一方面, 智能算法通过数据分层归类, 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偏差, 导致小众群体、边缘群体的需求被忽视或弱化, 这破坏了不同群体、不同需求在技术应用和资源分配中的公平性原则。这种偏差会进一步反哺技术应用的偏向性, 使技术资源向主流群体倾斜, 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 智能算法倾向于向用户推荐高度同质化的内容, 这虽然提升了用户的短期体验, 却剥夺了青年接触多样化观点, 突破自身思维惯性的机会。青年在不知不觉中被算法从多元可能的世界中“移出”, 安放于一个经验高度趋同、价值不断自证的封闭空间。在这种逻辑下, 信息茧房日益加厚, 价值共识难以在多元碰撞中形成, 反而加剧了群体极化与价值割裂。

(三) 工具理性逻辑对价值理性逻辑的压制

智能算法本质上以工具理性为准则, 其通过代码将复杂的人类价值问题简化为可计算的技术问题, 从而导致工具理性逻辑对价值理性逻辑的压制。这种压制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 而是技术发展过程中价值导向的结构性失衡, 深刻地改变着青年的精神生活和意义世界。一方面, 工具理性遵循“效率至上”的原则, 要求一切投入和产出具有“可计算性”和“可量化性”的具体指标, 这无

疑压制了价值理性所倡导的人文关怀。这种评判标准的确立,似乎宣告凡是不能被数据化和量化的价值,是不存在的或者不重要的。例如,智能算法技术致力于精准分发与流量聚合,将内容价值简化为点击率、完播率、转发率等冰冷的指标,却忽视了信息茧房、隐私泄露等伦理风险,将人异化为数据节点与消费符号,消解了价值理性所倡导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工具理性颠倒了人与技术的主客关系,催生了“异化的人”。“数据化犹如一个扭曲的镜像,其构造了一个以数据为基础的量化世界,却一定程度上遮蔽扭曲了现实世界,并用被数据化的人取代了现实中的人,导致了人的异化。”^[12]在智能算法场域中,青年不再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人,而是被数据化、标签化的流量节点。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资源和曝光,逐渐习惯将“是否有用”“能否变现”“有无热度”作为衡量价值实现的优先框架,将自身价值实现异化为对数据指标的追逐和对流量的盲从。当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就意味着压制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容易导致人意义的沦丧和精神的空虚。

二、智能算法驱动下青年价值引领的现实困境

智能算法对青年价值观的冲击呈现出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由知到行的递进性特征,已经深度地介入青年价值认知、价值认同、价值选择与价值践行的全过程,青年价值观的窄化、虚化、物化等问题便不再只是隐约的隐忧,而是亟待正视的现实困境。

(一)价值认知困境:茧房效应加剧,导致价值“窄化”与“偏化”

价值认知,从心理层次上来讲,对应的是“知”,即知识层面,核心问题要求知不知道、不了解,它关乎青年“看到什么”“知道什么”以及“以何种认知框架理解世界”,构成价值引领的起点。智能算法迎合偏好的个性化推荐机制在提升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也构筑起封闭的“信息茧房”,致使青年的价值认知陷入“窄化”与“偏化”的困境。一方面,在“信息茧房”的作用下,青年价值认知逐渐“窄化”。在智能算法介入之前,青年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他们通过筛选、比较、整合,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这一过程固然费力,但通过理性思维的调用,认知结构在多元信息碰撞中保持开放和弹性。然而,智能算法通过“猜你喜欢”,让青年长期处于“所见即所爱”的舒适区,

价值认知的广度在舒适区中被持续压缩,青年对世界多元可能性的感知也随之枯萎。另一方面,价值“偏化”相伴而生。“技术的迭代和青年文化寻求个性标识的诉求彼此呼应,形成了网络时代圈层化的交往。”^[13]在同类信息的反复浸染下,网络时代圈层化内部的观点在缺乏外部制衡的情况下不断极化与扭曲。算法为了增强用户粘性,往往优先推荐具有情绪煽动性、立场极端化的内容,这进一步催化了群体内的非理性共鸣。青年极易将网络时代圈层内的局部经验升格为普遍真理,将偏见视为圭臬,导致价值认知的偏移。这种认知的“窄化”和“偏化”不仅使青年在自我编织的意义网络中越陷越深,更是对主流价值的稀释和误读。

(二)价值认同困境:泛娱乐化弥漫,导致价值“轻化”与“虚化”

价值认同,即心理层面的“情感”,它指向的是“信奉什么”“被什么打动”“对什么有归属感”。一个人可以在认知层面完整地知道某种价值观,但如果内心并不真正信奉它,可以在情感上产生疏离感或抵触感。在技术迭代与资本逻辑的共谋下,泛娱乐化洪流从传播表征渗透至价值结构的深层,引发价值认同的深刻危机。其一,泛娱乐化弥漫,青年价值认同逐渐“轻化”。智能算法构建的泛娱乐化信息生态,通过瞬时情感体验和高频感官刺激,显著“轻化”了青年对严肃价值议题的情感投入,进而动摇了价值认同的情感厚度和深度。历史叙事被压缩为碎片化的“热梗”,经典文本被降维为戏谑化的“鬼畜素材”,这种“浅表化”的价值供给,消解了崇高感与严肃性,导致公众认知模式由深度反思向廉价快感滑落。持续性的娱乐浸染让价值的情感根基隐形流失,进而导致价值的深层结构单薄而脆弱。其二,泛娱乐化弥漫催生价值认同“虚化”。价值认同的牢固程度,取决于价值话语能否与个体的具体生命经验发生深切共鸣。一种价值观念若仅停留在抽象的说教层面,无法与青年求知进阶与学业规划形成有效对话,则难以完成从“外在规范”到“内在信守”的转化。当青年习惯了娱乐化叙事对世界的简化编码,那些需要复杂理解、承载张力与伦理重量的价值话语便显得格格不入,它们悬浮于青年的真实情感体验之上,成为可以复述却无法共鸣的符号。价值的“虚化”,正是在这种情感链接断裂处悄然发生的。

(三) 价值选择困境: 算法权力扩张, 导致价值“物化”与“从化”

价值选择是价值认知与认同的延伸与检验, 当青年面临多重价值冲突时, 依据何种标准进行取舍与决断, 彰显的正是价值观的实际效力。与传统算法的“工具理性”不同, “算法的社会本质就是一种权力”[4]。这种权力迥异于传统科层制下具有制度化与强制性特征的实体权力, 它不再依赖显性的行政命令, 而是“将自身的强制性特征隐形化, 显现出商业逻辑、偏好原则、技术理性和隐性运行的特征。”[5]使青年价值选择陷入“物化”与“从化”的双重困境。先论“物化”。在智能算法的量化世界里, 一切都被转化为可计算、可比较、可排序的数据单元。这种可量化逻辑原本服务于内容分发, 却在青年的日常使用中逐渐溢出, 成为他们衡量事物价值乃至人生价值的框架。学业成就被简化为绩点与排名, 职业前景被等同于薪资数字, 社交关系被量化为点赞数与粉丝量, 甚至个人的兴趣、审美与情感表达, 也被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标签所收编。青年不再以内在的意义感知来确认价值, 而是以外在的数量指标来兑换价值, 将人的价值等同于物的价值。再论“从化”, 智能算法权力的另一重面相, 是以“智能推荐”的方式隐性接管了青年的选择路径。无论是看什么内容、追逐什么潮流、模仿何种生活方式, 算法都以“猜你喜欢”“大家都在看”“与你相似的人选择了”等形式, 青年在此过程中体验到的不是被强制, 而是被理解、被服务。“从化”的实质则是: 不是智能算法替青年选择了什么, 而是青年逐渐丧失了价值选择的能力与勇气, 沦为接受算法投喂的客体。

(四) 价值践行困境: 即时满足成瘾, 导致价值“韧性”不足与行为“退化”

在算法推送、无限下拉和“秒回”生态共同编织的数字环境中, 青年个体日益陷入一种高频率、低成本的满足感循环, 并对此产生深度成瘾。这种即时满足成瘾, 不仅弱化了个体抵御诱惑的心理能量, 更从根本上瓦解了价值践行的长效动力机制, 致使青年在价值塑造上呈现“韧性”不足, 在实践行动上出现“退化”现象。价值“韧性”, 是指一种深层的心理弹性, 是个体的核心

价值观在诱惑、挫折等外部因素冲击下不断裂, 是受扰动后仍然能够保持核心价值观不被置换、持续自我修复并调节的内在行为。它需要在一次次延迟满足、克服冲动的反复践行中获得锻炼, 如同肌肉需要抗阻训练一样。即时满足的机制以几乎无缝衔接的快乐供给, 将想要与得到之间的时间差压缩至近乎消失。当个体已经习惯满足成瘾, 便会对需要付出持续努力才会获得回报的深层价值丧失耐心, 产生回避甚至厌倦的心态, 造成稍遇现实阻力便发生价值动摇或信念崩塌。价值“韧性”不足的核心正是价值观从稳定的心理结构内层, 向外围的、易变的认知标签的漂移。这种状态直接映射于行为层面, 体现为一种清晰的“退化”轨迹。行为“退化”表现为价值观在实践践行层面行动意愿的实质性萎缩。在即时满足的裹挟下, 青年“指尖上的勤奋”掩盖了“大脑中的懒惰”, 使得知行关系发生断裂, 即青年虽然掌握了丰富的价值理念, 却因缺乏将理念转化为行动的意志力与实操机会, 陷入“高认知、低行动”的实践性贫困。

三、智能算法驱动下青年价值引领的纾解路径

智能算法驱动下青年价值引领的出现多重现实困境, 纾解之道无法靠单点修补或施策, 而需构建“技术—制度—主体”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格局。其中, 技术向善是源头活水, 提供抵达之力; 制度规约是刚性防线, 守护前行之路; 主体觉醒为最终归宿, 赋予青年成长的方向和意义。三者层层递进、互为支撑, 共同铺就智能算法驱动下青年价值引领的纾解通路。

(一) 技术向善: 优化算法核心技术, 增强主流价值定向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 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 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6]要遏制智能算法因技术发展所诱发的意义危机, 防止主流价值秩序的边缘化, 应对之道不在于技术的克制, 而是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锚定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坚持技术向善原则。也就是说, 正确认识和运用智能算法引领青年价值, 首要的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设定为技术运行的唯一价值航向, 矫正其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偏差, 确保

智能算法技术发展为青年价值观的引领服务,让技术助力成长成才。首先,在内容池准入与分发排序机制中,引入主流价值权重因子。譬如,运用自然语言处理、语义分析等技术,提升对主流价值内容的机器识别精度,并在推荐排序中赋予更高的基准权重,使优质内容在流量竞争中具备优势,打破“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效应。其次,建立信息多样性的强制性干预机制。譬如,在个性化的推荐中,保持一定比例的异质内容与公共议题曝光量。这种强制性的设计并非对个性化推送的否定,而是通过注入必要的多样性的信息,使智能算法在满足个体需求的同时,也承担起破除信息茧房,拓展认知边界、保障信息多元化的社会责任,为青年价值认知的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技术保障。

(二) 制度规约:完善算法治理体系,筑牢价值引领的制度防

智能算法的应用应是解放人、服务人,而非束缚人、捆绑人。当技术红利归资本所有,而价值迷失和不确定风险则由社会承担,这样的技术即便再先进,也称不上真正的智能。智能算法是价值传导的重要载体,是青年认知世界的通道,而非精神垃圾场,因而其运行逻辑必须受制于制度框架的刚性规约。一是明确智能算法治理的法律规范体系的价值底线。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为加强算法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持,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多侧重于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对智能算法的价值规约相对不足。因而,应该明确将主流价值导向写入智能算法推荐的运行原则,确立算法不得逾越的红线和底线,识别并修正可能存在的偏见与歧视,以主流价值凝聚思想共识,对违背公序良俗的负向价值导向实施一票否决。二是建立全链条监督和问责机制,构建“前端审查—中端监测—末端问责”的全链条监管责任闭环,以制度刚性倒逼平台企业从“他律”转向“自律”的根本转变。具体而言,在前端,实施智能算法备案与安全评估制度,要求算法研发者和平台方披露算法的核心运作逻辑,赋予青年群体对算法推荐的“解释权”与“申诉权”,打破技术黑箱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在中端,建立实时监测预警系统,对异常流量与诱导性推送进

行精准拦截,防止青年价值观偏轨;在末端,落实问责制,加大惩戒力度,提高违规成本,形成“不敢违、不能违、不想违”的高压态势,从而筑牢抵御青年价值异化的制度堤坝。

(三) 主体赋能:激活内生动力,实现知行合一的自觉转化

技术治理和制度规约为青年价值引领提供了外部保障,但要真正实现“外部约束”向“内生秩序”的跨越,必须回归主体维度。主体赋能,即激活青年的主体意识,使其从智能算法投喂的“被动客体”成长为价值选择的“能动主体”,帮助青年完成“要我认同”到“我要认同”“我要践行”的深刻转变。一是以认知素养夯实理性根基。应当加强算法素养教育,将智能算法推荐背后的商业逻辑、权力属性、基本特征等内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融入学校课程和社会教育,帮助青年为算法技术祛魅,揭开智能算法运行的神秘面纱。唯有教育青年明晰智能算法“为何推荐”“如何推荐”,才能破除其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在认知层面提升算法素养,重建理性判断的能力,为价值自觉奠定理性根基。二是以情感素养涵养价值认同。价值引领要入脑入心,仅停留在“知”的层面是不行的,还须打通“情”的通道。“文化作为主体性确立的重要因素,是数字青年精神存在维度的重要表现方式。”^[7]应当充分运用中华文化中的丰厚资源,以直抵人心的叙事方式将真挚的情感与远大的理想内化为青年深切的价值认同,进而唤起其对崇高意义的深层共情与自觉向往。当青年在情感上与家国情怀、时代使命、艰苦奋斗等价值内核产生深切共鸣,那种由智能算法制造的即时满足的娱乐快感变相形见绌,内生性的价值认同由此生发。三是强化具身实践与价值确证。要引导青年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文化传承等真实情境中反复锤炼,在具身实践中检验和确证主流价值的真理力量。通过将宏大的价值引领转化为个体可感可知的具身体验,正确的价值观便不再是外部灌输的教条,而是内心自觉生发的必然选择,最终实现主体的回归,实现知行合一的自我超越。

参考文献:

- [1] 张林.智能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治理[J].探索,2021,(1):176-188.

[2] 余杰.智能算法下网络价值引导的四重反思[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11):119-126.

[3] 罗小茗.圈层—既要有特色,也要有共识[N].人民日报,2020-05-08.

[4] 喻国明,杨莹莹,闫巧妹.算法即权力:算法范式在新闻传播中的权力革命[J].编辑之友,2018,(5):5-12.

[5] 张爱军,李圆.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权力:逻辑、风险及规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6):18-24+109.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7] 靳玉军,王梦蝶.青年数字化生存的主体性审思[J].思想理论教育,2026,(4):96-103.

数字文化赋能：国际理解教育视域下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张力与突破

王凡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重庆 400065)

摘要: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语境中, 在技术文明的推动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提升, 数字技术从工具升维为存在境遇, 国际理解教育从学科转化为文明对话智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了核心价值, 本文尝试以国际理解教育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IU) 为方法论, 以数字技术为突破域,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旨归, 探讨三者融合的理论张力与实践突破, 通过解构数字共同体与文化赋能机制, 破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传统到现代”从“本土到全球”的二元张力, 为人类数智文明贡献兼具民族根性与世界关怀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新范式。

关键词: 数字文化; 国际理解教育;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金项目: 2025 年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2025PY09。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32

Digital Culture Empowerment: Tensions and Breakthroughs i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Wang Fan

¹*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global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hanced. Digital technology has escalated from a mere tool to a mode of existence, whil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EIU) has transformed from a disciplinary domain into a form of civilization dialogue wisdom.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come a core valu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ak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as a methodology, digital technology as a domain of breakthrough,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s the ultimate goal,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tensions and practical breakthroughs in their integration. By deconstructing the digital community and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empowerment, this study seeks to resolve the binary tensions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and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thereby contributing a

作者简介: 王凡(1988—),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new paradigm for cultiv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one that is both rooted in national identity and oriented toward global concern.

Keywords: digital cultur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EIU);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一、引言：时代命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在全球化与数字化双重浪潮冲击下，如何在开放包容中坚守文化主体性，是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面临的核心命题。数智时代的到来使教育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智能化终端逐渐成为新型的教育叙事载体，因而在当前数字文化科技发展的基础上，以国际理解教育视域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协同创新，既是回应时代挑战的战略选择，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这为在数字时代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当前，数字全球化浪潮对民族国家层面的共同体认同意识的发展形成了多维度解构，但在其实践发展来看，由于个体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需求长期潜化，但对数字技术总是呈现“欲迎还拒”的状态。尽管当前在网络技术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有了若干的突破，但从其总体而言，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仍处于技术工具取向，尚未实现变革性的发展。

2016年11月，教育部杜占元副部长在“G20教育对话”大会上阐述面向2030的教育改革时，强调在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教育应该更加开放，提出“促进世界的文化包容与不同民族的理解”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理解需求与文化主体性维护之间呈现深刻张力，一方面，国际理解教育中强调的“超国家认同”可能导致本土文化根基弱化，另一方面，要谨防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简单等同于文化保守主义，忽视其“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开放基因。本文将深入剖析国际理解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合的守正创新，提出系统性研究进路，并结合前沿实践探索创新路径。

二、概念拓扑：内涵界定与基本特征

（一）数字文化内涵、特征

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强调技术对文化结构具有重塑性，其理论揭示，数字文化既是技术重塑的产物，亦是反塑技术逻辑

的能动力量。

数字文化的内涵可概括为以数字技术为底层架构，在虚拟与现实深度互嵌的“社会—技术”系统中生成的新型文化形态，其不仅是技术衍生的文化表现形式，更是重构社会关系与意义生产的元场域。

曼纽尔·卡斯特的“真实虚拟文化”（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理论框架下，首先，数字文化呈现出技术物质性与文化象征性深度互嵌的基本特征。其核心在于算法架构对文化意义的重新编织，这一特征表现为算法驱动的共同体情感联结，数字文化通过数字技术中介重构集体认同，形成新型情感共同体，通过沉浸式体验激活文化基因，使分散个体在数字空间形成情感共振，由数字算法推荐多元文化纳入统一视觉叙事框架，算法通过内容分发的可见性分配，成为共同体意识的编织者。但是同时，数字文化也绝非技术决定论的产物，而是一场持续进行的文明协商。然而，从数字文化的本质是技术化文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文化也具有全球流动与本土根植性张力这一特征。爱德华·霍尔的“文化冰山”理论将文化分为显性（水面以上）和隐性（水面以下）两部分，认为跨文化传播中表层符号容易传递，但深层价值体系因语境差异难以被完全理解。由此可见，数字文化面临全球化的深层张力：一方面，技术加速文化符号流动；另一方面，本土文化可能被简化为“他者”，难以形成共识性的共同体意识。可见，面对全球流动冲击，数字技术亦可成为文化根植性工具。

（二）国际理解教育目标、内涵与当代挑战

国际理解教育本就是一个“富有根基的”教育理念，其目标从兴起时的和平共处、全球胜任力培养，强调文化理解、尊重差异、共担责任发展演变到需超越传统“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中构建辩证统一的价值取向，本质是以促进文明互鉴与人类共同发展为目标，其核心在于塑造“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的统一”，培养“扎根的开放者”，既在多元文明中游刃有余，又能将中华文化基因转化为全球议题的中国方案。

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强调的绝非消解本土认

同,而是“扎根于本土的开放性”的实践载体,避免共同体意识陷入封闭化或虚无化的极端。数字文明时代发展下,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发展为以数字技术为中枢,通过激活文化符号的算法表达能力,在跨文明对话中强化对文化文明共同体认同,并赋予个体跨文化认知力、批判性对话力、共同体认同力,在文明互鉴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有效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批判性实践系统。

国际理解教育在数字时代面临是信息过载、文化冲突显性化、价值观渗透等新问题,例如工具赋能与教育本质如何把握?数字传播时代的国际理解教育发展,是追求算法效率至上还是注重文化深度的传承;全球开放与本土根基如何衡量,国际理解教育要如何兼容民族认同?怎样有效解决本土与全球的价值调和困境等等现实的挑战。

(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核心要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涉及面广、内容丰富、体系庞大,考古学家夏鼐在1962年所撰《新中国的考古学》提到:“现今全国的少数民族还很多,他们虽和汉族不同,但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首次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独立概念使用。新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再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或政治话语,而成为全体成员日用而不觉的精神家园和行动指南,从客观实体上升为自觉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在中华民族成员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深刻认知、强烈认同、深厚情感和自觉维护的集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根基与精神内核,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秉持的紧密相连、荣辱与共、生死相依、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涵,即实现“一个目标”,推动“两个共同”,确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意识,领会“五个共同”,坚定“五观”,并加强“五个认同”能更好维护各民族利益,进一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理论透镜:多维交叉的内在机理

理论问题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演进而不断深化,始终与人类社会实践保持着紧密联系。由时代背景和政治因素催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

育的议题,更需要我们关注其时代发展背景、经济政治文化与全球化跨文化等多种视角,因此,本文将数字文化赋能定位为“桥梁”和“引擎”,国际理解教育视角视作是“视野”和“基础”,旨在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和“目标”。

(一) 技术逻辑:数字文化赋能的正向机理

数字文化作为核心催化剂与新兴交叉维度,深入并重塑了国际理解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各个层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交叉节点。数字文化赋能的核心逻辑体现在其重塑文化生产、传播、体验、互动及认同方式的能力上,具体涉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区块链等技术领域。这些技术为应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和内在动力。

首先,数字文化的赋能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时空压缩与连接强化功能。在当前社会运转加速、时空压缩趋势日益显著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亟需展现出及时的适应性和高度的实用性。其跨地域连接的作用,使不同民族的个体能够便捷地进行在线交流、社群互动、文化分享等活动,极大地拓展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弥补了地理分隔的不足;同时也具备即时性互动,缩短了情感距离,加速了共同经验的积累和共同体感的形成,为成员提供持续互动的虚拟“共居”环境,深化交往深度,形成超越地域的“精神共同体”。

此外,数字文化赋能具有精确传播与认知优化的能力,能够定制化内容,从而提升教育引导的效能。在数字文化赋能的加持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活动能够从个性化叙事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教学方法在多种教学场景和各主体关系中获得情境性叙事体验,有针对性地融入培育内容,及时改善和调整培育方法以匹配当前教育存在的“痛点”“难点”。另外,数字文化还可以及时同时进行舆情监测与引导,监测网络空间中涉及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舆情,及时发现并精确回应误解、谣言或错误思潮,进行有效引导,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正向的舆论氛围。

同时,数字文化的赋能作用亦体现在其多元叙事及国际传播能力上。互联网天然的具备跨文化传播的潜力。通过积极引导,可以打破信息孤岛效应,主动向国际受众展示中国民族团结、多元文化和谐共存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真实面貌,绕过西方主流媒体的偏见性过滤。通过创新叙事

方式,利用数字的理性和文化的感性,采用国际受众易于接受的视听语言、故事化表达、游戏化互动等手段,生动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国理念与实践,从而提升国际传播的亲和力与有效性。此举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基于事实的理解,消除误解和偏见,进而服务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和软实力的提升。

(二) 视野构建: 向内扎根和向外共生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理解教育对于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推进作用。通过开展跨文明比较,进一步整合全球视野,推动民族认同感的进一步深化,借助本土智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提供深刻的反思性认知。通过开展跨文明比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提供深刻的反思性认知。

从费孝通“文化自觉”的内核“自知之明”“自主转型”与“美美与共”融合德洛尔“学会共处”(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的外延“合作能力”“共情理解”“责任伦理”来看,国际理解教育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是文化主体性与全球对话性的共生。国际理解教育有助于完成从“他者镜像”到“主体性的觉醒”,进一步解构西方中心的主体叙事,冲破普世主义迷思和文化霸权,通过比较将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论下单一民族认同的排他性对比中国“多元一体”模式的包容性治理智慧,和研究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坚守,揭示中华文明的跨域生命力,强化“文化共同体”认同,引导学生理解“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基因,提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国责任与大国担当来看,国际理解教育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全球治理资源,真正实现从“教育输入”到“文明输出”,借助全球比较视野,解构西方话语霸权从而讲好中国故事,在文明对话中强化“五个认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内扎根。同时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治理智慧转化为数字时代可传播、可参与的全球公共产品向外共生。在技术赋能与教育创新的协同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治叙事升华为跨越文明隔阂的人类精神共鸣。

(三) 连接强化: 逻辑关系与互动机制

数字文化、国际理解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者构成了相互依存、动态耦合的有机系统。其核心在于:以数字技术为媒介载体,以

国际理解教育为实践框架,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价值旨归,形成多维交叉的内在作用机理。数字文化的赋能体现在其作为连接与推动的双重角色,国际理解教育提供全球视野和包容心态,是拓展视野与奠定基础的关键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了核心层次,是凝聚力的根本所在。三者由内而外相互支撑,共同服务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利益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各层次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与互动机制,对于深化理解该结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层面审视,数字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型技术路径和表达形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技术的教育应用,使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可传播的数字符号与体验,技术赋能不仅突破了传统教育的平面化叙事局限,更创造了沉浸式学习体验,使共同体意识内化于情感共鸣。

国际理解教育则构建了双向互鉴的桥梁,一方面推动着中华文化在全球语境中的表达与传播,另一方面促进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在国内的吸收转化。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国际理解教育不仅在于培养公民具备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更有助于增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为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国际理解教育的教育模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置于跨文明对话的视野中,在文化对比中强化身份认同,在交流互鉴中提升文化自信,从而实现了从民族内部到国际舞台的全面拓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三者的价值核心,其强化不仅关乎民族内部的团结与和谐,更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键基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数字文化创作与国际理解教育提供了精神坐标,其核心要义内涵包含“五个认同”(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四个与共”(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理念体系,在数字转化中需通过技术向善原则融入底层设计。三者关系可概括为:数字文化是载体,国际理解教育是方法,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核心,共同构成理论透镜的三角棱柱,折射出多维度的链接张力。

综上所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基,以开放包容的国际理解视野为方向,以数字技术的创新活力为引擎,三者嵌套结构在增强国

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利益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共同构建一种既能坚守文化主体性、又能拥抱人类共同价值的现代文明认同模式。

四、现实困境：三重场域中的张力显影

（一）数字赋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疏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由政治认同、经济发展、文化凝聚、社会融合、教育灌输、技术赋能等多维度紧密交织、动态互构的有机体系。数字文化赋能则为一种强大的渗透性力量和催化剂，深刻重构了各维度的内涵及其交叉方式，既创造了共同体体验、精准教育传播、创新国际叙事等新的可能性，但在数字文化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进程中，技术赋能场域作为链接教育实践与价值目标的载体，面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刻张力。这种张力不仅影响着国际理解教育的效果，更关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否在数字化浪潮中真正铸牢。

当前，数字教育平台依赖算法推荐系统，通过数据驱动的“精准滴灌”模式提升信息传递效率。数字技术路径虽能打破传统教育的“大水漫灌”局限，但其内在逻辑过度强调用户行为的数据化追踪、学习路径的标准化定制以及教育效果的量化评估，将复杂的价值认同过程简化为可计算、可预测的技术问题，有可能导致教育者忽视价值文化认同形成的情感复杂性和历史纵深性，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价值理性要求数字技术服务于“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的深层价值目标。然而，在实践层面，数字技术应用往往缺乏对历史语境脉络和情感结构的充分考量，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例，当VR场景被运用还原于文成公主进藏路线时，若缺乏对唐蕃古道政治意义、文化交融深层机制的历史阐释，学生获得的仅是感官刺激而非真正的“各民族共创历史”的具身认知。当我们过度关注数字技术“图谱伴学”的行为数据，而忽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AI助手”价值导向的校准，数字赋能便会陷入手段与目的倒置的异化状态，这在目前全球化语境中十分危险，可能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沦为技术绩效主义的附庸，丧失其培育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的核心使命，因此价值理性的式微也将导致技术赋能难以触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即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理解和情感认同。

（二）国际理解教育视域：跨文化理解与本土文化认同的张力消散

在国际理解教育的广阔视角下，传统的单一话语叙事模式逐渐显露出诸多不容忽视的缺陷和不足。具体来看，在构建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时，往往过分强调某些文化符号的重要性，倾向于以一种包容性和接纳的同质性视角来呈现，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不同地域和民族文化表达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不仅导致了文化折扣现象的频繁出现，也让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失去了其原有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更为严重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易于接受和理解，中华民族文化往往被简化为一系列“可消费符号”，这种简化无疑是对文化深度的极大削弱。因此，在国际理解教育中，当我们一味强调文化共性时，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民族文化特性逐渐消解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仅影响文化的多样性，也削弱了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基础。

同样，在国际理解教育的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内涵显得尤为丰富和复杂，它涉及对跨文化理解与本土文化认同之间的深刻辩证关系。跨文化理解方面，倡导的是一种开放与包容的态度，旨在通过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对话，增进彼此的理解和尊重；而本土文化认同则强调在全球化浪潮中，必须保持文化内核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维护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在积极拥抱全球视野、参与国际交流的同时，如何坚守中华文化的根本立场，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且充满挑战的问题。特别是在数字空间的多元文化碰撞中，如何有效地抵御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防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的动摇，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文化冲突和误解，这些冲突和误解又将如何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构建，是否会削弱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以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三）教育实践：理念构想与现实落地的张力

在数字文化赋能国际理解教育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理念构想”与“现实落地”之间存在显著的张力落差。落差的本质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技术逻辑与教育规律、全球视野与本土认同的结构性矛盾在实践场域中的显影。

在理论构想的构建中,数字技术如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以及元宇宙被预设能够为突破时空界限的关键工具。这些技术通过构建沉浸式的体验场景,旨在激发对“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意识认知,促进从情感共鸣到理性认同的转变。然而,将数字技术的虚拟协作能力转化为现实世界的实际应用,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一方面,技术本身的成熟度、普及度以及教育应用的可操作性,都是制约其有效转化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教育理念的革新与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桥梁,实现数字技术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其现实落地的张力还体现在资源分配与利益协调方面。推动数字文化赋能国际理解教育需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但不同地区、学校资源分配不均衡,偏远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难享先进数字教育资源与国际理解教育机会,这会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广泛性和深入性。所以,确保教育资源公平分配,让学生享受高质量国际理解教育和数字文化体验,是缓解教育实践张力、推动共同体意识有效培育的关键。同时,教育实践利益相关者众多,包括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不同主体诉求有差异甚至冲突,如政府关注宏观效益和社会影响,学校和教师注重教学效果和职业发展,学生和家长关心个人成长 and 未来发展。推动数字文化赋能国际理解教育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时,协调各方利益、形成共识和合力,也是缓解教育实践张力、推动共同体意识有效培育的重要方面。

教育实践中的张力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推动数字文化赋能国际理解教育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培育。

五、突破路径:数字共同体与文化赋能的理论重构

目前我们处于一个多元化、快速变迁的数字化,民族问题并非孤立静止的,“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在全球化进程中,数字技术、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国家认同强化构成看似张力实则统一的辩证关系。数字文化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过程,本质上是响应国家文化安全与软实力建设的战略需求。

本文以数字文化为“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为中心论题,以国际理解教育为视角研究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实践突破。

(一) 数字文化共同体:超越时空界限的认同联结新范式

“数字文化共同体”并非实体空间的简单数字映射,而是依托泛在连接、智能交互与沉浸体验的数字技术生态,构建的一种具有情感黏性、文化价值共享与实践行动协同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与文化认同空间,聚焦于克服技术异化、确保数字赋能服务于“铸牢”核心价值目标。

在数字文化共同体构建中,需完成顶层设计重构,确立“价值先行”的数字治理框架,明确将“中华文化基因识别”“共同体叙事优先级”“跨地域情感联结度”纳入数字平台的考核体系,开发“价值校准型”智能技术替代单一流量指标,当监测到AI助手输出解构共同体的话语出现民族地域对立、历史虚无主义时,自动触发模型修正并溯源标注偏见数据源。

同时也要注重数字文化共同体的主体性激活,创建“价值共创”的参与式生态。数字技术发展后的低技术门槛激活“草根创新”,社交媒体的嵌套式传播网络催生文化符号的裂变扩散推动虚拟社群中实现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实现,发挥各个主体的主动性叙事能力,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编辑、可交互、可再生的动态系统,国际理解教育也可借此平台,展现中华民族“大散居、小聚居”格局下的内在凝聚力,凸显共同体意识超越地理阻隔的文化韧性。在大众主体性发挥的作用下解构传统权威,从而催生新型文化认同。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对话式、参与式的新渠道,使“他者”理解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在互动中增进共情与认同。

只有在工具效率与价值深度实现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在数字时代获得坚实的技术支撑与持久的精神感召,最终实现如“石榴籽”般紧密团结的文化认同图景。

(二) 实践创新:国际理解教育的范式跃迁

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范式跃迁,要求教育理念从“文化认知”升维到“文明共创”,强调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文明间的对话与共创。在国际理解教育的创新框架下,学生不再仅仅是文化的接受者,而是成为了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通过参与国际项目、

跨文化交流活动以及数字文化创作,学生们能够在实践中深化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同时促进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识以及国际传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具体而言,国际理解教育的范式跃迁在多个层面展现出显著的变革趋势:首先,设定新的教育目标:文化自觉(根性认同)乘以学会共处(开放性能力)等于全球胜任力的中国范式,教育目标实现从单一的文化认知层面到更高层次的文明共创目标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强调学生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更注重培养他们具备广阔的全球视野和娴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其能够在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

在教育内容的规划方面,可采取创新性的拓展策略。传统的文化知识传授方式已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因此,可引入了对文化本体的认知、跨文化对话能力、价值整合与创新以及全球责任意识等教学内容。旨在促进学生从自我认知到认知他者,从欣赏他人之美到学会和谐共处,从追求共同美好到学会有效行动,最终达到理解天下大同并学会如何成为有责任感的个体。具体而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课程内容当中,可探讨了如何解码中国大一统治理的智慧和“仁学”伦理,以及将中华“天下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比较分析和耦合研究,在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中也可尝试运用中华民族“改土归流”的智慧来调解当代全球族群间的矛盾,将中华民族传统智慧转化为现代解决方案。用“文化自觉”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课程以历史纵深与主体性,用“学会共处”为国际理解教育注入关系性与实践性。二者的融合催生的国际理解教育范式的跃迁,本质是培养“扎根中国的世界学习者”。

再次,在教育方法的运用上,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教育者们成功搭建起虚拟的国际交流平台,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逼真的模拟国际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参与到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实践中,通过角色扮演、模拟谈判等方式,切实提升自身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国际合作素养。

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革命,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被解释的文化客体跃升为人类新文明的编程主体。当良渚玉琮纹成为太空城伦理代码,当孟子仁政算法优化跨洲际治理,中华文明便在创造人类普遍性的实践中,自然终结符号化危机与虚无主义幽灵。数字文化赋能的基础上国际理

解教育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的协同体现了全球视野与本土立场的辩证统一,既在国内教育中筑牢身份认同根基,也在国际舞台传播中华文化价值,最终实现以文化基因锚定全球责任,以文明对话激活共同体智慧。

(三) 基因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文明基因”

数字文化赋能、国际理解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协同本质上是智慧探索以中华文化作为基因基础,筑牢“开放-认同”二元辩证统一根基的“数字文明基因”。数字文明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以数字文明形态拓展传播边界,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国际理解教育的积极参与全球对话,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以全球对话姿态超越文明冲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通过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文化,增强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

“数字文明基因”的激活过程首先可以从开发数智化的国际理解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特色课程入手。在这一开发过程中,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教育方向,严格遵循科学规范,着力突出教学效果的显著提升,明确界定知识产权的归属与保护。通过这样的方式,精心打造一系列数字化精品教育课程,确保这些课程在涉及国家主权、意识形态等重大原则性问题上,能够展现出鲜明而坚定的立场。与此同时,课程还应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示其独特的审美情趣,传达深厚的情感理念,以及呈现经典而高雅的意境,在积极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要严格保障内容的安全性和规范性,为培育学生的全球视野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且规范的数字资源支持,助力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数字课程的开发真正实现了云端协作教育共同体的构建,跨区域文化认同教育的建构,这正是数字文明基因激活的典型例证。

数字文化赋能是构建“人机协同、虚实融合、情感浸润”的教育新生态,国际理解教育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是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本土叙事与国际视野融通、历史记忆与当代实践贯通。当数智化的国际理解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特色课程开发利用之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能更好的如“石榴籽”般深植具有全球胜任力的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在全球数

字文明浪潮中彰显持久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2版

[2]杜占元.面向2030的教育改革与发展[J].教育研究,2016(11):4-7.

[3] 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J].红旗,1962(17)

[4] 实现“一个目标”: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两个共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树立“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增强“三个意识”: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领会“五个共同”:辽阔的疆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伟大的精神分别由各民族共同开拓、

缔造、书写、创造、培育;树牢“五观”: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宗教观;增进“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参见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9月28日,第2版。

[5] 王汐牟:《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路径》云南日报理论专题 2025.7.29

[6] 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7.

[7] 李树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内涵及其建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期刊 2021,12

[8] 葛数金:主体论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20(12)

青少年创伤心理影视表征的情绪传播机制与行为模仿风险研究

孟杨¹ 陈矿¹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近年来,现实题材影视作品对青少年创伤经验的呈现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叙事方向。校园欺凌、家庭失序、情绪障碍以及自我认同危机等议题在影视文本中的频繁出现,不仅推动了社会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注,也引发了关于媒介影响与行为模仿风险的广泛讨论。本文基于传播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视角,以社会学习理论、情绪感染理论和叙事认同理论为基础,对现实题材影视中的青少年创伤心理表征及其情绪传播机制进行系统分析。文章选取《少年的你》、《悲伤逆流成河》、《隐秘的角落》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影视文本如何通过情绪唤醒、角色认同与叙事沉浸等机制影响青少年受众,并进一步形成行为模仿倾向。现实题材影视中的创伤叙事呈现出明显的情绪强化与视觉放大特征,其在提升社会共情与公共讨论的同时,也可能对心理结构尚未成熟的青少年造成消极心理暗示。文章进一步提出创伤叙事伦理、媒介分级制度及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等优化路径,以期为影视创作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青少年创伤心理;影视表征;情绪传播;行为模仿;媒介影响

基金项目: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创伤群体心理与行为的影视表征及社会影响研究”(项目编号: XLYXW2026039),川北健康人文研究中心项目“疗愈电影的理论建构与跨学科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NC26CB78)和成都大学2024-2026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影视文学跨学科教学策略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cdjgb2024236)的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33

Research on the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Behavioral Imitation Risk of Adolescent Trauma Psychology in Film and Television Representation

Meng Yang¹, Chen Kuang¹

¹ Affili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presentation of adolescent traumatic experiences in realistic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significant narrative direction in popular culture. The frequent appearance of topics such as campus bullying, family dysfunction, emotional disorders, and identity crisi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texts has not only heightened public awareness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ssues, but also sparked widespread discussions on media influence and the risk of behavioral imitation. Drawing on perspectives from communication psychology and

作者简介:孟杨(199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文学;

陈矿(1980—),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心理、影视美学。

通讯作者:陈矿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and grounded in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motional contagion theory, and narrative identity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adolescent trauma psychology in realistic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nd its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Taking socially influential works such as *Better Days*, *Cry Me A Sad River*, and *The Bad Kids* as research objects, the paper explores how film and television texts influence adolescent audiences through mechanisms of emotional arousal,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 and narrative immersion, and how such influence may further generate behavioral imitation tendencies. Traumatic narratives in realistic film and television exhibit pronounced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amplification and visual intensification, which, while enhancing social empathy and public discourse, may also impos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suggestions on adolescents whos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s have yet to mature. The paper further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ways including traumatic narrative ethics, media rating systems, and adolescent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Keywords: adolescent trauma psychology; film and television representation;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al imitation; media influence

一、青少年创伤议题的媒介建构与影视研究的范式转向

(一) 青少年创伤议题的媒介凸显

随着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兴起,青少年成长困境逐渐成为影视文本的重要叙事资源。尤其在互联网平台与流媒体传播环境下,围绕校园欺凌、家庭暴力、抑郁焦虑以及原生家庭创伤等议题的影视作品不断进入公共舆论场。这些作品通过情绪化与视觉化的表达方式,使原本隐蔽的心理创伤获得社会可见性,同时也强化了公众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情感感知。

现实题材影视对创伤经验的再现,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情绪的文化表达。影视文本通过角色叙事、情绪渲染和符号建构,将个体心理创伤转化为具有传播性的公共情感经验。阿斯曼指出,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工具,同时也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其能够通过重复性的符号传播建构社会共同认知^[1]。在这一意义上,影视中的创伤叙事不仅关乎艺术表达,也关系到社会心理结构的形成。

(二) 影视影响与行为模仿的理论争议

关于媒介是否会诱发行为模仿的问题,学界长期存在争议。一部分研究认为,影视中的极端行为可能通过观察学习机制对青少年产生示范效应^[2];另一部分研究则强调,影视更多是现实社会问题的反映,而非行为发生的直接诱因^[3]。

事实上,影视影响并非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生成过程。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其认知结构与价值体系尚未稳定,更容易在情绪感染与角色认同过程中形成行为迁

移。班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指出,个体能够通过观察媒介角色行为及其后果形成新的行为模式。因此,当影视文本以高度情绪化方式呈现创伤行为时,其潜在影响值得关注。

(三) 研究不足与研究路径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影视文本的社会意义分析,对“影视如何通过心理机制影响青少年行为”的讨论相对不足。尤其在创伤叙事领域,学界更多关注苦难书写与社会批判,而较少探讨情绪传播与行为模仿之间的关系。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媒介心理学角度构建“影视表征—情绪传播—行为模仿”的分析路径,重点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现实题材影视如何对青少年创伤进行表征;
第二,影视中的情绪传播机制如何作用于受众;
第三,行为模仿风险如何生成。

二、校园失序的影像书写与青春创伤的符号再现

(一) 校园权力结构中的创伤叙事编码

校园欺凌是现实题材影视中最典型的青少年创伤叙事类型,其本质并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暴力冲突,而是校园权力结构失衡下的群体性压迫机制。在多数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中,校园空间往往被建构为一种封闭性的社会场域,受害者在其中长期处于被凝视、被孤立和被规训的状态。这种空间压迫不仅塑造了角色的心理创伤,也强化了观众对“受害者处境”的情绪体验。

在《少年的你》中,影片并未将校园暴力单纯处理为个体恶意,而是通过集体围观、舆论冷漠以及制度失语构建了一种持续性的压迫结构。影片中陈念长期处于“被观看”的状态:教室、走

廊以及楼梯等校园空间均通过狭窄构图与压抑色调呈现,使角色始终处于无法逃离的精神困境之中。福柯在“规训空间”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的权力运行并不总是通过直接暴力完成,而是通过空间秩序与持续监视实现个体驯化^[4]。影片中的校园环境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隐性的权力场,受害者在结构中逐渐失去自我表达能力。

与此同时,影视作品通常会通过“沉默机制”强化创伤感。在《少年的你》中,无论是教师的回避态度,还是同学的集体旁观,都形成了一种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阿伦特认为,群体性冷漠比直接暴力更容易造成个体心理崩塌,因为其意味着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彻底失语^[5]。这种叙事策略能够有效增强观众的情绪代入,使校园创伤从个体经验转化为社会情绪经验。

相比之下,《悲伤逆流成河》则进一步强化了网络舆论与校园权力的联动关系。影片中,谣言传播与网络暴力共同构成了角色心理崩塌的重要原因。数字媒介在其中不再只是信息工具,而成为校园暴力的放大装置。传播学研究指出,互联网环境中的匿名性与群体效应会强化情绪攻击行为^[6]。影片通过手机屏幕、聊天记录以及短视频传播等媒介元素,使“创伤”呈现出公共化与持续化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题材影视往往倾向于通过极端化情节增强戏剧冲突。例如影片中受害者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结局,虽然强化了情绪震撼力,却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将校园创伤简化为“悲剧宿命”,从而削弱对社会结构问题的深入讨论。

(二) 家庭关系失序的心理创伤再现

除校园空间外,家庭结构失序同样是现实题材影视中青少年创伤的重要来源。家庭不仅是青少年人格形成的核心空间,也是情感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当家庭关系长期处于冷漠、冲突或暴力状态时,青少年容易形成持续性的心理创伤。

在《隐秘的角落》中,家庭关系的破裂构成了角色心理异化的重要基础。剧中多个青少年角色均处于缺乏情感支持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关系疏离、教育方式失衡以及情感忽视共同造成了角色的心理失序。鲍尔比的依恋理论指出,儿童与父母之间稳定的情感联结是人格安全感形成的重要基础^[7]。当这种联结缺失时,个体更容易出现焦虑、敌对与行为偏差。

该剧在叙事上采用了大量封闭空间镜头,如狭窄房间、阴暗楼道以及压抑性的家庭布局,以此强化角色的孤独感。镜头语言在此不仅承担叙

事功能,也成为心理创伤的视觉表达。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形式本身即意义的一部分^[8]。在现实题材影视中,空间形式与情绪表达之间往往形成高度关联。

此外,现实题材影视中的父母形象通常呈现出“功能失调”特征。一部分父母角色长期缺位,另一部分则表现出过度控制与情感压迫。这种“失衡型家庭关系”使青少年角色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稳定认同,进而导致其对现实关系产生不信任感。需要指出的是,影视作品对家庭创伤的呈现通常带有明显的情绪强化倾向。为了增强戏剧效果,创作者往往集中呈现家庭冲突中的极端时刻,而较少展现日常修复过程。这种表达方式虽然增强了观众的情绪震撼,但也可能导致青少年观众对现实家庭关系形成悲观认知。

(三) 情绪障碍的符号化表达机制

近年来,现实题材影视对抑郁、焦虑以及情绪失调等心理问题的呈现显著增加。这种趋势一方面提升了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度,另一方面也使“创伤”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传播价值的情绪符号。

在多数现实题材影视中,情绪障碍往往通过视觉符号加以呈现。例如阴暗色调、封闭空间、长时间静默以及重复性独白等,均成为表达角色心理压抑的重要手段。这种符号化表达使抽象心理问题获得了可视化呈现,但同时也存在将复杂心理机制简单化的风险。

在《悲伤逆流成河》中,角色长期处于灰暗环境之中,影片大量采用冷色调与慢镜头,以此强化抑郁情绪的蔓延感。波兹曼认为,视觉媒介时代中的情绪表达往往优先于理性表达^[9]。影视作品通过符号化手段快速激活观众情绪,但这种高度情绪化的表达也容易削弱对心理问题复杂性的深入呈现。

与此同时,部分影视作品倾向于将“痛苦”浪漫化。例如通过唯美镜头、诗化台词以及青春化叙事,将创伤经验包装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情绪体验。这种“苦难美学”虽然能够增强艺术感染力,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创伤问题的现实严肃性。

(四) 极端行为的视觉强化与叙事放大

极端行为是现实题材影视创伤叙事中最具传播性的内容之一,包括自伤、自杀以及暴力反抗等。由于其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因此往往成为影片中的情绪高潮部分。班杜拉指出,媒介中的

行为示范会对观众产生观察学习效应^[10]。当影视作品频繁强化极端行为时,部分青少年观众可能将其视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行方式。尤其对于情绪调节能力较弱的青少年而言,这种视觉强化容易形成心理暗示。

在《少年的你》中,角色通过极端方式完成“反抗”与“自我保护”,影片虽然最终指向社会批判,但其对暴力行为的视觉强化仍然可能对部分观众产生情绪刺激。传播学研究表明,视觉暴力越具有情绪合理性,观众越容易降低对其后果的理性判断^[11]。因此,现实题材影视中的创伤表征既具有社会警示价值,也存在潜在模仿风险,其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呈现创伤”,而在于如何平衡艺术表达与社会责任。

三、视听符号的情绪唤醒与媒介共情的扩散逻辑

现实题材影视对于青少年创伤心理的传播,并不仅仅停留在“内容再现”层面,其更深层的作用机制在于通过视听语言、叙事结构与媒介传播路径构建情绪感染系统,从而影响观众的心理认知与情绪体验。尤其在数字媒介环境中,影视文本的传播已经突破传统影院或电视媒介的单向传播模式,而是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与网络社区中形成二次传播与情绪扩散。青少年受众在这一过程中,不再只是信息接受者,而逐渐成为情绪传播链条中的参与者与再生生产者。因此,对影视创伤表征的研究,需要从单纯文本分析进一步转向“情绪传播机制”的讨论。

(一) 视听语言中的情绪唤醒机制

影视作品中的情绪传播首先依赖于视听语言所形成的感官刺激。镜头调度、色彩系统、音乐节奏以及空间构图等元素,都会对观众的情绪感知产生直接影响。德勒兹指出,电影并不仅仅是讲述故事的媒介,其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机器”,能够通过影像运动调动观众感知系统^[12]。因此,在现实题材影视中,创伤情绪的传播往往不是依靠角色对白完成,而是通过整体视听氛围实现。

在《少年的你》中,影片大量采用低饱和度和色彩与手持摄影,以此强化角色的不稳定状态。影片中的校园空间长期处于灰暗色调之中,狭窄楼道、逼仄教室以及高密度近景镜头共同构成了压迫性的视觉环境。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会不自觉进入角色的情绪结构之中。这种情绪唤醒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感官沉浸,它能够绕过理性分析,直接作用于观众情绪系统。

音乐同样是情绪传播的重要媒介。现实题材影视通常通过低频背景音乐、重复性旋律以及突然的静默处理强化情绪波动。科恩认为,影视音乐能够在观众尚未形成明确认知之前率先激活情绪反应^[13]。在《悲伤逆流成河》中,悲伤旋律与缓慢节奏反复出现,使影片整体始终笼罩在压抑氛围之中。这种持续性的情绪暗示,会逐渐强化观众对“痛苦”的情绪认同。

现实题材影视中的创伤表达往往倾向于“情绪优先”。也就是说,作品首先追求观众情绪震荡,其次才是理性思考。这种表达方式虽然提升了传播效果,但也容易造成情绪过载。尼尔·波兹曼指出,在视觉媒介时代,娱乐化逻辑会不断强化感官刺激,从而削弱公众的理性判断能力^[14]。当创伤情绪被不断放大时,观众可能陷入持续性情绪感染之中。

(二) 叙事沉浸与情绪共振机制

影视情绪传播的核心,并不只是感官刺激,而是通过叙事沉浸形成观众与角色之间的情绪共振。格林与布洛克提出“叙事沉浸”概念,认为观众在进入故事世界后,会暂时中断对现实的判断,并在情感上与角色建立联系^[15]。这种沉浸机制使影视作品能够突破现实经验限制,直接作用于观众心理结构。

现实题材影视中的创伤叙事,通常采用“受害者视角”推进情节,以此增强观众的情绪代入。例如《少年的你》始终围绕陈念的心理体验展开,观众看到的并非“校园暴力事件本身”,而是受害者长期处于恐惧中的精神状态。这种主观化叙事方式能够有效强化观众共情。

与此同时,现实题材影视往往会通过“情绪延迟”增强沉浸感。创作者并不会在一开始就直接展示创伤结果,而是通过不断积累压抑情绪,使观众逐渐进入角色心理结构。伊瑟尔认为,文学与影视接受本质上是一种“空白填补”过程,观众会主动参与意义建构^[16]。当影片不断制造情绪悬置时,观众会在心理上持续参与角色命运,从而形成更强烈的情绪共振。

这种情绪共振具有明显的社会传播属性。尤其在网络平台环境下,观众会通过弹幕、评论与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情绪体验,使原本个体化的观看行为转化为群体情绪表达。情绪在这一过程中不再只是个人感受,而逐渐形成一种“公共情绪结构”。

(三) 角色认同与心理投射机制

影视情绪传播之所以能够影响青少年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角色认同机制。认同并不仅仅意味着“喜欢角色”,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投射过程。科恩指出,观众在观看影视作品时,会短暂地将角色视为“自我延伸”,并在情感与价值层面与角色形成一致性^[17]。对于青少年观众而言,这种认同关系尤为明显。青少年阶段正处于人格认同形成时期,其心理结构尚未稳定,更容易通过媒介角色寻找情感参照。当影视中的创伤角色与观众现实经历相似时,认同关系会进一步强化。例如在《悲伤逆流成河》中,角色长期遭受校园孤立与网络暴力,这种情境与部分青少年现实经验存在对应关系,因此更容易激发“镜像认同”。

拉康提出,“镜像阶段”中的认同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映射^[18]。影视角色实际上成为观众情绪与欲望的投射对象。当青少年将自身压抑情绪投射到影视角色时,角色行为便可能获得“合理化”解释。这也是为何部分现实题材影视容易引发观众对极端行为的情绪理解。

此外,现实题材影视中的“弱者叙事”往往具有天然情绪优势。观众通常会站在受害者立场理解其行为逻辑,从而降低对极端行为的批判意识。当创伤角色最终通过暴力、自毁或极端反抗完成情绪宣泄时,观众可能会在潜意识层面形成行为认同。

(四) 数字媒介环境中的情绪扩散机制

在短视频与社交媒体时代,影视情绪传播已经不再局限于作品本身,而是进入碎片化与二次传播阶段。大量影视片段通过剪辑、配乐与情绪标签在网络平台中循环传播,使创伤情绪进一步放大。

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中的传播具有高度流动性,情绪能够在节点之间快速扩散^[19]。现实题材影视中的高情绪片段往往更容易获得流量支持。例如哭泣、自伤以及情绪崩溃等片段,因其具有强烈情绪冲击力,通常成为短视频平台中的“高传播内容”。这种传播机制会进一步强化情绪消费逻辑。创伤叙事不再只是社会问题讨论对象,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具有流量价值的情绪商品。博德里亚指出,在消费社会中,媒介符号会脱离现实语境,成为可循环消费的情绪景观^[20]。当创伤经验被不断视觉化与娱乐化时,其原本的社会批判意义也可能被消解。

因此,现实题材影视中的情绪传播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提升了社会对青少年心理问题

的关注;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在情绪放大与媒介消费过程中,对青少年受众形成潜在心理暗示。

四、角色认同的行为内化与模仿风险的社会生成

现实题材影视中的青少年创伤叙事,不仅是对社会问题的艺术再现,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心理影响机制。尤其在情绪传播与角色认同不断强化的情况下,影视文本中的行为表达可能逐渐进入青少年观众的认知系统,并在特定情境下形成行为迁移。需要指出的是,行为模仿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生成过程,其背后涉及观察学习、情绪认同、情境代入以及社会传播等多重机制。因此,对于影视创伤叙事的讨论,不能仅停留于文本层面的“是否真实”,更需要深入分析其行为影响路径及社会风险结构。

(一) 观察学习中的行为编码机制

班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指出,个体能够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形成新的行为认知,并在适当条件下进行行为再现。影视媒介中的角色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化行为模型”,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会对角色行为进行心理编码。当观众与角色形成情绪认同后,这种行为编码便可能进入其潜意识层面。

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这种观察学习效应更为明显。青少年阶段处于人格认知与价值观形成时期,其行为判断尚未完全成熟,更容易将影视中的行为逻辑视为现实参考。尤其是在现实题材影视中,创伤角色通常被塑造成“值得同情”的弱者形象,观众往往倾向于站在其情绪立场理解行为动机。这种情绪合理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极端行为后果的理性判断。

在《少年的你》中,影片虽然试图通过社会批判揭示校园欺凌问题,但角色最终通过暴力实现“反抗”的情节,仍然可能被部分观众视为一种有效解决路径。周星指出,现实题材影视中的“情绪真实性”容易强化观众的代入感,使影视行为获得现实意义上的心理可信度。当影视中的极端行为与观众现实情绪产生对应关系时,行为编码过程便会进一步强化。

影视中的“后果弱化”同样会影响行为认知。一部分现实题材影视为了维持叙事节奏,往往淡化极端行为的长期后果,而突出其情绪宣泄效果。例如角色在实施暴力或自毁行为后,影片更强调其情绪释放,而较少呈现后续心理创伤与社会代

价。这种叙事倾向容易使青少年形成“行为有效性”的错误认知。

（二）角色认同驱动的行为内化路径

行为模仿的生成，并不仅仅依赖于行为观看本身，更重要的是角色认同所带来的心理内化过程。认同意味着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将角色视为自身情感与经验的投射对象，并在心理层面形成“替代性体验”。

陈旭光认为，现实题材影视中的“青春叙事”往往具有高度情绪感染力，其原因在于观众能够在角色身上看到自身成长焦虑与社会压力。尤其对于存在现实困境的青少年而言，影视中的创伤角色容易成为情绪寄托对象。当角色长期处于压抑、孤独与失语状态时，观众会在情感上形成共鸣。

在《悲伤逆流成河》中，角色长期遭受校园排斥与网络羞辱，其“孤立感”被反复强化。影片通过大量主观镜头与情绪独白，使观众进入角色内部心理空间。这种叙事方式会在无形中强化观众的角色认同。

心理学研究表明，认同程度越高，观众越容易接受角色行为逻辑。也就是说，当观众已经在情感上认同角色时，其行为本身也更容易被视为“合理反应”。这一点在现实题材影视中尤为突出。由于创伤角色通常被赋予“受害者身份”，观众会天然降低道德批判意识，从而强化对其行为的情绪理解。部分影视作品存在“苦难浪漫化”倾向，即通过唯美镜头与诗意表达，将角色痛苦包装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情绪体验。这种表达方式虽然增强了艺术感染力，但也可能使青少年观众对痛苦与极端行为形成错误审美认知。

（三）情境迁移中的行为再现逻辑

影视行为影响并不会在观看结束后立即消失，而是可能在现实情境中被重新激活。尤其当观众现实经历与影视情境存在相似性时，影视中的行为模式更容易被迁移至现实生活。李彬指出，媒介传播对青少年的影响具有“情境触发性”特点，即个体在现实压力状态下，更容易调取媒介中的行为经验。例如，当青少年在现实中遭遇校园孤立、家庭冲突或情绪压抑时，影视中的创伤叙事可能成为其理解现实的重要参照。

在《隐秘的角落》中，青少年角色长期处于缺乏情感支持的成长环境，其行为逐渐从心理压抑走向道德失控。虽然作品本身具有强烈现实批

判色彩，但其对于“压抑—反抗”路径的强化，也可能对部分青少年形成潜在暗示。

尤其在短视频传播环境下，影视中的高情绪片段会脱离原有叙事语境，被单独剪辑与传播。例如哭泣、自伤以及极端冲突场景，往往因为情绪浓度较高而获得更多流量。这样一来，观众接触到的并不是完整叙事，而是被高度情绪化的“碎片内容”。这种碎片化传播会进一步强化情绪刺激，而削弱对行为后果的理性理解。

传播学研究认为，媒介环境中的重复暴露会强化行为印象。当青少年长期接触相似创伤情节时，其对极端行为的心理敏感度可能逐渐下降，甚至形成“行为正常化”认知。

（四）行为模仿风险的社会结构性影响

影视创伤叙事的行为影响，并不仅仅停留于个体层面，其还会在媒介传播过程中形成群体性社会情绪结构。尤其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情绪传播已经突破传统媒介的单向传播逻辑，转而形成网络化扩散。

一方面，影视中的创伤情绪会在网络平台形成“情绪聚集效应”。观众通过弹幕、评论以及社交媒体互动不断强化彼此情绪体验，从而形成集体性情绪共振。彭兰指出，社交媒体时代的情绪传播具有明显“共情聚合”特征，即情绪会在群体互动中不断放大。另一方面，创伤叙事还可能逐渐演变为一种“流量消费”。部分平台在算法推荐机制驱动下，更倾向于推送具有强情绪刺激性的内容。这样一来，创伤经验便从社会问题转变为可被消费的情绪景观。

影视中的“受害者叙事”若被过度强化，也可能导致部分青少年形成“受害者认同”。即个体倾向于将自身现实问题全部归因于外部压迫，而忽视积极的心理调适与社会沟通。这种认知结构容易强化消极情绪循环。因此，现实题材影视中的创伤叙事既具有社会警示价值，也存在潜在风险。其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呈现创伤”，而在于如何在艺术表达、社会责任与青少年心理保护之间建立平衡。

五、结语

现实题材影视中的青少年创伤叙事，本质上是社会心理问题在媒介文化中的集中呈现。影视作品通过情绪传播与角色认同机制，使创伤经验获得公共表达空间，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青少年的认知与行为。本文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与情绪传播理论，构建了“情绪—认同—模仿”的分

析路径,揭示了影视表征与行为模仿之间的心理机制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影视并非行为问题的唯一诱因,其影响往往与家庭环境、社会结构及个体心理状态共同作用。因此,对媒介风险的讨论不应停留于简单归因,而应从创伤叙事伦理、媒介分级制度以及青少年心理支持体系等层面展开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 [1] Assmann J.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7-41.
- [2] Bandura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7: 22-26.
- [3] Potter W J. Media Effects[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12.
- [4]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195-228.
- [5] 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50-58.
- [6] 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Oxford: Blackwell, 2010: 407-459.
- [7] Bowlby J. Attachment and Los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177-209.
- [8] McLuhan M. Understanding Media[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7-21.
- [9] Postman 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5: 3-20.
- [10] Bandura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7: 22-26.
- [11] Potter W J. Media Effects[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12: 3-18.
- [12] Deleuze G. Cinema 1: The Movement-Imag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65-79.
- [13] Cohen A J. Music as a Source of Emotion in Film[M]//Juslin P N, Sloboda J A. Handbook of Music and Emo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879-908.
- [14] Postman 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5: 87-98.
- [15] Green M C, Brock T C. 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Persuasiveness of Public Narrativ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5):701-721.
- [16] Iser W. The Act of Reading[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163-179.
- [17] Cohen J. Defining Identification: A Theoretical Look at the Identification of Audiences with Media Characters[J].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1(3):245-264.
- [18] Lacan J. Écrit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75-81.
- [19] 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Oxford: Blackwell, 2010: 407-459.
- [20] Baudrillard J. The Consumer Societ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8: 25-34.

高校辅导员“精准思政—心理护航—生涯赋能” 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刘杰

(应急管理大学 应急国际交流学院, 河北 廊坊, 065201)

摘要: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 高校辅导员面临从“事务管理者”向“发展指导者”转型的现实要求。针对英语专业学生在专业认同、心理适应与职业规划方面的现实困境, 本文基于应急管理大学英语专业一线辅导员工作实践, 构建了“精准思政、心理护航、生涯赋能”协同育人模型。该模型以精准思政确立价值坐标, 以心理护航筑牢心理资本, 以生涯赋能激活行动路径, 三者形成“价值—心理—行动”的协同闭环。实践表明, 该模型能有效提升育人实效, 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显著提升, 心理危机预警事件逐年下降, 高质量就业率(含应急管理相关领域)保持在较高水平。与本项工作相关的案例已经入选省级辅导员优秀工作案例, 为行业特色高校辅导员开展精细化育人工作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高校辅导员; 精准思政; 心理护航; 生涯赋能; 英语专业

基金项目: 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计划人文社会科学类青年基金项目(编号: QN2026471)、廊坊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自筹经费项目(编号: 2025029138)、应急管理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编号: JY2025B27)。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34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of “Targe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Psychological Support – Career Empowerment” for University Counselors

Liu Jie

*Universit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Langfang,
China, 065201*

Abstract: Under the backdrop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counselors are facing the practical demand of transitioning from "affairs managers" to "development guides." In response to the real challenges faced by English major students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career planning,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ractical work of frontline counselors for English major students at Emergency Management University, constructs a tripartite education model of "targe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career

empowerment." This model establishes value orientation through targe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rengthens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rough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activates action pathways through career empowerment. Together, these three components form a collaborative cycle of "value-psychology-action."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is model effectively enhances educational outcomes, with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sychological crisis warning events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high-quality employment rate (including in emergency management-related fields) maintained at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The case study related to this work has been selected as a provincial-level outstanding work case for counselors, providing a replicable practical pathway for counselors in industry-feature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refined education work.

Keywords: University counselors; Preci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support; Career empowerment; English major students

进入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正式由大众化迈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学生群体异质性增强、成长发展需求多元分化、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对高校立德树人育人工作提出更高标准与全新要求。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协同育人体系的建设目标。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身处育人工作最前沿,其工作质量与育人成效直接关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地落实。

在国家应急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行业特色高校英语专业学生既要参与通用就业市场竞争,更亟需探索语言专业能力与服务国家应急管理事业的融合发展路径。同时,随着新文科建设向纵深推进,培养复合型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已成为应急管理类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1-2],也对学生价值引领、心理支持与生涯发展指导提出一体化整合要求。而当前高校辅导员育人工作仍普遍存在条块分割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与就业生涯指导分属不同工作模块,缺乏系统联动与深度融合,极易造成育人资源分散、育人成效碎片化。

基于上述现实诉求,本文立足应急管理大学英语专业学生成长特征与发展困境,结合十年一线辅导员工作积淀,建构“精准思政、心理护航、生涯赋能”协同育人模型。通过思政教育、心理育人与生涯指导的有机融合、协同发力,系统回应英语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弱化、心理适应不足、职业规划模糊等突出问题,以期为行业特色高校辅导员开展精细化、机制化育人工作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1 行业特色高校英语专业学生的发展困境分析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与新文科建设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传统语言类专业在行业特色高校中面临结构性转型挑战,人才培养逻辑与就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3]。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快速迭代、就业市场需求持续调整,不断弱化语言专业传统优势;同时行业特色高校肩负服务国家战略与行业发展的使命,要求英语专业突破单一语言培养范式,向“语言+行业”复合型人才方向转型^[4]。这种双重发展转向,致使应急管理高校英语专业在专业认同、心理适应与生涯发展层面呈现出更为突出的成长困境。

首先,专业认同感弱化是行业特色高校语言类专业的共性突出问题。行业特色高校多以理工、主干优势学科为办学核心,英语等文科专业易处于学科布局边缘位置,学生易产生专业身份疏离与自我价值焦虑^[5]。不少英语专业学生难以厘清语言学习与应急管理事业的内在关联,对复合型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定位认知模糊,无法有效回应“为何学、学何用”的价值困惑,进而出现学习动力不足、专业归属感不强等问题^[6]。究其根源,不仅是学生个体认知偏差,更是行业高校专业布局语境下价值坐标缺失、个人发展与行业需求脱节的集中体现。

其次,行业嵌入不足造成学生生涯发展方向模糊。行业特色高校人才培养需深度对接产业链与行业岗位实际需求^[4],但当前应急管理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对涉外应急协同、国际风险沟通、应急语言服务等新兴领域认知有限,大多局限于传统语言技能训练,尚未建立“英语+应急”复合发展思维^[7]。由于缺乏行业场景体验与职业认知支撑,专业学习与行业需求形成脱节,极易催生就业迷茫与“专业无用感”,职业探索陷入被动无序状态。

再次,多重压力叠加加剧学生心理负担与发展焦虑。新时代就业竞争日趋激烈,英语专业就业方向分散、职业路径多元,本身易引发学生不确定感与心理内耗^[6]。叠加行业特色高校专业认可度不高、行业竞争优势不凸显等现实因素,部分学生在职业选择中产生自我怀疑,直接降低学习投入意愿,形成“心理状态不佳—发展动力不足”的负向循环。

综上,行业特色高校英语专业学生的成长困境,已不再是单一学业或就业问题,而是价值认同、心理状态与行动能力相互交织的系统性难题^[5]。传统事务型、碎片化单项帮扶模式已难以适配学生复杂化、动态化发展诉求。基于“三全育人”理念与行业高校育人规律,亟需构建统筹价值引领、心理支持与生涯赋能的协同育人机制。由此,本文提出“精准思政—心理赋能—生涯护航”协同育人模型,实现从专业适应到价值认同、从心理稳定到行动发展的系统性成长闭环。

2 协同育人模型的理论构建

2.1 概念的界定

精准思政是立足个体差异实施分层分类、个性化引导的新型思政教育形态,其核心要义是推动思政教育由粗放式“大水漫灌”转向精细化“精准滴灌”。前人研究表明,精准思政应遵循精准识别、精准定制、精准施教、精准评估四维运行逻辑^[8-9]。我们在英语专业学生思政教育实践中,依托学生成长画像开展精准研判,将精准思政的育人边界从单一思想疏导拓展至学生全周期成长发展需求,进而实现价值引领与生涯指导的深度融合。

心理护航是指面向学生大学四年成长全程搭建的“校-家-社”多维协同连续性心理支持网络。大量实践表明,个体心理发展受微观、中观、外层及宏观多层环境系统交互影响,大学生心理护航需贯通学校、家庭、社会全域育人场域^[10-11]。在学生管理中,我们兼顾日常心理韧性培育与突发危机应急干预,通过构建心理育人共同体整合多主体资源,形成协同支持格局,实现心理育人全覆盖、全过程长效赋能。

生涯赋能是指以激活学生内在发展动力为核心,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索中明晰职业方向、在实践历练中积累成长信心。辅导员在就业育人中扮演着“引路人、赋能者、链接者、护航员”四重角

色^[12]。区别于传统灌输式就业指导,我们在就业指导过程中,强调学生主动建构职业认知,为学生提供“成长支持脚手架”,助力学生自主认知生涯价值、规划发展路径,实现思想引领向发展行动的有效落地。

2.2 模型的构建

精准思政、心理护航与生涯赋能三者不是简单并列叠加关系,而是相互支撑、深度融合、循环递进的有机整体,这与“三全育人”理念下辅导员立足全员育人纽带、全过程价值引领、全方位精准服务的核心逻辑相契合^[13-14]。

精准思政发挥方向引领功能,着力破解学生“为何而学”的价值坐标难题。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价值塑造与人格引领,为学生成长确立正确人生导向。若缺失价值引领支撑,心理护航易沦为单纯情绪安抚,生涯赋能极易陷入功利化就业导向,丧失立德树人核心灵魂。精准思政通过系统化价值塑造,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求、行业使命相结合,确保育人工作始终坚守正确导向。心理护航发挥底线保障功能,着力破解学生“以何种状态成长”的心理资本难题。心理健康是学生学业发展、价值接纳与生涯规划的基础前提,心理状态失衡将直接制约思政教育入脑入心,也阻碍学生理性开展职业探索。依托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的心理护航体系,兼顾危机干预与日常韧性培育,为精准思政落地、生涯赋能实施提供稳定的心理基础。生涯赋能发挥动力激活功能,着力破解学生“学向何处去”的行动路径难题。生涯赋能是育人成效的转化器与验证器,外部价值引领与心理支撑,最终需要通过学生自主探索与实践行动转化为真实成长。学生在生涯实践中检验价值理念、积累成功体验,反向强化价值认同、改善心理状态,形成“认知—行动—认同”的成长闭环,持续激活自我发展内生动力。

三者协同可概括为精准思政锚定育人方向、心理护航筑牢发展底线、生涯赋能激活成长行动。精准思政为生涯赋能划定价值坐标,规避职业规划的功利化倾向;生涯赋能通过实践落地成效反向印证并深化精准思政的育人实效;心理护航则为价值引领与生涯探索双向赋能提供稳固的心理基底。三者形成“价值—心理—行动”互为支撑、循环反馈的动态耦合机制,即正向价值认同能够维系学生生涯探索的行动韧性,实践行动体验又进一步内化并巩固价值认知;心理状态则深度影

响学生对思政价值理念的接纳程度与职业探索的持续稳定性。因此,心理护航兼具全局平衡与风险缓冲的系统“稳定器”功能,一旦缺失心理层面的基础支撑,价值引领易流于形式,生涯发展也将陷入短期化、碎片化困境。在一线育人实践中,辅导员需立足学生个体处境、成长阶段与发展痛点,动态调配三大育人维度的工作权重与介入时序,实现从传统单点事务干预向三全育人视域下系统协同育人的转变(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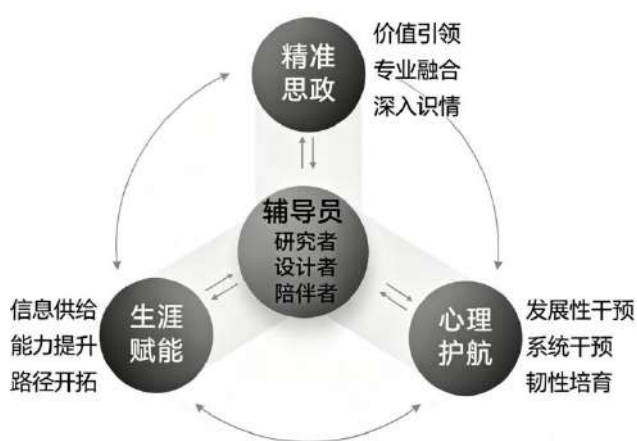


图1 辅导员工作“价值·心理·行动”协同育人育人体系示意图

3 实践探索与案例分析

3.1 精准思政的实践案例

精准思政的关键在于实现教育对象的深度识情与差异化精准回应,核心不仅在于采集学生基础信息,更在于洞悉学生行为背后的成长逻辑、家庭境遇与价值困境。

英语专业新生小李入学后厌学情绪突出,课堂参与积极性低迷,常规视角易简单归因为学习态度懈怠。经实地家访深度研判发现,其问题根源在于父亲工伤丧失劳动能力、家庭经济负担沉重,叠加城乡文化差异引发强烈自我否定,核心症结是价值坐标缺失,对专业学习意义与个人发展前景丧失信心。基于学生实际困境,我们从资源支持、能力补偿、价值转化三个维度进行干预,即通过实地走访全面掌握家庭经济状况与成长环境,协助申请助学金缓解现实经济压力。同时,联动专业教师制定个性化学业补习方案,补齐专业短板、提升学业胜任力。此外,还引导学生参与“用英语讲好家乡故事”特色实践活动,将乡

土情怀与成长感悟转化为学习内生动力,在实践展示中获得正向成长反馈。经过一年精准帮扶,该生学业成绩大幅提升,彻底扭转逃避学习的消极状态,实现自我认知与责任担当的全面成长,毕业后选择回乡任教,扎根基层教育事业。

该案例表明,精准思政必须建立在学生发展情境系统研判基础之上,以深度家访为有效载体,坚持价值引领与资源帮扶同步推进,将学生原生成长困境转化为价值成长资源。

3.2 心理护航的实践案例

心理护航旨在构建覆盖危机干预、心理修复与长远发展重建的全周期支持体系,依托多元主体联动实现从风险处置到意义重塑的发展性修复,为精准思政落地与生涯赋能实施筑牢心理底线。

英语专业学生小张因家庭突发变故导致选调生政审失败,叠加家庭情感支持薄弱背景,陷入重度抑郁并出现自伤行为,面临心理危机与生涯发展断裂的双重困境。我们在长期陪伴建立的信任基础上,针对该同学启动“心理急救—价值重塑—路径重构—持续护航”四阶段协同干预,并联动家长建立24小时安全联络与陪伴,开展紧急心理介入与风险防控。同时,通过深度谈心引导学生厘清事件挫败与个体人生价值的边界,重塑自我认知与成长信心。最后,结合该学生英语专业优势与责任素养,锚定应急管理涉外服务、国际风险管理等适配发展方向,链接行业校友与实践资源,指导该学生高质量就业。最终学生成功入职应急管理相关外贸企业,从事国际风险管理相关工作,实现从心理危机到职业良性发展的跨越转型。

该案例充分印证了心理护航的底线保障功能,彰显了心理支持与价值引领、生涯规划协同推进的实践价值,验证了生态系统理论下全域联动、持续修复的心理育人模式有效性,为高校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与发展性护航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3.3 生涯赋能的实践路径

生涯赋能以结构化、体系化支持激活学生自主探索意识,核心不在于为学生预设固定发展答案,而是帮助其构建面向未来的职业认知框架与行动逻辑。就业市场变革与专业边界重构背景下,辅导员承担资源链接、认知引导与发展赋能双重职责。

英语专业学生小王学业基础扎实，但发展目标模糊，对英语专业与应急管理行业融合路径认知匮乏，缺乏职业场景体验与实践支撑，陷入有能力无方向的成长迷茫。在对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过程中，我们立足应急语言服务行业发展需求，梳理了近五年专业毕业生就业数据，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涉外应急服务、应急装备外贸等行业就业专题分享，拓宽学生职业认知边界。同时，积极对接应急装备出口企业、应急管理涉外业务部门及优秀校友资源，为学生搭建常态化实践平台，并组织学生参与应急装备英文资料翻译、国际合作会议志愿服务等实景实践，完成职业适配性验证。小王是从入学起就存在就业迷茫问题，我们通过生涯赋能教育，敦促该学生在认知拓展与实践历练中逐步明晰发展定位，并帮助其入职应急装备出口企业担任涉外专员，成长为复合型应急语言服务人才。

该路径摒弃传统说教式就业指导，以真实校友数据、行业场景体验强化职业认知，将应急管理行业特色转化为英语专业学生就业竞争优势，有效实现价值引领与心理支撑向自主发展行动的转化，为行业高校英语专业学生高质量就业提供参考范式。

3.4 协同育人模型协同运行的效果分析

上述三个案例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模型的运行逻辑。小李的案例侧重于精准思政的引领作用，通过深度家访实现精准分析、精准对接，使价值引领真正入脑入心；小张的案例凸显了心理护航的底线保障功能，以及心理康复后价值重塑与路径重构的协同效应；小王的案例则集中体现了生涯赋能的动力激活作用，将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三个案例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渗透。小李在学业进步后需要持续的心理支持和生涯规划，小张在心理康复过程中离不开价值引领和路径重构，同时，学生在生涯探索中同样需要价值校准和心理支撑（见表1）。

从实践成效来看，该模型有效提升了高校育人工作的系统性、针对性与实效性，既助力学生在价值认同、心理适应、职业发展层面形成互促共进的成长闭环，也推动辅导员工作从传统事务应对、单点碎片化干预，转向机制化、系统化、精细化协同育人，实现辅导员育人理念与履职能力的转型升级。由此可见，精准思政、心理护航、

生涯赋能三项工作内容具备内在逻辑关联的协同育人机制，能够为行业特色高校开展价值塑造、心理支持与发展指导一体化育人工作提供可操作、可推广的整合型实践框架。

表1 协同育人育人模型的功能定位与实施机制

维度	实践机制	主要成效
精准思政	通过深度家访和系统研判，精准洞察学生成长困境；依据个体差异制定针对性帮扶方案，最终将多方合力转化为学生成长动力。	提升专业认同感与成长内驱力
心理护航	及时筛查学生心理危机与发展风险；联动家庭、学校等多方资源构建支持网络；在心理稳定后开展长期跟踪与发展性修复，完成从危机到成长的过渡。	稳定学生成长发展的心理基础
生涯赋能	梳理行业数据为学生构建职业认知框架；对接企业、校友等资源拓展发展支持；组织真实行业实践，帮助学生行动中验证职业方向。	助推学生职业目标的落地实现

4 结论

本文立足应急管理行业特色高校办学定位与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实际，基于十年一线辅导员工作实践，构建了“精准思政、心理护航、生涯赋能”协同育人模型，突破传统思政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与生涯指导相互割裂的育人局限，形成了“价值校准—心理保障—行动转化”的内在协同闭环，确立了精准思政定方向、心理护航保底线、生涯赋能促行动的系统性育人逻辑，为“三全育人”理念在高校辅导员微观育人场景的落地实施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学理支撑。

该协同育人模型经典型学生案例实践检验，能够有效破解行业特色高校英语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弱化、心理适应不良、职业规划模糊等现实成长难题，推动辅导员育人范式从被动事务处置、单点碎片化干预，向机制化、系统化、精细化协同育人转型，育人实践成效突出，具备良好的示范价值与推广价值。行业特色高校及应用型本科院校可借鉴本研究育人框架，紧扣新文科建设与复合型人才培养需求，结合自身专业特色与行业资源复刻协同育人路径，构建适配行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育人体系。

同时也应看到,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样本与实践场景主要聚焦单一院校英语专业,研究结论具有一定情境依赖性,跨院校、跨专业的普适性仍需进一步验证;研究以实践反思与案例归纳为主,尚未构建量化测评指标体系,育人成效的长效追踪与量化评估有待完善。后续可开展跨院校、跨专业比较研究,检验模型适用边界并优化适配路径;引入量化评估工具与纵向跟踪设计,构建协同育人成效测评体系;高校层面应健全多部门联动协同育人机制,完善常态化运行与跟踪培育制度,持续拓宽模型应用边界,推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与成长指导工作向系统化、精细化、长效化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 [1] 孙疆卫.新文科指引下复合型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理念与路径[J].中国应急管理科学,2025,(6):101-111.
- [2] 王立非,任杰,孙疆卫,等.应急语言服务的概念、研究现状与机制体制建设[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42(1):21-30.
- [3] 薛岩松,高欣.新一轮“双一流”背景下行业特色高校学科建设路径思考[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S2):60-62.
- [4] 杨仁树,焦树强,罗熊.“产教融合”构建行业特色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新生态[J].中国高等教育,2024,(2):33-36.
- [5] 李海萍,王健.淬炼与融入:行业文化视角下的行业高校办学特色建设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8(1):133-140.
- [6] 马鑫民,杨国梁.新时代行业特色型高校大学生就业发展教育与对策[J].北京教育(德育),2021,(5):34-38.
- [7] 谷天硕,孙子衿,魏洋洋.“三全育人”视域下行业特色型高校就业工作体系构建探析——以北京建筑大学为例[J].就业与保障,2025,(4):175-177.
- [8] 申小蓉,潘云宽.大数据时代高校精准思政的主要特征、运行机制和实践策略[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23):15-19.
- [9] 高盼,黄丹,祁文博.精准思政课:“一核两驱三维四融”模式探索[J].高教学刊,2024,10(6):107-110+114.
- [10] 于跃进,李安瑶.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高校心理育人家校社协同机制构建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12):84-87.
- [11] 钱闰建,胡春梅,葛宁,等.生态系统理念下“校家社”多维协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策略——基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求的实证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5,47(12):11-23.
- [12] 林小艳,于晓舟,黄燕霞.科技赋能视域下辅导员“四重角色”与就业实践[J].中国高校科技,2026,(3):38-42.
- [13] 董琛,郭凤臣.高校“三位一体”协同育人评价机制探究[J].吉林教育,2024,(17):9-11.
- [14] 王彦庆,刘佳鑫.“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定位与实现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9(11):143-147.

质量保障视域下西部高校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研究

聂浩虹¹ 吴钰双^{2*}

(1.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电子与物联网学院(集成电路学院), 重庆 401331; 2.泰国孔敬大学教育学院, 泰国 孔敬)

摘要: 远程支教与线上科普为西部高校参与乡村教育支持提供了现实路径, 但服务规模的扩大并不等同于服务质量的稳定提升。围绕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物联网和集成电路等新兴技术内容开展远程技能科普时, 项目组织者需要处理学生需求差异、志愿者教学能力差异、线上互动弱化、课程证据不足和 AI 使用风险等问题。本文以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电子与物联网学院(集成电路学院)“云启未来”云支教专项活动与“山海支教行动”为案例材料, 分析西部高校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的质量风险, 提出“需求诊断—资源适配—过程督导—证据评价—风险治理”的质量保障闭环。研究认为, 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的关键不在于把高校专业知识直接搬入乡村课堂, 而在于将专业资源转化为符合乡村学生年龄特点、生活经验和线上学习条件的科普任务, 并以组织、课程、过程、评价和安全治理共同支撑服务质量。

关键词: 远程支教; AI 技能科普; 质量保障; 乡村教育; 高校志愿服务

基金项目: 2023 年度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技能型社会视域下西部地区职业启蒙教育建设路径研究》(基金编号: 23SKGH439)。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35

Research on Quality Assurance for Remote AI Skill Popularization Volunteer Teaching in Western Universities

Nie Haohong¹, Wu Yushuang²

1. School of Electronics and Internet of Things (School of Integrated Circuits), Chongqi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Chongqing, China

2. Faculty of education, Khon Kaen University

Abstract: Remote volunteer teaching and onlin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have become feasible approaches for western universities to support rural education. For AI-related skill popularization, the main challenge is not only to expand service coverage, but also to ensure stable instructional quality, appropriate content transformation, and evidence-based improvement. Taking the volunteer teaching programs of Chongqi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as case materials, this paper analyzes quality risks in remote AI skill popularization and proposes a closed-loop quality assurance framework involving needs diagnosis, resource adaptation, process supervision, evidence-based evaluation, and risk governance. The study argues tha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h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age-appropriate and task-based popular science activities supported by systematic organization, training, feedback, and safety mechanisms.

Keywords: remote volunteer teaching; AI skill popularization; quality assurance; rural education; university volunteer service

一、问题提出

人工智能教育向基础教育阶段延伸以后，乡村青少年接触新技术知识的机会不再只取决于学校是否具备完整的实验室、专任教师和校本课程。线上平台、高校志愿者和社会科普资源共同进入教育现场，使偏远地区学生能够通过远程方式了解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物联网、智能设备和集成电路等内容。对于西部高校而言，这一变化带来的不是单纯的公益活动空间，而是一次专业资源重新组织和教育服务方式再设计的机会。

从已有项目材料看，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电子与物联网学院（集成电路学院）自 2021 年开展“云启未来”云支教专项活动，累计开展 11 期，服务持续 1000 余天，覆盖 13 所中小学校；2025 年累计贡献志愿服务时长超过 14000 小时，为 211 名学生提供线上教育资源和陪伴支持。“山海支教行动”自 2023 年 3 月 22 日启动，采用线上一对一教学模式，已开展 7 期，累计 532 名青年志愿者为 476 名乡村中小學生提供学业辅导与科普教学服务。项目规模说明远程支教已经具有持续运行基础，但规模数据只能说明服务发生，不能直接说明服务质量。

围绕 AI 技能科普展开远程支教时，质量问题更加突出。AI 知识具有抽象性、工具性和风险性，学生既需要理解生活中的智能技术，也需要学会合理使用工具、辨别信息、保护隐私和避免过度依赖。志愿者如果只把大学专业术语压缩成简短介绍，课程会停留在概念宣传层面；如果只展示新奇应用，学生又容易把 AI 理解为万能工具。由此看，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服务对象、课程内容、教学过程和安全边界形成可追踪的质量保障体系。

二、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的质量风险

远程支教的技术门槛不高，一台电脑、一个会议软件和一份课件即可完成一次线上授课。问题在于，这种“能上课”的条件并不等同于“上好课”的条件。乡村学生的年级、认知基础、家庭设备、网络稳定性、课堂陪伴条件和课后练习机会并不一致，同一份 AI 科普课件在不同学生那里会产生不同学习负担。质量保障的起点因此不是课程制作，而是对学生需求和学习条件的识别。

专业资源转化存在第二类风险。电子信息、物联网、集成电路和 AI 应用属于高校专业优

势，但中小学生并不具备相应的概念体系。将专业内容转化为科普课程，需要从生活情境出发，例如语音助手为什么能识别声音、智能门锁如何判断人脸、智能家居为什么能自动感应、芯片为什么会影响手机和汽车功能。志愿者需要把专业知识拆成现象观察、问题提出、简单解释和小任务完成，而不是把知识点做成演示性介绍。

线上教学存在互动衰减。线下课堂可以通过表情、动作和操作状态判断学生理解情况，远程一对一或直播课堂中的信号更加有限。学生不主动提问、摄像头不开启、网络延迟、家长临时打断等因素都会影响教学判断。对于 AI 技能科普而言，互动衰减还会削弱任务完成质量，学生可能听懂了概念，却没有机会进行观察、表达和迁移。

证据不足是远程公益服务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项目材料中已经有服务期数、志愿者人数、服务学生人数和服务时长等过程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说明项目投入，但不足以说明学生的科学兴趣、AI 理解、问题意识或学习方法发生了何种变化。论文发表和项目持续改进都需要证据链支撑，包括需求记录、教学计划、课堂记录、学生反馈、任务作品、学校评价和志愿者反思。

表 1 案例项目基础与质量保障切入点

项目	已有基础	可转化的质量保障切入点
云启未来云支教	始于 2021 年，累计 11 期，持续 1000 余天，覆盖 13 所中小学校；2025 年服务时长超过 14000 小时，服务学生 211 名	线上直播授课、一对一辅导、课后答疑、心灵陪伴、兴趣课堂、职业启蒙
山海支教行动	始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采用线上一对一教学；已开展 7 期，累计 532 名志愿者，服务 476 名乡村中小學生	语文、数学、英语辅导与科学小实验、自然奥秘、生活安全、天文地理、艺术创意、可再生能源等科普课程
AI 技能科普升级方向	依托电子信息、物联网、集成电路等专业背景，面向乡村学生补充新兴技术启蒙内容	将 AI 应用、智能设备、传感器、芯片常识和数字伦理转化为生活化、任务化课程

三、质量保障闭环的建构逻辑

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的质量保障可以按照“需求诊断—资源适配—过程督导—证据评价—

风险治理”的闭环展开。这个闭环不是额外增加行政负担，而是把原本分散在招募、培训、备课、授课和总结中的做法重新组织，使每一次服务都能留下可复盘的痕迹。

需求诊断是闭环的入口。项目组织者在匹配志愿者和学生前，应记录学生年级、基础学科薄弱点、是否接触过 AI 工具、上课设备与网络条件、兴趣主题和可接受的上课时段。对于低年级学生，AI 科普侧重感知体验与生活观察；对于高年级和初中学生，可以增加简单原理解释、任务设计和合理使用讨论。需求诊断越清楚，课程难度和表达方式越容易适配。

资源适配要求高校专业资源经过再设计。学院的专业优势不能直接等同于课程优势。专业知识进入远程支教场景前，需要完成三个转换：把技术概念转换为生活现象，把理论解释转换为可观察案例，把课堂讲授转换为小任务和小作品。以“智能家居”为例，志愿者不必从物联网架构讲起，而可从“灯为什么会自动亮”出发，引导学生观察传感器、条件判断和设备联动。

过程督导保障服务稳定。每一期支教都应形成统一的教学计划模板、课前准备清单、课堂记

录表和课后反馈表。队长或项目负责人不仅负责考勤和通知，还应检查课程目标是否清楚、课件是否适合学生年龄、互动问题是否充分、AI 工具使用是否合规。过程督导的作用不是替代志愿者教学，而是让不同志愿者之间的服务质量保持基本一致。

证据评价使项目从经验描述走向可改进实践。远程支教不宜过度追求考试分数，但可以收集更适合科普场景的证据，如学生能否用自己的话解释一个 AI 应用、能否举出生活中的智能设备例子、能否完成一张观察记录表、能否说出使用 AI 工具时需要注意的信息安全问题。这些证据比笼统的满意度更能说明科普课程是否真正发生作用。

风险治理构成 AI 技能科普的底线。AI 工具可能涉及隐私、错误信息、过度依赖和不当内容生成。面向乡村中小学生开展 AI 科普时，志愿者需要明确哪些工具可以演示、哪些信息不能上传、哪些输出需要人工核查、哪些问题不能交给 AI 替代思考。质量保障因此不只是教学效果管理，也包括教育安全和价值引导。

远程AI技能科普支教质量保障闭环模型

从“完成一次线上服务”转向“需求可识别、过程可追踪、质量可改进”的长期支持体系



说明：模型用于解释远程AI技能科普支教质量保障的关键环节，强调证据积累、过程管理与持续改进。

图 1 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质量保障闭环模型

四、质量保障机制的实施路径

需求识别应从“有没有学生需要辅导”转向“学生需要怎样的科普支持”。项目可以在开课前置简短需求表，由学生或合作学校填写年级、学习兴趣、设备条件和希望了解的科技主题。对于低龄学生，需求表可以由教师或家长协助完成。这样做能够减少志愿者盲目备课，也能避免同一课程反复投放给不同基础的学生。

课程设计应形成“微单元”结构。远程 AI 技能科普不适合一次课承载过多概念，每个单元宜围绕一个生活问题展开，例如“手机为什么能听懂我说话”“机器人为什么不会自己真正思考”“快递柜怎样识别取件码”“太阳能和智能设备有什么关系”。每个单元包括情境导入、概念解释、互动提问、任务完成和安全提醒五个环节，志愿者可在统一框架中加入自己的专业案例。

志愿者培训需要强化科普表达能力。很多高校学生具备专业知识，但不一定能向儿童解释专业内容。培训内容应包括儿童化表达、线上互动、任务驱动教学、AI 工具合理演示、课堂突发情况处理和学生隐私保护。培训后可以安排试讲，由队长或教师根据表达清晰度、互动设计、内容准确性和安全意识提出修改意见。

过程管理应建立轻量化证据链。每次课程不需要形成复杂报告，但至少应保存四类材料：课前教学计划、课堂互动记录、学生任务反馈和志愿者课后反思。对于一对一辅导，记录可以更简短，重点写学生本次掌握的内容、仍存在的困惑和下次课程调整方向。对于科普活动，学生作品、截图、问答记录和简短录音整理都可以成为质量证据。

评价改进要避免把公益服务做成形式化统计。服务时长、参与人数和覆盖学校仍然重要，但它们只是基础指标。更有价值的指标包括课程适配度、学生参与度、任务完成度、科学兴趣变化、AI 使用安全意识和合作学校反馈。项目组织者可以按期汇总这些证据，形成课程资源库和问题清单，为下一期活动提供改进依据。

表 2 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的质量风险与控制点

质量风险	表现形式	控制方式
1 需求	课程难度与学生基础不匹配，学生听课被动	开课前收集年级、设备、兴趣和薄弱点，建立学生简档
2 转化	高校术语过多，科普味道弱	采用生活案例、小实验、观察任务和儿童化表达

质量风险	表现形式	控制方式
3 互动	学生沉默、反馈滞后，志愿者难以判断理解情况	设置高频小问题、小选择和小任务
4 证据	项目总结停留在人数、时长和照片，难以证明质量	保留教学计划、学生反馈、任务作品和志愿者反思
5AI 边界	工具演示可能引发隐私、误用和信息依赖风险	明确不上传个人信息，输出需核查，工具仅作辅助

五、面向长期发展的质量评价指标

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的质量评价不应只服务于结项材料，也应服务于课程迭代和志愿者成长。一个可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从输入、过程、结果和改进四个维度展开。输入维度关注志愿者培训、课程资源和学生需求识别；过程维度关注互动频次、任务完成、课堂记录和队长督导；结果维度关注学生对科技概念的理解、兴趣表达、AI 安全意识和学习方法；改进维度关注反馈是否进入下一轮课程设计。

在评价方式上，可以采用多源证据而非单一问卷。学生的简短反馈用于判断接受度，合作学校评价用于判断服务适配性，志愿者反思用于发现教学困难，学生作品和任务单用于观察学习表现。对于项目发表或申报而言，这些证据可以支撑更有说服力的实践论文，也能避免单纯依赖“服务时长很长、志愿者很多”的宣传式表达。

质量评价还需要把学生发展和高校学生成长放在同一框架下考察。乡村学生获得的是科学启蒙、技术兴趣和数字安全意识，高校志愿者获得的是专业知识转化、公共表达、组织协作和社会责任体验。只有同时看到这两个方向，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的“双向育人”才不会停留在口号层面。

表 3 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质量评价指标框架

维度	观察重点	证据来源
输入质量	学生需求识别、志愿者培训、课程资源准备、AI 工具使用边界	学生简档、培训记录、课件脚本、工具清单
过程质量	互动频次、任务完成、课堂记录、队长督导、课后答疑	课堂记录表、问答截图、任务单、督导意见
学习表现	生活化 AI 概念理解、科学兴趣表达、问题提出能力、安全使用意识	学生反馈、作品样例、口头解释记录、简短测评
改进质量	问题是否被复盘，课程是否迭代，优秀案例是否进入资源库	阶段总结、课程修订记录、志愿者反思、案例库

六、讨论：从活动品牌到质量治理

“云启未来”和“山海支教行动”已经具备品牌化、持续化和规模化特征。下一阶段的关键不是单纯增加期数或扩大志愿者人数，而是把活动经验转化为质量治理能力。对高校而言，质量治理意味着每一期活动都能沉淀课程、数据、案例和反思；对合作学校而言，质量治理意味着服务内容更贴近学生需要；对志愿者而言，质量治理意味着公益热情能够通过专业训练转化为稳定的教学能力。

西部高校开展远程 AI 技能科普具有独特优势。电子信息、物联网、集成电路等专业资源与 AI 科普内容高度相关，学生志愿者也更容易从专业学习中提取案例。优势能否转化为教育效果，取决于项目是否建立课程资源库、试讲制度、过程记录和反馈机制。没有这些机制，专业优势容易变成术语展示；有了这些机制，专业优势才能变成乡村学生能够理解和参与的科学启蒙。

这类项目也需要保持边界意识。远程支教不能替代乡村学校的正式课程，志愿者不能替代专业教师，AI 工具也不能替代学生思考。远程 AI 技能科普的合理定位，是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性支持，通过高校专业资源和线上平台拓展学生视野、激发兴趣、提供陪伴，并在长期服务中逐步形成稳定课程和质量改进机制。

七、结论

西部高校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的价值，不只体现在服务范围和志愿时长上，更体现在高校专业资源能否被转化为适合乡村学生的科普学习经验。以“云启未来”和“山海支教行动”为基础，可以看到线上支教已经具备持续运行、志愿者组织和课程拓展的实践条件。面向 AI 教育普及和科学素质提升的新要求，项目后续需要把重点从活动开展转向质量保障。

本文提出的“需求诊断—资源适配—过程督导—证据评价—风险治理”闭环，为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质量管理思路。该思路强调，AI 科普不是简单讲解技术概念，而是通过生活情境、小任务、互动问答和安全提醒，让学生形成对智能技术的初步理解和合理使用意识。对于高校志愿者而言，这一过程也促使其把专业知识、社会责任和教育表达能力结合起来。

后续实践中，项目可进一步建设 AI 技能科普微课程资源库，完善志愿者试讲与督导制度，建立学生反馈和合作学校评价机制，持续积累课程证据与学生作品。只有形成可复盘、可迭代、可追踪的质量保障体系，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才能从一次次线上服务走向长期稳定的教育支持。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 [EB/OL]. (2021-06-03)[2026-06-08].
- [2] 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EB/OL]. (2024-12-02)[2026-06-08].
- [3]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国家数据局. “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EB/OL]. (2026-04-02)[2026-06-08].
- [4] 高宏斌, 任磊, 胡俊平, 等.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发展现状与特征——第十四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报告[J/OL]. 科普研究, 2025.
- [5] UNESCO. AI and education: Guidance for policy-makers[M]. Paris: UNESCO, 2021.
- [6] OECD. OECD Digital Education Outlook 2023: Towards an Effective Digital Education Ecosystem[M].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3.
- [7] BRANSFORD J D, BROWN A L, COCKING R R. How People Learn: Brain, Mind, Experience, and School[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0.

人工智能背景下经贸专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谭盼¹ 陈鸣¹

(1.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在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国家全面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 数字产业变革倒逼经贸专业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本文以南华大学经贸专业为调研对象, 依托380份有效问卷, 从四大维度开展数据分析。研究发现: 第一, 课程体系的数字化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失衡; 第二, 数字教学资源应用分化问题凸显; 第三, 学生数字化应用能力短板较为突出; 第四, 教师队伍的数字化教学素养亟待进一步加强。对应提出优化课程资源分层共建、搭建智能分级推送体系、构建三阶递进育人模式、分类分层开展师资培育四条转型路径, 依托生成式人工智能完善专业数字化建设, 推动经贸专业育人适配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关键词: 经贸专业; 教育数字化; 人工智能; 转型路径

基金项目: 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人工智能背景下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202502000741); 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隐性育人视域下新商科专业群教学改革路径研究”(202402000820)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36

A Study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of Education for Economics and Trade Majors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n Tan¹, Ming Chen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Law,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unan, Hengyang 421001, China²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igital trade,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drive to fully adva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industries has compelled economics and trade majors to optimize their talent training models. Taking the economics and trade major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four dimensions based on 380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four major problems: first, there is a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the alloc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with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second, the uneven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has become prominent; third, students are notably deficient in practical digital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fourth, literacy of teachers in digital teaching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urgently.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transformation paths: optimizing the hierarchical co-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resources, establishing an intelligent hierarchical push system, building a three-stage progressiv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and implementing categorized and hierarchical training for teachers. By leveraging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improve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作者简介: 谭 盼(1990—),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教育与教学数字化;
陈 鸣(1977—), 男,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隐性育人与教学改革。

通讯作者: 谭 盼

the major, this study aims to alig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of economics and trade majors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 Economics and Trade major;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AI; Transformation Path

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我国已从工业时代全面迈入数字时代。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需牢牢把握数字时代的新机遇,而教育数字化正是适应这一时代变革的核心战略选择。2025年4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以教育数字化为重要突破口,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全面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目前,全国各大院校已就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形成广泛共识。经贸专业作为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的学科,其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顺应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更是培养适应数字经济时代高素质经贸人才的关键路径。经贸领域本身正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变革,从跨境电商的蓬勃兴起,到国际贸易数据的智能化分析,从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到全球供应链的数字化协同,这些变革都对传统经贸人才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素养提出了全新挑战。因此,深入探究人工智能背景下经贸专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对于提升经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以及推动高等教育整体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旨在系统梳理经贸专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探索行之有效的转型路径,为相关教育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与策略支持。

二、经贸专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问题

为深度探究经贸专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状,本研究借助问卷星平台,针对南华大学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经贸专业学生展开调查,共收回问卷413份。按照填写时长过短、同类问题回答存在显著差异等标准进行筛选后,最终确定有效问卷380份。其中,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学生人数分别为74人、107人、123人、76人,占比依次为19.47%、28.16%、32.37%、20%。由此可知,本次调查对象具备较强代表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南华大学经贸专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一) 课程体系的数字化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失衡

在课程体系层面,针对“您在以下哪些课程中接触或使用过人工智能技术或数字化工具”这一调查问题,相关数据表明:高达80.79%的学生认为专业理论课程(如《经济学原理》《数字贸易》)的教学演示与互动环节已融入数字化元素;而认为实践实训课程(如单证制作、报关报检模拟、跨境电商运营)中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或数字化工具的学生仅占50.53%。这一数据对比清晰地揭示出当前经贸专业课程体系在数字化资源配置方面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失衡。专业理论课程由于知识传授的属性,更易于借助多媒体课件、在线教学平台等途径引入数字化元素,这不仅增强了课堂的生动性与互动性,也使学生对数字化有较高的认知。然而,实践实训课程通常涉及复杂的操作流程、动态的商业模拟环境以及个性化的技能培养要求,其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先进的软硬件设施支持,还要求教师具备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的能力。因此,在此次调查中,仍有近半数学生表示,在报关报检模拟、跨境电商运营等核心实践课程中,未能充分接触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或先进数字化工具。这种实践环节数字化程度的欠缺,既可能致使学生毕业后难以迅速适应企业对数字化技能的实际需求,也会限制其解决复杂经贸问题能力的培育。

(二) 数字教学资源应用分化问题凸显

在关于数字化教学资源使用情况的调查中,针对“专业学习中,您使用以下数字化资源或工具的频率”这一问题,调查数据表明:其一,57.11%的学生每日借助在线课程平台(例如MOOC、学习通、智慧树、雨课堂等)开展学习活动,25.53%的学生每周使用该类平台3-4次。这充分说明在线课程平台已成为学生日常专业学习中不可或缺的数字化资源,其高频率使用可能与理论课程常态化的线上教学设计存在紧密关联。其二,偶尔使用和从未使用虚拟仿真平台(如数字经济综合实训平台、数字贸易运营理实一体化平台等)的学生占比分别达到44.74%和29.47%,偶尔使用和从未使用数字化数据库(如Wind、贸易统计数据库等)的学生占比分别为38.68%和31.84%。数据

清晰地显示,虚拟仿真平台与数字化数据库的学生使用频率显著偏低,与在线课程平台的高普及率形成了鲜明反差。进一步剖析可知,虚拟仿真平台通常涉及复杂的操作流程、较高的硬件设备要求,并且与特定实践教学环节深度绑定。若相关课程未将其纳入必修或核心实践模块,学生主动接触和使用的机会将大幅减少。而数字化数据库的使用对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专业知识储备以及实际应用场景认知提出了更高要求。经贸专业学生面对海量数据时往往无从着手,进而降低了使用意愿。这种使用不均衡状况不仅制约了学生实践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的提升,也导致数字化教学资源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彰显,不利于经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

(三) 学生数字化应用能力短板较为突出

在有关数字化能力培养的调查中,针对“您是否参与过与专业相关的数字贸易竞赛、AI案例分析、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等数字化实践活动”这一问题,调查数据显示:从未参与和仅参与1次的学生比例分别为34.74%和34.21%,两者合计占比高达68.95%,而参与2次及以上的学生比例仅为31.05%。这一结果表明,多数经贸专业学生缺乏持续性、深度化的数字化实践锻炼。通过进一步访谈发现,学生参与度低的原因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学校提供的数字化实践项目数量有限,且多以短期讲座和零散竞赛为主,缺乏与专业课程体系深度融合的常态化实践机制;其二,部分学生对数字化工具的应用能力不足,在面对Python数据分析、跨境电商平台运营等实践任务时,因操作基础薄弱而产生畏难情绪;其三,实践项目与行业真实场景脱节,模拟案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不足,致使学生难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教师队伍的数字化素养对学生能力培养也存在一定制约。部分专业教师对新兴数字技术的掌握不够深入,在指导学生开展数字化实践时往往仅停留在基础操作层面,难以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性探索。这种数字化能力培养的滞后,直接导致学生在面对数字化贸易环境时,无法熟练运用数字工具分析市场趋势、优化贸易流程、规避跨境风险,与企业对复合型数字经贸人才的需求存在明显差距。

(四) 教师队伍的数字化教学素养亟待进一步加强

在有关数字化教学能力的调查中,针对“您认为当前本专业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存在哪些主要

困难”这一问题,调查数据表明:41.32%的学生认为在运用数字化资源或工具时,缺乏高效的师生互动以及及时的学习反馈;53.16%的学生认为数字化教学资源内容陈旧、更新迟缓;41.58%的学生认为当前数字化教学的个性化支持匮乏,难以契合自身学习需求;44.74%的学生认为数字化教学与传统教学模式的衔接融合不够流畅。从教师维度分析,部分教师对数字化教学工具的掌握仅处于基础应用层面,如仅能进行在线点名或资料共享,对于AI智能答疑、AI实践、大数据学情分析、AI教学助手协同备课等更为高级的数字化教学功能缺乏深入探究。此外,教师的数字化教学创新意识淡薄,在教学内容更新方面,对行业前沿的数字技术应用案例、跨境电商平台的最新规则变动、国际贸易数字化工具的实操技能等融入不够及时与深入,致使教学内容与行业数字化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同时,教师数字化教学成果的评价机制尚不完善,现有考核体系仍以传统教学指标为主,导致教师投身数字化教学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这种整体数字化教学能力的欠缺,不仅制约了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充分利用,也难以有效引导学生开展高阶数字化思维训练与实践创新,成为阻碍经贸专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的关键瓶颈。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经贸专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

结合本次问卷调研所识别出的四项核心现实痛点,我们紧密围绕调研数据所揭示的课程资源结构性错配、教学资源实际使用失衡、学生数字化应用能力短板较为突出以及师资队伍数字化教学能力不足等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系统梳理并依托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分维度、有针对性地设置了系列靶向优化路径,确保所提出的各项对策能够精准、有效地对应并解决上述四类现实困境。

(一) 优化课程资源分层共建,破解资源结构性失衡

针对调研显示的结构性矛盾,即《经济学原理》《数字贸易》等理论课程数字化覆盖率达80.79%,而报关、跨境电商等实训课程数字化使用率仅为50.53%,实务类数字资源存在明显紧缺。立足数智本体重构逻辑与高校数字化六大支柱框架优化资源配置^[1-2]。具体来说,第一,精简整合

存量理论数字资源,避免同类课件、线上课程重复建设造成资源冗余;第二,依托AIGC多模态生成能力,聚焦单证制作、报关报检、跨境运营等实训短板,联动跨境外贸企业动态生成实景业务案例、模拟实训素材,补齐实践课程数字化缺口;第三,按照通识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实训课四层搭建模块化数字资源库,重点充实数字贸易风控、跨境财税等稀缺资源;第四,遵循工业5.0人本配置理念深化产教资源共建^[3],资源入库阶段增设算法内容伦理审核^[4],规避算法片面筛选问题,从根源化解理论资源过剩、实训资源短缺问题,改善近半数学生实训课缺少智能实操条件的现状。

(二) 搭建智能分级推送体系,改善资源使用不均衡

紧扣调研数据,线上学习平台日均与周高频使用率之和超82.64%,而虚拟仿真平台、经贸数据库的闲置率分别达74.21%和70.52%,数字化资源使用分化问题显著。为解决这一问题可参考数据驱动的评价改革思路与多元资源应用模式^[5-6]。具体来说,第一,依托智慧教学平台全量采集学生选课、资源浏览数据,构建个体学情数字画像,按年级精准分发资源:大一与大二阶段定向推送基础课件资源,大三与大四实训学期强制配套仿真平台、Wind数据库实操任务,从供需匹配层面减少资源闲置;第二,常态化开展教研室教研沙龙,教师交流平台实操授课方案,缩小师资间资源使用差距;第三,把仿真、数据库实操成绩纳入课程平时考核,配套AI智能使用指引降低软件上手门槛,破解学生因操作困难放弃使用专业数据库的痛点,扭转不同类型资源冷热分化格局。第四,针对不同基础、不同学习需求的学生,设置不同难度层级的资源使用目标,引导学生按需自主选择进阶资源开展拓展学习,避免基础薄弱学生因资源难度过高产生畏难情绪,也满足学有余力学生的深度学习需求,进一步提升各类数字教学资源的实际利用率。

(三) 构建三阶递进育人模式,补齐学生数字化能力短板

针对调研68.95%学生极少参与数字经贸科创、AI实训类活动,实践锻炼严重不足的现实问题,依托人机协同育人逻辑与分层培养理论搭建分年级培养方案。具体来说,首先,大一新手层

开设Python数据分析、外贸智能工具通识课,依托AI导学完成基础数据练习;大二与大三胜任层结合跨境电商课程,在仿真系统完成报关、跨境结算全流程实训,借助生成AI撰写国别贸易分析报告;大四提升层对接校企实训基地,依托大模型开展外贸市场研判与产业链调研。其次,对标工业5.0育人要求改革考核方式,弱化期末卷面占比,以数字化调研报告、竞赛成果作为过程评价核心,破解学生问题,缩小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落差。再次,依托校企合作开发产业真实项目案例库,将企业数字化业务需求转化为教学实训任务,让学生对接行业最新技术应用场景,强化数字化工具应用熟练度,打磨数字能力。最后,依托校内数字经贸创客空间,组建跨专业AI应用竞赛梯队,配备专业导师指导备赛,以赛促练整合学生数字化技能为系统化实践能力,夯实数字化能力培养成效。

(四) 分类分层开展师资培育,提升数字化教学能力

立足调研反映的超四成学生反馈的缺少个性化辅导、教学素材陈旧、数智课堂融合不畅等问题,可参照分层研修机制与协同培育思路进行改革^[7]。具体而言,第一,推行差异化师资培训。针对中老年教师,重点开展学习通、智慧树等基础工具应用的专项培训;针对青年教师,则聚焦AIGC课程开发、大数据学情研判等高阶教学技能的系统培育,着力补齐其仅能完成简单点名、资料分享等浅层化授课的短板。第二,以教研室为单位组建集体备课小组,依托AI协同备课机制,持续更新跨境电商新规、数字贸易前沿案例,有效解决教学内容陈旧的问题;同时联动跨境头部企业开展实地研修活动,将产业实操经验融入教学设计,实现教学与实践的深度结合。第三,优化教师考核细则,增设数字化课程建设、个性化课堂实施等考核指标,以激发教师参与教学改革的内生动力,破解个性化教学缺失、课型衔接不畅等现实难题。第四,将数字化教学能力纳入教师职称评审的加分项目,鼓励教师主动对接企业数字岗位需求,参与产业数字化项目实践,在实操过程中深化对数字技术应用的理解,推动自身数字素养与教学能力的同步提升。最后,搭建校内外师资共享渠道,引入企业资深数字化业务专家任产业导师,共同开发实训项目、讲授实操课程,弥补校内教师产业实践经验短板,构建校内外优势互补的师资培养体系。

四、结语

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重塑全球经贸业态,推动高校经贸专业开展教育数字化系统性变革。本文以380份南华大学经贸专业有效调研问卷为分析依据,从课程资源配置、教学资源应用、学生数字素养培育、师资数字化建设四个维度,梳理当前育人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课程体系的数字化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失衡;二是数字教学资源应用分化问题突出;三是学生数字化应用能力短板较为突出;四是教师队伍的数字化教学素养亟待进一步加强。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分层资源共建、智能精准配给、阶梯式人才培养、分类师资研修四项实施路径,依托AIGC、大数据等技术弥补实训资源短板,通过学情画像优化资源投放,分年级构建从基础入门到数字贸易实战的实践体系,并建立差异化教师培训与教学改革激励机制,形成问题、理论、对策相互呼应的完整逻辑闭环。从长远看,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技术迭代升级,经贸专业数字化建设将向深度生态化发展。未来,一方面依托产业大数据深化校企共建模式,将跨境电商新业态、全球供应链数字化实操项目常态化融入课程;另一方面完善校本智能教学中台,实现课程、实训、评价全链路智能化闭环。同时,随着教师数字素养标准落地和长效研修机制成熟,师资队伍将从工具使用者转型为课程数字化设计

者。后续开展年度跟踪调研,动态调整培养方案,缩小人才培养与数字贸易行业需求差距,为经贸专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效支撑。

参考文献:

- [1]梁俊斌,谢贇,唐振华.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机理、挑战与对策[J].现代教育管理,2025,(11):15-23.
- [2]杨宗凯,程浩,吴龙凯.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框架及实践审思[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6,24(1):51-65+187-188.
- [3]黄晶,曲铁华.面向工业5.0的教师教育数字化转型:价值、困境与应对[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5,37(5):69-76+96.
- [4]宋萑,刘许,汪佳成.人工智能助力教师教育转型:理论逻辑、技术限度与实践进路[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7(5):118-127.
- [5]乔颖.数智技术赋能教育评价转型的内生动力、关键问题与实践路向[J].教学与管理,2025,(24):98-102.
- [6]王丽珍,武晔秋,王世杰.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教师培养模式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5,45(21):31-36.
- [7]吴军其,张萌萌,吴飞燕.教师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驱动逻辑与推进策略[J].现代教育管理,2026,(2):86-99.

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农文君

(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530000)

摘要: 在"五育并举"教育方针与2023年教育部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背景下, 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艺术教育实现传承与发展成为高校美育的重要命题。本文以南宁师范大学为例, 系统探讨了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教育中传承与发展的必要性、践行现状及优化策略。研究认为, 高校作为文化基因转译的重要阵地, 艺术教育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发动机, 也是艺术创新最丰沛的原型库。通过分析南宁师范大学在课程设置、实践活动、研究创新等方面的实践, 本文指出当前存在对艺术教育定位片面、活动停留于自发层面、教学资源与师资力量不足、活态传承与创意转化失衡等问题。基于此, 提出劳动教育重构、第二课堂升级、建立传统文化类社团、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建立评价与激励机制等策略, 旨在形成"教—劳—创—产"四轴驱动的传承模式, 为民族地区高校艺术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民族地区; 优秀传统文化; 艺术教育; 美育浸润

基金项目: 南宁师范大学学生工作课题(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研究2024XG13) 立项资助。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37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Ethnic Regions through Art Education

Nong Wenju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hina² Affiliation, university name, city,
530000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Five-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immersion initiative in 2023,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ethnic regions through art education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proposi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Taking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necessity, current practice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ethnic regions through art educa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universities serve as crucial site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genes, where art education functions both as an emotional engine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s the most abundant repository of prototypes for artistic innovation. By analyzing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s practices in curriculum design,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research innovation, this paper identifies existing problems, including a narrow understanding and positioning of art education, activities remaining at

the spontaneous level, insufficient teaching resources and faculty strength, and an imbalance between living inheritance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ccordingly, the paper proposes strategies includ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labor education, upgrading of second-classroom activities, establish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tudent associations,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form a "Teaching – Labor – Innovation – Production" four-wheel-driven inheritance model,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rt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ethnic regions.

Keywords: ethnic region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rt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immersion

为全面加强“五育并举”教育方针，高校美育工作提出了时代新要求，2023年教育部提出了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点明“以美育浸润学生，全面提升学生文化理解、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等核心素养，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学生身心更加愉悦，活力更加彰显，人格更加健全”^[1]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人们公认美育的主要实施途径是艺术教育，审美艺术精神对美育的实施而言，具有重要作用。而对艺术学理论的探讨、艺术各学科的研究以及艺术多领域的教育变化，都关涉艺术教育和美育。”^[2]在民族地区，艺术教育把历经千百年累积的纹样、旋律、仪式与技艺转化为可传授、可体验、可再创的课程和活动内容，这种以艺术为媒介的学习，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独特编码，又赋予其新的情境与功能，使审美素养、技术能力与思维品质同步提升，从而实现以美育人的现实目标。高校艺术教育需在资源整合与模式创新中持续发力，为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一、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艺术教育实现代际传递与创新转化的必要性

（一）高校是文化基因转译的重要阵地

艺术教育以形象、情感、身体经验为媒介，能把“抽象基因”转化为“可体验、可再生产”的符号系统。课堂里，学生可以亲手制作绣球，体验植物印染，也能用数字软件给纹样添上赛博霓虹；舞台上，他们把天琴弹成电子融合乐，把刘三姐的山歌唱成说唱。就在一次次动手、动脑、动情的过程中，文化不再只是博物馆里的“请勿触摸”，而成为可以反复再生产的创意素材，被年轻人带向更广阔的天地，完成真正的代际传递。

（二）艺术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发动机

艺术教育通过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共通审美体验，把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可共享的情感符号，使学生在“共情—共境—共忆”的过程中自发产生身份重叠与价值认同。“艺术教育是延续中国精神的载体，是积累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是唤醒民族意识的锋利武器。艺术教育也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培养艺术传承者的重要途径。因此，与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是艺术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3]问卷结果显示，高达98%的受访者将“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列为艺术教育的首要功能，表明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艺术教育中的融入，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文化归属与身份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三）民族地区文化是艺术创新最丰沛的原型库

民族地区文化就像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宝库：绚丽夺目的图案纹样、荡气回肠的古老歌谣、巧夺天工的竹编银饰，无不是天然的故事脚本、造型母本和色彩谱系，为艺术创新注入传统的基因、独特的肌理和震撼的灵魂，使高校艺术课堂永远不缺灵感源泉。数据显示，66%的师生主张“传统与创新兼顾”，这一理念在高校艺术教育的实践中得到了生动体现。以壮族铜鼓纹样、壮锦几何结构、天琴多声腔等民族元素为代表的文化资源，为视觉传达、数字媒体、产品设计等专业提供了独特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来源。这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差异性IP”，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文化辨识度，也为高校产出高水平、原创性的艺术成果注入了持续的创新动力。

二、南宁师范大学的践行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南宁师范大学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实行多校区办学，其中武鸣校区地处骆越文化发源地，深受广西民族文化熏陶，拥有深厚的广西民族文化资源，学校多年致力于将民族地区优秀传

统文化在学校艺术教育中传承和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 课程设置与教学资源

南宁师范大学在艺术教育中融入了广西各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开设了劳动教育、第二课堂等课程设置、辅导员等师资培训以及实践活动等,近两年新开设了《大学美育》课程,课程也注重导入广西民族文化内容,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选择。部分学院整合校内外资源,邀请“非遗”传承人、艺术家等进校园开展讲座、工作坊等活动,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

(二) 实践活动与展演

学校鼓励学生参与各类艺术实践活动,如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校园歌手大赛、“石榴籽”民族团结主题活动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和理解民族文化的魅力。校团委、学生工作处也借助民族节日的契机举办学生活动,如广西“三月三”、清明节、端午节等等。此外,学校还积极推动国内外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此展示和推广广西多民族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

(三) 研究与创新

南宁师范大学的师生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民族艺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践行艺术教育中仍旧存在一些问题:

1.对艺术教育的理解和定位较为片面

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师生和管理层对艺术教育的认知仍停留在“技能传授”或“才艺展示”层面,将其窄化为唱歌、跳舞、画画等表层活动,忽视了其在文化传承、价值塑造与创新能力培养中的深层功能。这种工具化的理解导致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流于形式,课程设计偏重表演性、观赏性,缺乏对文化内涵、历史背景与当代价值的系统阐释,学生难以形成真正的文化认同与审美判断。与此同时,艺术教育常被当作“业余爱好”或“副科”,在资源配置、师资建设、评价体系处于边缘地位,进一步削弱了其作为文化基因“活化器”和民族认同“催化剂”的重要作用。

2.艺术教育停留在自发的文艺活动层面

问卷数据显示,仍有相当比例的学生将校内民族艺术体验等同于“晚会表演”“节庆走秀”或“工作坊打卡”,把艺术教育窄化为热闹却碎片化的自发活动;缺乏课程目标、知识序列与评价标准的支撑,导致乐器敲完就散、壮锦织完就挂,文化解读流于口号,创新转化无从谈起,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只能“昙花一现”,难以沉淀为可持续、可生长、可再创造的教学资源。

3.教学资源与师资力量不足

研究表明,“我国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艺术教育方面,重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实践课,较少涉及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艺术教育课程资源的整合,忽视了艺术教育对传统文化内涵的阐释,由此导致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艺术教育的课程建设、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等方面没有进行规范体系的设置。”^[4]这个情况在高校较为常见,尽管南宁师范大学在艺术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例如,劳动教育和第二课堂等教学资源融入艺术教育和民族文化不足。同时,师资力量也相对薄弱,缺乏具有相关经验的一线辅导员等老师指导开展活动。

4.活态传承与创意转化之间的平衡问题

在活态传承与创意转化之间,民族地区高校艺术教育常像走钢丝:过于坚持“原汁原味”,容易把民族艺术复刻化到学生手里,学生只能充当“手艺人”的角色;过于偏离原轨,传统文化符号容易被抽离语境,成为失真地表达。调研中66%师生呼吁“两者兼顾”,却苦于缺少“翻译规则:没有共享的纹样数据库、没有可溯源的改编标准、没有“文化深度—市场接受度”双轨评价,教师学生都无所适从。

三、传承与发展策略研究

(一) 劳动教育重构

通过对劳动教育课程进行系统地课程设计和实践教学,把学习技艺变掌握本领,设立“民族艺术劳动周”,完成相关传统手工艺课程,计入必修学分。开创“非遗”学分,学生每完成1小时民族技艺传习,获得1个学分,可置换成创新创业课学分,实现劳动—学分—创新创业有效转换。

(二) 第二课堂升级

把学生活动变为学生项目,打造“一院一节”,如音乐与舞蹈学院主办“天琴音乐节”、美术与设计学院主办民族纹样创意市集,采用项目制管理,学生负责策划、融资、运营、传播,教师仅作指导与顾问。连同创新创业学院建立创客联盟,孵化优秀IP,优秀项目可直接获得市场风投,实现文化传承与创业就业一体。

(三) 建立传统文化类社团组织

学校可以鼓励学生自主发起传统文化艺术社团,比如组建民族乐团、舞蹈团或手工艺协会等。这些社团既能扎根校园举办各类展演活动,也能

走向社会推广传统文化,在活动中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协作。此外,社团还可以对接校外文化机构或“非遗”工坊,联合开展传承与创新项目,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四)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

“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等精神内涵,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想、文化和审美意识,同时也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5]学生工作部门可以把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日常思政工作,借助专题讲座、主题班会等渠道,帮助学生真正领会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追求,逐步涵养爱国情感与民族认同。此外,还可以紧扣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组织学生讨论探究,启发他们从传统智慧中寻找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五) 建立评价与激励机制

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传统文化艺术活动和学习,学校可以建立相应的评价和激励机制。例如,拿出专项经费,设立传统文化艺术奖学金;开设“非遗之星”“民族文化之星”等校级荣誉称号,毕业简历可写进“校级重要奖项”等等,旨在对在传统文化艺术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进行表彰和奖励。同时,可以将传统文化艺术活动和学习成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作为评价

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依据。建立数字化成长账本,学生每一次采风、劳动、创作、获奖均上链存证,毕业生成可带走、可验证的数字化文化履历。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学校艺术教育与学生工作可以紧密结合,以劳动教育夯实技艺、以第二课堂对接市场、以校地协同共享收益,形成“教—劳—创—产”四轴驱动,共同推动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还能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同时,把文化基因转化为时代价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广西样本。

[1]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EB/OL].(2023-12-2).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4205.htm.

[2]周星;郭必恒.中国艺术教育年度报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3.

[3]王淑君.高校艺术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路径探究[J].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23,194(5):125-126.

[4]刘一峰,宋刘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高校艺术教育的探索[J].中国高校科技,2024,1:74.

[5]于向辉.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9,196(4):148.

地方高校教育硕士学科教学（数学）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的思考

程从华¹ 李燕章¹ 曾欣怡¹

(1.肇庆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 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硕士培养质量关系到国家基础教育水平的高低。本文分析了地方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实践教学能力培养的一些问题。作者指出了地方高校在教育硕士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 教育硕士; 学科教学(数学); 实践教学能力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编号: 2024A1515010983)、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编号: 2025JGXM_181), 肇庆教育发展研究院教育硕士专项研究项目(编号: ZQJYY2025046)和肇庆学院第四批创新科研团队项目(编号: TD202410)的资助。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38

Reflections on Improv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Abilities of Professional Master's Degree Graduates Teaching (Mathematics)

Cheng Conghua¹, Li Yanzhang¹, Zeng Xinyi¹

1.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Zhaoq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teaching abilities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master's degree graduates in local universities. The authors identify challenges in the education of local universities and offer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Keywords: Master of Education; Subject Teaching (Mathematics); Practical Teaching Ability

1 引言

教育硕士是为我国基础教育教学和管理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主力军, 区别于学术型研究生, 教育硕士更具应用性、职业性和专业性。实践教学是教育硕士培养的关键环节, 直接影响教育硕士未来职业素养能力的高低。本研究论文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提升地方高校学科教学(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对

地方高校学科教学(数学)教育硕士实践教学的现状进行调研, 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问题为导向, 在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实施路径、条件保障、评价方式等方面加以改进, 以提高实践教学对教育硕士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作者进一步探索了地方院校的学科教学(数学)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为全面提升地方高校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参考。二是助力地方高校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广东省正在全面推进“百

作者简介: 程从华(1981-), 男,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 应用统计、数学教育;

李燕章(2002-), 女,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 中学数学教育;

曾欣怡(2002-), 女,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 中学数学教育。

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对基础教育提出了优先补强县镇村教育短板，推进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在此政策背景下，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较强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基础教育高层次人才，可以更好地满足地方基础教育的需求，为地方教育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推动地方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我国 2009 年开始招收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这 16 年时间里教育硕士培养高校稳步扩大。全日制专业学位教育硕士从开始的无人问津到现在成为本科师范生以及非师范毕业生成为基础教育教师的主要通道。专业学位教育硕士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遍的认可。各培养高校根据自身优劣势正在积极探索和改进各自的人才培养方案。根据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公布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修订）》和《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本要求》(2023)各相关培养高校都在因地制宜的进行各自高校教育硕士的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探索。但就作者作为所在单位负责研究生教育主要管理者及研究生校内导师双重身份所掌握的情况以及到同类院校交流获得的信息看我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在人才培育过程中尤其是实践教学环节还存在部分问题急需改进和完善，相关内容参考冯爱琳（2022），王焱、董增川、刘平雷（2015），刘丽艳、秦春生（2016）等文献。学者唐卫民、彭万英（2022）通过深入调查分析指出我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在培养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实践教学培养方案不清晰，实施过程不具体，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不完善、权责利不明确，实践课程实施方案不完善，实践教学体系系统、碎片化，实践过程无明确监控，实践教学考核机制不完善等。学者王飞（2022）指出我国全日制专业学位教育硕士培育过程中存在：各实践教学主体间缺乏合作，校内导师、行业导师和研究生三方都存在实践教学参与度不够的问题，各实践教学环节互相割裂等。学者康张琪、潘勇（2024）针对全日制教育硕士“双导师”制度下研究生实践教学能力培养指出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全日制教育硕士实践课程与中小学融合不足，校外导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变动性大、校内外导师交流、协作严重不足。“双导师”执行措施和反馈整改力度不够。更多关于全日制教育硕士实践教学研究的论文可参考李华、田俊格（2024），庄玉昆、李娜（2024），童汝根等（2023），韩子续、邵志豪（2023），叶飞、尹琚瑶（2023）和罗溢枫（2023）

等。国外高校尤其是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高校十分重视实践教学，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质量保障等方面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教学模式归纳为以下四类：“企业主导型”实践教学模式，“资格证书导向型”实践教学模式，“项目导向型”实践教学模式，请参考俞婷婕（2018）和 CDIO 实践教学模式，详细详细请参考张妍（2020）。实践教学内容和方法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重视学生自主设计，进行选题、研究路线设计、调查或实验操作等一系列的训练。实践教学方法主要有案例教学法、模拟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现场教学法等。为保障实践教学质量，国外高校重视从影响实践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入手，加强实践教学所需的师资、设备、经费、场所以及校内外实践基地等软硬件建设。

2. 地方高校学科教学（数学）全日制专业学位教育硕士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2.1 实践教学大纲制定精准度不够

肇庆某地方高校 2021 年获得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权，2022 年开始招生，2023 年首批 40 余名研究生正式报到入学，开起了学校研究生培养的新篇章。数学院教学（数学）方向首届招生 8 名，成为学校首批培养专业研究生的二级学院。自获得研究生培养资格以来，学院高度重视并成立了由党委书记和院长为组长的研究生培养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和协调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建设、实践教学方案制定以及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研究生助教助学金评定细则等全方面工作。学院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全面的人才培养体系，但与教指委关于专业学位教育硕士实践教学指导文件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目前该地方高校教学硕士学科教学（数学）方向 2023 级培养方案要求总学分为 41 学分，其中实践教学 8 学分；实践教学又分为校内实训 2 学分（教学技能训练和课例分析 1 学分，微格教学 1 学分）；校外实践教学 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 1 学分，教育实习 4 学分，教育研习 1 学分）。从学分设置上完全满足了专业硕士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文件要求，但作者做为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直接负责人，在工作中发现实际情况与教指委指导文件仍存在较大差距。第一：由于该院 2023 级教育硕士是学院第一届研究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毕业生，没有任何相关成熟的资料和管理模式可参考，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实践教学

工作涉及高校、实践教学基地、研究生三方,由于多方参与但协调又不足,教学效果明显不好。学院根据工作要求,分配相关老师制定了实践教学相关课程的大纲等指导文件。相关任务老师参考网上资料进行了简单组后便提交到学院作为学院实践教学课程培养文件。这些方案的制定几乎没有考虑到学院的实际情况,方案泛而空,很难实施。

2.2 教育研习过程难监控,研习方案不全面

目前该院 2023 级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校外实践课程学习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已全部结束,分别是第一学年每学期第 17 周到校外联合培养基地进行为期一周的见习,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到校外联合培养基地进行一学期的实习。实习有顶岗实习和普通实习两种。教育研习要求学生提交研习总结报告。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学生对于教育见习要求不明确,见习学习一般仅是跟随校外行业导师随堂听课,协助校外导师批改作业,盯自习以及教学日常事务。对于教学过程的反思,导师课程组织与备课准备等深层次的教学思考很少涉及。通过见习研究生反馈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校外行业导师大部分都是所在学校行政领导,除了上课还有很多管理工作,基本没有时间与见习研究生进行较为深入的沟通和指导。二是见习研究生由于个人原因觉得自己仅是见习到学校进行观摩,通过多看、多听、多记便可以很好完成见习学习任务,学生对于见习学习的目标把握不准。三是部分学生存在羞于开口的问题,认为导师课堂一定是标准的、完美的示范课,自己只需要模仿导师授课模式即可,殊不知要达到老师示范课堂标准要进行的大量课下准备,错失与导师进行面对面交流学习的好机会。

2.3 专业硕士研究培养学术化

专业硕士培养学术化是教育硕士在培养过程中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目前该院 2023 级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和期中考核均已完成,通过开题答辩反应的问题主要有部分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均是学术化角度对中学教育方法和技能方面的讨论,部分选题还有大学数学教学论的趋势。期中考核中研究生关于开题后学位论文进展的报告中也反应出这一问题。参加期中考核的专家评委对这一问题进行严厉的说明和指导,该院也要求相关研究生和导师务必把握住教育硕士的应用型主题,同时学

位论文的研究范围必须是基础教育。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研究生本人对专业学位的自身定位不清晰。由于这是该校第一届研究生,学校和学院在论文指导方面没有具体的参考资料供学生和导师参考。研究生只能根据自己文献查阅和个人研究兴趣进行学位论文选题,虽然期间可能会与导师进行交流,但主要工作思路还是研究生自己决定,这样必然会导致出现偏差。另外一方面导师自身科研兴趣以及学科背景学术化也是重要原因。该院作为学校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培养学院,由于师资储备等原因,目前学院所有的学科教学(数学)的研究生导师大部分都是学术性背景的博士教师,他们的学源构成主要有数学专业、统计专业以及金融数学专业博士等,仅有个别导师是与学科教学(数学)相关的数学教学论博士。这些导师由于个人科研方向以及学源结构问题,很多导师对于学科教学(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和指导原则并不是很清楚,在指导学生时往往关注问题的理论研究而不是基础教育的数学教育教学问题。虽然该校和学院组织了一些关于导师指导能力的培训讲座,目前看效果仍需进一步提升。

3 提升地方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硕士实践教学能力的措施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结合工作实际笔者提出有以下几点改进措施。

3.1 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针对实践教学课堂以及考核评价标准不明确的问题,对该院学科教学(数学)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进行全面的修订和完善。校内实训课程由教学技能训练与课例分析(1 学分)和微格教学(1 学分)两门课程组成并计入研究生培养方案学业总学分,其中教学技能训练与课例分析在课程安排时必须让数学教学论方向的副教授或者博士作为任课教师同时要求与行业导师组成课程团队进行授课和任课老师必须准备教学案例做为课程分析素材。微格教学课程要求必须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副教授或者博士老师授课。在课程大纲设置中明确必须先由学生进行 10-15 分钟的实际授课演练,通过微格教学设备记录学生上课全过程其间要求学生必须体现教学基本功内容以及现代教学设备运用到教学实践中的体现;再由研究生和授课老师逐帧分析微格教学视频,发现和指出研究生在教学基本功、教材处理、课堂导入、

重难点讲解、教学仪态等各方面的不足以及后续改进的办法。通过这些细化的课程要求使校内实践真正为提升研究生实践教学能力提供保障。

3.2 改进教育研习实施方案

针对教学见习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目前该院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见习都是固定安排在第一学年每学期的第十七周进行。研究生分配到各自行业导师所在的校外联合培养基地跟随行业导师进行一周的见习观摩,但实践运行情况是并不理想,根据学生反馈,整个见习活动中基本上除了观摩校外导师课堂授课和协助校外导师进行作业批改和盯自习外基本没有关于课程准备、教材分析、课程组织、集体备课等活动导致学生见习效果甚微。针对这些情况,建议该学院制定详细的校外导师见习工作指导准则,要求校外导师除了让学生可以进入课堂听课以及协助日常教学工作之外,必须要让学生参与到中学集体备课、教材分析会等讨论环节,并且要求基地学校的学科组成员课堂对实习研究生开发,研究生可以根据时间自由进入各位实践基地老师的课堂进行观摩学习而不仅仅是校外导师课堂。让研究生广泛接触不同风格的老师授课,为研究生成长提供全面指引。

3.3 “以赛促学”通过技能大赛提高研究生实践教学能力

教育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能力的最终评价模式就是走上讲台,作为教师的授课能力,班级管理能力以及课堂反思能力等。这些能力通过校内外实训,校外“三习”基本能够满足教育硕士毕业时做为基础教育高层次人才到中学任职。但在实践中实际的培养效果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并未完全达到培养方案的要求,导致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校研究生在目前三年制的学习模式下,研究生自认为自己所学知识已经足够,并且通过实习锻炼完全已具备成为一名优秀基础教育数学教师的各种能力。部分学生出现学习倦怠现象,学生不知模拟课堂,微格教学以及实习上课都与未来真正上课的课堂还有巨大差距,也未看到与未来就业竞争者之间的差距。因此让研究生参与教育硕士相关教学技能大赛是非常重要的实践技能提升途径。通过研究生参加比赛也可以提高学校管理部门对教育硕士培养工作的重视程度。因为当研究生通过参赛获得各级荣誉时不仅是对学校培养人才的肯定,也是对学校的大力宣传。通过这些

成绩的获得,学院可以争取更多的培养条件,包括场地、硬件设施等。通过研究生参与学科竞赛可以看到全国各类高校在培养教育硕士人才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出色成绩,找到自身的不足,促进学校研究生导师和学生提升实践能力的主动性和。有利推动导师的专业指导水平提升和加强学生间的团队协作能力。目前该院教育硕士研究生主要参与的学科竞赛是“田家炳”杯全国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大赛以及依托本项赛事进行的学校和学院选拔赛。2023级学科教学(数学)硕士研究生2024年首次参加了此项比赛,2025年的比赛正在积极准备中。通过2024年的第一次完整参赛可以发现我院研究生与全国同类型研究生在教学技能方面的差距。第一就是研究生自身知识能力不够全面。根据比赛规则,参赛学生是到现场随机抽取抽题,题目范围是高中数学所有章节,该校24年唯一一名进入全国总决赛现场的选手出现了抽取的题目不是自己熟练掌握的高中课本知识点,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做为即将进入学校的准教师知识盲点情况必须杜绝发生,这也从一侧面反映出该院学生基础薄弱的问题,生源不理想的困境依然存在。第二是学生现场备课以及讲课能力都存在明显不足。笔者带队和观摩比赛的发现该校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准备出的教学设计和课程处理也存在明显不足。教学设计仅是课本知识的简单重现,课堂组织中重难点不分明,现代教育手段运用不佳等。通过这些竞赛活动,让学生看到自身不足和后续努力的方向,最终为研究生成为优秀的基础教育教师提供保障。

以上是笔者做为该院教育硕士管理人员和一名校内导师双重角色对学院学科教学(数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提高实践教学能力的一些思考,希望这些建议能为该院提高研究生实践教学能力提供帮助和参考。

参考文献

- [1] 冯爱琳.“双导师制”在师范生培养中的探索与实践:以惠州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J].惠州学院学报,2022,42(4):105-110.
- [2] 韩子续,邵志豪.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学科理解与职业实践[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3,(05):78-83.
- [3] 康张琪,潘勇(2024),“双导师制”下的教育硕士研究生教学实践能力培养研究[J].教育教

学论坛, 04: 177-180.

[4]李华,田俊格.教育硕士实践能力培养路径与实践探索[J].电化教育研究,2024,45(04):110-116.

[5]罗溢枫.全日制教育硕士实践能力协同培养的对策研究[J].湖南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36(02):81-85.

[6]刘丽艳,秦春生.协同与融合: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双导师制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6(12):54-58.

[7]童汝根,王红,安宁,罗一帆.实践导向的教育硕士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探索[J].高教学刊,2023,9(33):29-32.

[8]唐卫民、彭万英(2022),全日制教育硕士综合素质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全国教育硕士培养院校的抽样调查[J].现代教育管理,06:73-81.

[9]王焱,董增川,刘平雷,等.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以河海大学为例[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5(6):75-79.

[10]王飞(2022),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实

践教学模式的多元化探索[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06:39-46.

[11]俞婷婕(2018).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教育硕士培养目标探析及启示[J].中国高等教育,21:60-62.

[12]叶飞,尹珺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教育督导功能覆盖组态分析——基于教育硕士培养质量巡查的实证[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3,(07):67-72.

[13]张妍(2020),基于CDIO理念的应用型本科专业课程改革的研究与实践,苏州:苏州大学,2020:14-19.

[14]庄玉昆,李娜.大理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路径优化[J].大理大学学报,2024,9(01):75-80.

[15]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公布《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本要求》(2023年8月修订)的通知:教指委发〔2023〕07号[A/OL].(2023-08-28)[2023-08-30].<https://newyjs.snnu.edu.cn/info/1024/13511.htm>.

西部高校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的实践路径与育人机制研究

聂浩虹¹ 吴钰双^{2*}

(1.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集成电路学院), 重庆 401331; 2.泰国孔敬大学 教育学院, 泰国 孔敬)

摘要: 在乡村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与人工智能教育普及持续推进的背景下, 西部高校如何依托数字平台把专业资源转化为可理解、可参与、可持续的远程技能科普服务, 已经成为高校志愿服务和教育数字化实践中的现实议题。文章以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电子与物联网学院(集成电路学院)“云启未来”云支教专项活动与“山海支教行动”为案例, 采用案例研究与实践材料分析方法, 围绕项目品牌、志愿者组织、课程转化、远程实施、过程保障和成效改进等维度, 梳理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的实践基础与运行机制。研究认为, 西部高校远程技能科普支教的关键不在于简单迁移高校课程, 而在于将电子信息、物联网、集成电路和 AI 应用等专业内容转化为生活化案例、趣味实验和项目任务, 并通过线上直播、一对一辅导、互动问答、课后答疑等方式形成稳定服务。面向后续发展, 项目仍需在课程模块化、志愿者教学能力、服务成效评价和 AI 科普规范性方面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远程支教; AI 技能科普; 乡村教育; 科学素养; 高校志愿服务

基金项目: 2023 年度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技能型社会视域下西部地区职业启蒙教育建设路径研究》基金编号: 23SKGH439。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39

A Study on the Practical Path and Educational Mechanism of Remote AI Skil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upport Teaching in Western Universities

Nie Haohong¹, Wu Yushuang^{2*}

1. School of Electronics and Internet of Things (School of Integrated Circuits), Chongqi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Chongqing, China

2. Faculty of education, Khon Kaen University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mproving rural adolesc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promo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western universities transform disciplinary resources into sustainable remot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ervices. Taking the “Yunqi Future” cloud support teaching project and the “Shanghai Support Teaching Action” of Chongqi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as case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ject foundation, organizational process, curriculum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mechanism.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remote AI skil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hould not directly transplant university courses into rural classrooms. Instea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ternet of Things,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AI applications need to be transformed into life-oriented examples, interesting experiments and project-based tasks. Future development should strengthen curriculum modularization, volunteer training, service evaluation and the ethical norms of AI science popularization.

作者简介: 聂浩虹, 1988.11.22 男, 硕士研究生、讲师

吴钰双, 2000.01.30 女, 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 吴钰双

Keywords: remote support teaching; AI skil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ural education; scientific literacy; university volunteer service

一、引言

乡村青少年科学素养的培养已经不再只是自然科学知识的补充性学习，而是与学生理解现代社会、认识技术变革、形成职业想象和参与未来生活直接相关的基础性能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把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列为重点行动之一，并将科学教育、科普资源供给和数字化传播纳入持续推进的工作体系[1]。中国科协发布的2024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继续提升，但科学素质的层次差异仍然存在[2]。在这一背景下，面向乡村学生的科普教育不能停留在一次性活动和知识宣讲上，还需要通过稳定的组织体系、连续的课程供给和适合儿童认知特点的表达方式，把抽象技术知识转化为学生能够观察、讨论和尝试的问题。

人工智能进入基础教育视野以后，科普支教的内容边界也随之扩大。人工智能教育并不等同于算法训练或编程技能训练，对中小学生而言，更重要的是理解生活中的智能应用、数据与决策的关系、人机互动的边界以及技术使用的基本伦理。教育部等部门提出推动“人工智能+教育”行动，强调普及中小学生人工智能教育，说明AI素养已经从少数兴趣课程逐渐转向更广泛的基础素养建设[3]。对于西部高校而言，电子信息、物联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应用等专业资源本身具有较强的科普转化潜力，关键在于如何把高校专业知识转换为适合乡村中小学生的远程课程。

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电子与物联网学院（集成电路学院）持续开展“云启未来”云支教专项活动和“山海支教行动”，为观察这一问题提供了具体案例。“云启未来”自2021年启动，依托线上平台开展学业辅导、课后答疑、兴趣课堂、职业启蒙等服务；“山海支教行动”自2023年3月22日启动，以线上一对一教学方式对接湖北、广西、河南、甘肃、广东等多地乡村中小学。两个项目都不是单次公益活动，而是以多期运行、志愿者招募、课程准备和组织保障为基础的持续性服务。本文沿着“实践基础—运行机制—实践成效—优化路径”的思路展开分析，讨论西部高校远程AI技能科普支教如何形成可持续的教育支持模式。

二、文献综述

（一）乡村青少年科学素养与教育资源均衡

科学素养通常包含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应用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乡村青少年而言，科学素养的形成既需要学校课程中的稳定学习，也需要课外科普、技术体验和真实问题情境的共同支持。乡村学校在基础学科教学方面承担主要任务，但在科学实验、前沿技术启蒙、职业认知拓展和个别化辅导方面仍面临资源有限的现实。远程科普支教的价值并不在于替代学校教育，而是在学校原有教学之外提供一种补充性的资源通道，使学生能够接触到更丰富的科学主题和技术应用场景。

科学素养提升还与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未来发展想象有关。电子信息、物联网、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主题贴近日常生活，却又常常以抽象概念出现在中小学课堂之外。若能通过生活案例、可视化演示、趣味实验和项目任务进行转化，乡村学生就能在较低门槛下理解技术与生活的联系。远程平台进一步降低了高校资源进入乡村课堂的组织成本，使高校学生能够在不离开校园或假期居住地的情况下持续参与教育公益服务。

（二）远程支教与数字化教育公益服务

传统支教依赖线下驻点和短期集中服务，能够形成较强的现场互动，但在时间、人力和区域覆盖方面受到限制。远程支教借助直播会议、在线文档、即时通讯和数字课件等工具，把支教活动从固定地点转向跨地域协同。线上教学并不天然意味着教学质量提升，它真正发挥作用，需要稳定的师生匹配、清晰的教学计划、可持续的课程材料和服务过程中的反馈机制。

从已有实践看，远程支教正在从单一补课转向“学业支持、兴趣拓展、心理陪伴、职业启蒙”并行的综合服务形态。尤其在一对一辅导和小规模互动课堂中，志愿者能够根据学生已有基础调整讲解方式，学生也更容易提出个别问题。对于科普教育而言，线上实时演示、屏幕共享、互动问答和课后答疑能够把科学知识拆解为更具体的学习活动，但这一过程需要

志愿者具备教学转化能力，不能把大学课堂内容直接压缩后交给中小学生。

(三) AI 与技能科普教育的融合趋势

人工智能素养研究强调，学习者不仅需要知道 AI 可以做什么，还需要理解 AI 系统如何从数据中学习、如何受到训练数据和设计目标影响，以及如何判断 AI 输出的适用边界[4]。面向中小学生的 AI 教育框架通常会把感知、表示与推理、学习、人机互动和社会影响作为基本内容[5]。这些内容若直接以概念方式讲授，容易超出乡村中小学生的经验范围；若嵌入生活化任务，如手机识图、智能音箱、智能家居、推荐算法、导航和校园安全场景，学生就能通过熟悉经验进入技术理解。

技能科普的“技能”并不是要求中小学生掌握完整职业技术，而是让学生在观察、操作、比较、表达和反思中建立初步技术意识。西部高校相关专业可以把专业优势转化为多个层级的科普模块，低年级学生侧重生活现象和趣味实验，高年级学生可以接触简单项目任务和技术伦理讨论。AI 主题在远程支教中的引入，也应与电子信息、物联网、集成电路、可再生能源等内容保持关联，使学生看到“智能设备—数据采集—算法处理—实际应用”的基本链条。

(四) 高校志愿服务与实践育人

高校志愿服务具有明显的双向育人特征。对服务对象而言，志愿者提供了学业辅导、知识拓展和情感陪伴；对高校学生而言，支教过程要求其备课、授课、沟通、答疑、反思和团队协作。这种过程能够促进高校学生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公共表达能力，也使其在真实教育场景中理解社会责任。职业本科高校强调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远程技能科普支教把“专业学习—社会服务—实践反思”联系起来，为学生提供了课堂之外的成长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志愿服务的育人价值并不自动产生。只有当项目具备基本的组织规范、培训环节、服务记录和评价反馈时，志愿者的

经验才能从热情投入转向能力积累。远程支教尤其需要避免“临时上课、随意答疑、材料零散”的问题，项目组织者需要把志愿者个体行动纳入稳定机制，使每一期服务都能在前期经验基础上继续优化。

三、研究设计

(一) 案例对象与资料来源

本文以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电子与物联网学院（集成电路学院）开展的“云启未来”云支教专项活动和“山海支教行动”为案例对象。两个项目均依托线上平台开展支教与科普服务，服务对象主要为教育资源相对薄弱地区的中小学生，服务内容包括基础学科辅导、课后答疑、兴趣课堂、科学知识普及、职业启蒙和成长陪伴等。案例资料主要来自学院项目简介、活动总结材料、课程截图、活动照片、志愿者证书和项目过程数据。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案例研究与实践材料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文章不把两个项目处理为严格实验研究，也不使用没有证据支撑的学习成效数据，而是围绕项目如何组织、课程如何生成、服务如何实施、学生和志愿者如何受益等问题进行机制性分析。这种写法更符合当前材料的证据条件，也能避免将志愿服务宣传稿简单改写为研究论文。

(二) 分析维度

本文从五个维度展开分析。项目目标维度关注项目如何回应乡村教育帮扶、科学素养提升和高校实践育人的共同需求；组织机制维度关注志愿者招募、岗前培训、队长统筹、动员大会和证书激励；课程内容维度关注基础学业辅导、趣味科普、AI 技能启蒙和职业认知拓展；教学方式维度关注线上直播、一对一辅导、实时演示、互动问答和课后答疑；实践成效维度关注服务期数、服务时长、覆盖学校、志愿者规模和学生受益范围。通过这些维度，可以把两个项目从“做了什么”进一步推进到“如何运行”和“如何优化”。

表 1 两个远程支教科普项目的基本情况

项目	启动时间	主要方式	服务规模	主要内容
“云启未来”云支教专项活动	2021 年	线上平台、直播授课、一对一辅导、课后答疑	已开展 11 期，持续 1000 余天，覆盖 13 所中小学校；累计招募志愿者 2000 人；2025 年服务时长超 14000 小时，服务 211 名学生	文化课巩固、学习方法指导、心理健康关怀、兴趣课堂、职业课堂启蒙
“山海支教行动”	2023 年 3 月 22 日	线上一对一教学、实时演示、互动问答	已开展 7 期，累计 532 名志愿者参与，为 476 名乡村中小学生提供服务	语文、数学、英语辅导，科学小实验、自然奥秘、生活安全、天文地理、艺术创意、可再生能源等科普课程

资料来源：根据“云启未来”云支教专项活动与“山海支教行动”项目材料整理。

四、西部高校远程技能科普支教的实践基础

(一) 项目品牌持续化发展

“云启未来”和“山海支教行动”共同构成学院远程支教科普服务的实践基础。“云启未来”从 2021 年开始运行,已经形成多期持续推进的云支教专项活动;“山海支教行动”从 2023 年启动,逐年开展志愿者招募和支教服务,覆盖多个省份的乡村中小学。两个项目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都把线上平台作为连接方式,把高校青年志愿者作为服务主体,把学业辅导与科普拓展作为主要内容。持续多期运行使项目具备了品牌积累,也让支教活动从临时性公益实践转向相对稳定的教育支持。

品牌化并不只是活动名称的延续,更体现为组织经验的沉淀。每一期服务都涉及志愿者招募、学生对接、课程准备、教学实施、过程沟通和阶段总结。随着服务期数增加,项目逐渐形成了可复制的工作流程,志愿者也能在既有材料和前期经验基础上开展教学。对于远程科普而言,这种持续性尤其重要,因为学生科学兴趣的培养依赖长期陪伴和反复接触,单次讲座难以形成稳定影响。

(二) 专业资源向科普资源转化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集成电路学院)的专业结构为技能科普提供了内容基础。电子信息、物联网、集成电路和 AI 应用等专业知识与中小学生学习生活存在大量连接点,例如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交通导航、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能源利用和信息安全。远程技能科普的关键,是把这些专业内容转化为学生熟悉的现象、可操作的小任务和可讨论的问题,而不是把大学专业课程直接压缩后下放到中小学课堂。

“山海支教行动”中已有可再生能源优势与应用、科学小实验、自然奥秘探索、生活安全常识、趣味天文地理、艺术创意科普等课程内容,这些主题体现出专业知识向生活化、趣味化科普内容转化的方向。后续若进一步强化 AI 主题,可以围绕“生活中的 AI”“智能设备如何感知环境”“推荐算法为什么懂我”“AI 生成内容如何判断”“芯片与智能设备的关系”等主题开展模块化设计,使 AI 科普与学院专业资源之间形成更清晰的对应关系。

(三) 线上平台突破地域限制

远程支教的直接优势在于突破地理距离限制。湖北、广西、河南、甘肃、广东等地乡村中小学学生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与重庆高校志愿者建立联系,获得基础学业辅导和科普学习支持。对于服务组织者而言,线上方式降低了交通、住宿和时间协调成本,也让志愿者在学期中和假期中都能保持参与可能。对于乡村学生而言,线上一对一辅导提供了比公开课更细致的互动机会,学生可以围绕自己的薄弱环节和兴趣问题进行提问。

线上平台同时也带来新的教学要求。屏幕两端的交流缺少现场教学中的即时观察,志愿者需要通过提问、反馈、屏幕演示和课后沟通判断学生理解情况。科普课程尤其需要避免长时间单向讲解,应通过图片、短视频、生活案例、简单实验和小任务保持学生参与。平台只是服务通道,真正决定教学效果的是课程设计、互动密度和持续反馈。

(四) 志愿者队伍提供持续服务能力

两个项目的志愿者规模为远程支教提供了人力基础。“云启未来”累计吸纳志愿者 2000 人,“山海支教行动”七期累计集结 532 名青年志愿者。大规模志愿者参与说明项目具有较强的校园动员能力,也说明高校学生愿意将自身时间和专业背景投入教育公益服务。志愿者不只是课程执行者,也是在备课、试讲、调整和复盘不断生成课程资源的实践主体。

志愿者队伍的价值还体现在专业表达能力的成长。技术专业学生常常熟悉专业知识,却不一定能够面向儿童进行通俗表达。远程科普要求志愿者把复杂概念变成例子、问题和活动,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专业能力训练。对于职业本科学生而言,能够把技术知识讲清楚、讲生动、讲给不同基础的学习者听,是技术技能人才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的运行机制

(一) 招募与选拔机制

项目运行的起点是志愿者招募与选拔。远程支教需要志愿者具有稳定时间、责任意识、沟通能力和基本教学表达能力;远程技能科普还需要志愿者具备一定专业基础,能够理解电子信息、物联网、集成电路或 AI 应用相关知识。招募过程不宜只强调人数规模,还应根据课程类型和学生需求进行匹配,将学科辅导

型、科普拓展型、心理陪伴型和组织协调型志愿者区分使用。

在项目实践中,队长统筹、小组分工和学生对接能够降低远程服务的不确定性。每名志愿者承担清晰任务,每个小组有固定负责人,服务过程就能避免因个体时间变化造成中断。对于一对一辅导而言,稳定匹配尤其重要,学生与志愿者之间需要通过连续交流建立信任。

(二) 培训与课程准备机制

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的质量主要取决于课程准备。岗前培训不应只讲志愿服务纪律,还应包括儿童认知特点、线上课堂互动方法、科普表达规范、技术伦理边界和安全沟通要求。志愿者需要提前制定教学计划,把学科辅导与科普知识有机融合,并在试讲或组内讨论中检查内容难度。

课程准备还需要把专业知识拆解为模块。一个 AI 技能科普主题可以包含“现象观察—概念解释—生活案例—互动问题—小任务—反思讨论”几个环节。例如讲智能家居时,不必从复杂算法开始,而可以从传感器如何感知温度、光线和声音切入,再讨论数据如何被系统使用。这样的课程结构既能降低理解门槛,也能使学生在有限时间内获得完整学习体验。

(三) 课程实施机制

项目现有课程实施方式包括线上直播授课、一对一学业辅导、课后答疑交流、实时演示和互动问答。基础学科辅导解决学生在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中的具体困难,科普课堂则拓展学生对自然、技术和社会生活的理解。远程课程若要保持吸引力,需要把知识点放入问题情境,使学生在提问、判断、选择和表达中参与学习。

AI 技能科普课程可以在现有科普内容基础上逐步嵌入。低年级学生可以从“生活中的智能设备”进入,观察语音助手、图片识别和智能推荐;高年级学生可以讨论数据、模型、偏差和安全使用。课程不需要追求技术深度,而应重视技术理解、科学兴趣和使用判断。对于乡村学生而言,能够意识到 AI 并不遥远,能够把身边设备与科学原理联系起来,本身就是科普启蒙的重要结果。

(四) 组织保障机制

项目组织保障体现在动员大会、队长统筹、教学计划、志愿者聘书、优秀志愿者评选和荣誉证书等环节。这些安排使远程支教不再完全依赖个体热情,而是被纳入学院志愿服务体系之中。组织保障还能够增强志愿者责任感,让志愿服务从“临时帮忙”转向“承担一段连续教育服务”。

远程支教的组织保障也包括服务记录和过程管理。每次辅导应有基本教学记录,包括服务时间、学习内容、学生问题、后续计划和志愿者反思。科普课程应保留课件、活动方案和学生反馈,便于后续志愿者继续使用和优化。只有形成资料积累,项目才能在多期运行中逐渐提高质量。

(五) 反馈与改进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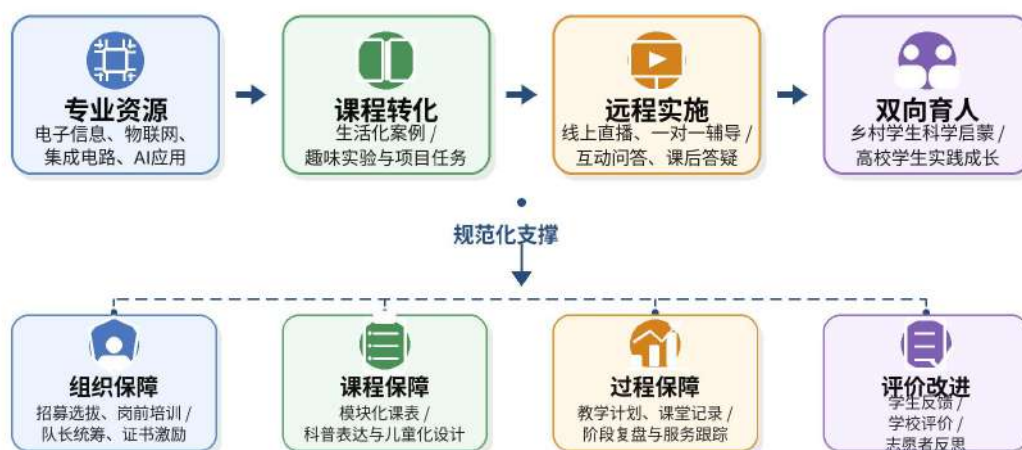
现有材料能够呈现项目规模和服务过程,但对于学生科学兴趣变化、学习体验、学校评价和志愿者成长的记录仍有进一步完善空间。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若要从实践探索走向更高质量研究,需要建立简洁可行的反馈机制。学生课后可以填写短问卷或口头反馈,合作学校可以提供阶段性评价,志愿者可以提交反思记录,项目组可以定期复盘课程内容和组织问题。

反馈机制的目的不是增加形式负担,而是让项目改进有依据。哪些科普主题学生更感兴趣,哪些表达方式更容易理解,哪些线上互动环节效果较好,哪些学生需要持续辅导,都需要通过过程记录逐渐呈现。这样的资料既能服务项目运行,也能为后续论文研究提供更扎实的证据。

表 2 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课程模块设计

模块	内容重点	适用方式	目标指向
基础学业支持	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薄弱环节辅导	一对一辅导、课后答疑	解决具体学习困难,建立学习信心
科学兴趣启蒙	科学小实验、自然奥秘、生活安全、天文地理	直播课堂、互动问答、图片或视频演示	激发好奇心和科学探索意识
AI 技能科普	生活中的 AI、智能设备、数据与算法、AI 使用安全	案例讲解、小任务、情境讨论	形成 AI 基本认知和合理使用意识
职业认知拓展	电子信息、物联网、集成电路、可再生能源应用	项目任务、职业故事、专业介绍	拓展职业想象,理解技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西部高校远程AI技能科普支教运行机制模型



说明：模型根据“云启未来”与“山海支教行动”的项目组织方式、课程内容与服务流程归纳形成。

图 1 西部高校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运行机制模型

六、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的实践成效

（一）拓展乡村学生知识视野

项目通过学业辅导与科普课程结合，为乡村学生提供了课堂之外的学习资源。科学小实验、自然奥秘探索、生活安全常识、趣味天文地理、艺术创意科普、可再生能源等内容，使学生能够在基础学科学习之外接触更丰富的科学主题。AI 技能科普进一步能够把智能设备、数据应用和技术伦理引入学生经验世界，帮助学生理解现代技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

这种知识视野的拓展并不表现为短期考试成绩，而更多体现为学生愿意提问、愿意观察、愿意把生活现象与科学知识连接起来。对于教育资源相对薄弱地区的学生而言，稳定接触外部科普资源本身具有启蒙意义。远程支教的持续性越强，这种启蒙越容易从偶然兴趣转向较稳定的学习动机。

（二）弥补课后辅导与科普资源不足

“云启未来”和“山海支教行动”均面向部分教育资源相对薄弱地区开展线上服务，有助于补充课后辅导力量和科普课程资源。线上一对一辅导能够针对学生个人学习问题进行解释，课后答疑可以延伸课堂学习时间，兴趣课堂则拓展学校课程之外的知识内容。远程平台并不能解决乡村教育资源差异的全部问题，但能在高校可承受的组织成本内，为乡村学生提供持续性补充支持。

从项目规模看，“云启未来”持续 1000 余天并覆盖 13 所中小学校，“山海支教行动”七期服务 476 名乡村中小學生，说明远程方式已经具备一定覆盖能力。相较短期线下支教，远程项目更容易形成常态化陪伴，也更适合围绕学生具体问题进行持续跟进。

（三）推动高校学生实践育人

高校志愿者在项目中不仅承担服务任务，也经历了一次专业表达和社会实践训练。备课要求其重新组织知识，授课要求其根据学生反应调整语言，答疑要求其理解学生真实困难，复盘要求其反思教学方法。技术专业学生通过科普支教学习如何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公共语言，这种能力与未来就业、社会沟通和技术推广均有关联。

项目中的证书激励、优秀志愿者评选和队伍建设也强化了志愿者的身份认同。志愿服务并不只是完成时长，更是学生理解社会需求、参与公共服务和形成责任意识的过程。对于职业本科院校而言，这种实践育人能够与专业教育形成互补，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理解技术学习的社会价值。

（四）形成西部高校服务乡村教育的新路径

两个项目表明，西部高校服务乡村教育不必局限于传统线下支教，也可以依托数字平台、专业资源和志愿服务体系开展长期远程支持。其路径不是简单地把城市优质课堂搬到乡村，而是根据乡村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兴趣特

点, 重新组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服务流程。

这种路径具有一定复制价值。具备工科、信息技术或职业教育背景的高校, 都可以围绕自身专业优势设计技能科普模块, 并通过线上平台对接乡村学校或学生。项目能否长期有效, 取决于课程库、志愿者培训、服务记录和评价反馈是否同步建设。

七、现实问题与优化路径

(一) 课程体系需要进一步模块化

现有项目课程内容较为丰富, 但后续需要把分散课程进一步整理为模块化课程体系。基础学业支持、科学兴趣启蒙、AI 技能科普和职业认知拓展可以形成四类课程, 每类课程再按照年级、难度和主题分层设计。模块化并不是让课程僵化, 而是为志愿者提供可继承、可修改、可复用的基础材料。

AI 技能科普模块可以按照“认知启蒙—生活应用—简单任务—安全伦理”展开。低难度课程讲生活中的 AI, 高难度课程引入数据、模型、偏差和判断。每个模块应包含教学目标、核心概念、生活案例、互动问题、课后小任务和注意事项, 避免志愿者每期从零备课。

(二) 志愿者教学能力需要持续提升

远程科普对志愿者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懂专业知识不等于会教学, 会做课件不等于会互动。志愿者培训应增加儿童化表达、线上课堂节奏、提问设计、即时反馈和安全沟通等内容。项目组可以建立示范课、优秀课件库和常见问题库, 让新志愿者能够在成熟材料基础上开展服务。

对于 AI 主题, 志愿者还应接受基本伦理规范培训, 包括不引导学生过度依赖 AI、不传播未经核实的技术信息、不收集学生敏感数据、不在课堂中使用不适合未成年人的工具。技术科普越贴近前沿, 越需要明确边界。

(三) 服务成效评价需要更加可观察

当前材料能够支撑项目规模和实践过程分析, 但若要进一步发表为更高质量研究, 还需要补充学生反馈、合作学校评价、志愿者反思和课程样本。评价不必一开始就复杂化, 可以从简短问卷和过程记录做起。学生可以反馈课程是否听懂、是否感兴趣、是否愿意继续学习相关主题; 志愿者可以记录学生问题和教学调

整; 学校可以评价项目对课后服务和科普拓展的支持作用。

成效评价应避免只追求漂亮数据。远程科普的成效更适合从兴趣变化、知识理解、参与表现、问题意识和持续参与等方面观察。项目数据越真实、越完整, 论文写作就越能从经验总结转向证据支撑。

(四) AI 科普内容需要加强规范性

以 AI 为主题的科普支教不能只把 AI 作为标签。课程应清楚区分 AI 概念介绍、AI 应用体验、AI 工具使用和 AI 伦理讨论。对于中小學生, AI 科普既要保护好奇心, 也要培养判断力。学生需要知道 AI 能够帮助人解决问题, 也需要知道 AI 输出会出错, 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需要被保护, 技术使用需要遵守规则。

后续项目可以形成 AI 技能科普课程清单, 例如“身边的 AI 应用”“智能设备如何感知环境”“图像识别与生活安全”“推荐算法与信息茧房”“AI 生成内容如何判断”“芯片、传感器与智能系统”等。每个主题都应根据学生年龄调整难度, 使 AI 教育真正成为科学素养的一部分。

表 3 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优化路径

问题领域	当前表现	优化方向	预期作用
课程体系	课程内容丰富但结构化程度仍可提高	建立分年级、分主题、分难度的模块化课程库	提高课程稳定性和可复制性
志愿者能力	专业基础较好, 儿童化表达和线上互动仍需训练	增加示范课、试讲、同伴评议和伦理规范培训	提升远程课堂质量
过程记录	服务规模数据较清晰, 学习过程证据仍需积累	完善教学记录、学生反馈和阶段复盘表	为持续改进和论文研究提供依据
AI 科普规范	AI 主题具备拓展潜力, 但需要避免概念化包装	形成 AI 应用、技术原理、使用安全和伦理判断一体化课程	提高 AI 科普的准确性和教育价值

八、结论

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电子与物联网学院(集成电路学院)依托“云启未来”云支教专项活动和“山海支教行动”, 形成了以线上平台为支撑、以高校志愿者为主体、以学业辅导和技能科普为主要内容的远程支教实践。两个项目的经验表明, 西部高校参与乡村教育支持具有现

实可行性,尤其在电子信息、物联网、集成电路和 AI 应用等专业资源较为集中的院校中,远程技能科普可以成为专业教育、志愿服务和乡村教育帮扶之间的重要连接。

从运行机制看,远程 AI 技能科普支教需要经过“专业资源—课程转化—远程实施—双向育人”的过程,并依赖组织保障、课程保障、过程保障和评价改进形成规范化支撑。它的核心不在于把大学专业内容直接移入乡村课堂,而在于根据中小学生认知特点,把复杂技术转化为生活化案例、趣味实验和项目任务。只有完成这种转化,AI 技能科普才能从概念标签变成学生能够理解和参与的学习活动。

面向后续发展,项目仍需加强课程模块化建设、志愿者教学培训、服务成效评价和 AI 科普伦理规范。若能进一步积累学生反馈、学校评价、课堂记录和志愿者反思,远程支教项目将不仅能够持续服务乡村学生成长,也能为高校实践育人和教育数字化公益服务研究提供更具证据基础的案例。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 [EB/OL]. (2021-06-03)[2026-06-08].

[2]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024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EB/OL]. (2025-05-30)[2026-06-08].

[3] 教育部等五部门. “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EB/OL]. (2026-04-29)[2026-06-08].

[4] LONG D, MAGERKO B. What is AI literacy? Competencies and design considerations[C]//Proceedings of the 2020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New York: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2020:1-16.

[5] TOURETZKY D, GARDNER-MCCUNE C, MARTIN F, et al. Envisioning AI for K-12: What should every child know about AI?[C]//Proceedings of the AAAI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9,33(1):9795-9799.

[6] UNESCO. AI and education: guidance for policy-makers[R]. Paris: UNESCO, 2021.

[7]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EB/OL]. (2022-09-04)[2026-06-08].

无障碍理念下的老年住宅室内空间优化设计策略研究

农蒋怡¹ 莫雯雯¹

(1. 南宁师范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 广西 南宁 530100)

摘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 老年住宅室内空间的无障碍设计变得越发紧迫, 但现有住宅大部分缺乏系统性的无障碍设计, 这与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的状况存在一定的冲突。本研究把无障碍理念作为理论框架, 从老年人行动困难、感官退化及心理特征这三个纬度来剖析其居住需求, 总结当下老年住宅在通行尺寸、地面高差、辅助设施、视觉引导等方面出现的常见问题。在此基础上, 提出全程无障碍、安全冗余、易识别且可操作、弹性与适变四项设计原则, 形成空间组织、尺度控制、细部安全、环境感知四类优化策略。研究表明, 把无障碍理念由物理可达扩展至心理可达和行为可达, 经由流线重构、功能复合、尺度适配、高差消除、辅助设施整合及照明色彩标识协同设计, 可以系统加强老年住宅的安全性、便捷性和自主性, 本研究为老年住宅设计及适老化改造赋予了理论支撑和可行办法。

关键词: 无障碍理念; 老年住宅; 室内空间; 优化设计; 设计策略

基金项目: 2025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编号: S202510603282)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43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Design Strategies for Indoor Space of Elderly Housing Based on Accessibility Concept

Nong Jiangyi¹, Mo Wenwen¹, Tian Chenglong¹

1. School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ed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dominant aging-in-place model, the demand for accessible design in indoor spaces of elderly hous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urgent. However, existing residences generally lack systematic accessibility design, resulting in a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with the decline in physical functions of the elderly. Using the accessibility concept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liv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from three aspects: mobility impairment, sensory decline,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t identifies typical problems in current elderly housing, including unreasonable circulation and dimensions, floor height differences and slip hazards, lack or improper installation of auxiliary facilities, and insufficient visual guidance and signag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four design principles are proposed: full accessibility, safety redundancy, easy identification and operability, and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Furthermore, four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constructed: spatial organization, dimension control, detailed safety measures, and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expanding the accessibility concept from physical accessibility to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accessibility—through

作者简介: 农蒋怡(2004—),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莫雯雯(2004—),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通讯作者: 农蒋怡

circulation restructuring, functional integration, dimensional adaptation, elimination of height differences, integration of auxiliary facilities, and coordinated design of lighting, color, and signage — can systematically improve the safety, convenience, and autonomy of elderly housing.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he design and aging-appropriate renovation of elderly housing.

Keywords: accessibility concept; elderly housing; indoor space; optimization design; design strategy

引言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之际,“原居安老”逐渐成为主流养老模式,老年住宅的适老需求变得越发紧迫。可是当前住宅室内空间多数缺乏系统的无障碍设计,这同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行动艰难的特征形成较大冲突。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施行的情况下,把无障碍理念系统融入老年住宅室内设计当中,化解居住难题并保障老年人安全便捷的生活^[1],已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任务。本研究尝试构建基于无障碍理念的老年住宅室内空间优化设计策略体系,用以应对老年群体居住中时存在的行动不便、安全隐患等状况。理论层面,会充实无障碍设计与老年住宅交叉领域的理论框架,弥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实际应用方面,则能给新建老年住宅设计及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给予具体可行的指导,进而改善老年群体居住的舒适度和安全性,推动积极老龄化的发展。

1 相关理论基础

1.1 无障碍理念的核心理念

无障碍理念起源于20世纪中叶的残疾人权利运动,该理论重点关注消除环境中的阻碍,让特定群体得以参与社会生活。“无障碍”概念由欧美国家在建筑设计方面提出,伴随工业化进程和平权运动的推动而持续发展^[2]。早期的无障碍设计大部分着眼于物理空间的行走便捷性,譬如设置坡道、加宽门洞、安装低位设施等,目的在于满足轮椅使用者的基本行动需求。后来,随着理念的提升,无障碍设计渐渐由从单纯的物理空间扩展到信息传递和服务参与范畴,重视环境对全体成员的可达性和可用性,而非仅仅针对少数特需群体。罗宇枫全面阐述了无障碍设计,通用设计以及包容性设计这三个理论的发展情况,表明无障碍设计理念并非人权运动的副产品,而是朝着更为全面的方向发展^[3],其核心要点可概括为消除物理障碍、提供信息无障碍、实现参与无障碍。由此可知,无障碍理念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技术规范,而是一种适合所有人的包容性设计哲学。

1.2 老年住宅室内空间的特征

老年住宅是指专为老年人居住及使用而设计或者改造的住宅种类,它的室内空间有着不同于普通住宅的显著特点,其一,使用强度较高。老年人平均每天在家的时间远超其他年龄段人群,住宅要涵盖起居、睡眠、娱乐、康复等诸多功能。其二,安全敏感度高。老年人一般都会出现肌肉力量缩减、协调能力变弱、骨质疏松等情况,地面高低不平、湿滑或者狭窄之类微小的设计漏洞也许就会引发跌倒事件。其三,对空间的灵活性需求大。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一直处于动态的改变之中,住宅空间应当可以经由局部的改动来符合从自理到介助、介护各个不同阶段的需求,这些特性使得老年住宅设计务必把安全性、便捷性以及可变性当作重点予以考虑。

1.3 无障碍理念与老年住宅设计的关联性

无障碍理念和老年住宅设计有着全面而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目标群体的需求存在很大的重叠之处,老年群体中有不少人都会出现行动不便、感官衰退以及认知能力下滑等情况,其功能障碍程度类似于残障人士,所以无障碍设计规范自然就能适合老年住宅。某项研究把社会老龄化当作大背景,依照无障碍设计的七大原则,剖析了老年人和残障者住宅在无障碍设计方面存在的不足,表明二者的设计需求在物理层面上十分接近^[4]。另一方面,设计逻辑也极为相近,无障碍设计重视“去除阻碍、留有余地、简化操作”,此类准则恰巧符合老年住宅对于安全性、便捷性和自主性的要求,比如无障碍规范所规定的轮椅回转区域以及防滑地面都是防止老年人跌倒的重要举措,杠杆式把手和低位开关也正好符合老年人手部力量变弱这一生理特点。通用设计和无障碍设计不是等同关系,通用设计是对无障碍设计理念加以进一步充实并提升之后得到的结果,它重点在于产品和环境应当最大限度地适合所有人使用。在老年住宅设计当中采用通用设计理念,有益于达成从特别照顾向全员友好的过渡。有些学者表明,

以前有关老年人居住空间的无障碍设计往往仅仅关注物质空间和生理需求,却忽略了老年人真实的生活情况、行为特点以及心理需求,适老化设计应该在无障碍设计之上给出更为实际的想法^[5]。所以把无障碍理念全面应用到老年住宅室内改良设计之中,既符合理论逻辑的发展趋势,也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有效办法。

2 老年住宅室内无障碍需求分析

2.1 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与无障碍诉求

老年人身体机能出现衰退状况表现在行动受阻和感官衰退这两个方面,二者一起形成了无障碍诉求的重点所在,就行动而言,肌肉力量变小、关节活动变得不灵活,有些高龄或者失能老人只能依靠轮椅来行走,他们的活动范围以及灵活性受到很大限制^[6],所以与之相关的通行需求主要是保证行动既方便又安全,应当有足够宽的门洞、走道以及弯道半径,才能让轮椅通过。按照《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规定^[7],无障碍通道的通行净宽不能低于轮椅通行所要求的最小宽度,而且室内还要去除地面高低差异,防止绊倒的危险发生,在走道、转角之类的要害地方安装扶手,给老年人行走给予支持。在感官方面,老年人视觉上对光线、色彩以及对比度的敏感程度明显下降,容易出现眩光现象并造成空间判断失误,听觉上由于听力减退对声音的识别能力也有所减弱,所以信息获取的需求重点在于清晰度和丰富性,应该设置简单而显眼的标识系统,采用高对比度的色彩,还要安装声、光、触等多种模态的提示设备,帮助老年人尽快了解周边环境情况。总的来说,无障碍诉求一方面要符合物理通行的可达性,另一方面也要保证信息感知的可信度,进而真正改善老年人居家生活时的安全感和独立性。

2.2 老年人心理特征与空间认同需求

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内心比较看重安全与自主,这是其空间认同需求的关键所在。踏入老年时期以后,老年人容易出现依赖和孤独的情绪,对于居住环境的安全防护有较高的期望,而且希望可以自行把握生活节奏,不愿意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在空间规划方面,尽量减少采用医疗化、机构化的样式,而是加入家庭式的装饰及熟悉的生活场景元素,从而创建出温暖又亲切的氛围,提升老年人的居家归属感。

无障碍设计要统筹好物理上的方便和心理上的关爱,一方面要符合活动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尊重老年人的私密性,并给予他们足够多的生活自主权,防止因过度帮助而产生的失落情绪,使得老年人在合适的空间里得到心灵的安抚,产生很强的空间归属意识。

2.3 社会交往与应急安全诉求

老年住宅室内空间除了要达成生理无障碍和心理认同需求之外,还存在社会交往以及应急安全等层面的诉求。从社会交往角度看,老年人退休以后其社会角色变得较为薄弱,社交范围有所减小,从而较易出现孤独感和抑郁情绪。住宅内部应当营造出利于家庭成员相互交流以及朋友前来探访的社交场所,比如宽敞明亮的客厅、半开放式的茶歇区或者能够灵活变换用途的多功能空间,防止因空间划分过多而阻碍彼此之间的对话。应急安全方面,老年人患急病或者摔倒的风险比较高,所以住宅里要有紧急呼叫装置,而且该装置的操作要简单,安装的位置也要合适。还要留出护理人员能快速跑到达的安全通道,也要考虑到急救担架进出时需要的空间,这些需求正好对应无障碍设计里的“参与无障碍”和“安全余量”原则,是老年住宅室内改善时不可漠视的关键部分。

3 无障碍理念下老年住宅室内空间的现存问题

3.1 通行与尺度不合理

当下,老年住宅室内空间多数存在通行和尺度不合理的情况,影响到老年人出行的便捷性和安全性。一项研究针对当下我国适老化住宅设计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做了系统剖析,其中把通行设计不合理列为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具体来说,门洞宽度往往小于800mm,远达不到轮椅通行的要求,从而约束了失能老人的活动范围;走道设计常存在弯曲、狭小之处,其宽度少于1200mm,使得老年人转动身体变得极为费力,极易引发碰撞危险。另外,家具的摆放乱堆放造成通道受堵,部分空间既过度闲置又缺少关键区域应有的规模,这些状况加重了通行的难题,违背了无障碍设计的原则,很难符合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的实际状况。在一些老社区里,无障碍设施短缺的现象相对严重,只有少数老年人觉得小区公共区域的楼梯扶手设置得还算齐全。

3.2 地面高差与防滑隐患

老年住宅室内无障碍设计存在地面高差和防滑问题两大主要不足, 这些都会危及老年人安全。相关技术规范表明, 地面高差超出 15mm 就会给行动困难以及坐轮椅的老年人带来通行阻碍, 所以要尽力去掉室内各个功能空间相接处的高差。可是当下大多数老年住宅里, 室内门槛、不同地面材料的交界处都有明显的高差且没有过渡处理, 这极易致使动作缓慢的老年人绊倒受伤。跌倒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甚至生命的重大因素, 经由调查研究得知, 老年人室内跌倒的环境危险因素主要是室内障碍物和地面光滑^[8]。卫生间、厨房属于用水频繁之地, 地面常会积水易滑, 但大部分并未采取有效的防滑手段, 防滑能力不足。阳台和室内地面往往会有高差, 而且未经过斜坡处理, 轮椅无法正常通行, 这就加大了老年人跨越时跌倒的可能性, 一定程度上违反了无障碍设计关于安全的核心准则。

3.3 辅助设施缺失或设置不当

显示, 功能分区欠科学、安全防护设施短缺也是适老化住宅设计里的主要不足之处。卫生间属于高频次使用的空间, 常常缺少扶手, 或安装高度、位置太高又太远, 不能给老年人起身、如厕给予有效的支持。老年人居家防跌改造的技术方案表明, 卫生间没有扶手属于老年人室内跌倒的关键环境危险因素。室内缺乏紧急呼叫按钮, 部分虽然设置了该按钮, 但是位置过高或者藏得深, 老年人处于紧急情况的时候难够到。已经有研究表明, 紧急呼叫器的拉绳距离地面大约 100 毫米左右, 这样老年人即使晕倒在地也能发出呼救信号。此外, 家具设计没有顾及老年人依靠的需求, 床边没有辅助扶手, 沙发又低又软, 这使得老年人起身困难, 无法符合自身行动迟缓的状况, 也违反了无障碍设计的适配原则。

3.4 视觉引导与标识不足

视觉引导与标识设计存在短缺现象, 这是老年住宅室内无障碍设计的一大重要缺失, 很难符合老年人视觉衰退的生理特性。老年人视觉系统在色彩感知, 光感对比以及形状识别上的能力有所下滑, 所以要比年轻人更为强烈的照明和对比环境才能源源不断地区分空间界面, 而且, 老年人对于高饱和度、高亮度暖色的辨别能力较强, 但是当下住宅空间中的标识与照明系统常常忽略此需求特征。室内照明普遍存在亮度不够、眩光过多的情况, 又缺少有针对性的局部补光措施,

这会影响到老年人看东西的清晰度; 色彩搭配较为单一枯燥, 功能区域之间没有明显的色彩差异, 到了夜晚难分辨, 容易造成空间被错误判断。室内缺少醒目的方向指示标识和危险警示标识, 标识样式繁杂、字体过小, 无法让老年人迅速识别空间信息并规避风险, 影响到了他们的居住安全性和便捷性。

4 无障碍导向下老年住宅室内空间设计原则

4.1 全程无障碍原则

全程无障碍原则在老年住宅室内空间优化设计当中处于核心地位, 重点在于形成一条从入户直至各个功能空间的连贯, 不中断且无障碍的流动路径, 以保障老年人可以自行行走。设计要清除所有由人造成或者结构带来的通行阻碍, 这既关乎水平面上的门洞大小、过道宽窄以及地面高低不平之类的情况, 还牵涉到垂直方向上上下楼梯的需求。各空间之间应当过渡自然, 没有明显高度差, 也不被家具或其他物品阻挡住去路, 方便轮椅和辅助工具通过。如此一来, 老年人就能自由地在玄关、客厅、卧室、卫生间等各个功能区之间来回走动, 充分体现出无障碍设计所蕴含的人文情怀以及恰当性。

4.2 安全冗余原则

安全冗余原则对于老年住宅的无障碍设计十分关键, 其主要依靠多层保护和余量设计来最大程度缩减老年人意外受伤的可能性。设计人员要在淋浴区、床边、马桶边等重要地方安装扶手、紧急报警设备以及防滑地砖等多种安全防护手段, 从而创建起一个防护体系。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到一旦出现意外时自己营救和他人施救所必需的空间和资源, 预先留出足够的操作区域和设备余量, 使得老年人能够立即启动求救信号, 施救者可以顺利展开救援行动, 防止由于场地狭小或者设备短缺而耽搁救援时间, 全面保障老年人在家中的生活安全, 这符合无障碍设计本质上的追求目标。

4.3 易识别与可操作性原则

易识别和可操作是老年住宅无障碍设计的关键原则, 重点在于符合老年人感官及动作衰退的特性, 保留其自主操作的能力。设计时, 开关、把手、家电和洁具的操作界面应采用大尺寸、高对比度色彩的样式, 提升视觉识别效果, 便于老年人立即找到所需之处。还要充分考虑到老年人

手劲减小、精细动作变差的实际情况,不能用旋钮、小按钮之类的难按部件,应该首选按压式或者推拉式的方案,从而减轻操作的困难程度,使得老年人自己顺畅地处理日常事务,这体现出无障碍设计以人为本的温暖情怀。

4.4 弹性与适变原则

弹性与适变原则在老年住宅无障碍设计中具有重要意义,关键在于适应老年人各阶段的失能情况并做到空间长时间合适设计时,室内空间布局及家具要有可调性,按照老年人行动能力的改变来灵活改动,从而满足从自理到半失能再到完全失能各个阶段的需求。而且要预先留出足够的护理空间,安排好护理设备接口以及管线的位置,削减后续无障碍改造的困难和费用,防止重复施工。此原则既考虑当前的使用需求又顾及将来的变动,使得空间适合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体现出无障碍设计的持久价值和人性关怀。

5 老年住宅室内空间无障碍优化策略体系

5.1 空间组织策略:流线重构与功能复合

老年住宅室内空间的组织要经由流线重构和功能复合来优化无障碍水平。其一,核心动线重点在于卧室、卫生间、厨房、起居室这四个高频使用空间,要规划出最短、最直、最宽的通行路径,缩减迂回转折和动线交叉的情况发生。动线的宽度要符合轮椅通行的标准,还要清除沿途的地面高差和障碍物,在走道两侧、转角以及空间交接之处留出扶手连续设置的地点,从而让老年人在行动时随时有依靠之处,做到各个功能空间之间的无障碍过渡。其二,辅助空间应当达成功能复合化,玄关可以融合换鞋、储物以及安装带有扶手的换鞋凳,设立低位的挂衣区域;走廊充当康复行走的通道,在墙边安放可折叠的扶手,不会占据通行的空间;阳台与起居室实施一体化设计,冲破空间界限,包含种植、晾晒、休息等多种功能,并且配备防滑的地面和舒适的座椅。主要动线做到无障碍串联,辅助空间得以复合利用,这样既能减轻老年人的行动压力并减小跌倒的可能性,又能够改善空间的实用性和舒适性,很好地符合无障碍设计理念。

5.2 尺度控制策略:通行空间与家具适配

尺度控制是老年住宅无障碍设计的根基所在,要从通行空间和家具尺度两个层面实施系统适配。

就通行空间而言,入户门以及室内门洞应当确保轮椅得以顺利穿行,优先选用推拉门或者外开门,防止内开门占用地道空间;走道的净宽要符合轮椅和行人双向行走无碍的要求,关键之处得留出足够的轮椅回转余地,卫生间里面也要安排轮椅靠近马桶和洗手台的侧面位置,保证操作方便。家具尺度及其操作高度方面,操作台面的高度要综合考虑坐姿者和轮椅使用者的需求,带有升降功能的设计更为合适;床的高度利于老年人起身,旁边加装扶手给予支持;沙发的座高恰当,采用硬支撑结构防止下陷;储物柜采取低位设计,常用物品置于老年人伸手可及之处,缩减弯腰和踮脚的幅度,经由对通行空间参数的恰当把控并配合家具尺度加以调整,可以有效地顺应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的特征,进而给予其独立活动的基本保障,真正体现无障碍设计的理念。

5.3 细部安全策略:高差消除与辅助设施集成

细部安全设计对于老年住宅无障碍优化而言非常关键,要从地面平整防滑以及辅助设施整合这两方面共同推进。地面部分,要做到全屋无门槛,取消各个区域之间的高度差,在材料相接之处用平坡过渡,保证轮椅能够顺利通过而且不会被绊倒。卫生间、厨房等用水处,选择高防滑等级的地面材料,并且采取线性排水的设计,及时排出积水,免除局部出现湿滑的情况。辅助设施方面,扶手应该连续地安装起来,在走廊两侧、淋浴区、马桶附近以及床头等重要之处设立结实的易触位置,确保在紧急的时候就能立即发出求救信号。还要融入智能辅助技术,比如装上红外感应夜灯、跌倒检测装置以及语音控制功能,做到夜间有安全照明,有异常提示并且操作方便。地面经由平整化和防滑设计去除物理阻碍,把扶手、报警系统和智能辅助系统融合起来,可以有效地减小老年人跌倒的风险,加强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充分体现了无障碍设计理念中的安全余量和人性化关怀。

5.4 环境感知策略:照明、色彩与标识引导

环境感知策略的目的是经由照明、色彩以及标识的系统设计来适应老年人视觉衰退的特性,从而加强空间的识别性及其使用时的安全性。照明上采取基本照明与局部重点照明相结合,基本照明用来维持室内整体亮度的均一,而局部重点照明则着眼于操作区、阅读区等高频活动区域。到了夜晚就安装低位感应脚灯,它会自动开启又

不会造成强光干扰,灯具挑选漫反射的那种类型,以此去除炫光现象,使得颜色得以准确再现。于色彩和标识,各个功能区域用不同的色系加以区别,比如卧室选柔和的暖色调,厨房和卫生间则用浅色和浅蓝色系来做标识,或者利用高对比度的腰线来分隔开区域;门框,扶手以及墙面相互之间采用高对比度的色彩搭配,以此来优化视觉上的辨识效果;而且标识体系运用大号字体、粗体字以及各类图形符号,加上触觉导向辅助手段,方便老年人经由视觉和触觉两个途径来取得所需的信息。当照明、色彩和标识一同被设计的时候,就能够促使老年人立即认清所处的空间环境,缩减出现判断失误的可能性,真正符合无障碍设计理念当中关于易于识别和具备可操作性的需求。

结束语

本研究以无障碍理念为切入点,深入剖析老年住宅室内空间改良设计的相关问题,其一,要明确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滑及心理特点而产生的立体式无障碍需求,涵盖行走需求、信息获取需求、空间归属感需求、社交活动需求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安全保障需求。其二,总结当下老年住宅室内空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一是行走路径和空间尺寸设计欠佳,其二是地面存在高低落差且缺乏防滑措施,其三是辅助设施缺少或者摆放位置不合适,其四是缺少视觉导向标识。在此基础上,提出四项设计原则,分别是全程无障碍、安全冗余、易于识别且具备可操作性,具有灵活性并能适应变化。形成起空间组织策略、尺度控制策略、细部安全策略以及环境感知策略四类优化

策略体系。本研究把无障碍理念由物理层面的可达到之处拓展到心理层面的可达到之处和行为层面的可行之处,给老年住宅室内空间设计赋予了系统的理论支撑和实用的设计指导,对于推进适老化居住环境创建有着良好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2023-06-29).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8910.htm.
- [2] 宋尚聪.域外无障碍立法彰显“温度”[J].检察风云,2023(17):16-17.
- [3] 罗宇枫.从无障碍设计、通用设计进阶到包容性设计的无障碍环境构建理论和方法[J].建设科技,2023(5):11-1418
- [4] 李茹.老年人和残障者无障碍住宅设计研究[J].艺术与设计(理论版),2024(4):79-82.
- [5] 黄志杰.无障碍设计理念下居住空间适老化设计的发展及策略[J].建筑与文化,2023(7):175-176.
- [6] 彭洪俊,曾羿.肌肉减少症和骨关节炎相关性研究进展[J].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2022,36(12):1549-1557.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
- [8] 马英楠,靳宗振,高星,张哲,刘旭晔,张文佳.老年人居家防跌环境改造和设计技术方案[J].城市住宅,2016,23(1):29-34.

壮族文化在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中的研究

袁泽佑¹ 陈小霞¹ 郑婷¹

(1.南宁师范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 广西 南宁 530100)

摘要: 文化强国及文旅融合战略不断深入之际, 地域文化在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中的价值愈发凸显。壮族文化源远流长又独具特色, 其包含壮锦、铜鼓、花山岩画、以及歌圩文化等诸多典型元素, 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形成部分。当下, 博物馆展陈设计存有一定的问题, 壮族文化的潜在应用价值还未得到全面发挥。文章把壮族文化和博物馆展示空间的本质联系当作突破口, 采用文献研究法, 案例分析法以及归纳总结法, 得出整体性、可读性、体验性三个设计原则, 并且从主题定位、整体叙事、艺术融合、符号创建、技术助力五个层面给出设计策略, 希望本研究能助力民族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并更新发展。

关键词: 壮族文化; 博物馆; 展示空间设计; 应用策略; 文化表达

基金项目: 2025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编号: S202510603286)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44

Research on Zhuang Culture in Museum Exhibition Space Design

Yuan Zeyou¹ Chen Xiaoxia¹ Zheng Ting¹

1. School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100, Guangxi

Abstract: As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trong cultural nation and integrating culture and tourism continues to deepen, the value of regional culture in museum exhibition space desig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Zhuang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Zhuang brocade, bronze drums, Huashan rock paintings, as well as Song Wei culture and many other typical elements. It is a key part of the form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t present, there are certain problems with museum exhibition design, and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value of Zhuang culture has not been fully realized. The article takes the essential connection between Zhuang culture and museum exhibition space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and adopt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case analysis method, and inductive summary method to derive three design principles: integrity, readability, and experientiality. It also provides design strategies from five levels: theme positioning, overall narrative, artistic integration, symbol creation, and technological assistance.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can help promote the dynamic inheritance and renewal of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Zhuang culture; museum; Exhibition space design; Application strategy; cultural expression

作者简介: 袁泽佑(2004—),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郑婷(2004—),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通讯作者: 陈小霞(2004—),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引言

文化强国战略持续推进,文旅融合不断深入,此时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成了民族文化传播的关键载体。当下,观众观展需求日益多元,更加看重文化性、体验感以及互动性,不过目前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仍然存在同质化、文化挖掘浅表化等一些问題^[1]。壮族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涉及壮锦、铜鼓、干栏建筑等诸多典型元素,是博物馆展示设计的一笔宝贵财富。本文把壮族文化和博物馆展示空间的本质联系当作入手点,利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以及归纳总结法,对于文化应用表面化、体验感缺乏、设计雷同等重点展开探究,探寻壮族文化元素深入转化和全面应用的途径,总结出设计准则并且形成应用策略。研究期望给壮族地区博物馆展陈革新赋予可行的操作计划,促使壮族文化鲜活传承并更新发展,有益于树立文化自信,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

1 壮族文化的相关概述

1.1 壮族文化的形成背景

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主要聚居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该文化可回溯到古代百越族群当中的西瓯、骆越支系^[2],有着两千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历史。广西地区多山多水、气候湿润,该自然环境之下是以稻作为主的传统农耕生产模式,加上各民族长时间相互交融的社会大背景,一起铸就了壮族特有的文化形式。依山傍水的聚落环境促成了通风防潮、符合当地气候条件的干栏式建筑;稻作祭祀及祈福的文化习俗产生了代表民族精神的铜鼓文化和雄伟壮观的花山岩画;聚居生活加上群体性的节日庆典活动,便诞生了诸如歌圩、绣球、壮锦等极具标志性的民俗文化和传统艺术^{[3][4]}。这些文化要素源于生活、蕴含历史,具备鲜明的地方特色、实用价值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内涵丰富又易于识别,给博物馆展览空间的设计赋予了多种独特的创作资源和文化依托,从而为民族文化的现代转换及其革新性表现构筑了稳固根基。

1.2 壮族文化的显著特征

壮族文化存在四个明显特点。其一是地域性十分突出,广西为其核心分布区域,在建筑形制、纹样符号、色彩体系以及民俗仪式等方面创建起稳固而独有的识别系统^[5],同其他民族文化有一

定的差别,地域特征十分明显。其二是历史传承性佳,铜鼓、花山岩画、壮锦等经典文化遗产经过长时间流传和发展,直到现在仍然被使用并不断更新,其中蕴含的文化基因一直延续,具备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其三是包容性强,在守护自身文化核心和特色的情况下,踊跃接纳中原文化和周边各个民族的优良文化,并相互融合共同发展,从而塑造出包含多种元素又统一、开放而宽容的文化特质^[6]。其四是生活气息浓烈,文化源自人们的日常生产劳动,衣食住行以及节日庆典等活动,它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其内容生动有趣、饱含深情,极具亲和力、感染力和流传力。

1.3 壮族文化的典型元素

壮族文化中有许多可以化为设计语言的典型元素,包含视觉符号、空间意象以及行为仪式三大部分,这些元素内涵充实、形式繁多,会给博物馆展示空间的设计赋予充裕的创作素材和表现途径。

1.3.1 视觉符号类

从视觉符号角度看,壮锦主要采用红、黄、蓝的高饱和度颜色作为基调,并配以几何纹、花卉纹等传统纹饰,其图案饱满对称,蕴含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而铜鼓则把太阳纹、云雷纹以及青蛙图案当作关键的装饰题材,整体造型显得十分庄严,代表着人们期盼五谷丰登以及各族人民相互融合的美好愿望。花山岩画以赭红色的人物剪影为主角,形象地表现出祭祀、歌舞之类的画面,笔触精炼流畅、气魄宏大磅礴,给人带来很强的视觉震撼力和浓厚的历史沧桑感。经由对花山岩画视觉语言实施符号学剖析并探究其发展脉络,可以有效地提取出具备文化特色的视觉要素,进而给博物馆展览场地的界面规划、色彩调配以及纹饰选用给予直观的设计灵感^[7]。

1.3.2 空间意象类

从空间意象看,干栏式建筑底层架空、上层居住、坡顶木结构属于传统形式,其层次分明、利于通风防潮,符合岭南气候特征且富有独特的空间韵律,可以化作展厅动线规划及空间界面设计的语言。壮族传统村落把鼓楼、晒场当作公共中心,创建起围合式、仪式感强的整体布局,其秩序感浓烈,叙事性明显,可用作博物馆展厅序列安排以及观展节奏的设计参考^[8]。广西壮族干

栏建筑在空间规划、结构设计上的独特之处,给现代展示空间的功能分区、流线组织以及节奏营造带来很大灵感。

1.3.3 行为仪式类

歌圩的行为仪式主要围绕对歌、合唱以及互动传唱展开,其突出特点是参与性强、群体性大,充分表现出壮族民俗文化的特点。铜鼓祭祀重视节奏韵律,仪式过程以及营造场所气氛,整个过程庄重又极具感染力。按照情境叙事理论,把叙事情境、叙事结构和叙事序列的方法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交互展陈设计当中,可以把歌圩文化的互动感受以及铜鼓祭祀的仪式气氛转变成互动装置、情境体验和沉浸式展项,从而达成壮族文化由传统形式向现代表现手法的革新性转换,使得民族文化能够在空间里生动地展现。

2 文化与博物馆展示空间的相互关系

2.1 博物馆是文化展示与传播的重要载体

博物馆有收藏、研究、展览、教育等职能,其在传承、流传并发扬壮族文化时具权威性、系统性以及公众影响力的关键平台。博物馆属于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表现形式,凭借专业学术研究作支持,依靠规范的展览方法来达成目标,有条理的将壮族漫长的历史进程、多样的民俗特色、丰富的艺术成果及其深层意义,向大众普及信息。对于本地居民来说,博物馆是唤起文化回忆、巩固民族认同感、增进自尊心和归宿感的场所,有益于加深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喜爱之情。而对于外地游客来讲,博物馆则是迅速而直观地了解历史、艺术、信仰以及日常生活状况的可靠渠道,可以有效地表现出文化的独特吸引力和价值所在。近年来,广西民族博物馆、崇左壮族博物馆等场馆针对壮族文化的展示与流传做了不少有益尝试,并收获了一些操作成果。但从全局视角出发,当下部分相关博物馆仅处于以静态图文展板为主的初级展示层级,营造空间情感氛围欠佳,互动体验规划较为薄弱,展陈形式比较单调,没有很好地探寻出文化的核心精髓及其时代意义,所以其文化传播能力和感染力比较低,整体展示效果和流传效益还有很大的改良余地^[9]。

2.2 文化决定博物馆展示空间的文化特色

博物馆的空间气质、叙事逻辑、视觉体系、材料色彩以及整体氛围营造应深深扎根于地域本

土文化之中,用文化内核来统帅设计表现,防止出现空洞的形式堆积现象。壮族文化源远流长、特点突出,给广西地区的博物馆增添了独特的地域标志和文化特性,使得场馆在空间形状、色彩系统、动线规划以及体验方式等方面,均能表现出强烈的识别特征,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存在明显差别^[10]。如果背离本土文化的根基随意设计,容易掉进形式主义的陷阱里,引发空间风格相似、展览形式单调的情况,从而引发“千馆一面”的常见问题,致使地域特征消失殆尽,文化印象淡薄许多。可以说,文化意义决定了空间品质和精神风貌,良好的展示空间还能回馈文化流传、加深文化归属感,它们彼此依靠、互相配合、缺一不可,一起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博物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3 壮族文化在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中的原则

3.1 整体性原则

展示设计需形成起完备而统一、逻辑清晰的文化叙述体系,不宜出现文化符号碎裂堆积、机械套用标签或者生搬硬凑形式的情况,要切实做到由外至内、由表及里的文化传达效果。在整体设计当中,要把核心文化主题放在首位,把空间序列安排、参观路线规划、色彩系统创建,材料选取运用、灯光氛围塑造等要素整合起来并加以协调,让每一个空间角落都为整体故事服务,从而达成连贯递进、层次清晰的观赏节奏,给观众带来连贯而全面的文化感受。设计时可参考壮族干栏建筑的空间逻辑,其高低错落、虚实结合且功能分区清晰,并融入壮族历史发展、民俗生活、信仰仪式以及艺术创作等文化元素,依次衔接各个展示区域,经由整体化、系统化的空间塑造,保障博物馆展览风格和谐统一、文化主题鲜明突出、叙述脉络顺畅贯通,让壮族文化得以完整展现,增强整体影响力和流传度。

3.2 可读性原则

文化符号转译应坚持通俗直观、清晰易懂的基本导向,全面考虑专业研究人员、普通观众、青少年游客等不同群体的认知水平以及观展需求,避免让表达变得过于抽象、艺术化或者难以理解。当执行符号转化和视觉表现时可以灵活采用色彩对比、层级划分、隐喻象征等设计方法,从而提升壮族文化元素的识别度和记忆点,缩减观众的理解难度。比如可选取各种类型的壮锦纹样,针

对历史、民俗、工艺、艺术等不同的展厅主题,做到视觉上的区域提示;再结合简明扼要的图文说明、恰当的文化阐释,使得观众立即察觉到符号的特点,领悟其中的文化意义,感受到深层的精神价值,切实达成看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效果。可读性原则需从观众角度出发,保留文化本质,并以现代设计语言激发传统符号,令壮族文化更为亲切,易于领会且具备更强流传能力。

3.3 体验性原则

展示设计应由传统的静态单向观赏模式转为多感官、参与式、沉浸式的综合体验模式,并凸显以观众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全面融合声、光、电、数字互动、装置艺术等现代展陈技术,重现民俗仪式氛围以及历史文化情境,缩减展品与观众间的距离感。设计时倡导观众参与交流,借助沉浸式的环境、可参与的项目、可操作的装置来加强观展的乐趣和投入程度,大幅优化文化体验的参与感、流传力和记忆力。体验性原则使得观众由“看展览”变成体验文化、融入文化,壮族文化在沉浸式参与下得以入眼、入心、入脑,从而达成更为鲜活、持久的文化流传效果。

4 壮族文化在博物馆展示空间中的设计策略

4.1 明确展示设计目标与主题定位

博物馆展示设计首先要确定目标并准确定位主题,防止出现内容过于宽泛、表达不清或主题不集中的情况,从而使得壮族文化的展示更有指向性、条理性以及吸引力。各类博物馆肩负着不同的展示任务和教育意义,应依照自身的定位、馆藏特点以及服务人群来提取包含文化内涵和流传价值的关键主题。主题确定之后融入到空间布局、色彩协调、材料选取、灯光设置、互动装置等各个环节当中,创建起前后连贯、逻辑清晰的完整叙述框架。如以“铜鼓之声”作为展示线索,序厅可以利用巨大的铜鼓造型加上肃穆的光影效果来营造庄严的历史氛围;中厅详细讲述铜鼓的起源、图案象征、制作方法及其社会作用;尾厅则通过互动击鼓游戏结束整个参观过程,能促使观众在亲身参与的过程中加深印象,做到主题延续、文化传承,进而优化展示的整体性和影响力。

4.2 壮族文化的整体性表达与细节化设计

壮族文化的展示应坚持整体叙事与细节营造相统一,以完整文化脉络为线索,将起源发展、

稻作生产、日常生活、民俗艺术、精神信仰等板块有机串联,构建起有层次、有节奏、有情感的空间叙事结构。例如以“天地人和谐”为核心线索,序厅可运用花山岩画元素营造古朴神秘的远古氛围;中厅实景复原干栏民居、稻作劳作、家庭生活等场景,还原真实生活状态;尾厅以歌圩仪式、歌舞展演升华主题,传递民族精神与文化追求。在整体框架之下,细节设计更要深度植入壮族文化基因,实现由内而外的文化渗透。导视系统可提取壮锦几何纹样作为视觉基底,兼具导向功能与艺术美感;展台边缘、展柜边角可雕刻铜鼓太阳纹、云雷纹,强化文化符号;墙面色彩可提炼花山岩画赭红色、壮锦靛蓝色与明黄色,形成稳定而鲜明的地域色彩系统;灯具造型、休息座椅、扶手栏杆、地面拼花等均统一文化语言,保持风格高度协调。通过整体叙事统领、细节符号赋能,使空间从宏观布局到微观装饰都饱含壮族文化韵味,实现整体与细节高度统一、形式与内涵深度融合。

4.3 壮族文化与展示艺术的融合

壮族文化元素不应表面附着作装饰,需同空间构图、陈列形式、照明艺术等深度融合,变成具备艺术感染力的空间语言。就陈列形式而言,冲破传统文物单独摆放的形式,采取情景化、场景化、叙述化的陈列方法。如展示铜鼓时,可结合再现祭祀场景,用暖红色光影营造气氛,并伴有低沉的鼓点声音环绕四周,营造出庄严肃穆的仪式氛围,使观众领悟到它的文化意义。花山岩画可以变成镂空金属板、艺术隔断或者艺术装置,加上背光照射就会产生动态剪影的效果,从而创建起既有视觉冲击力又具叙述功能的光影艺术作品。经过全方位的艺术融合之后,展览空间不仅是存放展品的容器,而是成为展示民族艺术的重要场所,极大优化空间的审美价值并增强其文化影响力。

4.4 壮族文化符号在展示空间中的建构

壮族文化符号应用于现代设计中则应先经由提炼、简化、重组及转译,以满足现代审美与功能需求,并保留其文化辨识度来达成当代革新。如针对壮锦、铜鼓、花山岩画以及干栏建筑等经典元素展开解构与提炼,去掉繁琐细节,保留主要特点,进而化为简约、几何、模块化的现代设计语言。可把壮锦繁杂的纹样简化成几何网格与线条,用之于天花造型,地面分区,墙面切割以

及界面装饰;把花山岩画中的人物剪影执行阵列、重复、渐变排列,从而创建起具有节奏感的视觉背景墙或者艺术幕墙。在符号转译时,要守住文化可识别性与精神内核不改变,防止因过度抽象而造成文化失真,经由科学创建和适当更新,使传统符号以更为现代、更为精简、更合适的形式融入展示空间,既能保留文化根基,又能符合当代设计潮流,做到传统符号的革新性转换和改进性发展。

4.5 壮族文化与新技术的融合

利用数字技术和智能手段来助力壮族文化的流传,冲破传统静态展示的限制,创建起可看、可听、可玩、可感、可互动的新式展陈空间,使得传统文化得以切实“活”起来。对于歌圩文化而言,可以设立沉浸式对歌互动亭,屏幕会不断显示歌词,麦克风也会即时捕捉声音并自动打分,让观众在互动过程中感受到对歌的乐趣。铜鼓文化则可以利用地面的压力感应装置,当观众站在不同的地方时就会响起相应的鼓声,并伴有光效的变化,从而营造出一种击鼓的氛围,进一步加深参与者的感受。壮锦织造和花山岩画借助AR加强现实技术,观众用设备扫描就能看到动态的织造步骤,岩画绘制情形以及历史场景再现,还可以融合裸眼3D投影、沉浸式CAVE空间、人机交互等技术,形成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所,让观众仿佛身处历史场景、民俗活动以及自然环境当中。新技术的应用不但增添了展示的趣味性和吸引力,还缩减了认知难度,加深了情感共振,拉长了留存时间,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展陈形式单调、体验感差、流传力欠佳等难题,促使壮族文化凭借科技的力量达成更为高效、形象、深入民心的传承与流传。

结束语

壮族文化包含着壮锦、铜鼓、花山岩画、歌圩文化等诸多非常丰富的视觉符号、空间范式以及行为仪式,给博物馆展示空间的设计赋予了独特而鲜明、内涵深厚的创作资源。在设计时要严

格按照整体性、可读性、体验性原则,利用精确的主题定位、完备的整体叙述、多种艺术的融合、传统符号的创建、数字技术的助力策略,才可以切实做到壮族文化元素的创造性转化以及革新性的表达,有效地解决当下民族地区博物馆展览普遍存在的同质化现象突出、文化挖掘浅尝辄止、体验设计乏力等实际难题。本文的研究成果期望能促使壮族文化在现代社会得到鲜活传承,使得优秀的壮族文化在新时代持续展现勃勃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 [1] 张子旭.行业博物馆展陈设计现状及思考[J].中国民族博览,2023(18):247-249.
- [2] 梁敏.论西瓯骆越的地理位置及壮族的形成[J].民族研究,1996(3):102-107.
- [3] 韦熙强.试论壮侗民族民居文化中的科学因素——壮侗民族民居文化研究之一[J].广西民族研究,2002(2):43-48.
- [4] 王熠萌,曹之文.花山岩画视觉语言呈现的演变规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19):156-162165.
- [5] 姚北.壮族传统元素在空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J].美与时代(城市),2023(6):22-24.
- [6] 覃彩銮.壮族传统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及其成因[J].广西民族研究,1995(2):37-45.
- [7] 王熠萌,曹之文.花山岩画视觉语言呈现的演变规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19):156-162165.
- [8] 江波,黄露,谭典.广西壮族干栏建筑对现代展示空间设计的应用探究[J].艺术探索,2009,23(5):103-104106.
- [9] 宋才发.民族博物馆的三大基本职能探讨[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7(5):77-86.
- [10] 李卫平.趋同性和多元化——浅议博物馆陈列形式设计的创新[J].艺术科技,2015,28(6):83-84.

基于仿生理念的儿童趣味性家具设计研究

麦堡勇¹ 韦远通¹ 覃华盛¹

(1.南宁师范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 广西 南宁 530100)

摘要: 随着儿童家具市场的发展, 现有家具已难以满足儿童对功能性、安全性、趣味性与适应性方面存在的多种需求。本研究凭借仿生设计学、儿童心理学以及趣味性设计理论, 探究以仿生理念为根基的儿童趣味性家具设计。文章先论述仿生设计学的主要意义、儿童身心发展的特性以及趣味性家具设计的重点之处, 然后从仿生形态与儿童认知相契合、仿生功能与游戏行为相符合、仿生意趣与审美心理产生共振这三方面讨论两者深层的关联。借此给出安全性、自然亲和力、多感互动、成长适配等四项设计原则, 并创建形态简化与安全转译、结构与功能仿生融合、游戏化互动体验植入、色彩材质情感协调四种设计策略。此项研究期望给儿童家具更新设计给予相关的理论支持和执行手段, 使得家具不再只是起到功能的作用, 而是成为伴随儿童成长、激发探索兴趣、保留天然智慧的玩伴和载体。

关键词: 仿生理念; 儿童; 趣味性; 家具设计

基金项目: 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编号: S202510603283)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45

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Fun Furniture Based on Bionic Concepts

Mai Baoyong¹ Wei Yuantong¹ Qin Huasheng¹

1. School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100, Guangxi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ren's furniture market, existing furniture is no longer able to meet the various needs of children in terms of functionality, safety, fun, and adaptabilit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fun furnitu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biomimicry, using biomimetic design, child psychology, and fun design theory. The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main significance of biomimetic desig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the key points of interesting furniture design. Then, it shows the deep correlation between biomimetic form and children's cognition, biomimetic function and game behavior, and biomimetic interest and aesthetic psychology resonance from three aspects. Based on this, four design principl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safety, natural affinity, multisensory interaction, and growth adaptation, and four design strategies are created, including form simplification and safety translation, biomimetic integration of structure and function, gamified interactive experience implantation, and color material emotional coordin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systematic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for the updated design of children's furniture, so that furniture is no longer just functional, but becomes a companion and carrier that accompanies children's growth, stimulates exploration interest, and preserves natural wisdom.

Keywords: Biomimetic concept; Children; interest; Furniture Design

作者简介: 麦堡勇(2002—),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韦远通(2004—),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通讯作者: 覃华盛(2004—),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引言

儿童家具市场发展迅速,消费需求逐渐多元,传统的家具已难以满足当代儿童的成长需求,如何在家具设计中兼顾功能、安全、趣味与适应性,是儿童家具领域迫切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仿生设计学作为一门从自然界中汲取灵感的设计研究,经由对生物形态、结构、功能及行为策略的系统性模仿,给产品设计增添了自然亲近感与感性价值。把仿生理念运用到儿童家具设计当中既能给家具赋予亲切又具创意的造型语言,又能符合儿童探望自然万物的天性,唤起他们的审美乐趣和对世界探究的兴致,促使儿童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做到身心全方位发展^[1]。当下,有些学者试着把仿生理念用在儿童家具造型及结构设计上,但系统地依照仿生理念形成儿童趣味性家具设计理论架构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依托仿生设计学、儿童心理学和趣味性设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构建起依靠仿生理念的儿童趣味性家具设计策略,希望给儿童家具的革新设计给予相关的支持。

1 相关理论基础

1.1 仿生设计学的核心内涵

仿生设计学源自仿生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主要针对生物经过漫长岁月进化而形成的良好形态、结构、功能、材料以及行为策略展开系统性考察并加以运用,其内涵牵涉到形态仿生、结构仿生、功能仿生以及色彩肌理仿生等大量方面的内容。依照模仿的内容可划分成形态仿生、结构仿生、色彩仿生和表面纹理仿生等类别;遵照模仿的对象归类,则有植物仿生、动物仿生、人类仿生以及微生物仿生等多种类型。就抽象程度而言,仿生设计还可再细分出具象仿生、喻象仿生和抽象仿生,这里面既有对生物原型较为完整再现的整体仿生,又涉及仅再家具某一处运用仿生原理的局部仿生^[2]。仿生设计在当代家具设计领域里,其意义并不仅限于对外形的自然复制,而是深入到结构优化、人机适配以及生态可持续等层面,仿生设计给产品赋予一种天然之美,带有活力且亲切、符合现代人追求自然的心理趋向。若将仿生设计运用到儿童趣味家具当中,便能让家具具备生动而温暖的自然特征,这正合乎儿童喜爱新奇、有趣以及探究事物的本质。

1.2 儿童的身心发展与行为特征

儿童的身心发展属于连续又分阶段的过程,各个年龄段的儿童在生理形态、运动能力以及认知水平上有明显的差别,这就给儿童家具设计带来了精确适配的需求。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把儿童的认知发展划分成四个阶段,即感知运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7—11岁)以及形式运算阶段(11岁以上)。处于不同阶段的儿童,其思维特点、学习方法和交往需求都会有所侧重,家具设计需依照儿童认知机制的变化适时作出调整。从自身认知视角出发,儿童的认知发展离不开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感官体验、运动行为以及空间考察都是儿童认知形成的关键路径,儿童家具应当充当儿童自身认知的载体与媒介。而且,儿童的行为具备游戏性、模仿性、短暂性与参与性的典型特性,在家具之上的活动常常带有探究和试验的意味,所以家具不但要符合基本的坐卧和储存功能,还要顾及安全、互动以及可发展性^[3]。深入把握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则和行为特点,才有可能进行仿生理念的趣味性家具设计。

1.3 趣味性家具设计

趣味性是儿童家具区别于其他家具的其中一个关键设计要素,主要依靠造型、色彩、功能以及互动形式的革新来唤起儿童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参与度。当下,国内儿童家具行业存在设计雷同、造型僵化、趣味性缺乏等情况,很难切实符合儿童生理与心理两方面的需要。良好的趣味性设计需依照娱乐益智性、安全性、可参与性以及可发展性的设计原则,从而让儿童在使用时收获正面的情感感受和认识提升。就实际路径而言,趣味性儿童家具的设计可以着眼于仿生造型、游戏功能、模块化拼接以及多感官体验等方面。仿生设计利用拟人化、夸张化、抽象化等手段,给家具增添鲜活有趣的形态语言,这有益于加强家具的趣味性及其情感魅力^[4]。而且,趣味性家具应具备玩具特性、运动特性与创造特性,才能让儿童在使用家具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享受到“玩”和“学”结合的乐趣。趣味性不是单纯从视觉上带来的短暂快乐,而是存在于儿童和家具频繁互动过程之中的一种持久的情感联系,值得在设计实践的时候全面考虑并仔细探究。

2 仿生理念与儿童趣味性家具的关联性

2.1 仿生形态与儿童认知的契合

按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2 到 7 岁的年龄段儿童处于前运算阶段, 此阶段儿童的思维具备直观形象性的特点, 更多依靠直接的视觉印象去认识并理解世界。从认知处理方面来讲, 仿生形态给儿童家具带来了“可阐释性”。学者刘丹在研究当中提到, 儿童家具既要符合使用需求, 又要不断满足情感层面的需求, 而仿生设计就是经由形态上的趣味化表现形式, 让家具不再只是冷冰的物品, 而是变成了儿童能够与其交流的玩伴^[5]。当一把椅子的靠背做成兔子耳朵的样子, 或者一张床的床头板设计成蝴蝶翅膀形状的时候, 儿童不用依靠抽象的文字解说, 凭借自己的感觉就能知道其造型的意义所在。这种直观的认知方法减轻了认知压力, 符合低龄儿童以具体思维为主的资料处理特性, 还能唤起儿童的想象能力和联想能力, 让普通的家具变成儿童认知发展中的有利因素。

2.2 仿生功能与儿童游戏行为的映射

仿生设计并非只是模仿形态, 还关乎到生物结构、机能以及行为方式的参考。仿生设计由静态形态拓展到动态功能方面的时候, 就同儿童的游戏行为形成了深入的对应联系。儿童的游戏行为是其认识世界、发展身心能力的关键路径, 这既是一种释放能量的方式, 又是认知提升和社会化学习的主要手段。功能仿生策略表明, 站在仿生角度去探究儿童家具设计, 可以将生物的结构特点和功能长处加入其中, 就能营造出更为安全、舒适又充满趣味的儿童成长环境, 使得家具不只是简单的存放物品或者承受重量的功能, 而是变成能激发儿童游戏行为的交互装置^[6]。仿生功能和儿童游戏行为之间的对应情况具体表现在模仿动物的运动方式、模拟动物的栖息行为以及借鉴动物的互动模式上。研究表明, 把仿生设计的结构原理同游戏机制结合起来, 可以让家具具备实用功能和游戏功能, 促使儿童在使用时自然而然地开展游戏行为, 做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如此一来, 仿生功能就不再是单纯为家具实用性服务, 而是成了儿童游戏行为的激发源和支持场所, 让家具由消极的“用具”变为积极的“玩伴”, 在功能和游戏之间创建起有机的对应联系。

2.3 仿生意趣与儿童审美心理的共鸣

“意趣”属于仿生设计美学范畴中的核心目标, 其不局限于形态模仿及功能拓展, 而是关乎意味悠长的观赏感受。在儿童家具设计语境下, 仿生

意趣表现为设计师针对自然生命形态加以诗意凝练, 并向家具注入活力与情感热度, 进而同儿童独有的审美认知产生一定的共鸣。站在生态美学角度考量, 仿生设计借助重现自然界生命形态所具有的有机美, 可以促使儿童亲近并喜爱世间万物, 此样的审美体验一方面符合儿童泛灵论的心理趋向, 另一方面也符合其对于美好事物的自然渴望^[7]。当一件家具流出生长的动势或萌态的神韵时, 儿童会赋予其人格化的想象, 由此激发的审美联想恰是儿童审美心理活动的核心特征。仿生意趣的实现还依赖于形式美法则与儿童审美偏好的有机结合, 设计师应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寻求平衡, 过于写实会限制想象空间, 过度抽象则可能丧失识别与联想的入口。良好的仿生儿童家具往往以圆润的曲线、柔和的色彩以及活泼的比例激发情感共振。依照儿童自然的成长规律, 把仿生设计同趣味融合实施情感化设计, 可以引领儿童在欢乐的审美过程中得到情感满足和人格陶冶, 让仿生家具变成儿童审美教育的关键承载物。

3 儿童趣味性家具的设计原则

3.1 安全性原则

安全性是儿童趣味性家具设计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儿童身体还处于在发育阶段, 行为难以预料, 所以任何趣味性的想法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有研究显示, 有些儿童家具存在甲醛含量过高、颜色刺眼, 大小不合适之类的问题^[8]。在材质和构造方面, 应用环保又无毒的材料, 把尖锐的地方打磨光滑, 孔洞之间的距离也要控制得当, 活动的部分还要装上防止夹伤的装置等。安全性原则为仿生设计划定了基本约束边界, 设计者须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追求形态趣味与功能创新, 实现安全与趣味的和谐统一。

3.2 自然亲和原则

自然亲和属于儿童趣味性家具设计的关键美学导向, 它倡导从自然界获取造型、色彩以及质感, 从而令儿童在使用时能体会到自然的气息及其亲近感。把自然要素融入到家具设计当中, 能够满足儿童对于生命体验深层次需求, 创建起儿童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联系。相关研究显示, 产品需具备审美价值和生态内涵, 儿童在使用的时候就能感知到大自然的生命活力及其秩序之美^[9]。在材质方面, 首先采用木材、竹材、棉麻等天然材质, 用温暖的手感和自然的纹路取代工业合成

材料。在形状上，则要巧妙运用具体的仿生法和抽象的仿生法，具体形体像如动物造型的凳子会马上激起儿童的识别好奇心，而抽象形体则是如花瓣、藤蔓之类加以提炼，既增添了自然气息又保留了想象空间。自然亲和观念下，儿童家具不再是单纯的功能性物品，而成了连接自然、体会生命意义的艺术桥梁。

3.3 多感互动原则

儿童的认知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感觉运动经验的不断丰富，多种感官共同参与有益于加强大脑神经联系，并促使家具由单纯的使用者变成积极的互动对象。从“五感”体验设计的角度看，家具设计需从形状塑造、材料搭配、颜色调和、气息营造等诸多方面入手，达成多感官体验的目的，从而改善使用者的感受并且具备启发智慧的作用。就实际操作而言，可以经由不同的材质触觉层次来达到多感互动，如光滑的木头表面、柔软的织物、粗糙的塑料等不同的质地相互结合，引领儿童依靠触摸去感受各种不同的信息，有趣味性的形状能够引发孩子们自愿伸手去碰触，而触感的变化又会让人产生不断探寻的好奇心。此外，可以参照动物的运动方式去设计可摇座椅，或者加入模仿自然音效的发声装置，如此一来家具就不会只是单纯地在视觉上显现出来，而会变成一个立体的感知区域，给儿童创建起一个充满探寻乐趣的世界。

3.4 成长适配原则

成长设计理念依靠儿童心理学及人机工程学知识，让产品具有安全稳固、趣味互动、成长适配以及认知启蒙等诸多功能。从结构上看，家具要有灵活的可调节机制，比如座椅高度可依身高调整，桌面角度也可遵照阅读、绘画等不同情景变化，以此保护儿童的脊椎和视力。就功能性而言，模块化设计较为有效。如幼年时期拆除复杂部件确保安全，孩童时期便增添收纳单元、益智面板等模块，不断适应各个阶段的心理及行为特点。仿生形状适宜做适度的抽象化处理，防止如具象的卡通造型般随年龄增大而失去审美魅力。成长适配原则需兼顾实用性、经济性与可持续性，才能让儿童家具变成伴随其成长的长久伙伴。

4 仿生理念下儿童趣味性家具的设计策略

4.1 形态简化与安全转译

形态简化和安全转译属于仿生理念用于儿童趣味性家具设计时所采取的主要策略，重点在于把繁杂的生物形态加以提炼并概括，变成一种既能保留生物特点精髓，又能符合儿童安全标准的造型。

从形态简化角度来讲，仿生设计不是简单模仿自然形态，而是一种艺术化的去芜存菁过程。自然界动植物形态往往细节繁杂，如果直接照搬过来，一方面加大制作困难，另一方面过多的细节也许会抑制儿童的想象余地。在进行设计时可提取生物最具代表性的轮廓特点并转化为简约而连贯的几何形状，如此一来可使家具既保留仿生趣味又具有现代美感。这种介于“像”与“不像”之间的造型方法，既可以唤起儿童的回忆和认知，又能给他们的想象留白。在安全转译方面，形态简化属于安全设计的一种手段，它削减了表层多余的突出部件，从根本上缩减了碰撞的风险，经由转译得到的所有边角和曲线都要仔细打磨成圆润的弧度，不宜保留尖锐的棱角。而且，孔洞、缝隙以及活动部件也要重新塑造其安全性，孔径要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以防夹伤人，可移动的部分应当安装限位装置。如此一来，形态得以精简，安全考量也能得到兼顾，优秀的设计可以在极其简单的形态当中融入诸多安全要素。

4.2 结构与功能仿生整合

结构与功能仿生整合是提升儿童趣味性家具创新价值的深层策略，它超越表层形态模仿，深入生物的内部结构与运作机制，将力学原理与功能特性转化为家具的结构方案与使用功能，使产品获得自然智慧的加持。自然界蕴含丰富的结构原型，如蜂巢的六边形结构用最少的材料达成了最大的空间利用率和承重强度，可以应用到收纳家具的隔层设计当中；树枝分叉结构表现出了合理的荷载传递途径，会给人带来灵感去改良桌椅腿足的支撑部分；贝壳的曲面既轻又强，可以给椅子背部和坐面的结构设计带来一些想法。把这些原理融合起来之后，会让力学性能变得更好，稳定性也会加强，从而使得家具产生出一种天然的逻辑美。

在功能整合方面，如昆虫翅膀具备可折叠机制，这给儿童桌椅的折叠收纳方案带来灵感；动物挖掘洞穴并筑巢的行为则激发了围合式家具的设计，从而满足儿童对于私密空间以及探究游戏的需求；植物存在向光性运动和触碰反应，这些

也给予人们关于可调节结构的想法,使得桌面的角度、座椅的高度能够按照儿童的需求而变化。通过仿生整合结构与功能,儿童家具便由一种静态的工具变成包含自然智慧的互动平台,把仿生设计向前推进到体验层面上,极大地充实了设计的含义。

4.3 游戏化互动体验植入

游戏化互动体验植入对于把儿童趣味性家具由“物品”升格为“玩伴”十分关键,该策略提倡在家具设计时运用游戏化思维并加入互动机制,让家具变成引发儿童游戏行为,保留探寻快乐的载体,达成使用功能与游戏功能的自然融合。从行为角度实施互动设计,使得家具具备可操作、可变换的结构特点,比如参照动物关节活动来规划可晃动的座椅,儿童坐着的时候就能体会到动感带来的趣味;按照昆虫折叠构造去规划可改变形状的桌面,儿童经由翻转拼接来做“变形”游戏;凭借模块化原则把家具拆解成若干个可以自由组装的部分,儿童就像玩积木一样重新布局空间环境,在搭建过程中获取创造的喜悦。

游戏化互动涵盖营造情境所带来的体验,仿生外观具有叙事能力,设计师应选用富有情境感的意象,引导儿童围绕家具展开角色扮演以创作故事。而且要把把握好适中原则,互动机制的复杂度需符合儿童年龄特征,若过于繁杂则会令低龄儿童产生失望情绪;若过为简单则难以吸引较大儿童参与,优良的设计在于协调简洁与有趣的关系,从而让儿童在持续探究过程中得到达成感和愉悦感。

4.4 色彩材质情感化协同

色彩和材质是儿童趣味性家具传递情感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相互依存,共同发挥作用。带有情感性的配合策略关注到色彩与材质融合的时候,应当环绕同一个仿生主题以及情感基调来执行,依靠视觉和触觉这两个途径唤起儿童产生快乐的情感回应。从色彩角度出发,可以选用低纯度、中明度的、柔和色调,比如嫩芽的浅绿、树皮的暖棕、花朵的淡粉等源于自然观察得到的颜色,不会因为强烈的刺激而给儿童的眼睛和心情造成不良的影响,而是会带来亲切感和安全感觉。在色彩调和方面,则要依照主次分明这个原则,把大面积的中性暖色做为基础,用小块的仿生装饰色来做点缀,如此一来既可以加强识别性,又

能够助力儿童树立空间观念和秩序意识。

从材质角度来讲,重点在于考察自然质感和温暖触感。如木材具有温润的触感和天然的亲切感,所以比较适宜作为主要材质;棉麻织物恰当用于座垫、靠背等会直接接触到人体皮肤,能给人带来舒服又安全的体验。不同材质之间的触感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光滑和粗糙、坚硬和柔软等,这些都能够丰富孩子的触觉体验,激发儿童去探究的兴趣。如此一来家具就能做到情感表达的完整统一,进而使得儿童在视觉和触觉一同作用之下得到浸润式的美好感受。

结束语

本研究以仿生设计学理论的出发,探究依靠仿生理念的儿童趣味性家具设计所包含的原理及其操作途径,研究表现出仿生设计学丰富的含义以及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特点,阐述了仿生形状同儿童认知、仿生用途同玩耍活动、仿生趣味同审美想法之间深层次的关系。依托于此,从安全、亲近自然、多种感觉互动、成长适配这四个方面形成起设计原则体系,并且提出四种系统性的设计策略,即形态简化与安全转译、结构与功能仿生整合、游戏化互动体验植入、色彩材质情感化协同。研究认为,按照仿生理念来设计儿童趣味性家具设计不能停留在单纯模仿形态层面,而是要去深入学习生物的构造、机能以及行为模式。良好的仿生儿童家具既是实用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是蕴含大自然智慧,能唤起儿童游戏欲望,伴随儿童一同成长的好伙伴和好桥梁。本研究创建的设计策略期望能够给儿童趣味性家具给予一定的帮助,推动儿童家具走向真正契合儿童身心发展需求的独立品类。

参考文献:

- [1]张炜,韩笑,张晓梅,王明惠.仿生设计在儿童家具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21,28(3):91-93.
- [2]吴晶晶,刘洪海.仿生设计及在趣味家具上的应用研究[J].林业机械与木工设备,2021,49(10):80-83.
- [3]贾如意,张继娟,王彩霞.基于认知特征分析的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J].家具,2024,45(2):49-53.
- [4]孟吉冬.仿生学在儿童椅类家具造型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10):453-454.

[5]曾艳萍.基于儿童家具情感化设计的思考[J].工业设计,2017(7):58-59.

[6]陈慧珍,杨亚萍.学龄前儿童家具的游戏性设计[J].工业设计,2021(6):106-107.

[7]朱芳.浅析仿生设计在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中的应用[J].戏剧之家,2019(6):130-131.

[8]张旭,王欣铨,孟玲.儿童家具安全性设计初探[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6):78-79.

[9]朱思璇,李纳璽,冯阳.生态美学视域下儿童家具的仿生设计与应用研究[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4,4(24):48-50.S

“新文科”背景下《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汪洋

(东莞城市学院, 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 在国家全面推进“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的背景下, 新文科建设成为传统文科专业改造升级的核心方向。作为新闻学专业的核心实务课程, 《新闻采访与写作》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内容滞后于业界发展、能力培养难以适配媒介融合需求等多重问题。本文首先厘清“新文科”概念内涵与时代要求, 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课程教学模式的局限, 提出一种“理论筑基—项目赋能—多元评价”三位一体的创新教学模式, 并从多个维度论证模式可行性。

关键词: 新文科; 新闻采访与写作; 教学模式; 创新路径; 可行性分析

基金项目: 该文章为 2023 年度校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成果, 项目编号 2023yjg002。新文科背景下《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实践路径研究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652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 of the Course News Interview and Writ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Wany Yang

Dongguan City University, DongGuan,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that China is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Six Excellences and One Top-notch" Plan 2.0,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has become the core direc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liberal arts majors. As a core practical course for journalism major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News Interview and Writing has multiple problems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content lagging behind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y training failing to adapt to the demand of media convergence. This paper first clarifies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and era requirements of "new liberal arts", analyz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curriculum teaching mode, proposes an innovative three-in-one teaching mode of "theory foundation-building, project empowerment, multiple evaluation", and demonstrat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od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teaching mode innovation of this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should tak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s the core and practical ability cultivation as the orientation to reconstruct teaching content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Keywords: New Liberal Arts; News Interview and Writing; teaching mode; innovation path; feasibility analysis

随着传播技术的迭代与媒介生态的深刻变革,新闻行业对从业人员的综合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传统意义上,《新闻采访与写作》作为新闻学专业的入门核心课,长期采用“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后习作”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在新的行业背景下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与此同时,国家层面提出的新文科建设战略,为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要求各类传统文科课程主动探索教学模式改革,以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需求。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围绕新文科背景下《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路径展开系统探讨,回应“新文科是什么、现有模式为何需要创新、如何创新、创新模式是否可行”四个核心问题。

一、核心概念界定与背景阐释

(一) “新文科”的内涵阐释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指出,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势在必行,要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建设,推出“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版,形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为2035年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根据2020年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新文科建设构建了以“新理论、新专业、新模式、新课程”为核心的“四位一体”建设模式[2],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学科边界的突破,新文科不仅体现为人文社科内部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更显著地表现为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深度交融,打破了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其次是研究方法论的升级,新文科从传统人文社科方法转向积极运用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的高度统一,推动知识生产方式的创新。最后是人才培养目标的重构,新文科坚持“以本为本”,强调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结构、能够解决复杂现实问题、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复合型文科人才。

“新文科背景下”则意味着课程建设与教学模式改革需要主动契合新文科建设的核心要求:在知识内容上融入跨学科知识,在教学方法上引入新技术手段,在能力培养上聚焦实践创新,在价值引领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使传统课程适应新的人才培养要求。

(二) 课程教学模式的概念与现有主流模式

课程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理念指导下,为实现特定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目前国内《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主要存在三种主流教学模式:

第一种是“理论主导型”教学模式,该模式以教材知识体系为核心,按照“新闻价值—选题策划—采访方法—写作技巧”的逻辑顺序开展教学,教师系统讲授理论知识,辅以经典案例讲解,课后布置独立写作练习。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但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学生难以将理论转化为实操能力。

第二种是“模块拆分型”教学模式,该模式将课程内容拆解为采访模块与写作模块,分别安排不同教师授课,或在教学周期内前半段侧重采访训练、后半段侧重写作训练,每个模块围绕特定技能点开展针对性训练。这种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技能训练,但模块之间割裂,学生难以形成对新闻生产全流程的完整认知。

第三种是“课堂讲授+校外实习”分离式模式,该模式将课堂理论教学与校外媒体实习分开安排,一般在完成课堂教学后,安排学生到媒体单位进行集中实习,希望依托业界实践弥补课堂教学不足。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实习单位指导力度不足、学生实践机会零散,多数学生仅能完成基础性工作,难以得到系统的采写训练,导致理论与实践仍然存在“两张皮”问题。

二、现有教学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分析

在新文科建设与媒介融合发展的双重背景下,现有《新闻采访与写作》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人才培养需求,创新改革的必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行业需求升级倒逼模式创新

融媒体时代对新闻从业者的能力结构提出了全新要求,除了传统的文字表达能力与采访沟通能力,还要求从业者具备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融媒内容生产能力、跨平台协作能力与智能工具应用能力[3]。传统教学模式以文字采写为核心,内容局限于平面媒体时代的采写规范,难以覆盖新媒体语境下的短视频脚本创作、数据新闻可视化、AI辅助写作等新技能,导致毕业生能力结

构与行业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据一项对地方高校新闻学毕业生的跟踪调研显示,超过六成毕业生认为在校期间所学的采写知识“部分过时”,近七成用人单位反映应届毕业生“融媒实践能力不足”,需要重新进行岗位培训[4]。

(二) 新文科建设要求跨学科融合

新文科建设的核心在于突破传统学科边界,实现跨学科知识融合。但现有《新闻采访与写作》教学模式普遍局限于新闻学内部知识,很少融入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统计学的数据处理方法、计算机科学的人工智能应用知识等,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单一,难以应对复杂的深度报道选题与融合报道生产。例如,在进行数据新闻选题时,学生往往因为缺乏基础的数据采集与清洗能力,难以完成高质量作品;在进行社会议题深度调查时,缺乏社会学研究方法训练,难以保证采访的系统性与结论的可靠性。

(三) 传统模式难以激发学生主体性

传统《新闻采访与写作》教学多采用教师中心的讲授模式,学生处于被动接受位置,学习积极性与创造性难以得到发挥。当代大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习惯了互动式、体验式学习,单一的课堂讲授难以吸引其注意力,而课后独立习作的训练方式,也因缺乏即时反馈与情境代入,难以调动学生的创作热情。同时,传统终结性评价以期末论文或单次习作成绩作为主要评价依据,无法全面反映学生在采访策划、团队协作、问题解决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也难以对学生的能力提升形成有效激励。

三、新文科背景下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路径

基于新文科建设的核心要求与现有模式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一种“理论筑基—项目赋能—多元评价”三位一体的创新教学模式,具体内容如下:

(一) 理论筑基: 重构跨学科融合的课程内容体系

打破传统以“采访流程+写作体裁”为核心的内容框架,构建“基础理论+跨学科方法+前沿技能”三维内容体系:在基础理论层面,保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真实性、新闻价值等核心内容,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理论教学;在跨学科方法层面,融入社会学深度访谈方法、社会科学研

究伦理、基础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视觉传播基础等跨学科知识,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在前沿技能层面,增加短视频新闻采写、数据新闻制作、AI工具辅助采访写作、融媒标题与叙事创新等内容,让教学内容跟上行业发展步伐。

在内容组织上,采用“核心理论+模块化拓展”的方式,核心理论部分保证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模块化拓展部分则根据技术发展与行业需求动态更新,保证课程内容的时代性。

(二) 项目赋能: 构建全流程沉浸式实践教学体系

以真实项目为核心重构教学过程,将课程从“以教师讲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实践为中心”。具体实施中,采用“学期大项目+阶段小任务”的组织方式:在课程开始阶段,指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确定一个真实的新闻选题,完成从选题策划、采访设计、实地采访到内容写作、融媒转化的全流程生产;每个教学阶段围绕项目推进的需求安排知识点讲授与技能训练,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在项目实践中巩固知识。

教学过程中引入“新闻编辑部”情境模拟,教师扮演总编辑角色,定期组织“编前会”“选题论证会”“稿件评改会”,学生以编辑记者身份参与讨论,模拟真实新闻编辑部的运作流程,增强情境代入感。同时,主动对接地方媒体、校园融媒体中心、地方政务新媒体等平台,拓展校外实践渠道,推动学生优秀作品直接落地发布,让学生获得真实的传播反馈,增强实践获得感。[5]

此外,依托项目实践推动跨学科协作,鼓励学生跨专业组队,与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等专业学生合作完成融合报道项目,在协作中实现知识互补,培养跨学科思维与协作能力。

(三) 多元评价: 建立过程导向的综合评价体系

打破传统“一考定成绩”的评价方式,建立“过程性评价+成果性评价+反思性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体系:过程性评价占总成绩的50%,覆盖选题策划、采访提纲、小组讨论、阶段进展等各个环节,全面记录学生学习过程;成果性评价占总成绩的35%,重点评价最终新闻作品的新闻价值、专业规范与创新程度,同时将作品的传播数据(如阅读量、转载量)纳入参考;反思性评价占总成绩的15%,要求学生完成项目全流程的学习反思报告,梳理自己在知识、能力、伦理等

方面的收获与不足,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自我成长能力。

在评价主体上,实现教师评价、学生互评、业界导师评价三结合,引入合作媒体的资深记者对学生作品进行点评打分,提升评价的专业性与行业契合度。

四、结论

本文在深入分析新文科建设时代要求与《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传统教学模式诸多局限的基础上,系统性地提出并论证了“理论筑基—项目赋能—多元评价”三位一体的创新教学模式。经过多维度审视,可以得出如下扩展结论: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培养具备解决复杂实际问题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从根本上要求课程教学从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接收”的单向知识灌输,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能力建构”模式。本研究论证的创新模式正体现了这一转向。它不再将《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视为一系列孤立采访技巧和写作规范的集合,而是将其定位为培养学生新闻专业素养与综合实践能力的“能力工场”。在此范式中,“理论筑基”已非教学终点,而是为深入实践提供分析框架和价值指引的起点。“项目赋能”将真实的、具有复杂性的问题情境引入课堂,迫使学生在从选题策划到融媒呈现的全流程实践中,主动整合跨学科知识,应对未知挑战,从而在“做”中“学”、在“用”中“建”。“多元评价”则超越了以标准化考试衡量碎片化知识的模式,转变为对学习过程、实践成果与认知升级的综合性、诊断性评估,从而精准服务于能力发展的可视化与持续优化。这一系列变革旨在确保学生毕业时,不仅“知道”新闻采写是什么,更能“执行”新闻生产,并具备适应未来行业变革的“心智模式”与“学习能力”。本文提出的模式并非孤立的环节改良,而是一个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理论”、“项目”、“评价”三大模块构成了一个协同联动的闭环。“理论筑基”为“项目赋能”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使实践免于盲目;“项目赋能”作为关键载体,促使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应用和升华,并生成可供评价的丰富过程与最终成果;“多元评价”则从多维度、多主体反馈项目的得失,为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性整合(如“反思性评价”的设定)及后续教学的改进提供了依据,由此形成一个“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深化理论、评价反馈双促进”的良性循环。针对新文科“跨学科融合”的宏观要求,模式给出了具

体可操作的路径。它不仅体现在课程内容上引入社会学方法、数据分析等知识模块(理论筑基),更关键的是通过“项目赋能”鼓励学生跨专业组队,在完成真实数据新闻、深度社会调查等任务时,必须打破专业壁垒,与技术、社会科学背景的同伴协作。这种基于真实问题和共同目标的“嵌入”式融合,远比泛泛的课程模块交叉更为深刻和有效,真正实现了知识结构与应用能力的复合化。该模式精准回应当前教学中的痛点。针对“理论实践脱节”,它以真实项目贯穿始终,使得每个知识点的学习都直接服务于解决项目中的实际问题;针对“内容滞后于业界”,它通过“前沿技能模块”的嵌入以及与地方媒体、融媒平台的合作,将业界的最新技术(如AI辅助工具)和真实发布平台引入课堂;针对“评价方式单一难以激励学生”,它通过将过程性表现(占总评的50%)、成果质量(35%)与个人反思(15%)相结合,并与业界评价挂钩,全面、动态地反映学生成长,更有效地激发其主动性。模式的顺利实施与价值发挥,有赖于以下关键支撑条件的完善与协同演进:模式的成功实施,要求教师从传统的“知识权威”转变为项目的“总设计师”、“资源协调员”和“引导型专家”。这需要教师自身具备更强的跨学科知识储备、真实的媒体实践经验,以及驾驭项目式教学全过程的能力与精力投入。因此,教师的持续发展与团队化合作至关重要,这包括引进业界导师、跨学科师资协作以及面向教师的培训转型。“项目赋能”依赖于丰富的案例库、实践基地和技术平台支持。学校需要积极建立与地方媒体、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的深度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源源不断的真实选题来源和发布渠道。同时,配备数据新闻实验室、VR/AR沉浸式采访模拟等设施,也将极大增强项目实践的深度和前沿性。本研究构建的是一个在当前技术与社会语境下的框架性方案。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如生成式AI在信息搜集与初稿撰写中的应用)、传媒业态的持续裂变,该模式的具体内容必须保持开放性。未来的教学团队需持续追踪行业发展动态,将诸如AIGC时代的新闻伦理、人机协同的采写流程等新课题,动态纳入“理论筑基”与“项目赋能”中,定期优化教学项目库与技术工具包,使模式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与前瞻性,真正成为适应“未来新闻业”的人才孵化器。综上,在新文科建设的宏大叙事下,《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是系统性的范式变革,而非零敲碎打的修补。本文所提出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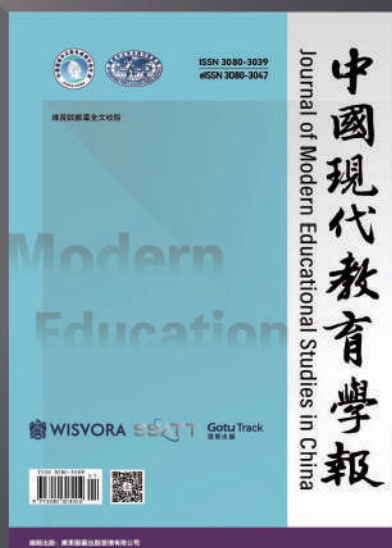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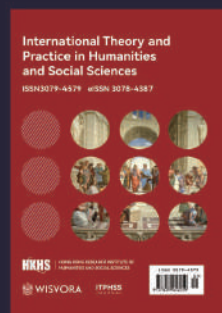
筑基—项目赋能—多元评价”三位一体模式，提供了从理念到方法再到评价的一条清晰、务实的转型路径。它通过构建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于一体的综合性学习生态系统，为破解传统教学的窠臼、培养适应媒介融合与智能传播时代的卓越新闻人才，提供了一个具备理论根基和实践潜力的范本。这一模式的深度探索与持续完善，对于推动整个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与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 [1] 吴岩，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 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J]. 中国高等教育, 2021, (Z1): 4-6.
- [2] 王铭玉，张涛，新文科建设：内涵、路径与方向[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 (11): 42-48.
- [3] 宫承波，张冠中，融媒时代新闻采访写作能力重构与教学转型[J]. 新闻爱好者, 2023, (03): 19-23.
- [4] 张红军，融媒体时代<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教学改革路径探索[J]. 新闻战线, 2021, (18): 82-84.
- [5] 王蕾，朱婧，新文科视域下<全媒体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教学改革探究[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3, (05): 124-127.

WISVORA 出版社：專注於學術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編輯、論文出版和國際索引、期刊創辦、期刊託管等服務，增強學術研究的全球傳播和影響力。

www.wisvora.com



中國現代教育學報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中國現代教育學報》是一份聚焦中國教育現代化進程、服務教育強國戰略的學術期刊。期刊以推動教育學理論發展與教育實踐創新為核心使命，重點關注課程改革、教育政策、教學理論、教師發展、教育技術等重大議題，致力於在新時代教育變革背景下，探索更為科學、高效、人本的教育路徑。

印刷出版 ISSN 3080-3039

網上出版 ISSN 3080-3047



學術贈閱

權責聲明

本期刊所刊載的評論、意見、觀點等均出自文章作者個人立場，不代表本期刊的觀點或看法。對於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內引用材料給任何個人、機構、及其財產所帶來的任何損失及傷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擔任何責任。我們鄭重聲明，本出版社的出版業務，不構成對任何產品商業性能的保證，也不表示本社業已承認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內容適用於某特定用途。如有疑問，請尋找專業人士協助。